

第 2 届 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蒙古袭来与 13 世纪蒙古帝国的国际化

■ 论坛主旨

在东亚地区，“历史和解”问题作为一个重大课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通过和约与联合声明，国家间的和解可以在法律层面得以成立。然而，在国民层面，和解却举步维艰。因此，这种状态很难说达到了真正的国家间的和解。历史学家们能够为历史和解做出怎样的贡献呢？

渥美国际交流财团于 2015 年 7 月召开了第 49 届 SGRA（关口国际研究会）论坛，论坛的主题是“东亚的公共财产”与“东亚市民社会”的可能性。在讨论之中，我们认为应该首先构筑起东亚“学知的共有（公共）空间”亦或是“学知的平台”，通过这一工作，为东亚提供更多的智慧，以资区域和解，我们确信，这一过程是具有非凡意义的。2016 年 9 月举办的亚洲未来会议，成为了构筑这一平台的时机，我们为平台设定了“国史对话”主题，并在会议中召开了第一届“国史对话”。至今为止，我们三国学者之间已经举办了各种内容的对话，但是在各国历史研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国史研究者”们还没有进行过深入的对话。基于此种认识，我们决定首先在东亚这一范畴内摸索各种使探讨历史对话成为可能的条件。具体方案是基于三谷博老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葛兆光老师（复旦大学教授）、赵珣老师（高丽大学名誉教授）的演讲，共同讨论三国各国历史中是如何处理在亚洲区域发生的史实的。

第二届对话对话中，为了更加具有建设性地理解本国与外国历史间的关系，我们将主题设定为“蒙古袭来与 13 世纪蒙古帝国的国际化”。将 13 世纪上半叶发生的“蒙古袭来”放在各国“国家历史”中讨论的时候，日本会强调日本文化独立这一视点，而中国会一面将蒙古（元朝）看作本国历史的一部分，一面却将“蒙古袭来”当作是蒙古、日本与高丽之间发生的中国以外的历史事件。但是，从东亚视野来看，蒙古建立的元朝对高丽与日本的入侵唤醒了各国的自我意识，这一历史事件正象征了政治层面上华裔秩序的一种变奏。我们十分期待，在“国史”与东亚国际关系史的接壤处，蕴藏着崭新的历史认识。

当然，出于本会议的宗旨，目的是客观看待现存的多种历史认识，并非是通过“对话”得到某种共识。

另外，为了使对话更为顺畅，会议提供日⇌中、日⇌韩、中⇌韩同声传译服务。

何为SGRA？

SGRA 是以长期留学日本并在日本的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来自世界各国知日派研究人员为中心组建的，其研究宗旨在于为勇于挑战全球化的个人或组织制定方针和战略时提供有益的帮助，为解决问题建言献策，并将其研究成果以论坛、报告书、网页等形式，广泛公诸于社会。对于每个研究课题，都分别由多国籍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人员组成研究小组，凝聚多门科学智慧，构建跨领域网络，从多方面的数据入手，展开分析和考察。SGRA 不以特定的学科或某一群专家为对象，而是以整个社会为对象，展开领域广泛，跨学科、跨国界的研究活动。为培养优秀地球公民做出贡献乃是 SGRA 的基本目标。详情请浏览主页。（<http://www.aisf.or.jp/sgra/>）

SGRA瓦版

每周四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SGRA 论坛等的通知和世界各地 SGRA 会员的文章。任何人都可以免费订阅 SGRA 瓦版。想要订阅的读者可以通过主页自动登录。<http://www.aisf.or.jp/sgra/>

第 2 届 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蒙古袭来与 13 世纪蒙古帝国的国际化

时 间 | 2017 年 8 月 7 日 (星期一) ~ 9 日 (星期三)
地 点 | 北九州国际会议场国际会议室等
主 办 | 渥美国际交流财团关口全球研究会 (SGRA)
协 办 | 北九州市 / (公益财团) 北九州观光国际会议协会
赞 助 | 鹿岛学术振兴会财团

开幕主持 | 今西淳子 (渥美国际交流财团)
主旨介绍 | 三谷 博 (跡见女子学园大学)

※ 配备中日韩同声传译

开幕议程	[主持: 李 恩民 (樱美林大学)]	
【基调演讲】	“后蒙古时代”? ——重新审视 14—15 世纪的东亚史 葛 兆光 (复旦大学)	5
第 1 讨论小组	[主持人: 村 和明 (三井文库)、彭 浩 (大阪市立大学)]	
【发表论文 1】	作为蒙古影响力一环的“蒙古的袭来” 四日市康博 (昭和女子大学)	10
【发表论文 2】	异密阿儿浑及他在呼罗珊等地进行的两次户口调查 朝克图 (内蒙古大学)	24
【发表论文 3】	解读《蒙古袭来绘词》—二つの奥書の検討を中心に 橋本 雄 (北海道大学)	32
第 2 讨论小组	[主持人: 徐 静波 (复旦大学)、娜荷芽 (内蒙古大学)]	
【发表论文 4】	从古代蒙古人的姓名看蒙古人与外族的关系 额尔敦巴特尔 (内蒙古大学)	46

向 正树 (同志社大学)	【发表论文5】	蒙古帝国与火药武器	58
	【发表论文6】	朝鲜王朝所修高丽史书对元东征日本的历史书写	70
第3讨论小组		孙卫国 (南开大学)	
	[主持人：韩承勋 (高丽大学)、金同泰 (高丽大学)]		
	【发表论文7】	东征日本中高丽忠烈王的政治意图	86
		金甫桃 (嘉泉大学)	
	【发表论文8】	对蒙战争及其讲和过程与高丽政权所处环境的变化	94
		李命美 (首尔大学)	
	【发表论文9】	浅析北元与高丽关系-以禡王时期关系为中心	106
		其林道尔吉 (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第4讨论小组		[主持人：金范洙 (东京学艺大学)、李恩民 (樱美林大学)]	
	【发表论文10】	14世纪时期蒙古帝国的饮食文化向高丽的传入与变化	118
		赵阮 (汉阳大学)	
	【发表论文11】	“深簷胡帽”考：一种女真帽式在蒙元及此后时代的盛衰史	129
		张佳 (复旦大学)	
		综合讨论	142
		主持 / 总结：刘杰 (早稻田大学)、论点整理 / 赵珖 (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 总结 / 三谷博 (跡见学园女子大学)	
		代后记	
		金同泰 168 三谷博 170 孙军悦 172 娜荷芽 174 彭浩 176	
		著者简介	178
		参会名单	180

基调演讲



“后蒙古时代”？ —重新审视14-15世纪的东亚史

葛兆光

复旦大学

原文为中文，日语翻译：宋刚（北京外国语大学）

SGRA | 28 | REPORT

提 要

14-15 世纪之间（1368-1420），笼罩欧亚的蒙古势力在东亚逐渐溃退，这是东亚各国关系重新调整的枢轴时代，或许我们可以把它叫作“后蒙古时代”？在这半个世纪中，东亚经历了妥协、冲突、再平衡，终于在“应永外寇”/“己亥东征”事件之后，大体形成了一个以朝鲜“事大交邻”为中心，彼此协调的东亚新秩序。很多历史学家曾经把“蒙古时代”看成是世界史/全球史的开端，但“蒙古时代”之后，作为世界史一部分的东亚史，它的基本特点是什么？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历史问题。

1 . 关键时期

历史上，有一些“关键时期”值得一再讨论。

在中国史上有不少“关键时期”，使得前后两个时代呈现出不一样的历史风貌，这里不妨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唐宋之际，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假说一出，立即让人聚焦755年（安史之乱）至1005年（澶渊之盟），历史学者纷纷要考察这两个半世纪，如何造成了中古中国与近世中国的巨变¹；再比如，张灏所谓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则把1895年到1925年凸显出来，晚清民初的甲午战败、戊戌

1 内藤湖南《概括の唐宋时代观》，日文本，见《历史と地理》9卷5号（1922.5）；1-11页；英文本，见宫川尚志：An Outline of the Naito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载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14 ; No.4 (1955), p.533-552；中文本《概括的唐宋时代观》，黄约瑟译，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1卷《通论》。

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被连接起来，在知识群体、新闻出版、教育选举、政治制度、宗教文化等方面，显示了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深刻转型²。

这种历史“关键时期”的意义，简单地说当然可以使用“承先启后”一词。已经有学者指出，在这些“关键时期”，往往造成一个王朝/国家内部的深刻变化；但是，在超越王朝/国家的区域史里，是否也可以有一些重要时期值得讨论呢？在这些“关键时期”中，各个国家与地区的位置、力量与利益在重新“洗牌”，过去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平衡被建立起来，于是，奠定了后一段历史时期的稳定，构筑了一个较大区域的国际关系。

我想提出来的，就是蒙古的世界帝国在东亚逐渐解体之后，从1368年到1420年发生在东亚的一段历史³。我以为，这一段时期也可以算是东亚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因为在这五十年里，蒙古势力逐渐退却，东亚的大明王朝、李朝朝鲜和足利日本，在经历了复杂的往来、折冲和妥协之后，以“应永外寇”/“已亥东征”事件为节点，大体奠定了此后东亚的基本格局：即以朝鲜“事大交邻”为轴心，构成了明朝、朝鲜、日本的基本平衡。此后几个世纪中，尽管也有倭寇事件、“壬辰之乱”、“明清易代”这样一些动荡和变化，但是，这个东亚国际的基本平衡格局一直延续了数百年，要到十九世纪中期，才被西方来的坚船利炮所彻底颠覆。

2. “蒙古时代”之后

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鸟瞰14、15世纪之间（1368-1420）这五十来年的历史。

横扫欧亚的蒙古大帝国在十四世纪中叶之后，在东亚逐渐溃退。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了汉族统治的明朝；1392年，李氏取代高丽王氏建立朝鲜；同一年，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逼退南朝后龟山天皇，结束南北分裂的局面；1400年，安南的黎氏取代陈氏；五年之后（1405），开始转向东方，对明王朝构成威胁的跛子帖木儿（Tamerlane）去世，帖木儿帝国陷入争夺汗位的混乱中，不再有余力觊觎东亚⁴。

我们可以把这一段时间，看成是“蒙古时代”之后的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个关键时期里，东亚各国之间都在调整。（1）一开始，明初中国并不稳定，内部问题牵扯，因此，一方面试图重建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另一方面也采取妥协的方式，宣布“十五不征之国”⁵；一方面重点放在东北和西南，试图廓清边疆隐患，另一方面又对周边异国采取安抚政策，甚至对鞑靼和兀良哈也采取招抚策略⁶。（2）新建立的朝鲜王朝既要得到明朝的承认，不能不采取“事大”的姿态，也要缓和与日本的关系，重新建立“交邻”的关系；（3）日本足利义满既要小心明朝与朝鲜联合对日本构成威胁，又要试图改变“元寇”之后日本的孤立状况。自从1374、1380

2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载张灏《时代的探索》（台北：中央研究院·联经，2004），51页。

3 已经有人提出，世界近代史应当从蒙元溃退、明朝建立的1368年开始，见赵现海《世界近代史的起点与明代中国的历史分流》，载《中国史研究动态》（北京）2016年第5期，42-43页。

4 英国学者达尔文（John Darwin）在《全球帝国史：帖木儿之后帝国的兴与衰（1400-2000）》（陆伟芳、高英芳译，大象出版社，2015）的开头，也指出帖木儿之死“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全球史中一个长时段的终结”。《前言》1页，正文，3页。

5 《明史》卷三百二十二《外国三·日本》记载“列不征之国十五，日本与焉。自是，朝贡不至，而海上之警亦渐息”。8344页。

6 见《明太祖实录》卷一二四（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壬寅条）。

两度被明朝拒绝遣使往来之后⁷。为满足明朝的虚荣，1401年以“日本准三后道义”之名上书，接受明朝册封，又以对等方式，用“日本国王”对“朝鲜国王”，和李朝朝鲜建立邦交。(4) 再看琉球。洪武五年十二月，杨载作为使者赴琉球中山国，带去明太祖的诏书，两年后中山国王尚察度的弟弟来到中国进贡，并且接受了《大统历》，正式进入明朝的朝贡圈；(5) 安南在这一段时间内，由于内部纷争以及占城入侵，逐渐衰弱。洪武五年（1372），安南陈叔明杀陈日烺自立，派遣使者来明朝贡，蒙元时代都一直无法控制的安南，至此算是纳入明朝的朝贡圈；(6) 最后再看西北的帖木儿王国。十四世纪末到十五世纪初，帖木儿征服西亚和中亚，甚至北印度和中东，这时曾经试图转向东方，进犯中国，但是由于1405年帖木儿去世后，继任人也改变原来的态度，与明朝建立了比较友好的关系。

这样，在东北亚暂时形成了一个彼此妥协的新秩序。

3. 后继者们的尝试

但是，在十四世纪末、十五世纪初，明太祖（1398年卒）、李朝太祖（1398年退位，1408年卒）、足利义满（1394年让位，1408年卒）相继去世，接下来的继承者似乎试图改变这种相对平衡的东亚秩序。永乐皇帝不仅先后五次远征蒙古余部，而且向南试图将安南“改土归流”，建立直属明朝的交趾，设“交趾都指挥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⁸；足利义持则居高临下，不再承认大明的宗主地位⁹，又以“日本将军”对“朝鲜国王”，试图在国际关系上凌驾于朝鲜；而朝鲜强硬的国王太宗，则于1419年突然进攻日本的对马，造成日本的极大震撼，也引起日本关于明朝与朝鲜是否会联手进攻日本的疑虑¹⁰。应当说，这一疑虑虽然查无实据，但事出有因，因为明朝一改洪武朝的保守策略，由于收到朝鲜方面的屡次报告（说日本在“大修战舰，欲寇中国”），永乐皇帝对日本相当不满，甚至借口日本以朱元璋画像为箭靶，对日本发出“发船万艘讨之”的威胁¹¹。显然，朝鲜敢于主动出兵侵占对马岛恐怕与此有关，也与同一年（1419）六月明朝总兵刘江在辽东望海埚

7 田中健夫《中世对外关系史》（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75），特别是第一章。

8 见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洋学文献中心丛刊，第42辑，1984）“本纪”卷九，494页。大致过程是：永乐二年（1404），明朝即要求安南割让谅山、禄州，使得安南被迫把“古楼等村凡五十九村还之”；永乐四年（1406）四月派遣征南将军韩观、参将黄中率十万军马，借送陈添平返国的名义进攻安南，占领了谅州、武宁、北江、嘉林等地；九月更派遣太子太傅朱能为征夷大将军，率征夷副将军张辅、参将陈旭，以及征夷副将军沐晟、参将李彬，各率四十万军队分别进攻坡壘关和富令关，随后几乎占领整个安南。次年（1407），以陈氏没有可以继承国王者为由，将安南改为明朝的郡县，据记载，明朝征服安南，“获府州四十八，县一百六十八，户三百一十二万九千五百，象一百一十二，马四百二十，牛三万五千七百五十，船八千八百六十五”。以上见《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八，487-490页，卷九，493-495页。此外，可以表现永乐皇帝对外政策从保守转为进取姿态的，除了征服安南和远征蒙古之外，还包括（1）七次派郑和下西洋，开拓东南亚及印度洋，（2）派遣宦官赴阿姆河流域，（3）设置努尔干都司，（4）派遣侯显、李达赴内亚和西藏等等。

9 永乐九年（1411），足利义持拒绝接见三宝太监王进，王进只好靠“夷妇密引”，才得以从兵库回国；永乐十六年（1418）三月，又拒绝接见明朝行人吕渊，不允许他进入京都。参见汪向荣《明史日本传笺证》（成都：巴蜀书社，1987），44-46页。

10 日本对于中国深有戒心，也许是仍然停留在蒙古袭来的历史记忆中。李朝朝鲜的《世宗实录》卷十（世宗二年十月癸卯，1420）记载了这次使团的通事尹仁甫《复命书》，其中记载：“臣等初到其国，待之甚薄，不许入国都。馆于深修庵。……继有僧惠珙来问曰：闻大明将伐日本，信否？答曰：不知也。珙曰：朝鲜与大明同心也，何故不知。先是，大明使宦者敕曰：若不臣服，与朝鲜讨之。继而使者畏害而逃，故疑而问之”。此事在宋希璟《老松堂日本行录》中也有记载，说日本僧人惠珙对宋希璟说，去年（1419）夏天对马之战，是朝鲜和大明联手攻日本。见《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第一册，62页。

11 同上，第一册，永乐十一年（1413），255页；永乐十四年（1416），265页。

全歼登陆的倭寇这一事件有一定呼应关系¹²，明朝对日态度的改变，恐怕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朝鲜对日本采取的强硬态度。

这一事件，在日本叫作“应永外寇”，在朝鲜叫作“己亥东征”。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日本派遣博多妙乐寺僧人无涯亮倪以求大藏经为名去朝鲜，恰好也在这一年，强硬的朝鲜太宗去世，本来就不赞成所谓根本解决倭寇问题的朝鲜世宗执政，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才算得到缓解。正是在这一逐渐和缓的国际背景下，第二年（1420年），朝鲜方面以宋希璟作为“回礼使”出使日本，并向日本赠送大藏经，开启了此后长达数百年朝日外交交流史，也从此基本奠定了以朝鲜“事大交邻”为轴心的东亚国际秩序¹³。尽管此后也有“壬辰之役”等等波澜，但在近代西潮东渐，根本改变东亚面貌之前，大体上东亚的中国、朝鲜、日本、蒙古、琉球、安南诸国之间，仍然延续了“后蒙古时代”的这一基本格局。

4. 解放后东亚诸国的行动

很多历史学家都把蒙古帝国时代，看成是世界史的开端，比如本田实信、冈田英弘、杉山正明等¹⁴，但是，也应当注意到，这个横跨欧亚的世界历史，刚刚翻开一页，就遭遇剧烈变化，这个世界从合而离，又分成若干个各自独立的空间。从蒙古帝国统治和威胁下解脱出来的东亚诸国，在“蒙古时代”之后，就出现了有意思的变化，形成了一个特别的历史世界。

在这一段时间里，东亚各国都开始重建自己的政治与文化。

首先看中国。明朝建立以后，为了确立取代蒙元的大明王朝的合法性，朝廷开始广泛并严厉地“去蒙古化”。张佳《新天下之化》中指出，明初重建汉族文化传统，不仅仅包括简单的“禁胡服、胡语、胡姓”，也包括对不同等级人士的服饰制度的规定，对混入胡人风俗的婚丧制度的管理，对社会上各种等级制度的强调，对各种礼仪风俗的重新规范，明初官方通过一系列严厉的整肃，试图恢复汉族传统生活规范、重建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以及塑造上下有序的儒家政治秩序，也就是“从文化、风俗、文献甚至血统上，泯灭蒙古的存在”，特别是，明初通过科举考试与提倡儒学，使得政治与文化又重新回到汉族中国传统轨道¹⁵。

其次看日本，正如内藤湖南在《日本文化的独立》一文中指出的，“蒙古袭来”事件非常重要。日本的“文化上对外独立的观念的产生，与这些事情（蒙古大军船

12 这一年（永乐十七年，1419）六月，明朝与日本之间也出现冲突。《明史》卷三二二《外国二·日本》中记载较详细，“倭船入王家山岛，都督刘荣率精兵疾驰入望海埚，贼数千人分乘二十舟，直抵马雄岛，进围望海埚。荣发伏出战，奇兵断其归路。贼奔樱桃园，荣合兵攻之，斩首七百四十二，生擒八百五十七”。8346页；《明实录》中，“都督刘荣”作“都督刘江”，说“辽东总兵官中军都督刘江以捕倭捷闻”，在望海埚“擒戮尽绝，生获百十三人，斩首千余级”，《明太宗实录》卷二百十三，2141-2143页。又，可以参看明代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中的“日本”部分。

13 当然，日本国内形势是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在“应仁之乱”（1467-1477）后，日本陷入长达一个世纪的内乱，根本无暇顾及海西，只是由山口的大内氏以“日本国王”名义，掌控了白银开采与海外贸易，所以，东亚海域内国与国之间关系大体上相对平静而彼此冷淡，搅起局部风波的，只是倭寇的沿海骚扰与掠夺。一直要到丰臣秀吉统一日本，才开始发生变动。

14 见本田实信《蒙古时代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冈田英弘《世界史的诞生：蒙古的发展与传统》（陈心慧译，台北：广场出版社，2013）；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周俊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杉山正明《蒙古帝国的兴亡：军事扩张的时代·世界经营的时代》（孙越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15 张佳《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只被大风刮得七零八散，溃不成军）的发生有很大关系……日本一直把中国尊崇为日本文化之师，可就是这位文化之师居然被犬的子孙蒙古所灭，……正因为如此，对日本来说，中国也就不足为尊了”，从此发展出“日本乃神国”的观念，加上后来怀良亲王针对明太祖的威胁，采取强硬回应的态度，使得日本在中国面前开始扬眉吐气。所以内藤说，因为这些背景，“日本文化从根本上实现了独立”¹⁶。

再看朝鲜。在依违于北元与明朝之间的高丽王朝于十四世纪末被李氏取代之后，新兴的朝鲜王朝开始重新调整对中国的交往姿态。一方面在政治上，他们承认明王朝作为宗主国，也接受明朝的册封，但也觉得朝鲜只要“且卑辞谨事之”就可以了。但另一方面在文化上，他们则开始采取比明朝更加严厉的措施，推行儒家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政治理念和道德伦理。表面上看，朝鲜王朝似乎与明代中国有着颇为相似的政治与文化，但由于朝鲜的国际位置、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因而比起中国来，他们的儒家观念、伦理制度以及道德要求，比起中国来更加严厉，并且维持更加久长，因而逐渐滋生出谁更“中华”的自觉意识¹⁷。

5. 东亚关系史的基本特征

1420年，永乐皇帝从南京迁都北京，这时，蒙古势力已经逐渐衰退，不再能直接威胁东亚¹⁸。同一年，朝鲜使臣宋希璟赴日本，朝日之间开始呈现稳定的关系。

那么，在“蒙古时代”之后，东亚史或者说东亚关系史基本特点是什么？我的看法是，在欧洲坚船利炮进入东亚，打开东亚大门，形成“冲击”之前，东亚史的特点有三：（1）环东海诸国以朝鲜“事大交邻”为中心，大体有一个基本稳定的东亚秩序，这个秩序从十四世纪中叶之后开始形成，到十五世纪二十年代基本奠定，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中叶，几乎延续了四百多年；（2）由于蒙古入侵与溃退，刺激了各国文化上的“自我中心主义”崛起，也就是说，各国在政治与文化上的独立意识逐渐唤醒而形成，过去混沌一团的“认同”，出现了政治承认、文化认同和经济利用之间的分化，特别是在中国发生明清易代，日本和朝鲜认为中国已经“华夷变态”的17世纪中叶之后，这种认同上的分离状况就越来越严重；（3）环绕着东亚海域，形成了一个贸易圈，官方的朝贡贸易只是其中很小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商贾推动的物质流通。在这四个多世纪中，在这个环东亚海域的国际环境里，各国在经济上彼此联系，在文化上开始竞赛，在政治上互相角力，其间虽偶有激烈冲突，但又往往能够相互妥协，这个历史格局一直延续到西方通过坚船利炮对东亚发生冲击的19世纪中叶。

2017年4月匆匆于上海

16 内藤湖南《日本文化的独立》（1922年的演讲），载内藤湖南《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刘克申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17页、122页。

17 如朝鲜儒学学者李退溪就认为，严格遵守儒家的伦理道德，才是“中华”之所以为“中华”的根基，因此，文明不一定以圣贤和经典所产生的地域来确立，朝鲜当然也可以成为文明的正宗，这就是后来朝鲜“小中华”意识的渊源之一。李退溪在《成王皇华集序》就说，“我东国天昼壤地，邈在海表，然而箕子之所受封，孔圣之所欲居，礼义文献之称，其来尚矣”。见《朝鲜文集丛刊》第三册，卷五十九，261页。

18 在永乐时代，明王朝对北方蒙古采取进逼姿态，永乐屡次北征，蒙古内部也出现问题，因此，鞑靼和瓦剌两大部暂时安定，瓦剌三王、阿鲁台封爵，兀良哈建三卫，随后又被击溃，因此北方边疆暂时稳定。

发表论文 2



作为蒙古冲击一环的“蒙古袭来”

四日市康博

昭和女子大学 外聘教师

原文为日文，翻译：宋刚（北京外国语大学）

提 要

13世纪到14世纪，蒙古帝国及其继承政权席卷欧亚大陆，其支配与影响遍及各个地区和社会。在欧亚大陆出现超越语言、宗教、民族等文化性框架的蒙古式共通形式。以经济、文化交流的背景下，蒙古霸权下安定的东西往来被称作“蒙古和平”即Pax Mongolica。但是该概念只是片面看法，无法说明经济、文化交流的全部内容，也并不意味蒙古霸权下欧亚大陆迎来了没有战争的和平状态。蒙古与欧亚各地的文化圈和社会之间，时而冲突、时而相克、时而共存、时而融合，两者的交流呈现出多角度、多层次的特点。在欧亚各地，有所谓“蒙古冲击”Mongol Impact。只有认识到各地域和社会对此各有对策，才能理解交流的内容及随后的影响。因此“蒙古袭来”，不仅指短期的政治军事冲击，也包括长期经济、文化影响。所以“蒙古和平”与“蒙古冲击”是共存且互为表里的概念。理解欧亚整体的“蒙古和平”，需要先了解欧亚各地的“蒙古冲击”的态度以及对策。日本曾两度遭受蒙古侵略，也是最早开始研究“蒙古袭来”的国家。但是，先行研究都着眼于日本与元朝两国间关系，或者与高丽的三国间的外交、军事关系。蒙古帝国即元朝的对外侵略并不仅限于日本，而是包括越南、占城、缅甸、爪哇、琉球、库页岛等海域在内的亚洲全境，相互间并非毫无关联。而且在亚洲各地，“蒙古冲击”的影响其后也长期性持续。

前言

13世纪至14世纪，蒙古帝国及其继承政权将国家统治范围扩大到亚欧大陆东西方向的各地区，其影响也扩散到了各地区和地域社会。因此，在亚欧大陆的东

1 在蒙古帝国时期的亚欧大陆东西方向沿线上，不论发号施令的文件以蒙古语、土耳其语、波斯语、藏语或是汉语等语言中的哪一种撰写，其文件均采用了相似的文章结构及共通的特定语言。这种在蒙古帝国时期采用共通样式撰写的文件，被称作“蒙古帝国样式文书”或“蒙古命令文书”。详细内容，请参考四日市2015与Yokkaichi2015的研究。

是在这样的经济、文化交流的背景下，诞生了伴随着蒙古霸权扩张而出现的东西交通稳定局面，即“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²。然而，这一概念归根结底来说是一种片面的观点，不足以说明当时经济及文化交流的全部内容，甚至也不能认为这一概念就意味着蒙古帝国霸权下亚欧大陆的和平稳定状态。蒙古帝国与亚欧大陆各地的文化圈及地域社会，时而冲突、相克，时而共存、融合，多角度多层次进行着交流。换言之，在亚欧大陆各地区及地域社会，都存在着所谓的“蒙古冲击（Mongol Impact）”，并且，若不能认识到各地区及地域社会针对冲击做出的相应反应，也就无法理解交流的内容及其带来的影响。此时的“蒙古冲击”中，不仅包括了短期性的政治与军事方面的影响，还包括了长期性的经济与文化方面的影响。即，“蒙古和平”与“蒙古冲击”同时存在，它们是一对表里一体的概念。若想准确把握亚欧大陆整体的“蒙古和平”，就有必要了解亚欧大陆各地区中存在的“蒙古冲击”及随之而来的各地区的应对措施³。

1. 蒙古帝国：元朝的亚洲海疆经略与入侵日本

在研究“蒙古来袭”所带来的“蒙古冲击”的影响之前，必须首先了解蒙古帝国，即元朝对于亚洲海疆整体的经略方针。蒙古帝国的侵略活动层次丰富，波及金朝、高丽、南宋、缅甸、越南、爪哇等国家或地区，并非各个侵略活动单独开展，而是所有活动联动进行。将焦点汇聚到日本上来看，蒙古帝国发动的“蒙古来袭”并非元朝与日本两国间外交的产物，而是高丽国介入其中的三国间国际关系所反映的结果，并且高丽国独立势力“三别抄”也对蒙古和日本两国展开了外交活动⁴。

众所周知，蒙古帝国进攻日本的契机，来自于高丽国朝臣赵彝对世祖忽必烈的建言⁵。至元二年（1265CE），赵彝建言进攻日本，而在这一时期，高丽国面对蒙古帝国的反复攻势，于中统元年（1260）接受了蒙古帝国的册封⁶；远据南方的越南陈朝也于中统三年（1262）接受了蒙古帝国三年一贡的条约（朝贡），被册封为安南国王⁷；在正式进攻南宋之前，如何与邻国日本相处，就成为了有待观望的问题。在蒙古帝国，依照传统，战争最前线归顺的敌兵将被送入下一场战役的前线⁸。如果基于该惯例，那么新归顺的高丽国士兵就应该被送入下一个战场。然而，在降服高丽之后，尽管蒙古帝国于至元五年（1268）发动了襄阳之战，正式开始进攻南宋，但是史书上却几乎没有留下有关高丽国军队被派遣至南宋战场的任何记载。这些军队不仅被派遣到了珍

2 “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也被称作“鞑靼和平（Pax Tatarica）”。此概念最早由Michael Prawdin等人倡导（详细内容，请参考Prawdin 1937；佐口透 1970；四日市 2001）。但是，我们不认为Prawdin和佐口等提出的早期“鞑靼和平论”中论及的政治与军事的稳定，在整个亚欧大陆都得到完全实现。归根结底，“蒙古和平”仅仅指代有助于经济面和文化面发展的亚欧大陆东西方向沿线的稳定，是一个具有局限性的分析概念。因此，仅仅使用“蒙古和平”这一概念表述亚欧大陆上的蒙古帝国政权是极其片面的，若不同时考虑动摇了各地的社会及文化的“蒙古冲击（Mongol Impact）”，实为偏颇。

3 关于该问题，2016年12月在昭和女子大学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亚欧大陆中的蒙古冲击：基于考古学和历史学视角的亚洲海域蒙古来袭（International Symposium “Mongol Impact on Eurasia: Arch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f the Mongol Invasion）”中，来自日本、中国、韩国、越南、蒙古、澳大利亚、以色列的考古学者、历史学者、地域研究学者等做了相关报告，并展开热烈讨论（组织者：菊池诚一、四日市康博等）。该研讨会的成果将于2017年，以单行本的形式刊发。

4 有关三别抄与日本的交涉，可以参考村井章介1988(a)及石井正敏2010的研究。此外，有关蒙古侵略以前的南宋、高丽、越南、日本的外交事件，可参考榎本涉2015的研究。

5 《元史》卷二零八 外夷传一 日本。

6 《元史》卷二零八 外夷传一 高丽。

7 《元史》卷二零九 外夷传二 安南。

8 与该传统相似的做法也可见于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自中亚至伊朗的南征进程中扩大领土的活动。《世界征服者历史》一书中留下了相关记录。该书中虽然没有记载以蒙古语表述该传统的词汇，但却有以波斯语表述的hajar一词。

岛、耽罗（济州岛），以镇压盘踞在二岛的三别抄军队，还被派遣到了海峡对岸的日本，以进攻日本⁹。就入侵日本的军队主体而言，第一次进攻（文永之战）与第二次进攻（弘安之战）时的东路军（来自高丽国的舰队）都是在蒙古帝国统治高丽国的晚期被派往高丽平定了三别抄之乱的忻都的军队，以及从高丽国归顺的洪福源、洪茶丘的军队。换言之，蒙古帝国发动的入侵日本的行为，很明显是经略高丽的延长线上的产物。

另一方面，蒙古帝国入侵日本的行动与针对高丽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蒙古经略政策齐头并进、联动而行。此时，在东南亚方面，尽管蒙古帝国与越南陈朝在表面上维持着稳定的关系¹⁰，但在与缅甸的接触方面，蒲甘王朝则对被派遣至此的元朝使节表示了反感，且摩擦越来越大。事实上，在第一次入侵日本（文永之战）三年后的至元十四年（1276），元朝发动了第一次针对缅甸的战役¹¹。此时，元朝在东方进攻日本、进攻南宋，在南方进攻缅甸，同时铺开了三条不同线路的战争攻势。第一次入侵日本与第一次入侵缅甸均以失败告终，之后，元朝意图再次发动进攻。但此时南宋首都临安无血开城，再加上至元十五年（1279）发生了崖山海战，至南宋完全被平定后，蒙古帝国于至元十七年（1281）发动了第二次远征日本。同时，在东南亚方面，进攻缅甸的行动重启¹²；自至元十九年（1283）起，进攻南海交易据点占婆国的行动也逐渐展开¹³；至元二十年（1284）年，蒙古帝国正式向缅甸发起进攻¹⁴。无论哪场战争，可能都是将侵略南宋的军队调配至日本、占婆国、缅甸等国的结果¹⁵。由此可见，入侵日本的行为不仅仅是经略高丽的延长线上的产物，另一方面，也与进攻南宋相联动，而入侵南宋又与东南亚方面的入侵占婆国、越南、缅甸直接联动。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入侵日本看作是蒙古帝国即元朝在整个亚洲海域上的政策经略中的一环。

2. 亚洲海域各国受到的“蒙古冲击”

如上文所述，蒙古的军事侵略活动覆盖了东部海域亚洲各国的几乎所有领域，但也正如其名，“蒙古冲击”本身的影响力并不仅仅局限在军事方面，放眼中长期，其在经济和文化领域也给各地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源自蒙古、波及到各地区的“冲击”具有一定程度的共性，但是为了应对这些“冲击”，各地区所做出的“反馈”，也就是政权及社会的反应和冲击带来的社会变容，却各有差异。

高丽国方面，与蒙古帝国断断续续地反复进行着交战与和解。最后，蒙古帝国即元朝迫使高丽态度弱化，高丽便也全面降服蒙古并接受了蒙古的册封。虽然形式上来说高丽成为了蒙古帝国的领属（即属国），但实际上，高丽王朝依然维持着独立的支配权。与此相类似的例子，还有天山回鹘王国、汪古王国等归顺于蒙古帝国的亚欧大陆中部王朝政权。当然，这些国家直接

9 至元五年（1268），高丽国王上奏元朝廷，称已经备好一万名士兵与一千艘船。元世祖忽必烈派遣元都统领道尔吉前往检阅军队，同时命令其视察从黑山至日本的路径，而这些谕旨的前提均为将高丽的军队与船只用于经略日本。《元史》卷六 世祖纪三 至元五年七月丙子。

10 实际上，即使是越南，也对派遣至此的督官达鲁花赤及其严格的要求表示了日益膨胀的不满，对蒙古帝国的反感在陈朝太宗去世后，最终升级发展成为了对蒙古帝国的战争。

11 《元史》卷二零 外夷传三 缅。

12 《元史》卷一一 世祖纪八 至元十七年二月丁丑。

13 《元史》卷二零 外夷传三 占城。

14 《元史》卷二零 外夷传三 缅。

15 甚至于重罪犯人、蒙古士兵、从南宋新归顺的“新附军”，全部都被分配至日本、占婆国、缅甸，参与远征军的讨伐。《元史》卷一二 世祖纪九 至元十九年十一月甲戌；卷二 世祖纪九 至元二十年五月戊午。

受到蒙古帝国即元朝的统治政策及财政政策等影响与干预，也正因为如此，受到的来自蒙古的冲击才更加强烈。可以说，这一冲击波及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为应对冲击，高丽王朝采取了融合的办法，即：历代高丽国王娶公主（元朝皇帝的女儿）为妻成为驸马（元朝皇帝的女婿），其儿子则作为秃鲁花供职于元朝皇帝的怯薛军（轮番近卫兼精英培养机构），由此，高丽王朝便享受到与蒙古帝国的皇亲国戚相当的优待。在元朝的诸多属地王国中，尤以高丽王国的地位最高¹⁶。此外，高丽的官制也参照元朝的官制进行了重新制定，高丽宫廷的王族与贵族之间逐渐吸收着蒙古文化。另一方面，高丽风文化在元朝首都大都也曾流行了起来。一直以来，对于高丽国与蒙古帝国的融合持否定态度的研究倾向显著，但是近年，也有研究者表示了肯定态度¹⁷。我们可以认为，高丽王朝通过积极打入蒙古帝国上层并成为其中一员，由此来享受“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带来的政治稳定与异文化吸收的便利性。举例来说，据森平雅彦的研究，高丽时期王权崇拜佛教的要素在后来的朝鲜时期被排除在外，取而代之的是对作为体制教学的朱子学的作用强化，而朱子学真正传播到高丽国的时期正是元朝时期。此外，通过与元朝的关系，高丽佛教得以加深与中国佛教、藏传佛教、印度佛教的交流。可以说，高丽国在国家性宗教与民众性宗教等两大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¹⁸。

越南则与高丽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越南陈朝虽然在遭受蒙古帝国攻击后接受了册封，但却并没有接受蒙古帝国提出的所有要求，蒙古帝国对其内部干预越深入，越南的反抗也越强烈，直至发展至战争。虽然其首都河内升龙皇城沦陷，但是战争的最终结果还是成功击退了蒙古军队。之后，陈朝决定向元朝进贡并释放了蒙古军俘虏，并再次接受了元朝册封¹⁹。基于此，可以认为陈朝得到了实质上的独立权。越南通过朝贡维持住了与蒙古帝国的经济纽带，但成功地排除了来自蒙古帝国的政治干预。战争上取得了胜利但却故意在形式上表示服从，这种做法使得两国关系从政治关系转变为经济关系。在此之后，“蒙古冲击”也就主要被限制在经济与文化层面²⁰。关于这一点的评价，有的研究者认为，这种做法保住了政治独立性，或者成为了彰显民族主义的开端；也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对“蒙古和平”及“蒙古冲击”带来的亚欧大陆即印度洋海域的世界规模经济文化交流的享受，也因此受到了限制。

第三种国家关系模式，则以爪哇国的信河沙里王朝和满者伯夷王朝与元朝的关系为典型。爪哇与日本一样，最初受到了元朝的招抚但都拒绝加入元朝的册封体系，于是遭受到元朝的进攻，将元军击退后，向元朝派遣朝贡使节。由于史书上没有留下满者伯夷国王被元朝奉为王公的纪录，因此可以认为其没有接受过册封，但在此之后，其积极向元朝进贡，促使爪哇与元朝保持了比战争前更为紧密的通商关系²¹。以“元征爪哇战争”为契机，长期的“蒙古冲击”即伴随着朝贡关系的通商关系得以建立。此外，该通商关系的建立并非源自爪哇国一方的行动，元朝一方发动爪哇战争时也向爪哇周边各国派遣了招抚使节与商人团体。

最后来看看苏门答腊岛的苏木都刺国及南印度的摩度罗（即：潘地亚王

16 有关蒙古帝国即元朝内部中高丽皇族的地位及该地位在高丽政权中的反映，可参考森平雅彦2013的研究（特别是《驸马高丽国王的诞生》（「驸馬高麗国王の誕生」）（22-59页）；《高丽王位之下及其权益》（「高麗王位下とその権益」）（60-104页）；《有关高丽皇族及蒙古皇族痛恨关系的备忘录》（「高麗王家とモンゴル皇族の痛恨関係に関する覚書」）（105-146页）；《元朝怯薛制度及高丽皇族》（「元朝ケシク制度と高麗王家」）（147-203页））。

17 可参考森平雅彦2013的研究（特别是《高丽与元朝的关系史研究的意义与课题》（「高麗と元関係史研究の意義と課題」）（1-21页））和李康汉2016等研究。

18 可参考森平雅彦2013的研究 5页、291-309页。

19 有关元朝经略越南的具体经过，可参考山本达郎1950、山本达郎1975、四日市康博2015(b)等研究。

20 有关越南陈朝、占婆国与元朝的通商、经济关系，可参考桃木至朗2011及四日市康博2015(b)等研究。

21 《元史》卷一八 成宗纪一 元贞元年九月丁亥；卷一九 成宗纪二，大德元年十月乙卯。

朝)与元朝的关系。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受到过蒙古帝国即元朝的直接攻击,也没有接受过册封。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否定元朝没有向这些国家派遣远征军的打算。元朝朝廷内部曾经商讨过向泰国、苏门答腊岛甚至南印度等地的国家派遣兵力的方案,但最后落实为派遣使节,实施诏谕。事实上,至元十七年,库伦、摩度罗、爪哇、越南已经与元朝保持着朝贡关系;至元二十三年,摩度罗、兰里、苏木都刺等十多个国家都在对元朝进贡。在这些王朝当中,位于印度东南海岸地带的摩度罗(即:潘地亚王朝)在至元十六年至延祐元年之间,有史可循的进贡就多达十几次。与此同时,元朝也多次向摩度罗派遣使节。同样地,13世纪后半期,苏门答腊岛北部的新兴伊斯兰教政权苏木都刺王国虽然在次数上不及摩度罗之多,但在至元十九年后,也多次向元朝进贡。总结马六甲海峡以西诸国的朝贡特征,可以发现以下两个特点:(1)就朝贡的主要目的而言,经济目的大于政治目的;(2)各国并非单独朝贡,周边各国及经由地的使节也同船往来。关于第一点,史书上几乎看不到元朝对马六甲海峡以西诸国实施册封的事例,同时,在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末期,出现了来访朝贡使节由于受到针对商人的海禁政策的影响无法归国的情况,由此可见,朝贡使节团当中也包含有不少海上商人²²。关于第二点,这实际上反映出南海诸国的朝贡使节受到元朝招抚前往朝贡的事实。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事例中即包含了元朝光耀国威、彰显霸权的目的,也反映出以苏木都刺为代表的海上诸国将蒙古帝国即元朝的霸权作为自己统治权力后盾的意图²³。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可以认为,中长期性的“蒙古冲击”存在于这些例子中,且在经济目的和政治目的上都被加以利用。

3. 重新审视日本受到的“蒙古冲击”

基于上述事例,笔者将在此重新审视日本受到的“蒙古冲击”。日本拒绝了来自蒙古帝国即元朝的册封,由此产生的摩擦最终发展成为战争。同样的事例,也可见于爪哇和蒲甘等几个地区。正如上文所述,日本在和元朝战争结束后,并没有与元朝建立正式的国家间外交关系,尽管如此,两国之间还是呈现出民间商贸往来的盛况。

至治三年六月,一艘自庆元(今宁波)驶往日本博多的商贸船在航行过程中受到风向和洋流的影响沉没,并被冲至了韩国新安海域。这就是有名的“新安沉船”。在该沉船遗迹的船舱内出土了大量货物,其运载的陶器、瓷器、铜钱、紫檀木等货物数量惊人²⁴。该新安船出航的时间点虽然是至元十八年/弘安四年(1281),即第二次入侵日本(弘安之战)发生后的约40年后,但是在这前后四十年间,即元成宗孛儿只斤·铁穆耳在位的大德年间后期至元文宗孛儿只斤·图帖睦尔在位的至正年间初期,戎克船频繁往来于日本与元朝之间²⁵。史书上没有留下关于元朝与日本的战争之后不久便有商贸船往来于两国间的记录,但是记载有战争结束十年后,即至元二十九年(1292),日本

22 《元史》卷一八 成宗纪一 至元三十一年十月乙巳。

23 马可·波罗指出,小爪哇(苏门答腊岛Java la menor/Giava minore)上的八大王国之中,roiame de Basma/regno di Basma,roiame de Samatra/regno di Samara,roiame de Daroian/regno di Dragoian,roiame de Lanbri/regno di Lambri,roiam de Fansur/regno di Fanfur等尊称元朝皇帝为大汗(le grant kaan/il gran Can)并予以臣服,但事实上并没有朝贡。(Marco/F, pp.171-174; Marco/R, pp.260-264.)

24 有关新安沉船的记录,可参考문화 공보부 문화재 관리국 1981-85;문화 공보부 문화재 관리국 1988;문화재청, 국립해양유물전시관 2006;川添昭二 1993;村井章介 2013(a)等研究。

25 但是,在此之后,由于元朝沿海地区出现了日本人引发的暴动,短期贸易被中止。榎本涉将这些暴动者分别称为“至大倭寇”、“泰定倭寇”、“元统倭寇”,他认为,这些倭寇事件是暴动因素强烈的单次性事件,与明朝时出现的倭寇有着不同的特征,这一点需要多加注意。(榎本涉 2014, 97-98页)。

派出三艘商贸船驶往中国，其中一艘船成功抵达庆元²⁶。此外，日本留存有扣押了唐船贸易利润的记录，由此可见，两个国家间已经恢复了关系²⁷。也就是说，至少在战争十年后，博多至庆元之间的商贸船恢复了往来，二十年后，日本与元朝的交易已呈现出盛况。第二次日本元朝战争结束后的十年间，即元世祖忽必烈的至元年间后半期，谋求财政扩大政策的权臣阿合马失足落马，紧接着受到维吾尔族宰相桑哥推荐的卢世荣着手财政改革。由于桑哥任命了大量的穆斯林及维族人担任财务官僚，从而与阿合马一样谋求财政扩大政策。在这一时期，马六甲海峡以西的南海诸国大举向元朝进贡，穆斯林商人的贸易活动也日渐活跃，南海贸易呈现出一片繁荣态势²⁸。然而，榎本涉指出，日本与元朝间的贸易实际上显示出与时代相违背的动向²⁹。如前文所述，日本与元朝之间的戎克船自元成宗铁穆耳统治时期的后半期才开始盛行，而战争后，尤其截止至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的后半期，两国间的贸易往来完全不活跃。其根源就在于元朝与日本之间的战争。话虽如此，其原因并不是两次元朝入侵日本的战争（文永之战与弘安之战）的影响，而是元朝制定了第三次进攻日本的计划。即使是在日本商船恢复与元朝往来的至元二十九年（1292），入侵日本的计划也没有停歇。

至元二十二年（1285），元朝为了实施第三次入侵日本，设置了征东行省，并任命阿塔海、刘国杰、陈严、洪茶丘等人为宰相³⁰。次年，元世祖忽必烈宣布圣旨，要求暂缓进攻日本，优先进攻越南，同时由于临近高丽的东方三王家领的叛乱持续不断，因此进攻日本的计划被宣告中止，直至东方三王家领叛乱、越南战争、占婆战争、爪哇战争都结束后的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该计划才再度被提上日程。高丽国王忠烈王对此表示赞同并开始为入侵计划做着相应准备³¹。然而，此时的元世祖忽必烈已经高龄，并于两年后的至元三十一年（1294）驾崩，第三次远征日本的计划便也随之告终。换言之，第一次和第二次入侵日本结束后的十年间，还不能称之为“战后”。倒不如说，只要条件俱全，第三次远征日本随时都有可能在忽必烈的指示下立即开展，因此将这段时期称为“战争即将发动时期”也不为过。与元朝相临近的越南、占婆国亦是如此。不过，与第三次入侵日本的计划最终流产不同，元朝对越南和占婆国发动了第二次、第三次战争，甚至还在此之后向爪哇派遣了远征军。这一差异之所以存在，其最大的因素就在于越南、占婆国、爪哇都位于当时南海贸易主干线的关键位置，而日本却远离当时元朝海上交通大动脉的主干道。与经由越南、占婆国的“西洋航路”不同，连接日本、琉球、福建、马尼拉的“东洋航路”直至16世纪以后，其重要性才逐渐凸显出来³²。此时，元朝优先经略的是经由南海通往伊斯兰各国的“西洋航路”沿线国家。这不仅仅是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还多半包含有经济和商业目的在内。不论是元朝发动的越南战争还是紧随其后的爪哇战争，都有一些负责招抚工作的随行人员与远征军同行，以笼络商人、增进贸易³³。但是，在入侵日本方面，却无法找到以振兴贸易为目的的随行人员出现在远征军中的记

26 《元史》卷一七 世祖纪一四 至元二十九年六月己巳。

27 正应三年四月二日关东御教书（福冈市教育委员会《大悲王院文书 一〇》）；榎本涉 2006，243-244页；榎本认为，13世纪80年代后期存在入元僧，两国交往也重新展开（榎本涉 2006，143-144页；同 2014，95页）。

28 有关这一时期元朝的财政、商业政策及元朝与南海交易的关系，可参考四日市康博 2015(b)的研究。有关马六甲海峡周边各港口王国的海上贸易情况，可参考深见纯生 2004、深见纯生 2006的研究。

29 榎本涉 2006；榎本涉 2014。

30 《元史》卷一三 世祖纪一〇 至元二十二年十月癸丑。

31 《高丽史》卷二九 世家三〇 忠烈王三 忠烈王十八年〔八月〕丁未；卷三〇 世家三〇 忠烈王三 忠烈王十八年〔九月〕壬午。

32 有关东洋航路和西洋航路相关资料，可参考四日市康博 2015(b)的研究。

33 可参考四日市康博 2015(b)，26-29页。

录。因此,说到底,经略日本只是元朝经略高丽与经略南宋计划的延长线上的一环。其结果正是由于背景不同,所以才导致了第三次入侵日本的计划无法实现。元世祖忽必烈驾崩后,次任皇帝元成宗铁穆耳于大德三年任命禅僧一山一宁为使节,促使日本向元朝进贡³⁴,但是与忽必烈时期相比,元成宗对待日本的态度明显弱化,已经不具备运用武力迫使日本接受册封的意图。元成宗铁穆耳朝代之后,亚欧大陆中部地区的蒙古宗族之间的武力冲突不断,元朝针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海域国家的军事入侵也就逐渐减少。因此,可以说,自元成宗铁穆耳之后,日本与元朝战争才终于迎来了尾声。日本与元朝的贸易逐渐盛行起来,也是这个时期。

那么元朝与日本战争的前后,日本社会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据村井章介研究,日宋与日元之间的海外交易中存在贸易船只往返次数限制、日本人出海限制、禁止铜钱流通等规定,但这些规定曾经全部都流于表面功夫³⁵。然而,在元朝发动第一次入侵后,镰仓幕府开始采取具体且有实效性的限制措施。弘安四年(1281),镰仓幕府颁布法令限制外国人进入国内;正安二年(1300),给予镇西探题管理与监督外来人员的权限,并以“异贼防禁”为名强化了镇西探题的军事功能³⁶。村井认为,以此为契机,公权力逐渐渗透进了博多地区。作为博多组成部分的博多浜与息浜,其背后的支配者各不相同,阻碍了博多地区的一体化发展的同时,也强化了公权力的干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元朝与日本的战争产生的短期军事冲击转变为政治、经济、文化的长期冲击,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可以说,元朝方面也出现了同样的影响。关于元朝与日本战争之后的两国交往,榎本涉否定了战争之后贸易政策变得消极的传统观点,认为元朝方面针对倭船警戒的根据来自于对日招抚失败导致的日本不臣服³⁷。笔者亦赞同此结论。元朝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其目的在于迫使日本臣服并将日本纳入册封体制之内,在此之后元朝对日警戒,与其说是对战争本身的反动,倒不如说是起因于没能将日本作为朝贡国纳入元朝的管辖范围之内。而且,尽管元朝实施了警戒措施,仍然有众多商贸船只往返于两国之间,只能说,两国间海外贸易带来的利益远远超过两国政府的互不交涉、互不信任。特别是来自日本的渠道更加强势。尽管当时往来于两国之间的商贸船是中国的戎克船,但船只主要以满足日本需求的形式运行³⁸。这种日元贸易船在日本被称作“寺社造营料唐船”³⁹,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了贸易结构与内容的变化⁴⁰。例如,在经济方面,日本从元朝进口了包括宋朝钱币在内的大量中国钱币,银也在日本和元朝之间进行着双方向的流通⁴¹。蒙古帝国初期,银流通于整个

34 《元史》卷二〇 成宗纪三 大德三年三月癸巳。该国书的复刻版保存在金泽文库(《金泽文库古文书》6773)。

35 村井章介 2013(a), 264-266页。

36 镰仓幕府追加法四八八条(异国警固条)、七〇一条(牒使来着时在所并问答法事)(《中世法制史料集》第一卷, 249页, 307页);村井章介 2013, 265页。

37 榎本涉 2007(b), 106-117页;森克己 1975, 366-370页, 511-525页。江静 2000, 江静2002。

38 其理由在于,虽然来自日本的船只航行至元朝时,无需顾忌元朝制定的废止市舶司与禁止下海时间限制等规定,可以自由驶入元朝港口(主要是庆元港),但是返航时,这些船只如果碰上废止市舶司与禁止下海的禁令期间,则只能等待出海禁令解除后才能出港。详细内容,可参考四日市康博 2016的研究。

39 有关“寺社造营料唐船”,可参考村井章介 2003、村井章介 2013;中村翼 2013等研究。此外,有关“寺社造营料唐船”的具体事例,可参考福岛金治 1991;福岛金治 1996;永井晋 2010等研究。

40 南宋时期,博多出土了很多“纲”铭及“纲首”铭的墨书陶器、瓷器,但进入元代后,则很难见到相关出土物。这意味着宋代以“纲”为中心的海上贸易结构在元代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从新安沉船中出土了众多“纲司”铭的木简,此处的“纲司”是否与“纲首”的意思相同,又或者具有别的含义,到现在仍是未解之谜。

41 从日本流向中国的银,据《至正四明续志》卷五记载,被作为“倭银”看待。日本银中,特别是对马银,经由庆元(今宁波)被进口到元朝。另一方面,在博多的圣福寺,江户时代的享保元年(1716)出土了元代的银锭,当时的出土情况记载于伊藤东涯的《盍簪录》。这说明了银的流通绝非单方向的,中国也有银流通至日本。(《盍簪录》卷四)

亚欧大陆地区。此外，元朝统治下的书画、陶器、瓷器、茶文化等都与日本的“中国文化（唐物）”接受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也持续到了明代——室町时代⁴²。在此当中，也包含有不完全是蒙古风格的要素，但毕竟是由元朝统治下的华北与江南地区的南宋文化继承并发展起来的要素，作为元代文化仍然带有元代的特征⁴³。元朝后半期，日本与元朝之间的僧侣往来迎来了空前盛况，村井章介和榎本涉都将这一时期称为“渡来僧的世纪”⁴⁴。这些文化交流表面上给人一种看似与“蒙古冲击”没有什么关系的印象，但它们都是蒙古霸权兴盛下的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产物，正是“蒙古冲击”的一环⁴⁵。

尾论：究竟何谓“蒙古冲击”？

如果仅仅将日本作为主体来思考的话，人们往往容易认为“蒙古冲击”指的是战争本身为最大且具有主体性的冲击。事实上，传统的蒙古来袭研究，都主要将研究的焦点对准战争发生前的外交关系以及战争本身。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如果观察亚洲海疆各地域发生的具体事例，就会发现“蒙古冲击”实际上是一种“长期性的冲击”，绝非仅仅只有战争，正是战后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给社会和文化造成了巨大影响。更进一步可以确认的是，战争前与战争中产生的政治冲击对其之后的经济与文化冲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换言之，虽然元朝与日本（镰仓幕府、朝廷）双方都在战争期间对贸易和交往做了很多限制，而这些限制也对贸易结构本身产生了直接影响，但是我们必须将这些状况和之后飘摇反复的贸易兴顺的状况作为一个整体的流程加以把握。正如前文中村井所述，日本在与蒙古交战后，立即强化了贸易管制，严格限制新的航船入境，由此，以在中国设置据点的汉商人（即“宋商”）为主体的贸易转变为以在博多设置据点的汉商人（“宋商”的子孙后代）为主体的贸易，汉商人甚至逐渐在日本定居，于是，贸易的主体最终在室町时代（中国明代）转变为以包括“宋商”子孙后代在内的日本商人。总之，镰仓及南北朝时代（中国元代）是中日贸易结构转变的过渡期，而且这一转变与元朝对日战争及其之后的“蒙古冲击”有着深刻的关联。

本文受限于篇幅，故不通过具体事例来说明日本受到的“蒙古冲击”的内容究竟为何，而将研究重点放在了解释“蒙古冲击”不仅仅局限于军事和政治上的冲击，这些短期冲击还带来了经济与文化上的冲击。关于本文主题的准确性，还必须将日本以外的地域纳入研究对象范围内，通过具体事例加以验证，而这，也是笔者今后的研究课题。

42 相关具体事例，可参考村井章介 2003；榎本涉 2003 等研究。

43 就极端事例而言，日本的唐物文化和禅宗文化中也可散见“蒙古文字”，即八思巴文。在日本，蒙古文被当作八思巴文，但并没有被积极地吸收进日本文化中，尽管如此，日本也留存在了少量的八思巴文。例如，常被用作茶壶的福建与广东生产的褐釉四耳壶（后被称作罗宋壶）和青瓷上时常刻画有吉祥文字，而在兵库县、鹿儿岛、博多（新安船）、冲绳等地出土了刻有八思巴文的印章及刻有八思巴铭文的青瓷（龙野市埋藏文化财中心 2015；石垣市总务部市史编辑课 2008；鹿儿岛县川边郡知览町教育委员会 2006）。此外，室町时代后期，临济宗禅僧玉隠英與用八思巴文制作了刻有自己名字的落款印章（日本经济新闻社 2003），后世认为他参考了记载了八思巴文汉字音对照表的音韵书《蒙古字韵》，十五至十六世纪玉隠担任过主持的建长寺，以及金泽文库等地，有可能保存着《蒙古字韵》一书。

44 村井章介 2013(b)；榎本涉 2007

45 实际上，在元朝与日本的战争期间，镰仓幕府借助留日的中国僧侣和留中的日本僧侣构成了信息网络并加以充分利用，开展了信息收集和谍报活动。元朝时的对日僧侣往来活动虽然被称为“渡来僧的世纪”，可以说，这也是前者的延伸。有关蒙古来袭时的僧侣活动及后续发展，可参考伊藤幸司 2009、伊藤幸司 2010。

史料

《元史》：《元史》校对本，15 册，北京：中华书局，1976。

《蒙古字韵》：照那斯图、杨耐思（编）《蒙古字韵校本》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

《四明续志》：中国地志研究会（编）《至正四明续志》宋元地方志丛书，台北：中国地志研究会，1978。

《高丽史》：国书刊行会（编）《高丽史》上中下，国书刊行会，1977。

《盍簪录》：森铨三等（编）《随笔百花苑 6》东京：中央公论社，1983 所收。

《镰仓幕府法追加法》：佐藤进一、池内义资（编）《中世法律史料集 第一卷 镰仓幕府法》东京：岩波书店，1955 所收。

Marco Polo. Le Devisement dou Monde（马可波罗《东方见闻录》）：

-Marco/F/Benedetto: Luigi Foscolo Benedetto (ed.), il Milione : Prima Edizione Integrale. Firenze, 1928.

-Marco/R/Einaudi: 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 (ed.), I viaggi di Marco Polo. In Navigazioni e viaggi. vol.3, Venezia, 1559 (Giulio Einaudi (re.ed.), Torino, 1980.)

参考文献

榎本涉 2003《关于陆仁与道元文信（「陸仁と道元文信をめぐって」）》《东亚海域与日中交流——19-14 世纪（『東アジア海域と日中交流——九～一四世紀』）东京：吉川弘文馆，2007，212-269 页（原载：《14 世纪后半来到日本的人们（「一四世紀後半、日本に渡来した人々」）》、《遥远的中世（『遙かなる中世』）》20，2003。）

榎本涉 2006《早期日元贸易与人员交流（「初期日元貿易と人的交流」）》《宋代的长江流域——基于社会经济史的视角（『宋代の長江流域——社会経済史の観点から』）》东京：汲古书店，231-272 页。

榎本涉 2007(a)《东亚海域与日中交流——19-14 世纪（『東アジア海域と日中交流——九～一四世紀』）东京：吉川弘文馆。

榎本涉 2007(b)《元朝的倭船对策与日元贸易（「元朝の倭船対策と日元貿易」）》《东亚海域与日中交流——19-14 世纪（『東アジア海域と日中交流——九～一四世紀』）》东京：吉川弘文馆，106-175 页。

榎本涉 2014《宋元交替与日本（「宋元交替と日本」）》《岩波讲座 日本历史 第七卷 中世 2（『岩波講座 日本歴史 第七卷 中世 2』）》东京：岩波书店，77-112 页。

榎本涉 2015《13 世纪的东亚局势与高丽、大越、日本（「13 世紀の東アジア情勢と高麗・大越・日本」）》《日越交流的历史、社会、文化的各课题（『日

越交流における歴史、社会、文化の諸課題』》京都：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17-24 頁。

深見純生 2004 《元代的马六甲海峡——通道？据点？（「元代のマラッカ海峡——通路か拠点か」）》《东南亚——历史与文化（『東南アジア——歴史と文化』）》18. 86-98 頁。

深見純生 2006 《单马令的发展与 13 世纪东南亚的商贸高潮（「ターンプラリンガの発展と 13 世紀東南アジアのコマーシャルブーム」）》《国际文化论集（『国際文化論集』）》34. 81-97 頁。

福岛金治 1991 《关于镰仓极乐寺的唐船派遣（「鎌倉極楽寺の唐船派遣について」）》《地方史研究（『地方史研究』）》233。

福岛金治 1996 《中世镰仓律院与海上交易权——热海船的特性与镰仓大佛造营料唐船的派遣情况（「中世鎌倉律院と海上交易権——熱海船の性格と鎌倉大仏造営料唐船の派遣事情」）》《镰仓大佛研究（『鎌倉大仏研究』）》1

石井正敏 2010 《关于文永八年三别抄牒状（「文永八年の三別抄牒状について」）》《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 史学（『中央大学文学部紀要 史学』）》56, 1-34 頁。

石垣市总务部市史編集課 2008. 《石垣市史考古视觉版 5 从陶磁器看交流史（『石垣市史考古ビジュアル版 5 陶磁器から見た交流史』）》石垣市。

伊藤幸司 2009 《外交与禅僧——东亚交流圈中禅僧的作用（「外交と禅僧——東アジア通交圏における禅僧の役割」）》《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国——社会と文化』）》24. 41-70 頁。

伊藤幸司 2010 《跨越东亚的禅宗世界（「東アジアをまたぐ禅宗世界」）》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编）《日本的对外关系 4 倭寇与“日本国王”（『日本の対外関係 4 倭寇と「日本国王」』）》东京：吉川弘文馆・30-56 頁。

江静 2000 《元代赴日中国商船锐减原因初探》《中日文化论丛》1998。

江静 2002 《元代中日通商考略》《中日关系史料与研究》1。

鹿儿岛县川边郡知覧町教育委员会 2006. 《国家制定遗迹 知覧城（三）（『国指定遺迹 知覧城（三）』）》知覧町：鹿儿岛县川边郡知覧町教育委员会。

川添昭二 1993 《镰仓末期的对外关系与博多——新安沉船木简、东福寺、承天寺（「鎌倉末期の対外関係と博多——新安沈没船木簡・東福寺・承天寺」）》《镰仓时代文化传播的研究（『鎌倉時代文化伝播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

李康汉 2016 《高丽的蒙古冲击与反应（「高麗におけるモンゴルのインパクトとレスポンス」）》《国际研讨会“亚欧大陆的蒙古冲击”论文集（『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ユーラシアにおけるモンゴルのインパクト」予稿集』）》东京：昭和女子大学。

桃木至朗 2011 《中世大越国的成立与变容（『中世大越国家の成立と変容』）》吹田：大阪大学出版会。

森克己 1975 《日宋贸易研究（『日宋貿易の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

- 森平雅彦 2013 《蒙古霸权下的高丽——帝国制度与王国的应对（『モンゴル覇権下の高麗——帝国秩序と王国の対応』）》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 문화 공보부 문화재 관리국（文化公報部文化財管理局）（編）1981-85 『新安海底遺物（資料篇 I-III）』서울：한국 문화 공보부 문화재 관리국。
- 문화 공보부 문화재 관리국（編）1988 『新安海底遺物（綜合篇）』서울：한국 문화 공보부 문화재 관리국。
- 문화재청，국립해양유물전시관（文化財庁，国立海洋遺物展示館）（編）2006 『新安船 The Shinan wreck』1-3. 목포：문화재청，국립해양유물전시관。
- 村井章介 1988(a) 《高丽三别抄叛乱与蒙古袭来前夜的日本（「高麗・三別抄の叛乱と蒙古襲来前夜の日本」）》《亚洲之中的中世日本（『アジアのなかの中世日本』）》东京：校仓书房，1988，144-188 页。
- 村井章介 1988(b) 《蒙古袭来与镇西探题的成立（「蒙古襲来と鎮西探題の成立」）》《亚洲之中的中世日本（『アジアのなかの中世日本』）》东京：校仓书房，1988，189-235 页（根据原载《史学杂志（『史学雑誌』）》87/4，1978 改编）
- 村井章介 2003 《日本交通与禅律文化（「日元交通と禅律文化」）》《日本中世的异文化接触（『日本中世の異文化接触』）》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3，171-213 页（原载：《日本的时代史 10 南北朝动乱（『日本の時代史 10 南北朝の動乱』）》东京：吉川弘文馆，2003。）
- 村井章介 2010 《蒙古袭来与异文化接触（「蒙古襲来と異文化接触」）》《日本中世的异文化接触（『日本中世の異文化接触』）》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3，375-400（原载：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編）《日本的对外关系 4 倭寇与“日本国王”（『日本の対外関係 4 倭寇と「日本国王」』）》东京：吉川弘文馆，2010。）
- 村井章介 2013(a) 《再论寺社造营料唐船——贸易、文化交流与沉船（「寺社造营料唐船を見直す——貿易・文化交流・沈船」）》《日本中世的异文化接触（『日本中世の異文化接触』）》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3，241-272 页。
- 村井章介 2013(b). 《从肖像画“赞”来看禅的中日交流（「肖像画・賛から見た禅の日中交流」）》《日本中世的异文化接触（『日本中世の異文化接触』）》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3，273-294 页。
- 永井晋 2010 《从金泽文库古书看唐船派遣资料（「金沢文庫古文書に見る唐船派遣資料」）》《金泽文库研究（『金沢文庫研究』）》324。
- 中村翼 2010 《镰仓幕府“唐船”相关法律的探讨——以“博多权门贸易”说的批判性继承为目的（「鎌倉幕府の「唐船」関係法令の検討——「博多における権門貿易」説の批判的継承のために」）》《镰仓遗文研究（『鎌倉遺文研究』）》25。
- 中村翼 2013 《日元贸易期的海商与镰仓、室町幕府——寺社造营料唐船的历史地位（「日元貿易期の海商と鎌倉・室町幕府——寺社造营料唐船の歴史

的位置」)》『ヒストリア』241.

日本经济新闻社, 东京国立博物馆(编) 2003.《鎌倉——禅の源流(『鎌倉——禅の源流』)》东京: 日本经济新闻社.

Prawdin, Michael 1937. The Mongol Empire: Its Rise and Legacy. (tr.) Eden and Cedar Paul. Brunswick and London: Aldinetransaction.

龙野市埋藏文化财中心 2015.《谜之八思巴字与光明山(『謎のパスパ文字と光明山』)》龙野市埋藏文化财中心.

佐口透 1970《鞑靼和平(「タタールの平和」)》《岩波讲座世界历史 中世3(『岩波講座世界歴史 中世3』)》东京: 岩波书店.

四日市康博 2001《蒙古和平——东西交通的繁荣(「パクス□モンゴリカ——東西交通の繁栄」)》『しにか』140, 50-55 页

四日市康博 2015(a)《基于亚欧视角的伊利汗国公文书——兼作伊利汗国公文书研究序论(「ユーラシア的視点から見たイル＝ハン朝公文書——イル＝ハン朝公文書研究の序論として」)》『史苑』75/2, 257-300 页.

四日市康博 2015(b)《13-14 世纪中国与东南亚的交往与贸易——以基于元朝视角的元朝与西洋航路南海诸国的关系为中心(「13 ~ 14 世紀における中国 - 東南アジアの通交と貿易——元朝から見た西洋航路上の南海諸国との関係を中心に」)》《昭和女子大学国际文化研究所纪要》21, 13-41 页.

Yokkaichi Yasuhiro 2015. (ed.) Special Issue: Multilingual Documents and Multiethnic Society in Mongol-Ruled Iran, in Orient 50.

四日市康博 2016《14 世纪的日本与元朝海上贸易中的新安船(「14 世紀の日本と元朝の海上交易における新安船」)》『신안선 발굴 40 주년 기념 국제 학술대회——아시아·태평양 해양네트워크와 수증문화유산』목포시: 국립해양문화재연구소, 164-184 页.

指定讨论

作为蒙古影响力一环的“蒙古的袭来”

[提问者 / 赵阮、回答者 / 四日市康博]

提问 / 赵阮：

我对四日市教授的发言很感兴趣。我非常赞同四日市教授提出的蒙古具有和平与冲击共存，两者互为表里的概念。我们在思考蒙古东征日本时，不能仅仅停留在蒙古元朝帝国与日本的关系上，还应该透过东南沿海海上战略的整体脉络来把握。您的发言内容让我受益匪浅。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对大元蒙古帝国来说，朝贡册封的意义何在？元朝对一些国家要求册封，而对一些海上国家则只要求朝贡，并没有要求册封。蒙古人灵活运用这种中国式的朝贡或册封方式的目的是什么？情况又是如何？有关这一点向您请教。

第二个问题是，教授提到蒙古东征日本时，对待东北沿海及东南沿海的方法有所不同，理由是在东南沿海，要考虑与西亚贸易的因素。这种海上战略与东北沿海的方式有何不同？目的又在于何处？

最后一个问题是，您在涉及元朝与日本关系的最后部分提到虽然两国断绝了外交关系，但是民间交流非常活跃。这一点能否再谈得具体一点？民间交流活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有何背景？在政府消极的情况下，能够让民间交流活跃起来的主体到底是谁？还有一个问题或许过于细枝末节，就是您提到宋商的后裔改变了交流方式，他们把博多当成了活动据点。这又有什么样的原因？想向您具体请教。

回答 / 四日市：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在元朝蒙古帝国，并不是由皇帝一个人进行所有决策，他的身边既有王族，也有官僚、大臣等，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地方官僚。即便是册封朝贡，决策的方式方法也有好几种。就像刚才我说过的那样，忽必烈和他的继承者们所做的选择基本上就是两种，要么对方顺从，要么向反抗者派兵。而各级官吏，特别是原本顺从于中国的金、以及后来南宋时期归顺的官吏们，纷纷仿照中国式册封的范式向忽必烈等进言。福建、浙江一带的官吏们则相对重视贸易，向皇帝提议不要征服，最好进行贸易。最终决策当然以皇帝的意志为准，但是各地情况不一，所以想法也不尽相同。因此，在东南亚，特别是印度沿海只建立了朝贡关系，而实际上忽必烈曾经打算向东南亚和印度派兵。不过，有一个叫迦鲁纳答思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向忽必烈进言，称因为向日本和越南派兵，国力疲惫不堪，还不如与之建立贸易关系。最后忽必烈同意，所以才没有向东南亚和印度派兵。

如上所述，在元朝内部，有人希望让对方归顺，有人希望说服对方建立和平关系，也有优先考虑通商，观点不尽相同。距离元朝越远，派兵的负担就越重，结果元朝没有向印度洋出兵。

您的第二个问题是有关日本的东北贸易。这一点与第三个问题也有关联。元朝皇帝的基本思路是要让日本臣服、归顺，但是并没有否定与日本通商，而是非常积极地肯定与日本做生意。虽然我说过与日本开展的是民间贸易，但并不意

味着元朝官方与日本朝廷或者幕府完全没有打交道，他们还是参与其中的。即便在远征失败之后不久，日本商船到访时，元朝依然批准了与日本的贸易。这当然不是地方官员随便就能批准，而是经过了中央政府的正式许可。也就是说元朝方面并不否定与日本的贸易。

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情况也相同。在这里，战争结束后的贸易反而愈加活跃。日本在战后的十年左右没有进行贸易，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也出现了这种现象。

实际上，忽必烈一直计划向日本和越南进行第三次远征和第四次远征。所以准确地说，14世纪之前不是战后，而应该称作战时，战争状态一直持续，元朝一直在准备着下一场战争。13世纪末，忽必烈去世之后，即位的新皇帝决定优先平定中亚地区的蒙古内部纷争，对东亚或东南亚地区的攻击相对平息。元朝对外方针的转变使得这一地区终于迎来战后，进入战争结束之后的下一个阶段。这种情况下，僧侣和商人的往来变得非常活跃。

正如您的提问那样，宋代开始有很多中国人来博多等地，基本确立了贸易的根基，即便后来改朝换代，浙江和福建的商人们建立起来的据点并未消失。社会结构几乎没有发生变化，所以双方的交流依旧以寺院为中心并持续了下来。因此，虽然两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依旧相对支持贸易关系，没有制定相应的阻碍政策，所以随后的民间贸易愈发活跃。

发表论文 2



异密阿儿浑及其在呼罗珊等地进行的两次户口调查

朝克图

内蒙古大学

提 要

14-15 世纪之间（1368-1420），笼罩欧亚的蒙古势力在东亚逐渐溃退，这是东亚各国关系重新调整的枢轴时代，或许我们可以把它叫作“后蒙古时代”？在这半个世纪中，东亚经历了妥协、冲突、再平衡，终于在“应永外寇”/“己亥东征”事件之后，大体形成了一个以朝鲜“事大交邻”为中心，彼此协调的东亚新秩序。很多历史学家曾经把“蒙古时代”看成是世界史/全球史的开端，但“蒙古时代”之后，作为世界史一部分的东亚史，它的基本特点是什么？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历史问题。

蒙古帝国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蒙古帝国时期，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对外进行不断扩展，征服东亚及欧亚各地区，建立了史无前例的蒙古大帝国。蒙古的征服活动，在东方和西方分别被称为《蒙古袭来》和《鞑靼旋风》，震撼全世界，形成一股不可抵挡的历史潮流。随着蒙古帝国的对外扩展，以蒙古为代表的北亚草原游牧民族走出亚洲腹地，走向世界，推翻摆在蒙古与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地理与语言屏障，促进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与融合，呈现出空前的大一统现象。这一历程大力促进人类全球化进程，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通过分析对异密阿儿浑在西亚地区的某些历史活动，为进一步了解和解释蒙古对西亚地区统治的建立过程和其特征而进行了一些尝试。阿儿浑是蒙古斡亦剌惕部贵族，他从童年时期效劳蒙古汗庭，后被派往西亚，任第五任呼罗珊异密，曾多次往返与西亚与蒙古高原之间，为蒙古帝国对西亚地区统治的建立和巩固献计献策，做出了特殊贡献。尤其是他在呼罗珊等地进行的两次户口调查，制定符合当地的税收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巩固蒙古对该地区的长期有效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研究异密阿儿浑在西亚地区的历史活动，不仅对了解蒙古帝国对西亚地区的统治与管理，而且对了解蒙古帝国的多样化、世界化特征，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历

史意义。

阿儿浑，蒙古斡亦剌惕部人，是蒙古帝国时期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历史人物。他曾任蒙古帝国总管呼罗珊等西亚地区的第四任大异密，对蒙古在西亚地区的统治献计献策，曾发挥巨大作用，留名于史册。在当时写成的与蒙古帝国时期历史相关的各种史籍中，他通常以异密阿儿浑、阿儿浑-阿合等名称出现。他切实地执行蒙古帝国对西亚地区的基本政策，在辅佐蒙古大汗加强对当地的直接统治、增加税收，发展经济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国内外有关蒙古对西亚进行征服与统治的研究并不很多。其中，日本学者本田实信的《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的建立》¹一文是论及该问题的较有影响的论文。他的文章虽然对蒙古帝国对西亚的管理和统治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但未能全面论述蒙古帝国派往西亚的几任总管们的历史事迹和他们所做的一些具体措施，因此对此问题尚可作进一步的研究。

为进一步了解和掌握蒙古帝国对西亚地区的统治方式和措施，本文在上述论文基础上对阿儿浑的生平事迹进行简要概述，同时介绍他在呼罗珊等地进行的两次户口调查的过程和意义，从而可以进一步考察和了解蒙古帝国在西亚地区的统治方式和措施。

1. 关于阿儿浑的族源和早期历史活动

要介绍阿儿浑的生平和历史事迹，首先要正确理解和掌握与其生平和历史事迹相关的历史记载。在蒙古帝国时期成书的拉施特《史集》，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等几部史籍，对阿儿浑的生平和历史事迹留下了一些记载。通过以上史籍可知阿儿浑是出生于斡亦剌惕部的一位颇具影响的历史人物。关于阿儿浑，拉施特《史集·斡亦剌惕部纪》中留下了以下记载：

（例一）

在伊朗和土兰，过去和现在都有很多斡亦剌惕部人异密，但不知他们所属的分支，只有他们相互间知道自己的出生。他们之中，有一个异密阿儿浑-阿合；但由于[他的]出生而不受人们敬重。据说，在窝阔台合罕时，他的父亲在荒年里，把他卖给札剌亦儿部的一个异密亦鲁格-合丹。换了一条牛腿。这个异密在窝阔台合罕左右担任师傅。但[亦鲁格]派自己的一个儿子到窝阔台合罕的宿卫怯薛中去时，他将阿儿浑-阿合连同自己的儿子一齐送到了[那里]。由于他是机灵人，他就逐渐成了个大贵人，一直升到执掌伊朗国政并任巴思哈之职。

对于阿儿浑的出生及成长经历，在《史集·札剌亦儿部纪》中也记载有与之相类似的内容。²

（例二）

1 本田实信『モンゴル時代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101-127页。

2 拉施特主编、余大钧 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197页。

据说异密阿儿浑之父，在饥饿贫困的日子里，将异密阿儿浑卖给亦鲁格那颜之父合丹，换得了一条牛腿。当[合丹]将自己的一个儿子送到窝阔台合罕处充任宿卫时，他把异密阿儿浑给这个儿子做亲兵。[阿儿浑]成了他的奴仆。因为[阿儿浑]是一个机敏，懂事，健谈而又聪明的人，所以他的事业很快腾达起来，于是他的地位超过了他的同辈。³

在以上两个记载中，有关阿儿浑的出身和成长等有关的内容是基本相同的。但仔细观察，在叙述中某些具体人名等方面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譬如：比较上述两处记载，例一中虽然说“异密阿儿浑之父把儿子卖给了札剌亦儿部亦鲁格-合丹”，但是例二中则说此人为“亦鲁格那颜之父合丹”。如此，以上两个记载的哪一个为更符合事实呢？我们有必要做进一步细致的研究。但不管怎样，通过以上记载，我们不仅对阿儿浑的出生部落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而且还掌握了关于其成长经历的重要信息。

除此之外，在蒙古帝国时期成书的其它史籍中，也能够见到与异密阿儿浑出身有关的记载。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是另一部记载阿儿浑历史事迹的重要史书。该书虽然通过大量的笔墨来叙述阿儿浑在呼罗珊的一些历史活动，但对他出身和家族方面的相关信息则没有留下详细的记载。关于阿儿浑的出身和家族情况，《世界征服者史》则留下如下记载。

（例三）

异密阿儿浑，他是斡亦剌部人，父亲太出是千户。⁴

此处不仅提及阿儿浑父亲的名字，而且还交代他是一个千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记载。据《史集》记载，由斡亦剌惕部组成的千户有四个⁵。但关于这四个千户的具体情况，史籍中没有找到详细的记载。关于阿儿浑的先祖，除了上文所引述的两处记载外，未能在《史集》中获得其他任何信息。但对于阿儿浑的子孙，《史集》记载详尽：

（例四）

他的儿子如下：乞来-灭里，塔里阿只，涅兀鲁思，列克集，哈只，亦斡勒-忽都鲁，不勒都黑和斡亦剌台，而他的孙子为古列克等许多个。他也有许多女儿。他把若干女儿嫁给了君主和异密们。他的儿子捏兀鲁思和列克集娶了[成吉思汗]氏族的姑娘，当了驸马⁶。

关于阿儿浑进入窝阔台汗宫廷后的具体情况，有关史籍没有留下详细的记载。但是从《世界征服者史》的以下记载中，我们还是能够窥见与阿儿浑所从事工作有关的一些信息。

（例五）

尽管他年轻，他仍赴合罕的宫廷，被录用为必阇赤。合罕对他恩渥日隆，当他年轻正茂时，就派他随合班到契丹去执行重要使命。他在契丹停留些时候，会见合

3 拉施特主编、余大钧 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153页。

4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翁独健校订《世界征服者史》（下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603页。

5 拉施特主编、余大钧 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368页。

6 拉施特主编、余大钧 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页。

罕，因他足堪信任，又受命审视额得古铁木尔与阔儿吉思的案子⁷。

额得古铁木尔应赶在阔儿吉思巩固他在朝中的地位之前，先法制人，把他的活动报合罕宫廷。于是，额得古铁木尔推荐通忽思(Tonguz)，派他赴阙去进行种种诬陷和诽谤。一些极力要使镇海丢脸的人，乘他不在时候，把这些指控上奏合罕，结果是，异密阿儿浑，忽儿巴哈(Qurbaqa)及苦思丁·迦马格尔(Shamas-Din Kamagar)受命去审视此案⁸。

从以上记载得知，阿儿浑进入窝阔台汗宫廷以后，担任过必阇赤一职。这与上述《史集》所载（例一）（例二）的内容相吻合。但是在额得古铁木尔与阔儿吉思纠纷中，他是以札儿忽赤（即断事官）的身份出现的。由于大蒙古国时期必阇赤与札儿忽赤职能很接近，所以，笔者认为，阿儿浑在窝阔台汗宫廷中担任必阇赤并兼任札儿忽赤的可能性较大。

2. 阿儿浑在蒙古高原和呼罗珊之间

在成吉思汗结束西征回到蒙古草原之后，札兰丁从印度返回呼罗珊，夺回部分城市，与蒙古统治者展开了激烈对抗。因此，绰儿马浑受窝阔台汗之命，率大军与札兰丁作战。

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军占领呼罗珊地区后，术赤任命青帖木儿担任了该地长官。当绰儿马浑抵达时，青帖木儿听从窝阔台汗的命令，同绰儿马浑一起进攻札兰丁，重新征服了该地。之后，为争夺当地的指挥权，绰儿马浑与青帖木儿之间发生了争吵。这时窝阔台汗下令将此地的指挥权交给了青帖木儿。这样，青帖木儿成为大蒙古国委派呼罗珊的第一任异密。

青帖木儿在呼罗珊各地派使臣加强统治，当地经济迅速恢复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青帖木儿死后，诺撒耳成为异密。但这时蒙古统治者内部以及蒙古统治者与当地官员之间纠纷不断，地方长官权利渐渐膨胀起来，进而掌控了属于帝国的财赋收入。这给蒙古统治者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如何加强蒙古大汗在该地的管理和统治，有效地开展税收工作成为当地首先要解决的最大问题。为此，阔里吉思任异密后，采取了户口调查、重新征税等措施以解决以上问题，从而恢复了呼罗珊和褥穆答等地的统治秩序。但此时，青帖木儿之子额得古木儿和阔里吉思为争夺该地区的指挥权而发生纠纷，二人分别到大汗宫廷诽谤对方。大汗开庭审理这一纠纷，让阿儿浑受理此案，结果以阔里吉思的胜诉而告终。阔里吉思胜诉后，继续担任异密，并把阿儿浑带到了呼罗珊。后者到该地后不久又被派回蒙古高原。之后不久，由于阔里吉思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成员之间发生口头纠纷而被处死，脱列哥那哈敦便把从乌浒水到法儿斯、谷儿只、鲁木和毛塔里等地的统治权交给了阿儿浑⁹。

阿儿浑从蒙古高原回到呼罗珊后，宣读札儿里黑(yarligh)，并任命各地的长

7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翁独健校订《世界征服者史》（下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603页。

8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翁独健校订《世界征服者史》（下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589-590页。

9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翁独健校订《世界征服者史》（下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604页。

官，在征收逋欠的赋税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由于绰儿马浑和拜住等到呼罗珊后，乘战乱将该地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尤其是窝阔台汗去世后，诸王们各霸一方，擅自征收赋税，发放札儿里黑（yarligh）和牌子，这一切都给当地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阿儿浑为迅速恢复当地秩序，采取了减轻税收的政策，从而得到了当地人的拥护，此前对蒙古统治者持反对态度的人，纷纷前来归顺阿儿浑。

贵由汗上台后，阿儿浑再度赴蒙古汗廷拜见了贵由汗。贵由汗赐他虎头牌子和札儿里黑（yarligh）。从蒙古高原回到呼罗珊后，阿儿浑赴各地大力修建各类宫廷和园林，受到了当地人们的欢迎。此时，反对阿儿浑以上活动的蒙哥孛剌赴蒙古高原向贵由汗诬告阿儿浑。听到这个消息后，阿儿浑准备亲自赴阙辩诬，而此时传来了贵由汗去世及宴吉只带（Eljigitei）将入驻呼罗珊的消息，阿儿浑便派遣异密忽辛前往斡耳朵，而他自己则留在呼罗珊。

尽管阿儿浑为宴吉只带（Eljigitei）积极准备粮草等军需物资，但各地的诸王随意征税，宴吉只带（Eljigitei）的征调及需索又过于刻薄，这使得当地百姓无力承受。

基于以上情况，阿儿浑再度亲自赴阙，对当地情况进行如实的汇报。在朝廷上与蒙哥孛剌进行尖锐辩论，并取得了胜利。回到呼罗珊后不久，他又赴大忽里台，拜见了蒙哥汗，向蒙哥汗如实汇报了呼罗珊等地存在的各种问题。蒙哥汗下令，让他在呼罗珊等地进行土地和户口调查，采取加强赋税征收等工作。

旭烈兀抵达伊朗时，阿儿浑亲自迎接，并给予了大力支持。不久，他遵照旭烈兀的命令，再一次赴蒙古汗廷，向蒙哥汗回报当地情况。阿八哈汗统治时期他继续担任各地包税制主管的职务。八剌入侵伊利汗国的时候，他率伊利汗国左翼军队与他进行战斗，结果战败。1275年阿儿浑逝世于图思附近的刺忒罕之地，并被葬于此地。

3. 阿儿浑在呼罗珊进行户口调查之过程和意义

在拜见蒙哥汗时，阿儿浑如实反映了呼罗珊等地的赋税和其它杂税的征收工作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并提出了应借鉴牙鲁瓦赤在河中地区征税的方式进行收税的建议。对于牙鲁瓦赤在河中地区征税的具体内容，《世界征服者史》中虽然没有留下详细记载，但通过对该书下册《异密阿儿浑赴大忽邻勒台》一章的相关记载，我们能够了解其部分内容。以上记载中能够见到如下内容：

（例六）

他们结论的要点是，征收百姓的各种赋课（ikhrājāt）和五花八门的暴敛乱（iltimāsāt），为数〔太〕多，百姓的流散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因此赋税应按牙鲁瓦赤在河中采取的方法来征收，也就是所谓的忽卜绰儿（qupchur）税，按照它，每人一年的缴纳是按他的财富和缴纳能力来决定，并且在缴纳了这个规定的数目，在同一年内不得再找他，也不得给他别的摊派。就这样作出了决定。¹⁰

10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翁独健校订《世界征服者史》（下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615页。

通过以上记载，我们推测认为，“按照它”之后的征税方法当是牙鲁瓦赤在河中地区征收赋税的具体方法，即与忽卜绰儿（qupchur）税相关的内容。此外，通过上述记载中的“就这样作出了决定”这一句话，我们又能够窥见阿儿浑等人在呼罗珊地区采取了与牙鲁瓦赤的征税方法同样的措施。

阿儿浑把上述决定报告了蒙哥汗。蒙哥汗听完建议后，下发了如下圣旨。

（例七）

一个富人每年应被征收十个的那，如此按比例降至一个穷人为一的那，从这个来源得到的全部收入用于支付签军（hashar），驿站（yams）和使臣生活的开销（ikhrājāt），除这之外，不得干扰百姓，不得用非法征索向他们要东西，更不得接受贿赂。而对每种情况和变化，他都制定一条札撒。¹¹

从蒙哥汗的以上圣旨内容来看，其对富人和穷人将采取不同的征税方法这一条文，显然采纳了阿儿浑的建议。与此同时，蒙哥汗把这一地区的最高权力交给阿儿浑，还任命了他的那可儿们和其它地方官员。

拜见了蒙哥汗，回到呼罗珊后，阿儿浑如实地执行大汗命令，重新任命派往各地的异密和必阇赤们，讨论并决定了应收忽卜绰儿的定额。

（例八）

而且按照圣旨，他任命异密和书记，他们连日来共同商量奉命征收的忽卜绰儿的定额。最后决定说，在实施人口调查时，税额应定为每十人每年交七十个鲁克尼的那。他这时指派异密和书记去编制户籍和忽卜绰儿。在呼罗珊和褥穆答而，他派三个作为诸王代表的蒙古异密，以及他自己的一个亲戚脑忽，兀鲁忽必阇赤哈法合鲁丁·比希昔惕，丞相也速丁·塔希耳作为〔他的〕全权代表。他把乃蛮台和我的父亲，撒希伯底万派往伊拉克和耶兹德，〔省略〕，还派秃鲁麻台，撒里合不花，篾力克撒都鲁丁，在帖必力思火者麦术督丁的合作下，去安排户口的调查，千户的划分和忽卜绰儿的征收。〔省略〕他这时经打耳班赴谷儿只，阿兰，阿哲儿拜占，并完成了户口调查，征收忽卜绰儿和收税的工作，然后他前往伊拉克。¹²

以上记载较详细记录了异密阿儿浑在忽罗珊等地所进行的户口调查经过和忽卜绰儿定额等具体情况。此次户口调查是在呼罗珊，褥穆答而，伊拉克，耶兹德谷儿只，阿兰和阿哲儿拜占等地同时进行的。通过户口调查，在了解当地富人和穷人经济条件的基础上，制定了以上税收定额。因此，在所收税额超出当地居民的承受能力，蒙古的西亚统治面临危机之际，异密阿儿浑的以上举措，对安定当地居民情绪，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巩固蒙古统治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阿儿浑的这次户口调查完成之际，旭烈兀抵达伊朗。阿儿浑在碣石拜见了。之后，他受旭烈兀委托，又一次赴蒙古高原向蒙哥汗回报了当地情况。朝廷上阿儿浑与来自呼罗珊持不同政见的使臣进行辩论，取得胜利，并得到了蒙哥汗的信任。正在这一时期蒙哥汗把呼罗珊诸地分给了自己的亲戚和诸弟们。¹³

阿儿浑从蒙古高原回到自己的分地后，赴阿兰拜见旭烈兀。旭烈兀派他到谷儿只（今格鲁吉亚）又一次进行了户口调查。

11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翁独健校订《世界征服者史》（下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615页。

12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翁独健校订《世界征服者史》（下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617-619页。

13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翁独健校订《世界征服者史》（下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620页。

(例九)

异密阿儿浑现在往见在阿兰地区的旭烈兀。抵达那里并作了报告后，他赴谷儿只，在该地他开始进行一次户口调查，把居民划分为千户。头一次忽卜绰儿定为每十人征七十个的那，但应人丁签发 (hashar)，驿站 (yam)，驿骑 (ulagh) 的开销和军队的支付超过了估计，不能由当时规定的忽卜绰儿来支付，由此调整为：多余的需求按原额的比例估定。〔省略〕阿儿浑曾把这种情况上报，有命令把富人的忽卜绰儿重定为五百的那，按比例降至穷人的一个的那，为的是开销可得到支付。采取这个步骤后，户口调查就十分彻底地实施了。¹⁴

从以上记载可知，在此次调查中，他不仅实施户口调查，而且还把当地居民划分为千户，重新调整忽卜绰儿定额，对富人和穷人采取了不同的税收政策。

众所周知，异密阿儿浑曾主管的以上地区，之后成立了伊利汗国。旭烈兀为首的伊利汗国统治者通过推行千户制制度，对当地进行了长期有效的统治。然而，实际上，在当地首先进行户口调查，实施千户制的人应为阿儿浑。因此，阿儿浑在蒙古帝国统治伊朗等西亚地区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有必要对阿儿浑的历史事迹和他所发挥的作用应做深入研究和探讨。

14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翁独健校订《世界征服者史》(下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621-622页。

指定讨论

异密阿儿浑及其在呼罗珊等地进行的两次户口调查

[提问者 / 额尔敦巴特尔、回答者 / 朝克图]

提问 / 额尔敦巴特尔：

朝克图老师在论文中对阿儿浑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阿儿浑这个人在蒙古历史上非常重要，朝老师、本田老师也对此进行了很多很重要的研究。其实在元代的蒙哥汗时期，忽必烈时期以前对欧亚蒙古人的政策是，一个是燕京，现在在中国的北部地区，另一个是别失八里，也就是现在的新疆，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伊朗、阿富汗这些地区，西部这些地区的管理权就交给了阿儿浑。所以对这个人进行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朝老师论文中提到阿儿浑有很多孩子，他去伊利汗国的时候，都是带着他的孩子们去的。我的问题是他们的家族在伊利汗国的地位是怎样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卫拉特人，就是后来明代所称的瓦剌人。在蒙古历史上，尤其到了元朝在中国中原的统治结束以后，瓦剌人在蒙古历史上非常重要，其实可以说是改变了蒙古人的历史，所以瓦剌人在伊利汗国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在波斯文的史料中多不多？

回答 / 朝克图：

关于阿儿浑的家族在伊利汗国的地位问题，从拉施特《史集》的记载来看，阿儿浑有八、九个儿子吧，将近十来个，还有几个姑娘，其中两个儿子娶了成吉思汗家族的姑娘，成为“kuruen”。努兀鲁斯这个人是继阿儿浑后，在整个伊利汗国政坛上很有影响的人物，甚至形成了一个政治集团。蒙古人到了伊朗以后，形成伊利汗国以后，从蒙古高原过去的各个部族的人，他

们分别构成政治势力，互相进行斗争。有些人跟大汗拉关系，有些人反对大汗，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斗争。其中努兀鲁斯这个人，非常厉害，整个伊利汗国史上经常出现，所以说阿儿浑这个家族在伊利汗国的势力是非常大的。甚至也成为了成吉思汗的亲族。

关于除了阿儿浑以外，瓦剌部人在伊利汗国的情况呢，没有其他特别有影响的人物，没有见到相关的史料。对于这个方面，志茂老师进行过详细的归纳，但是好像除了阿儿浑以外没有影响那么大的人物。



解读蒙古袭来绘词——以两个“奥书”的研究为中心

桥本雄

北海道大学

原文为日文，翻译：丁莉（北京大学）

提 要

日本镰仓后期“蒙古袭来”（蒙古入侵日本）这一历史事件的相关史料极为少见，其中《蒙古袭来绘词》（宫内厅收藏）生动描绘了两场战役成为珍贵的史料。《蒙古袭来绘词》是肥后国（今天的熊本县）下级武士竹崎季长让人绘制的，竹崎季长本人也亲自参加了两场战役。该绘卷作为蒙古入侵的基本史料之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这部作品现今的状态其实是在江户时代宽政年间（19世纪初期）经过后期修复形成的，而且绘卷中有很多前后次序的混乱和改动，可以推测宽政年间修复时有很多增笔。这部作品还有很多未解之谜，例如，它有两个“奥书”（卷末所附的创作旨趣），而一般作品都只有一个“奥书”；所用纸张也并不统一。

因此，如果要从史学角度来研究这部作品，首先要对其进行细致周到的史料批判。该作品虽然是绘画作品，但描绘的并非实景，所以绝不能从作品现今的状态简单地读取历史事实。为了最大限度地运用这部作品、发挥其价值，就必须进行细致周到的史料批判。本论文在近年来有关蒙古入侵以及该绘卷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考察绘卷的生成及绘制者的意图、企图，对绘卷原有状态进行想象性复原。

通过本文的考察，希望能够从泛亚洲史角度获取蒙古入侵表象论的一个切入点。

前言

关于日本镰仓时代后期“蒙古来袭”（蒙古战争）这一历史事件的相关史料，史学家们很早就开始进行收集了。其中，有一幅被称为《蒙古袭来绘词》（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收藏）的绘卷作为罕见的历史资料和绘画史料备受关注，这一绘卷是参与这场战争的肥后国（今天的熊本县）武士竹崎季长让人绘制的，对两场战役进行了生动地描绘。《蒙古袭来绘词》是蒙古战争（译者注：元日战争）的基本史料之一，意义深远，这一点可以说是学界的共识。然而这幅绘卷虽然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但并非是对真实场景的描绘（多用摹本、纸样等），这也是绘画作品惯用的手法。考虑到这一点，就有必要用建构主义的方法对这部作品进行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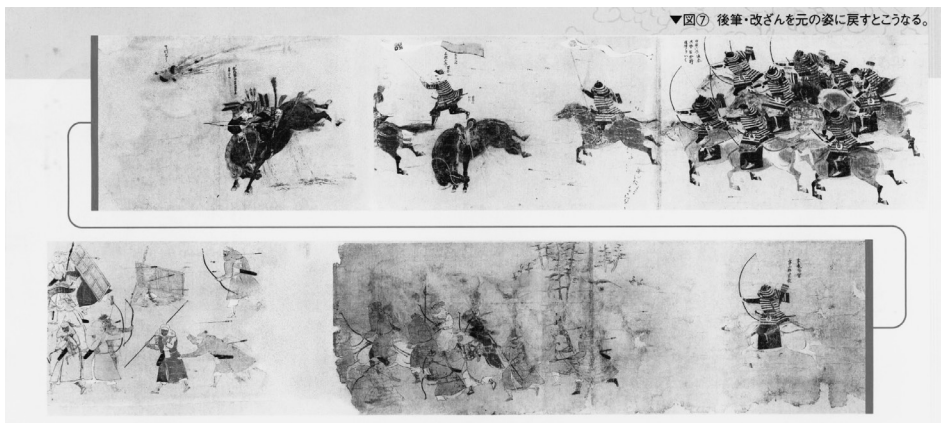
这部作品现今的状态其实是在江户时代宽政年间（19世纪初期）经过后期修复形成的，而且绘卷中有很多错简（译者注：绘卷前后次序的错乱）和改动，可以推测宽政年间修复时有很多增笔和修改。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以下这个场景：竹崎季长骑着一匹流血的战马冲向三个蒙古士兵，铁炮（即《金史》中记载的“震天雷”）在他的头顶附近的上空爆炸。绘卷左边描绘了为了躲避日本兵的箭矢正在仓惶逃跑的蒙古士兵。中间画的三名蒙古士兵最显眼，但是经过对纸张衔接处的分析和红外线扫描发现，其实原本绘卷上并没有这三名蒙古士兵，是后来添画上去的（佐藤铁太郎·太田彩氏）。另外，爆炸的“铁炮”也很引人注目，其描绘时期暂且不论，也被看作是后来添加上去的（佐藤铁太郎）。不仅如此，这个场景的绘图其实原本用于另一个不同的故事，后来为了突出竹崎季长一夫当关的勇猛形象将画纸顺序进行了调换才放在这里的。



※最近，服部英雄提出以下观点：三名蒙古士兵并非后来添加，而是在绘制绘卷时期画上的。绘卷笔触十分精巧，能看出画坊主人为了描绘这一史无前例的历史事件下了大功夫。关于为什么三个蒙古兵是画在画纸衔接处的这一疑问（一般认为创作时间略晚，或是不同的人添加的），服部认为通常绘制绘卷都是画完一张后，将第二章画纸衔接贴好之后再画下一张，因此在

两张画纸的衔接处作画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很多学者都认为这三名蒙古士兵的画风和周围的蒙古士兵完全不同，我也有同感。这幅绘卷创作于同一个画坊的可能性极低，当然也有反对意见。另外，绘卷一般是将一定数量的画纸衔接贴好之后才开始题词作画（这一点通过实际观察绘卷就会明白——笔者于2017年5月参观三得利美术馆“绘卷迷列传”展览时专门进行了观察，发现所有的绘卷都是先将（一定张数的）画纸贴好之后才开始题词作画的。）因此说在纸张衔接处作画完全正常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况且其画风还完全不同。

如果根据太田彩和村井章介的观点对上述场景进行复原的话，就会得到下面的画面（暂且保留了铁炮，但也有可能首次创作时铁炮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竹崎季长和一起从军的姐夫三井资长（石井进认为，季长有可能是资长的手下）带领队伍骑着战马、手持弓箭追赶东逃西窜的蒙古兵，这有可能才是绘卷原本的面貌。



（转载自九州国立博物馆开馆纪念特别展出手册）

如此一来，仅仅根据现存绘卷就很难也不可能还原历史真相。不仅如此，绘卷还有很多物理层面的不自然之处，需要一一研究阐明。根据前人研究，绘卷使用的画纸种类、是否用了施胶工艺（译者注：增加纸张抗渗透性）等并不统一。还有很多学者指出，绘卷中词书（译者注：绘卷中画图之间用于说明的文字）和绘画的笔触也都不尽相同。总之，这幅绘卷是一幅仍有很多未解之谜的绘画史料。因此，虽然相关研究已经很丰富，但仍需开展多层次、多方面的史料批判，否则就不能简单地把这部作品当作史料去看待。

但本报告的目的并非是对绘卷上的绘画·笔迹进行分析，关于近些年对蒙古战争（译者注：元日战争）的研究方面的进展等（特别是关于蒙古帝国史研究、对沉没在鹰岛（长崎县松浦市）的蒙古战船开展的水下考古活动等）也将在其他的报告和著作中阐述，本报告着重探讨的是这幅绘卷是在怎样的前提条件下、又是如何发展成为现今的状态的。具体说来，将聚焦于绘卷的“奥书”（卷末所附的创作目的说明），探究其历史属性，而这也是理解这幅绘卷的关键。一般来说，一部作品都只有一个“奥书”，但这部作品有两个“奥书”，而且内容并不相同，这也是未解之谜之一。本报告首先着重分析“奥书”A和B，内容和题目相比似乎有点名不副实之嫌，但希望能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打下基础。

正如刚才所说，为了尽可能充分利用这幅绘卷，必须要先对其进行多层面的史料批判。史料批判的前提是我们能够搞清楚绘制委托人的意图以及画师的世界观等，一步步地去揭开作品上的层层面纱。当然，仅靠本篇报告是无法搞清所有的问

题的，于是只能缩小了所设定的问题的范围。相信通过这样的研究，可以找到一个线索，能够逆向推证“蒙古袭来”（蒙古战争）的真实情况，更希望在这一线索的基础之上深入研究，发展成为蒙古入侵表象论亦或是泛亚洲史图像学研究。

1. 解读《蒙古袭来绘词》的准备工作

（1）绘卷的简单说明

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蒙古袭来绘词。考虑到便于理解，本报告的题目使用了《蒙古袭来绘词》这一一般性称呼。由于这幅绘卷描绘的是主人公竹崎季长的事迹，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应当称之为《竹崎季长绘卷》，本人也基本同意后者的观点。但是在这里暂且保留这一观点，不做赘述。

现在保存在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中的这幅绘卷，分上下（前后）两卷。应该就是绘卷的主人公——竹崎季长委托画坊创作了这幅绘卷。绘卷从竹崎季长家中外流之后某个时间点开始归熊本大矢野家所有。1825年（文政8），绘卷由熊本藩主细川家代为保管，后来被带到江户，渐渐被大多数武士所熟知（例如：松平定信的阅览和描摹→《乐翁本》的制作）。近代以后，全国临时宝藏调查委员会经过调查于1890年（明治23）从绘卷所有人大矢野家收购了这幅绘卷归入宫内厅收藏。现在，这幅绘卷虽属皇家御物，但实际上是长期保存在三之丸尚藏馆。

※大矢野家族居住在熊本天草，在文禄·庆长时期加入肥后南部地区小西行长的麾下。西军小西家族在关原之战中灭亡之后，大矢野家族便又投奔了统领肥后一国的加藤家族（被赐予玉名郡下长田村的领地）。加藤家族被贬后，大矢野家族又成为细川家族的家臣，玉名郡则成为该家族的大本营。

作品的规格如下所示。前卷（上卷）宽40.3cm，长2450.6cm，后卷（下卷）宽40.2cm，长2111.8cm。关于顺序，学者意见各不相同，通常情况下按照现存状况划分为：词书一到九，绘画一到十为前卷，词书十到十六，绘画十一到二十一为后卷。这是一幅很长的绘卷，之前还曾被分成三卷。绘卷中有前后次序混乱、错页、删除等情况，画纸的质地和规格也不尽相同。另外，有一部分词书和绘画被分开保存（部分被藏匿在了大矢野家），这一点后面还会详细分析，因此想要将绘卷复原到最初的模样是极其困难的。正因如此，相关的史料研究也非常多，有了深厚的积累。例如，有学者认为同样的作品同时绘制了两幅（原本·副本），这一说法很受支持。但有人说不仅是两幅，甚至有可能是三幅。这些都需要今后继续深入研究。

（2）研究本绘卷的视角和课题

研究这样的绘卷史料，不仅要研究作品的绘画部分、词书部分的各个细节，对卷末“奥书”（说明制作目的的文章）的理解也至关重要。前者是俯瞰全体、聚焦细节的视点和方法，而后者则是将整部作品当成一个对象来研究，是一个更为超视性的视点。绘卷研究就是通过两种研究的细致考察，在两种方法中来回、结合而最终获得升华，实现突破。但是，由于这部作品的错页、修改、添加等后来的加工较多，因此研究时我们应该先用后者的方法把握整体，在此基础上再来对前者在细节上的修改等进行解释。这一研究顺序有助于我们弄清楚绘卷是怎样发展成为现今这

种状态的，有助于我们一步步地揭开它神秘的面纱，有助于我们复原其本来面貌。

※但另一方面，很多学者致力于通过细节分析推测绘卷原本模样，以期提高绘卷的“实证性”。最近，堀本一繁的研究就很受人关注，他通过研究词二的错页，推断出了竹崎季长的行军路线。

这幅绘卷不合常理的地方就在于，卷末有两段相当于“奥书”的文章。（在此按顺序称之为“A（词十五）”、“B（词十六）”）。虽然两处落款都是“永仁元年（1293）二月九日”，但两个“奥书”文风各不相同，所写的创作目的也大相径庭。

简而言之，A写的是“安达泰盛之事”，安达泰盛“放文书，赏骏马，唯赐季长一人”，武士竹崎季长（担任海东乡地头一职之际）在镰仓受到了安达泰盛的关照，A的内容则可称之为对安达泰盛的“镇魂”。

与此相对，B则描写竹崎季长拜谢其所信奉的甲佐神社（大明神），也就是对担任海东乡地头一职的感谢之意。具体说来就是甲佐的大明神现身降临到神社祭坛东边的樱花树上，这个“东”指的是“关东”，和竹崎季长后来所任“海东地头”一职的“东”也是同一个字，（虽然这种说法太过于牵强附会），于是竹崎季长下定决心去关东讨个说法并付诸行动，最后获得成功。

更有意思的是，“永仁元年二月九日”这个日期其实当时是不存在的，正确来说应该是“正应六年二月九日”（萩野三七彦）。年号改为“永仁”是在正应6年的8月5日，中世纪的日本不像中国和朝鲜那样有即位年（即位当年为零年）的概念，因此当年（1293年）8月5日之前是正应年间，8月5日之后年号则改为“永仁”。也就是说，“永仁元年二月九日”这个年号，在正应6年2月时，是当时的人们不可能知道的，可谓“未来年号”。反过来也就是说，这个日期是在年号改为“永仁”之后才写下来的。这就说明，这部作品问世是在文永·弘安之役的十多年之后，甚至有可能是永仁元年之后才创作的。绘卷的创作意图不是很清晰，所以让很多学者都不明就里。

※绘卷卷末通常会附有“奥书”，记载有年月日。如果“蒙古袭来绘词”原本最早是正应6年制作而成的，那么日期就应该记载为“正应六年二月”。后人即便对其进行改写、改动，理应也会遵循原本的日期，由此可以推测本绘卷原本（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藏本）的原初形态应该是在永仁元年之后形成的。

此前有学者（宫次男）提出：应当将“奥书”A、B和绘卷本身分开进行理解，这一说法近年再次得到提倡（服部英雄）。服部的观点是：（1）关于“奥书”A；竹崎季长后来可能是和安达泰盛一派断绝了关系，因此才没有参加岩门合战。（2）关于“奥书”B；绘卷里面出现了熊野先达（熊野神社的修道者·山野修行僧），而“奥书”中又出现阿苏神社系列的甲佐神社（大明神），这只能说明是后来添加上去的。（另外根据服部的研究，肥后地区信奉熊野主要是在玉名地区，玉名周边有一个地方叫竹崎，正是季长之姓的来源），另外竹崎季长任海东乡地头一事在绘卷中也一次都没有提到，也就是说绘卷和“奥书”B根本就是互不对应的。

“奥书”A的一大特征就是汉字都有注音假名，从字体和字迹来看，它和疑点重重的词九（其内容和词二、词七都有相当多的重复部分，尤其是词九，在汉字和假名用法上留有区别，而这与词七的起头部分几乎一样）大体可以推断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宫次男·小松茂美·太田彩）。不过，“奥书”A描写了竹崎季长去安达泰盛处为自己鸣不平的场面，也强调了安达泰盛的恩情（但是词七和词九的笔迹不一

样，因此推测原来应该是各自记载于不同版本）。这样一来，从现存绘卷的整体结构来看，服部英雄以“奥书”A来论证竹崎季长是反安达泰盛派的这一说法是前后矛盾的。

※石井进认为词九有可能是误写（小松茂美也认为词九有可能是从别的书中误收进来的），就没有把词九收录到《中世政治社会思想（上卷）》一书中。因此，石井进把现在的“词十”编成了“词九”，这就和宫内厅现存绘卷的词书编号每个都相差一个号。也就是说“奥书”A（宫内厅现存本是词十五）在石井进的翻刻版本里面是词十四，“奥书”B（宫内厅现存本是词十六）则是词十五，这一点需要注意。

众所周知，竹崎季长受恩于三个人——安达泰盛、安达盛宗、小式（武藤）景资，这三个人后来都被镰仓幕府第八代执权北条时宗·第九代执权北条贞时的第一家臣——平赖纲所算计，被一一剿灭（1285年（弘安8年），霜月动乱）。特别是安达泰盛一派的小式景资在福冈县的岩门合战（1284年（弘安七年））中，被和他争夺家督的哥哥——小式经资所杀害（小式经资毫无疑问是反安达泰盛的平禅门一派的）。关于岩门合战之时竹崎季长等肥后地区武士们的动向，史料不详。一般推测，肥后势力当时没有余力参加合战，最终没有帮上安达泰盛派的小式景资，对此，竹崎季长或许是很后悔的。但也有学者（服部英雄）认为，当时竹崎季长已经加入了反安达泰盛的阵营，因此才没有去参加合战。

但真实情况到底怎样尚未解明，以上两种假说也都没有确实的根据。

2. 对《蒙古袭来绘词》“奥书”A·B的分析

（1）“奥书”A和词七·词二·图二——大矢野家族的起源论

本报告想要着重关注的一个历史事实是：绘卷原本的词二和图二一直被藏匿在大矢野家族家中，完全不为外界所知，直到江户时代文政年间末期。（堀本一繁）。

词二中描绘了“当日大将（当天的指挥官）”——小式景资。绘词的主人公竹崎季长骑马行进走过景资面前，告诉他说，倘若自己率先攻入敌阵，让景资务必向镰仓将军报告。（景资答应了这一请求）。与这词书相对应的绘画就是下图二。画面右侧端坐着的正是小式景资，和词书二对照一下就会很清楚，现今未能留存下来的绘画前半部分画的应该就是竹崎季长（只可惜所有的摹本也都没有前半部分）。



（《蒙古袭来绘词》前卷·图二/转载自太田彩·《蒙古袭来绘词》）

问题就在于，现在无法确认画中竹崎季长的样子。根据词二可以知道，竹崎季长立功心切，急于冲锋向前打头阵，见到小式景资竟然都没有行下马礼。可以推

测，图二的缺失部分（上图右方）很可能描绘的就是骑在马背上的竹崎季长。

看上图就能很容易推测，很有可能是为了掩饰竹崎季长的无礼举动，才故意把图二的前半部分给删除了。若非如此，没有理由要把描写了竹崎季长无礼举动的词二藏匿起来。在江户时期，武士阶层的秩序和礼制都非常严格，把描绘有武士无礼举动的绘卷当成宝贝收藏一事是会遭到谴责的。

※特别是不行下马礼这一举动，有可能会因为严重违反武士的礼法而被当作是反面典型。比如说，江户时期的武士阶级道德修养之书、同时也是镰仓幕府的正史——《吾妻镜》记录了治承5年（1181）6月19日，源赖朝麾下的上总介广常因没有向源赖朝行下马礼而遭人诟病。《吾妻镜》中多处描写了广常对“主君”源赖朝的反抗，这就为把广常认定为忤逆者埋下了伏笔。后来，源赖朝以“企图策划东国独立”的罪名肃清了广常（河内祥辅）。另外，关于中日两国律令制度上关于下马礼的继承关系，大隅清阳有很详细的研究。

这样推论是因为词二的内容和词七·词九的内容大部分都是重合的，（竹崎季长仅率五匹战马，在“当日大将”小式景资面前表达了自己想要率先冲锋陷阵的决心）但是，后面的词七·词九却完全没有提及竹崎季长未行下马礼一事。

为了证明这一推论，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下词书内容的书写方式。词二并没有残缺前半部分，一开始就是描写竹崎季长在博多战场向“当日大将”小式景资表达自己想要冲锋陷阵的愿望。也就是说，词二描写的是战争现场以及当时人们的谈话记录。

与此相对，词七·词九开头描写的是1275年（建治元年），竹崎季长来到镰仓因想要论功行赏在安达泰盛面前申诉时所说的话。回忆往事，将当时在“当日大将”面前表的决心等等又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但是，在这篇诉文里面也没有提到季长在小式景资面前没有行下马礼一事。如前所述，即便是为了冲锋陷阵，作为一名武士，不行下马礼是绝对不被允许的行为。

※书写词九（和“奥书”A字迹相同）的第43页用纸的最右侧可以隐隐约约看到画有松枝，因此可以推测出这前面没有缺失部分，另外也可以清楚地看出，画师跨过纸缝绘制了这幅图（大仓隆二·佐藤铁太郎）。但是很遗憾，词九后面有缺失，无从推测全文。但是，通过“奥书”A和词九可以推断，当时至少绘制了两部《蒙古袭来绘词》（包含“奥书”A和词九的这一部便是异本之一）。

这样看来，词二以及与之对应的图二之所以会被大矢野藏匿在家中并不难理解。小式景资下令要在博多息浜“一同（同时·一齐）作战”，但竹崎季长因自己手下太少急于通过打头阵的方式立军功。（词二·词七·词九）大矢野家需要对故事情节进行如下修改：“勇敢”的竹崎季长不惜扰乱行军秩序一心想要冲锋陷阵，但他并不是一个会对自己的上司采取无礼行为的粗鲁之人。也正因如此，大矢野家才会对绘卷进行藏匿，对部分内容进行了删除。

再回到“奥书”A的问题，即向安达泰盛表示感谢这一问题。词九隐藏了竹崎季长没有向小式景资行下马礼这一事，而“奥书”A与词九是出自同一人之手。也就是说，大矢野家族一直想把竹崎季长和安达泰盛、小式景资定位于同一条线上，因为这会给大矢野家的祖上增光添彩。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大矢野家一直认为自家祖上是大宰大监，相当于担任大宰小式的武藤家的直属部下。可以说，近世以后大矢野家族一直在强调（润色·捏造）自家和小式家族（武藤家）的亲密关系。小式景资有恩于竹崎季长，大矢野家族自然而然就把

竹崎季长当做了媒介加以利用。

第二：现存绘卷中描绘了大矢野种保三兄弟在1281年第二次战役（弘安之役）的海战中和竹崎季长并肩作战的画面（后卷·图十六——“大矢野兄弟三人/种保”这一说明文字很明显是后来加上去的），这是为了强调竹崎季长和大矢野家族的先祖在战场上有过出生入死的交情。不仅如此，后卷弘安之役中还描绘了竹崎季长和安达盛宗（泰盛次男，肥后守护代）军队的密切关系。

※ 那么，大矢野家族为什么不想向小式经资靠拢呢？小式经资继承了家业，在岩门合战中又取得了胜利。关于这一点前人研究已经指出：岩门合战之后，筑后·丰前·肥前·肥后等地被北条得宗家一一收入囊中，小式经资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坐收渔翁之利；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平禅门之乱（1293年（正应6年=永仁元年））后的第二年，原安达泰盛派重新夺回了权力；另外，江户时期的主流历史观是源平政权更迭进入源氏天下，因此反抗过平氏=北条家的菊地家族、大友家族、小式家族等就如同英雄一般，对大矢野家族来说，一段能和这些英雄攀上关系的家族“历史”非常重要，自然就会非常重视描写了自家和小式家族、菊池家族亲密关系的《竹崎季长绘卷》了。

对于最终当上细川藩（肥后·熊本）藩士的大矢野家族来说，曾和肥后武士竹崎季长一起出生入死、并肩作战的历史能够保证家族在肥后地区的正统性（尽管历史事实很可能并非如此）。这样一来，有学者（樱井清香）曾经指出的如下假说看来也不无道理：在大矢野家族之前先拥有这幅绘卷的名和显兴是从甲佐神社的宝库把这幅绘卷抢了出来。（或许也有可能是大矢野家的人抢的。）

（2）“奥书”B和竹崎季长文书——镰仓后期九州的德政状况

从以上分析可以推断出，“奥书”A和词九有可能是江户时期添加的“伪作”，或者是混杂进了异本的内容，始作俑者很有可能就是大矢野家族。但是另一方面，“奥书”B中也有几处不自然的地方，在此将其列出。

竹崎季长留下的相关文书中，有一部分残存在塔福寺中。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竹崎季长文书》（遗书兼捐赠书）（1293年（正应元年）原作【第一版】，1314年（正和三年）亲笔改稿版【第二版】；《中世政治社会思想》（上卷）载），其中记录他将安达泰盛·盛宗分封于他的海东乡的一部分权益捐赠给了氏族寺院——塔福寺和海头乡神社（海东社）。但是文书中记载的捐赠对象名·神社名的汉字表記却很有问题。塔福寺文书写的全是“海头乡神社”，而不是绘卷“奥书”B里所写的“海东乡”。当然，日本中世就连人名的汉字标记都有可能发生变化，这也许不过是很微不足道的差异罢了。但是根据“奥书”B的记载，竹崎季长是梦里受到神明的指点才去了关东（镰仓幕府·受到赏赐），被封为海东乡地头，为了纪念这件事才创作了这幅绘卷。如果是这样的话，竹崎季长难道不应该终生都对“海东”的表記极其在意才对吗？也就是说把“海头”（塔福寺文书）写成“海东”（绘卷“奥书”B）这件事，说明后者（“奥书”B）的记述有可能并非出自竹崎季长的本意。

※ “奥书”B最后写道：“为了将甲佐大明神的神德昭与世人，特书此文”（“此文”指《蒙古袭来绘词》石井进）。但是，现存绘卷的词书和绘画中并没有竹崎季长向甲佐大明神表示感恩的画面，石井进也指出了这一点（但他似乎并没有特别注意）。另外，海东乡属于受甲佐社（肥后二之宫）庇护的一带，季长将自己的领地捐赠给海东社（今天的海东阿苏神社），而海东社其实是经由甲佐社（阿苏分神社）请到海东乡分祀的阿苏分神社之一。（何时请来的不太清楚，如

果是竹崎季长感恩甲佐社大明神的神德而请来的话，有可能就是在竹崎季长来到海东乡的1276年（建治2年）正月6日之后）。另外，塔福寺离海东神社也不远，竹崎家族还将塔福寺的僧侣派到新建不久的神宫寺（1293年（正应6年=永仁元年左右）），借此加强对海东社·海东乡的控制。

“奥书”A、B落款都是“永仁元年二月九日”即1293年。前面也提到过，1293年8月之前都是“正应6年”。《竹崎季长文书》（塔福寺文书第二版，秋冈家文书第一版）的日期是“正应六年正月二十三日”，使用的却是正确的年号。这也是最难理解的一点，只能说《文书》是竹崎季长同时代史料，而“奥书”A、B则都是后世写成的。

综合来看，“奥书”A有可能是近代初期大矢野家族所添加的，“奥书”B即便不至于如此，也有很多疑点。不过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教形势，似乎也不能断定它是江户时期的作品。竹崎家族从政治、宗教上逐步加强对海东乡的控制是在1276年（竹崎季长来到海东乡）到1293年（海东社新建神宫寺，竹崎季长捐赠自己的领地）这一期间，可以认为他是为了保证自己对海东乡的实际控制，才决定向海东阿苏神社和新建的神宫寺进行捐赠。

1293年（正应六年·永仁元年）4月发生了平禅门之乱，旧安达泰盛派重新掌握政权。安达泰盛曾经发起过所谓的“弘安德政”（1284年（弘安7年）6月），否定“别相传所领”（神社领地归公家和武家所有），提倡神社的领地应归神所有（神领兴行），并且采取了较为激进的措施（井上聪）。虽然否定“别相传”的德政在那之后就再没有出现过，但1297年（永仁5年）颁布的《永仁德政令》和1312年（正和元年）颁布的《正和德政令（神领兴行法）》都对地方上那些不将神社领地归还回去的武士和小官更加以排斥——相比于前者因公家的无能最后以失败告终的结果，后者凭借武家的力量，激进地推行到甚至将御家人的保护方针也丢弃的地步（村井章介）——，竹崎作为一名武士肯定也感知到了这种政策的危险性。再加上旧安达泰盛派的复权、北条贞时的专政（例如：1293年（永仁元年）颁布的“执奏”制度规定最高司法权由得宗家北条贞时掌握，第二年（1294年）又规定不服北条贞时判决的申诉（申请复议）一律不得受理）以及伏见天皇亲政的愿望愈发明晰（建立了记录所申诉制度，每个月审理六次杂诉（土地·领地相关的诉讼）），对此，竹崎家族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对他来说最坏的情况便是：因海东乡本来属于甲佐社（肥后二之宫，阿苏分神社）的领地，自己在海东乡的权力被否定，领土·地头一职被甲佐社收回。

对此，竹崎季长采取的措施就是：将领地的一部分捐赠给海东社（阿苏分神社）；建造神宫寺；书写《文书》、强调自己对佛物·神物信仰的坚持等。另外，为了让这些措施有理有据，他也需要强调自家（竹崎家族）和甲佐社有着很深的因缘。可能就是为了强调这种“很深的因缘”，才创作了“奥书”B。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来自外部的威胁不断增加，和国内政治动向密切相关。（川添昭二）。1292年（正应五年·至元29）7月，镰仓幕府收到了元朝燕文楠的文书（《镰仓年代记》），同年10月，高丽国第三次送来文书——以元朝文书为中介——被金有声等人带到大宰府（《金泽文库古文书》·《高丽史》等）。金有声在护送漂流到耽罗（济州岛）的日本商人回国时带来了这封国书。虽然处于中间立场的高丽的金有声将国书里的措辞改得柔和了很多，但已是第三次催促日本尽快归顺元朝（植松正）。受到来自元朝-高丽的压力，日本加强了防御外敌的准备。同月让诸国国分寺·一宫等祈求顺利征服异国（《东寺百合文书》）。11月份开始选拔国防指挥官（大

将)，也就是后来的镇西探题（《亲玄僧正日记》）。次年3月份，任命北条兼时·时家，正式启动镇西探题（村井章介）。4月份发生了平禅门之乱，旧泰盛派重新夺取政权，6月份伏见天皇开始亲政。

在1293年（正应六年）~1314年（正和三年）{第二版}的竹崎季长文书（塔福寺文书等）里是明明表记为“海头（御社）”，但“奥书”B里却表记为“海东”，这确实让人觉得不太自然。但是，不能因此而冒然下结论说两者之间一点关系都没有。颁布《正和德政令》的时间是正和元年（1312）9月之间的事情（村井章介），因而塔福寺文书中的竹崎季长奥书{第二版}是为了应对此举而进行改稿的。奥书B的情况的话，会不会是在那以后由季长的子孙创作出来的呢？他们可能是在因为某种原因，其海头乡地头的职位不稳定或受到威胁等情况下，同时又不甚在意“海头”和“海东”的区别，而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梳理一下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代表镇西（九州）的宇佐神宫（八幡宫）之“式年迁宫”（1289年（正应二年））延迟，迁宫之后仅过了两年时间，便和弥勒寺一同毁于一场大火（1309年（延庆二年））；几乎就在同一时期，九州的宫崎宫·香椎宫也毁于火灾；后深草上皇·龟山上皇·后二条天皇先后驾崩；镰仓大地震；瘟疫肆虐；庆元年间日本商人被骚扰事件（榎本涉）；得宗贞时去世等等，引发社会动荡的事件相继不断，而实施德政恰逢时机。在此背景之下，1312年发布了“正和的德政令”。而这一法令因其是“权力阶层意欲从上之下强行制定出‘一円领（神领）’为目的的法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村井章介。假设“奥书”B是为了向幕府、探题和阿苏社强调御家人竹崎家族作为海头乡地头的“正统性”和神威，那它的效果可以说是很明显的。

也许竹崎季长迫于形势，为了保全自己的封地，就需要强调和宣扬自身和甲佐社·海东乡的关系，并为此创作了竹崎季长文书还有“奥书”B。如果“奥书”B的内容是这样形成的，那么将《蒙古袭来绘词》的其中一本捐赠给甲佐社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如果以上的分析、推论能讲得通的话，那么“奥书”B很有可能是正和年间稍后时期创作的。不过，“奥书”B的创作和向海头社奉纳《蒙古袭来绘词》这两件事情有可能是同一时期发生的。关于这一话题，愿留作今后的研究。

结语

最后再对前文做一些补充，作为本篇报告的结语。

首先关于《绘卷》的“奥书”A。“奥书”A对大矢野家族有利，很有可能是近世之后作为肥后·熊本藩士的大矢野家族创作（捏造）而成的。绘卷中强调了肥后菊池家族的存在，这部分可以看作是原来就有的。但奇怪的是绘卷开头的“丰后国守护大友/兵库守赖泰之手/军兵”等画中注并没有与之相对的词书，这有可能是大矢野家族为了宣传自身与九州三大势力——小式·菊池·大友家族的关系，特别是为了突出和阿苏的关系后来加上去了菊池·大友家族的有关内容。大友家族与阿苏神社内部的关系始于16世纪·战国时期，这也暗示着这个画中注可能远远晚于镰仓·南北朝时期。

关于“奥书”B，可以推测出它与竹崎季长把握海东乡控制权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弘安·永仁·正和的德政在九州地区保有影响力的背景下，竹崎季长的子

孙为了保全自己的封地起草了“奥书”B并在其中强调自己和甲佐社的密切关系。具体说来，也就是因为德政令否定“别相传”、排斥占领神社领地的地方武士，为此竹崎季长不得不采取了相应的对策。

另外，官次男和服部英雄所持的“奥书”A和“奥书”B原本就并不从属于绘卷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也如同石井进所指出的那样，不能说两个“奥书”和绘词之间毫无关系。换句话说，为了正确理解现存这幅绘卷，首先要探讨“奥书”A·B的创作目的，可以说后世对绘卷的改编正是为了使之符合“奥书”A·B的内容。因此，我们绝不能轻易就否定绘卷和“奥书”的关系。既然一次性溯源《蒙古袭来绘词》原本的模样基本不太可能，那么我们也可以尝试像这样一步步地、分阶段地去进行考证分析。

石井进认为，竹崎季长是为了追忆安达泰盛和小式景资，才让人制作了《蒙古袭来绘词》，这种可能性并非完全没有。不过，本报告分析的只是被认为是后世书写的“奥书”A、B的历史特征，因此《蒙古袭来绘词》这部作品的原初形态、以及竹崎季长出于什么目的找人制作这幅绘卷等，这些问题的谜团依然未能解开。

今后，为了更加深入分析《蒙古袭来绘词》，应该在把握“奥书”A（近世初期？）和“奥书”B（正和年间以后？）的历史特征的基础之上，分析出每一次修改和添加的内容。当然，有可能有的添加、修改和删除，和“奥书”A·B的主旨并不相符，也有可能通过对现存绘卷的分析，反过来需要重新修正本文对“奥书”A·B的评价。本人今后也将继续努力，尝试解读这部作品，争取解开它的未解之谜。

【主要引用・参考文献】

石井 進1972「竹崎季長絵詞」（詞書き翻刻・解説）『中世政治社会思想』（上）岩波書店 ※新装版1994

———1991『中世史を考える——社会論・史料論・都市論』校倉書房

———2000『鎌倉びとの声を聞く』NHK出版（日本放送出版協会）

井上 聡2013「神領興行法再考」『東京大学日本史学研究室紀要別冊 中世政治社会論叢』同研究室

植松 正2015「第二次日本遠征後の元・麗・日関係外交文書について」『東方学報』

榎本 涉2007『東アジア海域と日中交流：九～一四世紀』吉川弘文館

大倉隆二2007『「蒙古袭来絵詞」を読む』海鳥社

大隅清陽2011『律令官制と礼秩序の研究』吉川弘文館

太田 彩2000『絵巻＝蒙古袭来絵詞』（日本の美術414）至文堂

荻野三七彦1932「蒙古袭来に就ての疑と其解釈」『歴史地理』59巻2号

川添昭二1977『蒙古袭来研究史論』雄山閣出版

工藤敬一1974「竹崎季長おぼえがき」『日本歴史』317号

河内祥輔2013『頼朝がひらいた中世——鎌倉幕府はこうして誕生した』（ちくま学芸文庫）筑摩書房

小松茂美1988『蒙古袭来絵詞』（日本の絵巻13）中央公論社 ※再版1990

佐伯弘次2016「蒙古袭来以後の日本の対高麗関係」『史淵』153輯

桜井清香1967『元寇と季長絵詞』徳川美術館

- 佐藤鉄太郎 2005 『蒙古襲来絵詞と竹崎季長の研究』 錦正社
- 2016 「元寇の実相：服部英雄著『蒙古襲来』の実証的批判」『軍事史学』52巻2号
- 中村一紀 1975 「蒙古襲来絵詞について」『熊本県文化財調査報告書(17)竹崎城』熊本県教育委員会
- 服部英雄 2014 『蒙古襲来』 山川出版社
- 宮 次男 1964 「蒙古襲来絵詞について」『日本絵巻物全集(9) 平治物語絵巻・蒙古襲来絵詞』 角川書店
- 村井章介 1988 『アジアのなかの中世日本』 校倉書房
- 2001 『北条時宗と蒙古襲来：時代・世界・個人を読む』(NHKブックス) 日本放送出版協会
- 2006 『中世の国家と在地社会』 校倉書房
- 堀本一繁 1998 「『蒙古襲来絵詞』の現状成立過程について」『福岡市博物館研究紀要』8号
- 2012 「『蒙古襲来絵詞』の復原にみる竹崎季長の移動経路」『交通史研究』78号

指定讨论

解读《蒙古袭来绘词》——以两个“奥书”的研究为中心

[提问者 / 李命美、回答者 / 桥本雄]

提问 / 李命美：

您对绘画的分析非常有见地。我不了解日本内部的政治状况，有很多部分不太熟悉，所以不清楚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但是从您的解读中能了解到当时以及后来的日本人如何看待蒙古袭来，这一点非常受益。读起来甚至有推理小说的感觉。以下就我不太明白的地方简单提问。

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或许没有答案。您认为通过奥书对绘画进行修改或者删除究竟出于什么政治目的？当然，从您的论文当中也能充分把握、能产生共鸣，但是，奥书的笔迹差异如此之大，而且您也提到纸张的质量的差别也很大，对绘画进行的修改也非常明显。如果真是带有某种政治目的修改的话，应该是尽量避免与原作的差异，骗过一般人的眼睛，但是为什么差异这么显而易见呢？是因为当时的技术不过关吗？或者出于其他认识方面的不同？我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另外一点是奥书B，也就是词十六。通过与塔福寺文件的比较，您认为这或许是竹崎季长本人或者其后代创作而成，带有某种政治目的。这种解释也非常有趣。不过在您的论文最后部分则提到塔福寺文件中的汉字标记与奥书B及海东乡各不相同，就是因面对不同的人物或是因季长的政治姿态所表现的方法的不同。这一部分请您谈得再详细一些。

还有一点与奥书A相关。季长向小式景资建言，打头阵进行攻击之时，竟然未行“下马之礼”。这一事实记录在绘画二、或词二里，却被

大矢野家加以隐藏。以此展开分析的部分非常有趣。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里“未下马”的记录，在随后的奥书A中，或者词七、词九中并未记录，您认为这其中或许是出于某种意图进行的删除。我的疑问是，江户时代与镰仓时代的武家之礼是否有不同之处？我认为镰仓时代也还是存在武家之礼的，这个时期的绘画中出现未行下马之礼，在当时会不会是表现某种紧急状况？如果我的猜测成立的话，我认为在词七、词九中没有记录相应的内容，是因为这是事后回想起那个场面时，认为这样的内容可以忽略不计。另外一点与之相关，我不太明白，大矢野家隐藏的词儿和绘画二是如何被发现的？也就是说对外公开的经过怎样？是否有记录或者相关的内容？

回答 / 桥本雄：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您的问题其实就是笔迹和纸质的明显不同，反而造成画轴的不自然吧。我也认为一般情况下应该做到不露马脚。不过，制作画轴的花费高，过程又繁琐。假设全部重新制作一幅新画轴的话，会保证干净漂亮，但是一般做不到，也不会去做。这是为什么呢？

这种画轴一般有两卷或三卷，其内容要么相同，要么关联极强。这些画轴一旦被拆散的话，再将其放在一起时，很可能会出现时代顺序混乱的现象。保留下来的写本很多，至少有四十卷以上。顺序因书写时代不同而异，所以能了解各个时期保存的状况。因此，如果要在原画轴的基础上制作的话，虽然比较复杂，弄成粘粘乎乎的，

然后进行组合，这样的话反而能做出古旧的感觉，花费也不会多。顺便提一句，我们看到的画轴是江户末期制作的，跟竹崎季长完全没有关系。总的说来，是在保护古物的前提下制作的。

有关第二个问题，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东”与“头”这两个汉字的不同之处。或许当地人常用“头”字吧。大概是作者投其所好，所以用了这个字。

关于未行“下马之礼”的第三个问题，您指出可能在暗示某种紧急状态，我认为这种解释蛮有道理。不过，他还是被斥责了。为什么不下马？而且，决不允许抢头功。军队必须齐头并进，统一行动，不许跑在最前边。不过他还是自作主张跑到了最前边，触犯了规矩。因此，有可能是后来向镰仓的大人物进行汇报时隐藏了这一部分。另外，没有词二和绘画二直到江户末期才为众人所知的相关史料，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发表论文 4



从古代蒙古人的姓名看蒙古人与外族的关系

额尔敦巴特尔

内蒙古大学蒙古历史学系

原文为日文，翻译：丁莉（北京大学）

提 要

13世纪，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所进行的大规模的对外征服战争中，汉、女真、西夏、高丽、钦差、阿速、斡罗思等诸民族和国家的大量人口被输入到蒙古地区。蒙元时期，蒙古人有一种有趣的习俗，即用被征服的民族、国家和地区之名或部族长官的名字来给他们的孩子起名。如，撒里答（回回）、锁郎哈（高丽）、唐兀歹（西夏人）、合申（河西）、忻都（印度）、囊加台（南宋）、蛮子台（南方人）、阿速台（阿速人）、斡罗思（俄罗斯）、马札儿台（匈牙利人）等蒙古人名均来自当时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名字。众所周知，蒙古部首领也速该之子铁木真的名字来源于塔塔儿部的首领铁木真兀格。从蒙古人的这一起名习俗中，可以窥见到蒙古人与其他国家、民族接触和交往的历史。14世纪元亡之后，蒙古高原不同民族成分的部落以及大量外来人口逐渐融化到蒙古民族中，而其中一些国家、民族的名称也随之变成了蒙古的部落或姓氏的名称。

在蒙元时期，蒙古人常将别的国家、部族、地区之名或人名，作为自己孩子的名字。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很早就注意到这一现象。¹众所周知，蒙古部首领也速该之子帖木真的名字就来源于将战俘塔塔儿部首领帖木真兀格。《元朝秘史》的记载就是当时蒙古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参校《蒙古秘史》、《元史》、《史集》等史籍便不难发现，该现象在蒙元时期极为普遍，不乏其例，如称为撒里答（回回）、锁郎哈（高丽）、唐兀歹（西夏人）、忻都（印度）、囊加台（南宋）、蛮子台（南宋人）、合失（河西）、阿速台、钦察、斡罗思、马札儿台（匈牙利）、阿鲁浑、术赤台（女真人）等。

姓名是社会产物，它反映特定历史阶段上的文化和心理，同时也反映民族关系

1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00-201页。

和文化接触。²我们通过蒙古人“以部族为名”习俗的考察，不仅可以看到蒙古人与外族接触和交往，还可以看到大量外族人在蒙古人中融化的历史。

由于时间的关系，仅对蒙古与以上提到的几个国家、民族、部族的关系和史籍中出现的以异民族或部落作为名字的蒙古人做一些简单的梳理。

1. 乞台 (Khitai)、术赤台 (Jürcidei)、札忽惕 (Jaqut)

乞台源自契丹这一族名。在金元时期蒙古人中，Khitat（契丹的复数）这一族称是“汉儿”的意思，指契丹人、女真人和淮河、秦岭以北的汉人。《元朝秘史》第247节蒙古文音写：“乞塔惕 亦舌儿格訥 阿中忽台 阿勒壇 合阿納”，明人旁译为“契丹百姓的金主名金皇帝行”。与Khitat 意义相似还有“札忽惕”一词。据《元朝秘史》第134节记载，塔塔儿的篾古真·薛兀勒图被杀之后，王京丞相获悉成吉思汗、脱斡邻勒汗二人杀了篾古真·薛兀勒图，大喜。他承制就地封成吉思汗为“札忽惕·忽里”。《元朝秘史》第281节有“札中忽惕亦舌儿坚”，明人旁译为“金人每百姓”。元代汉译为“汉儿”或“汉人”，指原金朝统治地区的各族人³。蒙古人称女真为Jürcen，《元朝秘史》中多次出现，如第247节蒙古文音写：“主儿扯敦”旁注“女真的”。

据《元史》记载，元代叫做“乞台”、“乞塔歹”、“乞答解”、“乞解”、“乞台不花”、“乞塔台”的蒙古人不少，如：

《元史》卷三《宪宗本纪》：“（七年九月），以驸马刺真之子乞解达鲁花赤，镇守斡罗思。⁴

《元史》卷一百一十七《帖木儿不花传》：“至正十二年，庐州境内贼起，……命以所部兵及诸王乞塔歹等分道击贼。⁵

《元史》卷一百二十一《畏答儿传》：“忙哥卒，孙只里瓦解、乞答解”⁶

成吉思汗的开国功臣兀鲁兀部术赤台（又译主儿扯歹、术儿彻丹、术彻台），初依札木合，后率部归铁木真。蒙古与克烈部战于哈阑真沙陀，兀鲁兀、忙兀两部充当先锋，射伤王汗之子亦剌合。蒙古建国，受封为左手兀鲁兀四千户之长，成吉思汗赐克烈部王汗之弟札阿绀孛之女亦巴合别乞为其妻。⁷

《元史》卷一百二十《术赤台传》：“术赤台，兀鲁兀台氏。”

拉施特说，成吉思汗有一个由乃蛮部的妃子所生的儿子，名叫朮儿赤台。⁸

《元史》卷一百一十八《孛秃传》：“太祖尝潜遣朮儿彻丹出使，至也儿古纳河”。⁹

2 纳日碧力戈：《姓名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83页。

3 蔡美彪：《纥与纥军之演变》，《辽金元史考索》，中华书局，2012年，第232-242页。

4 《元史》卷三，宪宗本纪，第50页。

5 《元史》卷一百一十七，帖木儿不花传，第2912页。

6 《元史》卷一百二十一，畏答儿传，第2988页。

7 《元朝秘史》第208节。

8 《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91页。

9 《元史》卷一百一十八，孛秃传，第2921页。

《元史》卷一百二十一《畏答儿传》：“太祖与克烈王罕对阵于哈刺真，师少不敌。帝命兀鲁一军先发，其将术微台，横鞭马鬃不应”。¹⁰

《元史》卷一百二十八《土土哈传》：“十五年，追失烈吉逾金山，擒扎忽台等以献”。¹¹

《元史》卷一百三十五《忽都传》：“忽都……至太宗时为镇西行省，领蒙古、汉军从攻河中、潼关、河南，与拜只思、扎忽歹、阿思兰攻秦鞏及诸堡，又与拜只思守京兆。……忽都子扎忽歹”。¹²

2. 唐兀 (Tanyud)、合申 (Qashin)

唐兀是蒙古语党项一词的音译，兼指党项人及其所建的西夏国。“合申”是“河西”一词的音转，蒙古人当时这样称呼西夏。¹³成吉思汗建国以后，西夏成了首先被征服的目标。1205年、1207年和1209年三次攻入西夏，迫使西夏称臣纳贡。《元朝秘史》第249节记载：“[成吉思汗]从那里出征合申百姓。”1226年，成吉思汗又出征西夏。次年西夏亡于蒙古。

窝阔台汗的第五个儿子叫合失。拉施特说，“由于他出生于成吉思汗征服现今称为唐兀惕的河西地区之时，他遂被取名为合失。因为他爱喝酒，并经常喝醉，所以早在其父生前，他就以过度酗酒的恶习而夭折了。他去世后，合失（即河西这个名字）被禁用，从此以后，该地区称为唐兀惕。”¹⁴合失的儿子就是海都。

3. 肃良合 (Solangqa)

肃良合是蒙古人对高丽的称呼。肃良合作为蒙古人对高丽的称谓，最早以汉字音译“莎郎合思”(Solangqas, 原词的复数形式)见于《元朝秘史》第274节，旁译为“高丽”。¹⁵关于元丽关系研究论著甚多，本文不再赘述。由于元丽之间特殊的政治关系，大批高丽人入居元朝。

元朝后期，高丽人奇氏完者忽都是元顺帝妥欢贴睦尔的皇后。后至元六年(1340)为妥欢贴睦尔生下皇子爱猷识理达腊。这样，蒙古皇室中也有了高丽人血统。母以子贵，奇氏被立为第二皇后。至正十三年(1353)，爱猷识理达腊立为皇太子。二十五年(1365)，奇氏立为皇后，由摄太尉持节授以玉册、玉宝。册文中说：“咨尔肃良合氏，笃生名族，来事朕躬。”在立奇氏为皇后的诏书中说：“改奇氏为肃良哈氏”。¹⁶妥欢贴睦尔的诏书，将奇氏这个类似汉人的姓改用蒙古语，成为称呼全体高丽人的族名，认为这是“名族”，而且规定了Solangqa的标准汉译用字。

此外，《元史》中出现使用以钦定族属肃良哈为姓氏的人有朴赛音不花。此人

¹⁰ 《元史》卷一百二十一，畏答儿传，第2986页。

¹¹ 《元史》卷一百二十八，土土哈传，第3132页。

¹² 《元史》卷一百三十五，忽都传，第3278页。

¹³ 《中国历史大辞典》，第414页，周清澍撰写的“唐兀”词条。

¹⁴ 《史集》第二卷，第12页。

¹⁵ 《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第337页，周清澍写的“肃良合”条。

¹⁶ 《元史》卷一百一十四，完者忽都皇后奇氏传；卷46顺帝本纪，第971页。

姓从高丽本民族为“朴”，名从蒙古语Sain-buqa，意为好公牛，又仿效汉族土人字德中。《传》文称他为“肃良合台人”。古代蒙古人表述姓氏时，在族名之后续接姓氏后缀，男性的姓氏后缀作-dai/dei，女性姓氏后缀作-jin。朴赛音不花是高丽人，所以说他是肃良哈人-Solangqadai。朴赛音不花，初入宿卫为速古儿赤，即“掌内府尚供衣服”的怯薛执事，他可能是因奇后的引荐而入宫充当宿卫，后授官利器库提点，又任为奇后专设的资政院判官，迁主管军事的同知枢密院事。曾出任高丽的合浦全罗等处军民万户。再任大司农、岭北行省平章。至正二十四年（1364），改翰林学士承旨。再迁集贤院大学士、宣政院使、中书平章政事。二十八年，明兵逼大都，领兵数百人守承顺门，城陷被执，不屈被杀。¹⁷

漠南五投下亦乞列思部中，开国功臣成吉思汗妹婿孛秃曾孙的名为锁郎哈，他的女儿就是武宗皇后，明宗的生母。¹⁸

4. 南家 (Nangia)、蛮子 (Mansa)、哈刺章 (Qaraġang)

南家，金朝人对宋人的称谓。蒙古沿用此名，并加复数语尾-S。称为南家思。¹⁹元代把南家台又叫做蛮子。²⁰哈刺章，指元代云南地区名或族名。在元代蒙古文碑铭中，云南行省作Qaraġang qingšing（即合刺章行省）。²¹

《元史》卷一百三十六《哈刺哈孙传》：“斡刺纳儿氏。曾祖启昔礼。……父囊加台，从宪宗伐蜀，卒于军。”²²

《元史》卷一百二十七《伯颜传》：“……子囊加歹，枢密副使”。²³

《元史》卷一百二十九《纽璘传》：“纽璘，珊竹带人。……子也速答儿”，也速答儿“长子南加台，官至四川行省平章政事”。²⁴

《元史》卷一百三十一《囊加歹传》：“乃蛮部人，从阿术围襄阳，襄阳降，以功授汉军千户。从丞相伯颜攻复州，与宋人战，败宋兵于风波湖。……”²⁵

《元史》卷一百七《宗室世袭表》：阿木哥之子蛮子大王。²⁶

《元史》卷一百七《宗室世袭表》：镇南王脱欢之子文济王蛮子。²⁷

《元史》卷一百九《诸公主表》：“鲁国大长公主囊家真，世祖女，适纳阵子帖木儿，再适帖木儿弟蛮子台”²⁸

17 《元史》卷一百九十六《忠义·朴赛音不花》，第4435页。

18 《元史》卷一百一十八《李秃传》，第2923页。

19 伯希和：《南家》，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二编，中华书局，1995年，第57页；《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页353，周清澍写的“南家”条。

20 贾敬颜、朱凤合辑：《女真译语、蒙古译语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页。

21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方龄贵撰写的“合刺章”条，第40页。

22 《元史》卷一百三十六，哈刺哈孙传，第3291页。

23 《元史》卷一百二十七，伯颜传，第3116页；冯承钧：《元代的几个南家台》，《冯承钧西北史地论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年，第185-201页。

24 《元史》卷一百二十九，纽璘传，第3246页。

25 《元史》卷一百三十一，囊加台传，第3184页。

26 《元史》卷一百七，宗室世袭表，第2728页。

27 《元史》卷一百七，宗室世袭表，第2726页。

28 《元史》卷一百九，诸公主表，第2758页。

《元史》卷一百一十八《特薛禅传》：“唆儿火都者，亦按阵之子。……唆儿火都之诸孙若孛罗沙、伯颜、蛮子、……”²⁹

怯烈亦氏哈散纳曾孙秃满答之子名叫哈刺章。³⁰

元末名相脱脱长子名叫哈刺章。³¹

康里人也速鰧儿之子名叫哈刺章。³²

5. 撒里答 (sartaq)

“撒里答”这个词为Sartaq一词的音译。“撒里答”(sartaq)，又译“撒儿塔兀勒”，是蒙古对花刺子模、不花刺、撒马耳干等地回回商人的称呼，也用以泛称这些地区。撒里答源于梵语的Sartnavaho，意为“商人”。起初是突厥人对操伊朗语的定居商人的泛称，即隋唐时所见的“萨宝”。后在突厥语中读作Sartaq，再衍为蒙古语复数形式撒儿塔兀勒(Sartaul)和形容词形式撒儿塔黑台(Sartaqtai)。³³在《元朝秘史》中多次出现“撒儿塔兀勒(Sartaul)”、“撒儿塔黑臣Sartaqčīn”等词语，旁译均作“回回”。《秘史》§254：“帖兀讷 豁亦纳 成吉思合罕 撒儿塔兀勒 亦儿格捏 兀忽纳 帖里兀田 札温 额勒赤你颜 者惕古周”。撒儿塔兀勒 亦儿格，旁译回回百姓。此处指花刺子模人，也泛指信仰伊斯兰教的西域人。1219至1225年间，成吉思汗对中亚花刺子模国的大规模征伐战争，在蒙古语中称作“Sartaqčīn ayan”。³⁴

撒里答是个很常见的蒙古人名。尤以征服花刺子模的术赤家族以此为名的人就有数例。拔都的长子名叫撒里答。³⁵贵由汗死后，撒里答奉父命率军拥立蒙哥即位。后镇守钦察汗国西境，兼统斡罗思诸国。法国圣方济各会鲁不鲁克·威廉(William of Rubruk)当时东行至蒙古，多次见到拔都之子撒里答。³⁶

术赤汗的第一个儿子斡儿答的长子也叫撒儿塔黑台。³⁷窝阔台汗时期，第一次东征高丽的蒙古军统帅名叫撒礼塔。1231年，撒礼塔受命征高丽，连陷城邑，高丽王遣使请和。他在高丽境内置京、府、县达鲁花赤七十二人。³⁸次年七月，高丽王逃之江华岛，杀死蒙古所置达鲁花赤。八月，率军攻高丽。五年，撒礼塔受命再征高丽，至王京(今朝鲜开城)南，攻处仁城，被高丽军射杀。³⁹

忽必烈汗手下还有一名大臣叫作撒儿塔黑台那颜。⁴⁰拉施特说，阿难达的“异密之中，有一个撒儿塔黑(Sartaq)，是一个反对伊斯兰教的人，他前往合罕处抱

29 《元史》卷一百一十八，特薛禅传，第2917页。

30 《元史》卷一百二十二，哈散纳传，第3016页。

31 《元史》卷一百三十八，脱脱传，第3348页。

32 《元史》卷一百三十三，也速鰧儿传，第3238页。

33 [苏联]威廉·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32~133页；《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第518页，周清澍写的“撒里达”条。

34 亦邻真：《至正二十二年蒙古文追封西宁王忻都碑》，《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93页。

35 余大钧、周建奇译，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二卷，1985年，第127页；波义耳英译，周良青译注《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史集》第二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39页。

36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 鲁布鲁克东行纪》，耿昇 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5年，第313-317。

37 余大钧、周建奇译，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二卷，第116页。

38 《元史》卷二百八，高丽传，第4608页。

39 郑麟趾：《高丽史》卷二十三，高宗世家二。

40 余大钧、周建奇译，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二卷 第318页。

怨说，阿难达经常都在于教堂中，从事于祈祷和念诵《古兰经》。”⁴¹

6. 钦察 (Kipcak)

钦察人，原居住在额尔齐斯河流域。“钦察”(Kipcak)一名，源于中世纪伊朗语，Kip，意为“红色”或“浅色”；cak，是对所有草原居民的统称。所以，钦察，意即“浅肤色的草原居民”。钦察人还曾被称作“库曼人”，该名来自于位于高加索的库曼河。他们是一个伊朗-突厥混合民族。七世纪的时候，钦察人被突厥人所逐，向西迁徙。十一世纪中期，钦察人定居于伏尔加河流域和乌克兰草原地带。⁴²据《元朝秘史》的记载，1205年，成吉思汗在额尔齐斯河流域打败了蔑儿乞部落的残余势力，其领袖脱黑脱阿别乞被杀，其忽都等三个儿子经过康里，逃到了钦察。1216年，成吉思汗又命速不台远征康邻、乞卜察兀惕(钦察)、斡罗速惕(俄罗斯)、马札刺惕(匈牙利)、阿速惕等十一国。⁴³窝阔台时期由拔都统帅的兵锋直抵多瑙河的侵略战争，《元朝秘史》称之为Qibcaqcin ayan。⁴⁴后来，拔都建都于撒莱，以钦察草原为领地，有钦察汗国之称。

钦察国主忽鲁速蛮、斑都察父子归附蒙古。斑都察随蒙哥汗破阿速都城麦怯斯有功，后又率钦察百人从忽必烈征大理、伐宋，“以强勇称”。斑都察之子土土哈骁勇善战，屡立战功，忽必烈下令“钦察人为民及隶诸王者，皆别籍之以隶土土哈……选其材勇，以备禁卫”。⁴⁵这样，大批被蒙古俘虏为奴的钦察人被释放，归土土哈，其中精锐又组成了钦察诸卫，成了元朝的侍卫亲军的主力。土土哈家族还世代掌管元朝皇帝的马群。斑都察“掌尚方马畜，岁时桶马乳以进，色清而味美，号黑马乳，因目其属曰哈刺赤”。⁴⁶可知斑都察、土土哈父子所率钦察人又被称为哈刺赤，此名由“桶黑马乳”这一职业而来。随之“哈刺赤”一名也就成了钦察军或钦察卫的别称。⁴⁷哈刺赤牧户分别隶属于太仆寺下属成吉思汗大窝窝耳朵各牧场，主要集中于上都、大都及玉你伯牙、折连怯呆儿(今辽河上游)和阿刺忽马乞(今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一带)等地。⁴⁸1328年，土土哈之孙燕帖帖木儿以钦察诸卫为依靠，以蒙古地区的哈刺赤军为外应，发动政变，拥立文宗为帝。从此燕帖木儿长期把持朝政，并牢牢控制着钦察诸卫和蒙古地区的哈刺赤军。燕帖木儿死后，其子唐其势等人被镇压。但是土土哈家族对钦察卫和哈刺赤军的统治并为彻底结束。

窝阔台第六个儿子合丹—斡忽勒有一个儿子名叫钦察。⁴⁹

《元史》卷二十一《成宗四》：“(大德七年)，六月，给钦察千户等贫乏者钞三万七千八百余锭”。⁵⁰

41 余大钧、周建奇译，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二卷 第380页。

42 乌云毕力格：《喀喇沁万户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15页。

43 《元朝秘史》第199节、第262节。

44 亦邻真前揭文，《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93页。

45 《元史》卷一百二十八，土土哈传，第3132页。

46 《元史》卷一百二十八，土土哈传，第3132页。

47 宝音德力根：《应绍不万户的变迁》，《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续编)》(历史学卷)

48 《元史》卷一百，兵志三，第2553-2554页。

49 《史集》第二卷，第21页。

50 《元史》卷二十一《成宗四》，第452页。

7. 阿速 (As)

阿速，又译阿思、阿宿、阿速惕。阿速人原是北高加索的伊朗人，信仰希腊东正教，后移居到捷尔宾特伏尔加河口，与拜占庭、谷儿只（今格鲁吉亚）、斡鲁思关系密切。1221年，速不台等率军自高加索逾太和岭北上，大败阿速等部联军。1239年，蒙哥、贵由率领的蒙古远征军攻破阿速国都蔑怯思城。国主杭忽思率军投降，蒙哥括其丁壮千人，由杭忽思之子阿塔赤率领，组成阿速军，带回蒙古。⁵¹阿速人迁往中原多从军。至元九年（1272），组成阿速拔都军攻宋。武宗至大二年（1309），元廷选阿速军之精锐，设立左、右阿速两卫。⁵²从此阿速卫就成了元朝侍卫亲军中的精锐之一。1323年，铁失等人发动政变，杀英宗，依靠的就是阿速卫。⁵³

蒙哥汗的一个儿子名叫阿速台。⁵⁴拉施特说，蒙哥汗“一个妃子名叫奎帖尼，出自额勒只斤部落。[蒙哥合罕]和他生下一个儿子，名叫阿速带。阿速带曾与阿里不哥勾结起来对抗过忽必烈。”⁵⁵

8. 斡罗思 (Oros)

斡罗思，又译斡罗斯、兀罗思、兀鲁思、阿罗思等，复数作斡罗思惕。指伏尔加河以西莫斯科、基辅地区。十三世纪时，俄罗斯分为几个公国。1223年，蒙古军初次败其军于伏尔加河，攻入其南部。拔都西征以后，臣服于金帐汗国。一部分人被掳至蒙古和中原地区为奴。

至顺元年（1330），“置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府，秩正三品，总斡罗思军士，隶枢密院”。⁵⁶十二月，命收聚一万斡罗思人，给地一百顷屯田。次年四月，改万户府为宣忠扈卫亲军都指挥使司。⁵⁷

海都的正妻迭连臣所生的儿子名叫斡鲁思。拉施特说：“海都把与合罕交界的一块地交付了斡鲁思，并且给了他一支相当大的军队。”⁵⁸元文宗乳母完者之夫叫斡罗思。《元史》卷三十《文宗一》：“（天历元年）九月，追封乳母完者云国夫人，其夫斡罗思赠太保，封云国公，谥忠懿”。⁵⁹

《元史》卷一百三十四《斡罗思传》：“斡罗思，康里氏。……至元十九年为内府必闾赤”。⁶⁰

9. 马札儿

51 《元史》卷一百三十二，杭忽思传，第3205页。

52 《元史》卷九十九，兵志二，第2527页。

53 《元史》卷二百七，铁失传，第4600页。

54 《元史》卷一百七，第2723页。

55 《史集》第二卷，第234页。

56 《元史》卷三十四，文宗纪三，第758页。

57 《元史》卷一百，兵志三，屯田，第2567页。

58 《史集》第二卷，第16页。

59 《元史》卷三十《文宗一》，第712页。

60 《元史》卷一百三十四，斡罗思传，第3263页。

马札儿，又译马扎、马茶、马劄、马札刺，即今匈牙利。1241春，由拔都兄弟、速不台等率领的蒙古军攻入马札儿。不久，蒙古军进至首都佩斯（Pest）城附近，马札儿军出战大败。十二月，拔都亲统一军越过秃纳河（多瑙河），攻陷格兰（Gran）大城。

篋里乞氏伯颜的弟弟，马扎儿台（1285-1347），曾侍武宗、仁宗。泰定四年（1327），任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历任兵部尚书、御史大夫、知枢密院事等官。后至元三年（1337），拜太保，分枢密院，往镇北边。六年继伯颜任右丞相。⁶¹

《元史》卷一百《兵三》：“河西务玉提赤百户马札儿”。⁶²

10. 忻都（Hindu）

忻都一词指印度。《元朝秘史》第261、264节作忻都思（-s是复数词尾）。《至正二十二年追封的西宁王忻都神道碑》中的主人是忻都（Hindu）。⁶³

11. 阿儿浑（Argun）

伯希和说：“阿儿浑（Argun）是一部落名称，必与十一世纪末年Kašigari所已识之Argu部落，同现代的‘黑姓乞儿吉思（Kara-Kirghiz）’之Argin或Argun族有关系。”⁶⁴阿儿浑人居住在中亚七河流域至楚河流域，即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全部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一部分地区的突厥部族。此部成吉思汗西征时来附，组成阿儿浑军，由克烈部人哈散纳率领，转战中亚，下撒马耳干、不花刺等城。太宗窝阔台时，此军合回回工匠三千户，驻于荨麻林、丰州、下水，从事纳失失织绵的生产。元惠宗时，设阿儿浑部军，守卫宫阙内外门禁。⁶⁵

旭烈兀之孙阿鲁浑（1255-1291）是伊利汗国的第四代汗。

斡亦剌氏阿儿浑，元太宗时任必闾赤。后辅佐阔儿吉思（阔里吉思）治理波斯诸州。乃马真后元年（1242），继阔儿吉思任波斯诸州行政长官，整理民政，废除非法赋税。宪宗元年（1251），授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事，调查户口，统一赋税制。蒙哥汗遣旭烈兀西征并总督波斯军政，他受命管理财赋。后又辅佐阿八哈之子阿鲁浑镇守两州。并与伊利汗联姻，位尊权重。⁶⁶

12. 答失蛮（dašman）、术忽（juqu）

答失蛮，为元代伊斯兰教教士的称号。中亚地区伊斯兰教徒尊称其教师、神学家为Danishmand，波斯语“有知识者”之意。蒙古人最初接触的是中亚伊斯兰教

⁶¹ 《元史》卷一百三十八，马札儿台传，第3339页。

⁶² 《元史》卷一百《兵三》，第2557页。

⁶³ 亦邻真前揭文，《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90页。

⁶⁴ 伯希和：《荨麻林》，《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三编》第58页。

⁶⁵ 杨志久：《元代的阿儿浑人》，《元史三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29页。

⁶⁶ 余大钧编著：《元代人名大辞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29页。

徒，故用此称号来概称伊斯兰教士，蒙古语作 *dašman*，答失蛮即其音译。元代把犹太人叫做“术忽（主鹵、竹忽、主吾）”。《元史》卷三十三《文宗二》：“僧、道、也里可温、术忽、答失蛮为商者，仍旧制纳税”。⁶⁷

元代叫答失蛮的人不少，如，克烈氏答失蛮幼事忽必烈于藩府，任必闾赤。忽必烈即位，任第一怯薛必闾赤。⁶⁸

太宗窝阔台时，有个名叫术忽觶的断事官。⁶⁹

结语

蒙古帝国建立后，不久成吉思汗发动了大规模的对外征服战争。西夏成了成吉思汗首先征服的目标。西夏既降，接着对金朝进行了大规模的征伐，并转向灭亡了西辽和花剌子模。在他暮年，又消灭了西夏。成吉思汗继承者窝阔台（太宗），进而灭亡了金朝，占领了金朝统治下的广大地区，并继续展开对西方各国和高丽的战争。贵由和蒙哥统治时期，继续征伐南宋和高丽，并进而统治了吐蕃、云南和西亚两河流域的报达（巴格达）哈里发。忽必烈统治时期，灭宋后，接连派遣军队远征日本、安南、占城、缅甸和爪哇等国。建国后的半个多世纪，蒙古汗国变成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13 世纪波斯史学家志费尼称呼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为“世界征服者”。这一称呼即使放在人们视野大大拓宽了的今天，也不为过分。一个家族，在三代人的时间里，竟能发动并指挥如此大规模的战争，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今天有的历史学家称 13 世纪为蒙古人的世纪，仍是鉴于这场战争的世界性规模。⁷⁰

征服战争中的杀戮是十分残暴的，但同时，远征大大开拓了蒙古人以及欧亚各民族的视野，沟通了东西方的交流。至于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征服战争，对开始形成的蒙古民族有极大的影响，已故亦邻真教授指出：不少蒙古人离开故土，他们的后裔消融在各个被征服的民族中；代之而来的是被征服人口陆续加入蒙古民族中”，其中包括汉人、钦察人、阿速人、斡罗思人、康里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⁷¹15 世纪以后，所有融进蒙古民族中的民族及国家的名称也随之逐渐变成了蒙古的部落和姓氏名称。⁷²

1368 年，元朝在中原的统治结束，蒙古汗廷北撤到蒙古地区。到了 14 世纪之后，元代的一些侍卫亲军和一些官僚机构及外族名称作为蒙古人游牧集团的名称，重新出现在蒙汉史书中。15-16 世纪的阿苏特部、哈刺陈部、应绍卜部等就是一例。15 世纪初逐渐形成了冠以阿速卫之名的游牧部落，蒙古语称 *Asud*（阿苏特，是阿速的复数）。阿速部与喀喇沁部在阿苏特贵族阿鲁台管辖之下。

元代的哈刺赤军及其家属演变为 15 世纪以后的哈刺陈人，后来成为蒙古中

67 《元史》卷三十三，文宗二，第 732 页。

68 杨志玖：《元代的几个答失蛮》，《元史三论》，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221-225 页。

69 《元史》卷八十一，选举一，第 2017 页。

70 杨讷：《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华夏出版社，2000 年，前言。

71 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580 页。

72 乌兰：《关于蒙古人姓氏》，《蒙元史暨民族史论文集—纪念翁独健诞辰一百周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102-103 页。

央六万户之一——应绍卜万户的重要成员。同样，元代的康里人同化于蒙古人中。杭锦（康里的不同写法）之名渐渐地被鄂尔多斯某鄂托克使用，最后成了鄂尔多斯的一个旗名。⁷³此外，《黄金史纲》记载几个唐兀人，如唐古特（唐兀的复数）的多兰格儿（Tangud-un Dülenggeri）、唐古特的帖木儿哈达克（Tangud-un Temürqadaq）、唐兀特的安扎帖木儿。⁷⁴“唐兀”这个民族名称已经成为蒙古的一个姓氏了。另外，萨冈彻辰《蒙古源流》记载“肃良合人（Solongqas）忽都巴哈”⁷⁵、“肃良合人桑哈勒都儿”⁷⁶等。

73 亦邻真著：《额济纳 阿拉善 杭锦》，陈晓伟译，《元史论丛》第十四辑，第197页。

74 《汉译蒙古黄金史纲》，朱风、贾敬颜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9，第191页。

75 乌兰：《〈蒙古源流〉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页273。

76 同上书，页277。

指定讨论

从古代蒙古人的姓名看蒙古人与外族的关系

[提问者 / 四日市康博、回答者 / 额尔敦巴特尔]

提问 / 四日市：

您从姓名入手探讨蒙古人在亚欧的霸权地位，我认为这个报告非常难得，非常重要。

我的问题包括两个小问题和一个大问题。小问题是，您举了一个叫阿儿浑的名字，这个名字在马可波罗游记和其他当地的资料中也能见得到。李强教授写过相关的论文，他认为当地人把有土耳其混血的人叫做阿儿浑这个名字，我也认为与此有关，您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另外一点与马扎尔相关，元代出现的马扎尔并不是指匈牙利，而很可能是现在的巴什基尔人（自称巴什科尔托人），也就是说，我认为，他们是芬兰裔斯基泰人的子孙在蒙古时代土耳其化了的巴什基尔人。您觉得这个看法是否合适？

我的大问题是，我认为蒙古人的名字与多种因素相关。比如在民族统治方面，从前都说蒙古存在四个等级制度，最近则普遍认为蒙古并没有这种阶级区分，而是各民族的行政统治各不相同的体现。蒙古人享受相当高的待遇是大家都能理解的。实际上汉人和高丽人也一样。一般情况下，只要取蒙古名，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也能享受与蒙古人相同的权利。蒙古皇帝中，有的人还同时拥有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名字。这种取名现象是蒙古时代的很重要的元素。蒙古人会将统治地区的地名当作自己的名字，这也是很重要的现象，不过他们的宗教就是如此。请问，取伊斯兰教名、佛教名，与以地名取名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回答 / 额尔敦巴特尔：

谢谢四日市教授的提问，刚才由于时间关系，我可能概括得不太好。阿儿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族，对于这方面，伯希和、中国南开的杨志玖等人都进行了研究。伯希和就认为阿儿浑是一个部落的名称，称其“必与十一世纪末年 Kašigari 所已识之 Argu 部落，同现代的‘黑姓乞儿吉思（Kara-Kirghiz）’之 Argin 或 Argun 族有关系”。

关于阿儿浑人，说起来有很多内容。阿儿浑当时处于中亚的齐河流域至楚河流域，就是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全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一部分地区的突厥部落。在成吉思汗时期，西境来赴的阿儿浑人组成了一个阿儿浑军，之后由克烈部人哈散纳率领，在征服中亚的战争中取得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很有意思的是太宗窝阔台时期，这些阿儿浑人跟回回的工匠三千户组成了一个军，驻于荨麻林、丰州、下水，从事纳失失织绵的生产。丰州就是咱们今天的呼和浩特。

宗教方面，蒙古人接受了很多伊斯兰教、基督教。20世纪初期的时候，mosate 对蒙古鄂尔多斯传教了二十年。伊斯兰教 daximana 这些人在1368年以后已经从中原地区消失了，但是基督教呢，到20世纪初期还存在，在鄂尔多斯从没有中断过，这一点很有意思。就比如说，汪古部人也是信基督教的，到20世纪的时候就开始 mosate 的考察当中都找到了这些证据。

我写这个题目的意图是，我们现在探讨国与国史的研究，好像都在强调纯的汉人或者纯的蒙古人。但是100多年的蒙古帝国时期，其实吸收了很多的外来文化、民族、人种，所以不能用狭隘的观点来看。

谢谢，不知道是否回答到了四日市教授的提问。

发表论文 5



蒙古帝国与火药武器

向正树

同志社大学

原文为日文，翻译：丁莉（北京大学）

提 要

日本历史学界对蒙古帝国的认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杉山正明通过发表系列著作及借助媒体的力量，彻底改变了蒙古帝国的形象，其学说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中。另一方面，一般国民对蒙古袭来事件又是如何看待的呢？战前这一事件曾被用来加强国民同一性，从那时到今天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本文拟对西洋画家矢田一啸（1859-1913）的全景图《蒙古袭来绘图》与最新日本漫画中的相关描绘进行对比。这些关于蒙古军队的画像或影像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都描绘了先进的火药武器，但其中有的火药那个时代是否真的存在，其实并未得到近年来系列专门研究的证明。尽管如此，这些画像、影像却将其描绘成蒙古军实际使用过的武器。

蒙古在征服中亚花剌子模王国沙王朝并向巴格达进攻的过程中，攻陷了诸多城市的坚固城墙，在这个过程中也引进了各种武器。在远征中国南方时，创建了水军。在征服中国及花剌子模的过程中，蒙古帝国学习并吸收了当地的各種技术（引进技术工匠），自然也包括军事技术。关于蒙古军队是如何使用火药武器的，至今还有很多未解开的谜团，本文将从文献学及考古学的视角对这个问题进行考察，思考现今我们可以做怎样的判断。

1. 蒙古形象的变化

日本历史学界对于蒙古帝国的形象认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特别是杉山正明通过发表系列著作¹及通过传媒²刷新了人们心目中固有的蒙古帝国的形象，其学说的影响力广泛渗透。一个富有治理多元化社会的灵活性与管理智慧的新蒙古帝国形象，取代了传统观念中用暴行征服世界的刻板印象。另外，

1 杉山正明『大モンゴルの世界—陸と海の巨大帝国—』（角川選書227，角川書店，1992）、『クビライの挑戦—モンゴル海上帝国への道—』（朝日選書525，朝日新聞社，1995）、『モンゴル帝国の興亡』（講談社，1996）。

2 NHK特別節目《大蒙古》（1992年播放）等等。

关于蒙古的陈腐学说，例如蒙古至上主义、九儒十丐、对藏传佛教的狂热信仰等也遭到了猛烈的批判。

那么，一般日本国民对蒙古来袭事件又是如何认知的呢？战前这一事件曾被利用来强化国家认同，今天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我想在此对西洋画画家矢田一啸（1859-1913）创作的全景画《蒙古袭来绘图》和最近中国旅游景点的全景图展以及日本漫画中的描写进行一个对比。

矢田一啸和元寇纪念碑运动

矢田一啸是活跃在明治时期的西洋画画家，创作了大量历史题材的全景画。他于安政5年（1858）出生于横滨，先是学习日本画，而后接触了西洋画，明治15年（1882）前后赴欧美学习，归国之后在上野全景画馆展示了自己创作的戊辰战争的全景画，受到人们的关注。

所谓全景画馆，就是让全景画面覆盖圆柱形建筑物的整个内墙面，供观众环顾欣赏的场馆。全景画馆起源于1794年的伦敦，而后传到欧洲和美国，矢田一啸在旅欧、旅美期间大概也参观过。明治23年（1890），日本第一家全景画馆在上野开业，随后在浅草、大阪、京都、熊本、富山等地也陆续建成。

九州的第一家全景画馆开在了熊本，矢田一啸在那里创作了西南战争的全景画。明治27年（1894）他来到福冈后，支持在博多建造元寇纪念碑的运动，为此，以元寇为题材创作了一系列的全景画。为了能够向世人展示矢田一啸的这些作品，人们在建有元寇纪念碑的东公园里也修建了一个元寇纪念全景画馆。³此外，矢田一啸还运用自己掌握的解剖学的知识，改良了博多人偶的制作工艺。后于大正2年（1913）逝世。⁴



图1 矢田一啸 蒙古袭来图“博多登陆”本佛寺

图片源自 浮羽市官方网页 > 生活 > 历史・传统文化 > 本佛寺藏“元寇油画”

http://www.city.ukiha.fukuoka.jp/imgkiji/pub/detail.aspx?c_id=71&id=22

浏览于2017年7月10日

3 是由佐野前励人（下文中提及）修建的，位于铜像前面的广场。大正中期，毁于一场暴风雨。太田弘毅编著『元寇役の回顧—記念碑建設史料—』錦正社，2009，p.164。

4 以上参考太田2009和西本匡伸等编著的『よみがえる明治絵画—修復された矢田一啸「蒙古袭来绘图」—』（福岡県立博物館，2005）。



图2 「蒙古袭来绘词」前卷，图之七 宫内厅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C5%8Dko_Sh%C5%ABrai_Ekotoba.jpg?uselang=ja 浏览于2017年7月10日)

元军形象的变化——明治·现代日本与中国

从矢田一啸创作的这幅全景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元军的一大显著特征就是对于火药武器的运用（图8），著名的《蒙古袭来绘词》（文末附图2）中描绘了日本人与登陆博多的元军战斗的画面，矢田一啸在此基础上发挥想象力，从而使得图画的构图更加有立体感。前面提到的汤地丈雄、高桥熊太郎所著的《元寇》里的插图也使用了《蒙古袭来绘词》中“铁炮”爆炸的场景⁵，下面这段文字更可以看出对火药武器尤为关注。

元军已占领中亚地区，将士身经百战、骁勇无比，秩序井然、驰骋千里，且进退自如，战法令人出其不意。特别是射毒箭、放火箭、打铁炮，其声响彻云霄，如雷贯耳，被击之人不管如何刚勇，也会瞬间殒命。⁶

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描绘元军的画像、影像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对元军所使用的先进的火药武器的描绘。特别是近些年来，有的作品中描绘的元军所使用的武器，其实尚未被完全证实当时已经存在。比如，在漫画家高木七彦的《Angolmois 元寇合战记》中就出现了一种金属管型火器（图3-a）⁷，但忽必烈时代这种火器是否存在尚未得到证实。高木七彦作品的一大特点就是在缜密调查的基础之上独创新颖的内容。比如说，在他的作品里，唐朝是鲜卑系王朝，唐朝皇帝是作为“天可汗”君临天下的（图3-b）。⁸同时，他在作品里将蒙古帝国称作“兀鲁思”⁹（ulus）（图3-c）也是基于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另外，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所描绘的蒙古人，说的台词也好，军旗上的文字也好，多使用八思巴文字、维吾尔文字、蒙古文字等，有浓浓的异国风情（图3-d）。相比之下，矢田一啸的全景图画中，元军的军旗上基本上都是写的汉字，如“右军”、“东路”、“大元水师”等等。另外，高木七彦在刻画蒙古人形象的时候，虽然有时会表现蒙古人独特的价值观，但同时也会着重

5 汤地·高桥，1893，p.69.

6 汤地·高桥，1893，p.64.

7 高木七彦『アンゴルモア 元寇合戦記』（第4巻，角川書店，2015，pp.37-38）

8 同上，第5巻，2016，p.106. 关于唐朝=“鲜卑系王朝”之说、唐太宗的“天可汗”称号等，参照了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講談社，2007，p.138，164）

9 同上，第1巻，2015，p.54.

刻画能引起读者共鸣的富于人性化的一面（图3-e、f），这应该可以说是非常具有现代特点的表现方式，反映了全球化社会的多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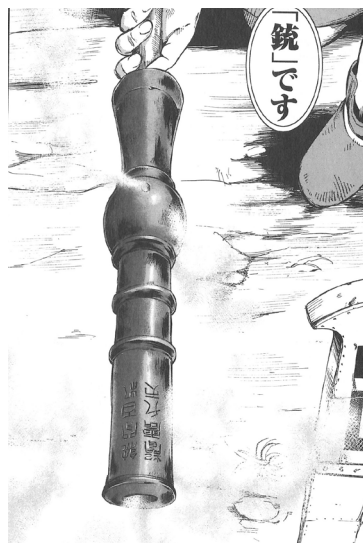


图3-a 銃（图片源自高木七彦
《Angolmois 元寇合战记》第4卷, p.42）



图3-b 天河汗（同第5卷, p.106）



图3-c 兀鲁思（同第1卷 p.54）



图3-d 八思巴文字・维吾尔文字
蒙古語（同第6卷 p.46）



图 3-e 蒙古将军 (同卷 3, p.171)



图3-f 蒙古将军 (同卷3, p.172)



图4-a 宋元崖门海战文化旅游区 2016年2月23日发表人拍摄



图 4-b 同 全景图



图 4-c 同 CG 影像

再就是，最近比较让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大陆位于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的宋元崖门海战文化游览区。1276年南宋幼主赵昰（赵端宗）将行宫建造于崖门，后来元朝军队逼近崖门，通过海战将南宋一举灭亡。根据这一段历史，当地政府在原来行宫的位置上建造了现如今的主题公园。这一游览区是站在南宋的立场上建立的，公园最里面矗立着三座崭新的祠堂，分别是供奉杨太后的慈元庙，供奉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的大忠祠，供奉南宋将士的义士祠。三座祠堂的建造资金出自于香港、澳门的居民乃至身在美国的华侨等（上图4-a）。南宋反击蒙古的这场海战虽已成为历史，对战争的记忆却成为了祖籍在崖门的人们对自己身份认同的核心，即便自己身在海外、远隔重洋，这一点让人印象深刻。

在园内的一个建筑里，展示着最新创作的描绘南宋军队和元军大战的全景画。其中的一幅画描绘了元军使用大口径大炮发射炮弹的场景（上图4-b）。在公园入口附近的一个展厅里，屏幕上滚动播放的CG影像再现了当时的海战情景，其中也有元军舰队一齐发射炮弹的画面（上图4-c）。此外，园内还展出了当地一些文献资料的复印本，其中详细记录了海战的过程，包括元军使用大炮的情况。文献里面确实提到元军使用了“炮”，可是这里的“炮”到底指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很复杂。

2. 回回炮和火药武器——军事技术的东西方交流

关于火药武器在世界史上发挥的作用，早已有很多研究。15世纪之后，欧洲人之所以能够开辟新航路来到亚洲、发现新大陆美洲，其前提正是因为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提高以及火药武器的改良。此外，尽管游牧民族此前曾数次撼动和改变了欧亚大陆的历史，但相比农耕民族建立起来的帝国却并不占优势，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农耕民族率先引进了火药武器。不过，最早开发火药武器的是中国王朝¹⁰，但将其真正用于战争的却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政权。



图5 《史集》阿拉伯语写本中所描绘的平衡锤型投石机 阿伯丁大学图书馆藏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le:MongolsBesiegingACityInTheMiddleEast13thCentury.jpg> 浏览于2017年7月10日)

10 Jerry H. Bentley, *Old World Encounters: Cross-cultural Contacts and Exchanges in Pre-modern Tim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81-184; Needham, Joseph. *Science &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5: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Part 7: Military Technology: the gunpowder epi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Robert Temple著, Joseph Needham序文, 牛山照代译『図説 中国の科学と文明』(河出書房新社, 1992, 改訂版2006, pp. 380-387 (原著Robert Temple (Foreword by Joseph Needham), *The Genius of China: 3000 Years of Science, Discovery & Invention*, Patrick Stephens Ltd., 1986; Carlton Publishing House, 2006).

蒙古帝国疆域横跨欧亚大陆，曾经是人类历史上幅员最为辽阔的帝国，其最大的武器便是游牧民族所特有的组织力和机动力。但是在征服中亚花剌子模王朝，进攻巴格达的过程当中，他们需要进攻的是壁垒森严的城池，于是在此过程当中开始引进各种各样的武器，在远征中国南方的时候，还新建了水军¹¹。现今已知的是蒙古帝国在进攻中国南方及花剌子模等地的过程中吸收引进了各种各样的技术（以及技工团体）¹²，包括军事技术。关于蒙古帝国是如何使用火药武器的，至今还有很多未解开的谜团，本文将从文献学及考古学的视角对这个问题进行考察，思考现今我们应当怎样去评价。

蒙古帝国在征服欧亚的战争中积极引进新的军事技术，例如在攻城时运用在中东改造的平衡锤型投石器——回回炮（上图5）等¹³。回回炮原本的意思是“投石机”，其主要用途是通过弹射巨大的石块以破坏欧亚大陆的城池常有的壁垒森严的城墙。根据《史集》记载，1258年，旭烈兀率领大军攻打巴格达的时候，从周围的山上采集巨石用投石机弹射出去，将巴格达的城墙砸开了大洞。这种能够弹射巨石的回回炮在巴格达战役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不过，这场战役中蒙古军队还使用了火药武器，这个事实也不容忽视。根据《史集》的记载，蒙古军队所使用的火药武器都来源于中国。据《史集》旭烈兀纪所载，1251年，第四代皇帝蒙哥下令让弟弟旭烈兀远征巴格达时，从中国派遣了1000名能够使用三种武器的技术兵，根据他们所使用武器的不同，用波斯语称之为“Manjanīq、Naftandaz和Charkhanda”¹⁴。在波斯语中，三者分别是“使用Manjanīq的人”，“投射Naft的人”和“投射Charkh的人”。Manjanīq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回回炮，Naft原本是指石油，也有火药的意思，Charkh大概是像火箭一样的东西。这三个词一直以来被理解成为“投射石头、石油、长箭”或是“炮手、火弹投射手、弓箭手”的意思。

关于蒙古帝国时代的Naft的用例，一般认解释为“石油”。这在阿拉伯语或者波斯语语境下可能是正确的，可是在中国，火药作为武器使用并不亚于石油，因此在中国语境下是否也是石油的意思就有待商榷了。例如，伊本·白图泰游记中记录了一个乘坐中国帆船、投射Naft的士兵。对该游记进行翻译注释的家岛彦一是这样推测Naft的意思的：“用棉花将石头紧紧包住，然后在石油中浸泡之后点燃”¹⁵。但其实Naft一词后来才有了火药的意思，伊本·白图泰的游记中有对中国帆船的描述，而早在伊本·白图泰游记的七十年前，就已经有了关于“铁炮”的记录，因此我认为Naft应当是“火药”的意思。

11 萧启庆《蒙元水军之兴起与蒙宋战争》，《汉学研究》第8卷第2期（16号），1990，p.177-200；向正树「蒲寿庚軍事集団とモンゴル海上勢力の台頭」『東洋学』89(3)，2007，pp.80-82。

12 松田孝一「モンゴル帝国における工匠の確保と管理の諸相」『平成12~13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B)(1)研究成果報告書碑刻等史料の総合的分析によるモンゴル帝国・元朝の政治・経済システムの基礎的研究』（研究代表者：松田孝一；課題番号：12410096），2002，pp.171-200。

13 杉山，1992，p.237；1995，p.177。

14 Abraham Constantin Mouradega d' Ohsson 著，佐口透译注『モンゴル帝国史』4（東洋文庫235）平凡社，1973，p.138；拉施特主编，余大钧译《史集》第3卷（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p.138；Фазлаллах Рашид ад-Дин，Джамі ат-таваріх：критический текст А.А. Али-Заде，Москва：Изд-во Наука，1965，Persian text，p.22。

15 伊本·白图泰著，家岛彦一译注『大旅行記』（東洋文庫691）第6卷，平凡社，2001，p.128；184，注163。



图6 “てつほう”（铁炮）松浦市埋葬文化財中心

另外，根据记载，在巴格达包围战中，蒙古将军布卡特姆率领的队伍在炮击企图突破包围的敌军时使用了“qawārīr naft”这种武器¹⁶。Qawārīr在波斯语中是“烧瓶”、“瓶子”的意思，是阿拉伯语 qārūra(t)（玻璃瓶，药瓶）的复数形式 qawārīr，意思大概就是“将Naft填充在易碎的容器里”。如果Naft是火药的意思的话，那么“qawārīr naft”的意思就应当是在内蒙古和九州出土的那种陶制的火药炮弹了（上图6）。这种炮弹如果是当年金朝华北地区汉人军队使用的武器的话，那么就和《金史》里面出现的“震天雷”比较接近。也就是说，在攻陷巴格达的战役中，不仅是投石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与“震天雷”相似的这种火药武器也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268年至1273年，蒙古攻打襄阳期间，远征军首领有一位名叫埃里克卡亚的维族将军，他想要使用西域的那种力量强大的投石机，于是皇帝忽必烈就从伊尔汗国（旭烈兀的家乡）的首领阿八哈那里调来了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这两个人（技术兵）¹⁷，最终大破襄阳城池。

中国那时虽然有火药武器震天雷，但却没有像回回炮那样强有力的投石机；另一方面，西域虽然有回回炮，却没有将其用来投射火药炮弹的构想。二者都有不足之处，而蒙古帝国则取长补短，使其融会贯通，可以说这样的灵活性和想象力才是蒙古帝国的真髓，使之能够构建起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帝国。

3. 两种火药武器和“炮”的两难选择

虽然在中国早已开始使用火药武器并加以不断改良，但蒙古帝国（元）时期将其大规模运用在战场上这一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关于这一时期火药武器的使用，相关记录在汉文文献中想必非常丰富。但是火药武器究竟是什么形状的，却依然难以推断。在蒙元时期被称为“炮”的火药武器当中，能认定其实物存在的有下述两种类型：陶制炮弹和金属管状射击火器。但这两种武器又有几种搭配组合，汉语中哪些词是指这些武器（或组合）的，尚不清楚，这些都给研究造成了困难。

16 Фазлаллах Рашīд ад-Дйн, 1965, Persian text, p. 57.

17 《元史》卷128，阿里海牙传，p. 3125（中华书局）；同卷203，工芸伝，亦思馬因，p. 4544 “亦思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也。善造砲，至元八年與阿老瓦丁至京師。十年，從國兵攻襄陽未下，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砲于城東南隅，…”；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2，丞相楚国武定公（阿里海涯），p. 33（中华书局）“九年，公請以西域礮攻樊城…”。

在汉语中自古以来使用“砲”（后为“炮”）这个字来形容火药武器。“砲”，原写做“礮”，指的是投射巨石的机械。火药武器出现之前，《后汉书》袁绍传中出现过这个字。石字旁表示意思，旁边的“包”表示发音（也有人认为是表示轰隆声），从金代到元代，可能都是用这个字来代指火药武器。从博多湾和伊万里湾里面发掘出的火药武器“てつほう（铁炮）”的汉语表记可能也就是这个“砲”字。不过同一时期的投石机（前文提及）又被称为“回回炮”。所以，不同的“炮”到底是指哪种炮，我们很难马上搞清楚。但是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再加上仔细分析文献中的用例，应该还是能够有所发现的，接下来我就想做几个假设性的考证。

α、陶制炮弹

所谓“てつほう（铁炮）”，是指将火药填充于直径15厘米的球型的陶制容器中来引爆的装置。1281年，蒙古军远征日本，四千艘蒙古军舰沉没于长崎县松浦市鹰岛海域。后来这片海域的海底中发掘出大量的甲冑、箭束，还有“铁炮”。由于海底发掘的文物外部被贝壳所覆盖，很难判断其原来的形状，另外金属文物的铁锈还会和贝壳紧紧地粘合在一起，为了探明其原来的形状，需要使用具有高速、大功率摄影功能，可以实现3D立体成像的X光CT扫描仪。在鹰岛海域发现的“铁炮”里面还有残留的物质，对其进行X光CT扫描后发现，内部残留的是短条状的铁片和陶器碎片。铁片上有气泡，可以推断当时使用的是铸铁。随着火药的爆炸，铁片和陶片一齐炸裂喷出，具有极强的杀伤力。在炮口附近发现留有纤维质的痕迹，可以推测这是导火线或者是其他有机物的内盖¹⁸。

忽必烈时代，不仅远征日本时使用了“铁炮”，其他关于元军灵活运用火器的记录也不少见。例如，据史书记载，汉人将军张荣的儿子一君佐，在南宋平定战中使用了火炮¹⁹。乃颜之乱中，李庭命令国军壮士持火炮夜入敌军之阵，“炮发，果自相杀，溃散”²⁰。还有记载说大元在消灭南宋余党的崖山之战中，面对南宋的海军舰队，也讨论了是否先用“炮”的方案。虽有人建议用“炮”，但遭到了反对，原因是“火起则舟散，不如战也”。随后描写的战斗场景中提到“弓弩火石交作”，说明这场海战中也使用了火药武器²¹。



图7 八思巴文字大德2年铭铜火銃 内蒙古蒙元文化博物馆

18 今津節生「4. 長崎県松浦市鷹島海底遺跡出土品のX線CT調査」『蒙古襲来，元の軍船からみえてくるもの』（鷹島神崎遺跡国史跡指定記念シンポジウム要旨集），2013, pp.287-300）。

19 《元史》卷151, 张荣传, p.3582.

20 《元史》卷162, 李庭传, p.3798.

21 《元朝名臣事略》卷6, 元帅张献武王, 中华书局本, p.106.

b、金属管型射击火器

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蒙古帝国还广泛使用了金属管型射击火器，这种火器被认为是现代武器中枪和大炮的雏形。²²中国学界普遍认为，被叫做“火铳”的这种铜制或铁制的武器，源自于宋代用竹筒制作的“火筒”，后来在中国有了独特地改良和发展，到了明朝得以广泛使用开来²³。现今中国有超过十种“火铳”被认为是元朝时期的，收藏、展示于各个博物馆。此前，内蒙古蒙元文化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全长34.7厘米、口径十厘米的铜火铳（上图7）²³，铳身上所刻的八思巴字铭文“大德2年”（1298）经专家考证属实。这样一来，它就取代了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元代至顺3年（1332年）的铜火铳成为现存最古老的火器。

这件铜火铳是在大元上都遗址附近的牧民家中发现的，可能曾经是守卫上都的部队的武器。忽必烈政权末期，成吉思汗幼弟后裔乃颜、哈丹发起的叛乱大大动摇了帝国统治秩序，大德2年这一年是平定叛乱后的第六年，大元仍然没有放松对蒙古东部地区的警惕，有可能曾在此地部署火器部队以防万一。

c、在船上使用的火药武器

1984年，在中国山东省登州港蓬莱古城出土了三艘古船。其中一艘残余船体长28.6米、宽5.6米，据考证可能是元末明初的一艘长32.2米、宽6米的中等规模战船。随古船一起出土的还有石弹，“铜炮”，“铁炮”等²⁴。如果说海战中使用了火铳的话，那么这就说明那时的中国就已经有了装备有火器的战船，这实在是令人震惊。

结语

本文以火药武器为中心，分析了蒙古帝国形象在日本的变化，又从军事技术这一视点梳理了蒙古时代的亚欧交流。关于蒙古帝国如何使用火药武器，有必要从技术史上进行考证，但本文关注的是，在对明治时期和现代日本的元寇形象进行对比时，火药武器是一个关键点。

汤地丈雄在《元寇》一书的结论中指出，中亚地区的土耳其斯坦等国家屈服在成吉思汗的铁骑下，并不是因为缺乏忠臣义士，而是因为他们的爱国之心不够。“我大日本帝国的人民”不光有北条时宗的英明决断和将士们的勇气胆识，更是因为有拳拳“爱国之心”，我们才能挫败强敌，向海外扬我大日本帝国之国威，向世界展示我日本男儿之英雄豪气。”²⁵另外汤地丈雄为矢田一啸的元寇大油画的画集作了序，在序言中这样描述日清战争（译者注：中日甲午战争）后明治30年（1897）的形势：“天下形势乃东洋危机日益加剧之秋”，“如今虽然表面和平亲善，但战后的戒备又甚于以往”²⁶。这样的描述充分反映了明治时期日本所处的状况，日俄战争

22 刘旭《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p. 31, 53.

23 钟少异，齐木德·道尔吉，砚鸿，王兆春，杨泓《内蒙古新发现元代铜火铳及其意义》『文物』2004年11月（总第582号），pp. 65-67+3plates.

24 席龙飞《中国造船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p. 210；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烟台市博物馆，蓬莱市文物局《蓬莱古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彩图20, 41，图版4.

25 太田，2009，p. 106.

26 太田，2009，p. 128.

爆发前夕，日本要一边对抗欧美列强一边制定国家的发展战略，这跟如今日本面临的情况也有些许相似。

蒙古袭来给欧亚大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段历史通过漫画、电视剧、电影等不同形式被不断演绎，今后是否还将以新的方式继续传承下去呢？当今，日本所处的远东局势越来越不明晰，中国的经济大国化和海洋发展成为热门话题。我们回顾一下世界史就会发现，明朝郑和下西洋600年后的今天，中国开始重新扩大自己的海洋力量。有学者认为从出动远洋舰队这一点来看，“郑和下西洋是蒙古帝国海洋政策的延续”²⁷。不过，郑和下西洋没有影响到日本，而蒙古袭来则将日本的对马和博多等地变成了战场。漫画《Angolmois 元寇合战记》中描写的火药武器既是高科技的象征，也是日本对邻国的恐惧心理的象征，反映了人们内心的不安，因为我们的邻国时隔730年作为一个军事大国在海上重新开始崛起了，也许我有些过度解读了。

矢田一啸创作的全景图画夸张地表现了蒙古军的残忍，整个画面充满了对蒙古袭来的恐怖。但是，在《Angolmois 元寇合战记》中，虽然也有描写元军士兵争抢战利品的丑恶画面，但是同时也描写了日本人的背叛和忤逆无道（本来这个作品也与汤地丈雄、矢田一啸所创作的爱国主义作品不同）。对于火药武器的描写也不像再现宋元崖门古战场的CG动画那么大胆。但是，在描写敌人的时候（除了强调对方之不义，跟自己区别开来这一因素）往往会把敌人描写得过于强大。日本、欧洲、伊斯兰等的史料里面，古今中外的历史记录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当然也不光是蒙古军的形象。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被怀疑持有核武器恐怕也有这个方面的原因。总之，塑造蒙古军的恐怖形象，仅靠千篇一律的夸张描写已不再有真实性，如今恐怕也只能通过描写新型火药武器才能强调这种形象了吧。

文末致谢

承蒙高木七彦先生、角川书店（《Angolmois 元寇合战记》）以及松浦市教育委员会文化财课文化财系（“てつほう”）的支持及欣然许可，得以在本文中载入相关图像资料。在此，本人表达诚挚的谢意。

27 『新編高等世界史B 最新版』（帝国書院，2002，p.147）。

指定讨论

蒙古帝国和火药武器 -- 明治和现代的“元寇”形象

[提问者 / 朝克图、回答者 / 向正树]

提问 / 朝克图：

向教授的论文《蒙古帝国和火药武器》主要是根据明治和近代的日本人对元寇的形象描述，对元寇的绘画，看近现代的日本人对元寇的影响。这是这篇论文的一个主要的侧面。我们要了解元寇。关于蒙古系元寇这个问题，各个国家，尤其是各个国家后人，对它的认识和理解都是不同的，都有自己的解释和观点，主要是从自己民族的角度去解释。向教授用日本近现代文化人对它的理解来解释这个问题，对我们进一步深刻了解蒙古系的元寇问题有一定的启发。

第二点，通过绘画当中的武器，揭示了元代的火药武器，也根据一些史料进行解释，这是挺有意思的。我们现在研究蒙元历史尤其是蒙古国历史的时候，还是要从多层次多方面进行，这对于理解蒙元时期的文化交流、国际化方面很有意义。蒙元时期，对世界的“一统化”、“国际化”，现在有很多夸张的词语去形容。其实这一时期同时也是兵器发展的很重要的时期。刚才向教授也说了，火药武器是这个时期的发明，也开始适用于战场，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张佳老师也说了，据史料记载，南宋时期1123年成桂铸火枪，这是第一个记载。《金史》里也有管形火器的记载，尤其是到了金朝和宋朝对峙的时候，火器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这个时候的火器主要是竹和木制的，技术不是太好，使用起来也不是太方便的。到了元代以后呢，在宋、金朝的基础上做出了金属型火器，元代史料中记载火铳。用金属制造的火铳，对当时的对峙两方、战争起到了很大的转折作用。

所以蒙元时期我们不能忽略，科学技术方面也有一定的发展。研究蒙元时期的科学技术会发现，中亚

的天文学知识、阿拉伯的数学都被引进，并在元有一定的发展突破，这是我们研究蒙元史的时候应该注意的地方。所以向教授的这篇论文很有意思。刚才的专家说元代的中后期开始，把火铳器适用于战场，在朱元璋和张士诚之战中对此有明确的记载。但是当时欧洲好像还没有这样的武器，所以这可谓是在人类历史上很大的发明。

最后我有一个提问，大德2年元朝时期出现铜火铳，说是在内蒙古蒙元博物馆里面保存的，这个内蒙古蒙元博物馆在什么地方？他们是怎么得到火器的呢？请回答一下好吗？

回答 / 向正树：

在回答您的问题之前先汇报一个事实，其实我还没去过那家博物馆。2004年左右在北京大学曾经展出过这家博物馆的展品。当时的介绍说，这家蒙元文化博物馆由民间人士收集了很多出土文物，在考古学上来看有不少文物的年代以及出土地区都不清楚。随后，大概是内蒙古的专家在研究其铭文时，介绍过这些文物。我只知道这些。不过，听说数年前NHK得知这家位于内蒙古的蒙元文化博物馆后，曾经派出采访队到当地，我本人还不知道具体在什么地方。

回答 / 朝克图：

我要补充一下，关于蒙元博物馆，其实今年我们有一个学生专门写了一篇关于元代兵器的硕士论文，他的文章里面也涉及到这个问题。他也用大德2年的铜火铳来进行了举例说明，但是这个东西的来源他也没有进行解释，不清楚从哪里来。所以我就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想问这方面有没有可靠的史料根据，是不是向教授亲自看过这个。

发表论文 6



朝鲜王朝官修《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的历史书写

孙卫国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提 要

朝鲜王朝立国之初，以编年体官修《高丽史》，几经努力不果。世宗年间改纪传体，编成139卷本《高丽史》，以塑造朝鲜王朝的正统性。《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历史的书写，强调高丽的自主性，刻画高丽对元朝需索的巧妙周旋，细致记录高丽所供给的粮草、人工等，凡背叛高丽、投身元朝的高丽人，都被称作“反人”而被列入《叛逆传》中，体现宗藩关系下高丽追求自主意识的努力。在《忠烈王世家》与《金方庆传》中，塑造了两个类似的元东征日本历史的版本，高丽将领成为左右战场胜负的关键，蒙古统帅的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加上“大风雨”，最终酿成东征的失败。对照《元史》与日本史书，《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的书写极为偏颇。对涉及东亚三国的历史事件，一定要摆脱“一国史”的局限，而用“东亚史”的视角，方能趋近历史的真相。

至元十一年（1274）和至元十八年（1281），忽必烈两次派大军征讨日本，乃近世东亚史上一件大事，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作为元朝藩国，高丽王朝是东征日本的重要参与者。高丽王朝被迫为东征建造战舰、准备物资；同时，高丽军队也随元军征讨。检视朝鲜王朝官修郑麟趾《高丽史》中，对这件历史事件是如何书写的，既是考察高丽王朝在这次征讨中地位的重要史料，也是检讨朝鲜王朝对这场战争认识的重要依据。《高丽史》有关这场战争的历史叙述，散见于《元宗世家》、《忠烈王世家》、《兵志》、《金方庆传》等相关篇章中。尽管零散，仔细分析，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这场战争，且透过分析战争中高丽如何巧妙地与元朝周旋，具体而微地解剖元丽宗藩关系的特质。

1. 朝鲜王朝官修《高丽史》的意图与历程

1392年，李成桂取代高丽幼主，自立为王。为了尽快树立王朝的正统性，一方面，李成桂当即遣使明朝，以“权知国事”的名义，派韩尚质以“和宁”、“朝鲜”请国号于明朝，积极谋求建立以明朝为宗主国的宗藩关系。明太祖朱元璋乃赐其国号为“朝鲜”，李成桂君臣欣然接受，通过箕子朝鲜接受周武王册封的传统，来争取明朝天子的册封，为其王朝获取宗主国的认同，以确立其正统性。¹同时，立国之初，李成桂就把编修高丽王朝史作为第一要务，试图从本国历史中寻找新朝的合法性。诚如有韩国学者指出：“通过对高丽时期的整理，指出高丽王朝存在的问题，以此不仅可以体现为克服这些问题而建国的朝鲜的正当性，还可以确定新统治理念的方向。”²就在这种政治诉求下，朝鲜王朝开始了高丽史编纂。最初以编年体为主，展开编修事宜。太祖四年（1395），李成桂令郑道传等人以高丽实录等史料为据，纂成编年体《高丽国史》，全书37卷。此书现已失传，有论之曰：“采摭各朝实录，及检校侍中文仁公闵漬《纲目》、侍中文忠公李齐贤《史略》、侍中文靖公李穡《金镜录》，汇而辑之。仿左氏编年之体，三年而成，为卷三十有七。顾其书，颇有舛误。至于凡例，以元宗以上，事多僭拟，往往有所追改者。”³此书成书虽快，但史料搜集有限，且当时以为对李成桂史实记载不真，“事多僭拟”，因而受到批评。不过，此书史论大多被《高丽史节要》采用，而得以留存，⁴也为随后高丽史的编纂奠定了基础。

太宗十四年（1414），太宗命春秋馆事河仑、卞季良等重修《高丽国史》，两年后河仑去世，重修被迫停止。世宗元年（1419），再令重修，三年（1421），书成，进献国王，世宗仍不满意。五年（1423），令卞季良、柳观、尹淮等继续改撰原来的史书，次年成《校讎高丽史》，因意见分歧，未能颁行。世宗十三年（1431），世宗令监春秋馆事申概、权踰等编纂高丽史长篇，广泛采纳高丽史料。世宗二十四年（1442）八月，书成，名为《高丽史全文》。此书初印于世宗三十年（1448），史料相当丰富，但以编纂主旨不明，后亦停止颁行。不过，此书为以后《高丽史》和《高丽史节要》的编纂，准备了丰富资料。⁵

最初几十年，朝鲜王朝官方为编高丽史，虽不遗余力，却并未编成一部满意的史书。世宗三十一年（1449），金宗瑞、郑麟趾等奉旨再次纂修《高丽史》，变编年体为纪传体，诚如《进高丽史笺》所言：“凡例皆法于迁史，大义悉禀于圣裁。避本纪为世家，所以示名分之重。”⁶因为编年体并不利于王朝正统性的塑造，即便从太祖开国时开始纂修，历经数代，尽管编过几部史书，然无一令朝鲜国王满意，只得采用纪传体重编。“因为纪传体的记述，比编年体在对以往历史的批判性分析

1 陈尚胜：《论朝鲜王朝对明朝的事大观》，《第三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24页。

2 （韩）朴仁镐：《韩国史学史》，全莹、金锦子、郑京日译，香港亚洲出版社，2012年，第55页。

3 《东文选》卷93《进讎高丽史序》，汉城：庆熙大学出版社，1968年。

4 （韩）朴仁镐：《韩国史学史》，第55页。

5 （韩）朴仁镐：《韩国史学史》，第57页。

6 《东文选》卷44《进高丽史笺》。

和构造性理解上,要更具有优势,而且这也更符合朝鲜统治者整理高丽时期史的意图。”⁷文宗元年(1451)八月终于完稿。全书139卷,其中目录2卷、世家46卷、志39卷、年表2卷、列传50卷。接着,金宗瑞在纪传体《高丽史》基础上,用编年体改撰,次年二月,《高丽史节要》成,35卷。这两部书终于实现了编纂前朝史以塑造王朝正统性的意图。

《高丽史》虽然用“世家”以载国王史实,以示名分,全书并没有用宋、元等中国皇帝年号,而是用高丽国王在位年为全书纪年方式,表明高丽王朝的相对独立性。其实,高丽立国以后,先后采纳过五代、宋、辽、金皇帝的年号。高丽元宗开始,行蒙古年号,忠烈王开始,行元朝年号,一直到被李成桂推翻。在高丽与中原王朝交往的岁月里,从文化上,高丽只臣服宋朝,但与宋朝宗藩关系持续时间最短,后来宗主国就先后被辽、金和元取代。对于这些游牧民族所建立的中原王朝,高丽王朝尽管政治和军事上不得不臣服,但文化心态上始终有着高昂的心态,并不臣服。朝鲜王朝官方修纂的《高丽史》,尽管国王用世家体裁,不用本纪,显示藩王的本色,但是全书不用中国皇帝年号,而是用高丽国王的在位年,作为纪年方式。这种折中办法,充分显示朝鲜王朝一种基本的认识:既承认高丽藩国的地位,但并不完全臣服,而有着一一种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这两种意识的有机结合,构成了《高丽史》历史书写的基调。

高宗五年(1218),蒙古军队追击契丹遗民,进入高丽,开始正式与高丽接触。不久,缔结兄弟盟约,正式交往。但蒙古屡向高丽索取财物,引起高丽不满。有次蒙古使臣归国途中被杀,终于引发战争。从1231到1258年,蒙古出兵攻打竟有七次之多。高宗四十六年(1259),派太子王僖前往蒙古,双方议和。恰在此时,蒙古大汗崩逝,王僖亲迎忽必烈,忽必烈继位,建立元朝。不久,高丽高宗去世,忽必烈遣使将王僖送回高丽继位,是为元宗,开启了两国和平之路。正是从元宗时期开始,忽必烈在高丽帮助下,开始了征讨日本的准备。朝鲜王朝以高丽为中心进行历史书写,贯穿着整部《高丽史》,因而其对元东征日本的历史书写,乃呈现一个朝鲜王朝版本的“蒙古袭来”故事。

2. 《高丽史·世家》对元东征日本战争之书写原则与史实选择

元东征日本之前,忽必烈派使臣前往日本,希望建立一种比较密切的关系,这个时期相当长。从一开始,高丽王朝几乎被迫成为元朝东征的马前卒。对于这个过程,《高丽史》尽力记述,字里行间,饱含着一种无奈又不甘的意识,显示高丽王朝在元朝高压下,试图寻求一种独立,以捍卫本国利益。以高丽王朝为中心,凸显其本国意识与本国立场,成为《高丽史》书写的最基本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战争准备阶段,面对元朝无端要求,高丽被动应付,全面地予以叙述。

7 (韩)朴仁镐:《韩国史学史》,第56-57页。

元宗七年（1266），在征讨日本之前，忽必烈派遣使臣，途经高丽，出使日本。因为高丽人赵彝告密，忽必烈知悉高丽与日本常通往来，于是派遣使臣黑的、殷弘前来，并带来诏书，令高丽必须派使臣陪同前往，威胁说若不听令，即其忠诚可疑。高丽无法，只得命枢密院副使宋君斐、侍御史金赞等与黑的等往日本。但这次使行并未到达日本，元宗八年（1267）正月，宋君斐、金赞与蒙古使节至巨济松边浦，畏“风涛之险，遂还”。

元宗只得令宋君斐随黑的去元朝复命，并上奏皇帝。奏疏中表达着几层意思：第一，先对此次使行未能如期抵达日本，加以解释。认为风涛骇浪，极度危险，担心使臣安全；加上日本人“顽犷无礼义”，对于蒙古使臣的安全，难以保证，故而只能半途而废。第二，对于蒙古听信赵彝之言，以为高丽常与日本通好，予以辨白。特别强调“日本素与小邦未尝通好”，只是偶尔与对马岛人稍有贸易，对于其他日本人，则根本没有往来，故而赵彝之言不确。第三，自从元世祖即位以来，高丽就深受隆恩，并铭记于心，“圣恩天大，誓欲报効，如有可为之势，而不尽心力有如天日。”⁸只期望能报之于万一。这是一篇表决心的奏疏，也是一篇为高丽开脱罪责自我辩白的奏疏，充满了外交辞令。蒙古第一次派通使日本，就这样落空了。可见，高丽当时对于此事，实在没兴趣，只是应付而已。

蒙古对高丽这种刻意推脱，非常清楚。八月初一，黑的、殷弘及宋君斐等再次来到高丽，并携来忽必烈的问罪谕旨。忽必烈在谕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高丽的推脱诡计，严词指责高丽敷衍塞责，不诚实，“天命难谏，人道贵诚，卿先后食言多矣，宜自省焉”，对高丽给予严重警告。进一步强烈表达他通使日本的决心，“以必得要领为期”，一定要有结果，否则不会善罢甘休。最后追问高丽“誓欲报効”的说法⁹，明确点出当时正是报效之时！软硬兼施，高丽毫无办法，只得硬着头皮派使臣前往日本，充当东征日本的马前卒。

过了十数天，高丽国王元宗遣起居舍人潘阜赍元国书及高丽国王书去日本。元国书有曰：“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迹，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¹⁰忽必烈向日本表达一种通使往来的愿望，希望日本能够上表通好，“以相亲睦”。若置之不理，就要兴兵问候，以示威胁。同时，高丽亦给日本奉上国书，现身说法，将其对蒙古的看法，向日本表露，规劝日本向元帝国遣使称臣。可见，尽管元跟日本并没有往来，之前了解也不多，但忽必烈通过高丽国王，向日本传达通使往来的愿望，希望两国互通往来，以建立一种友好关系。高丽王国尽管并不大愿意充当媒介，但在蒙古帝国的高压之下，也没办法，只能将蒙古帝国忽必烈帝诏书送达日本，同时附上高丽国书，表达通使愿望。蒙古对日本派遣使节，传达善意，但日本并不予理睬。随后忽必烈又遣使节赵良弼，亲自前往。

可见，《高丽史》在《元宗世家》中，对于高丽在蒙古的威吓下，被迫遣使前往日本的史实，一一陈述出来。在史实陈述的背后，有种无奈与被动的感觉。字里

8 郑麟趾：《高丽史》卷 26《元宗世家二》，元宗八年正月癸丑。台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 年。

9 《高丽史》卷 26《元宗世家二》，元宗八年八月丙辰。

10 《高丽史》卷 26《元宗世家二》，元宗八年八月丁丑。

行间，显示出蒙古帝国的威力，尽管并无评论，但从几份诏书中，元朝的威吓，相当明显。这是朝鲜王朝史官在书写这段历史时，所流露出来的厌恶情感。其实，通过高丽使节传话，只是先声，忽必烈对日本的遐想远不只是通使往来，就能满足的。

元宗十二年（1271）正月，“蒙古遣日本国信使秘书监赵良弼及忽林赤、王国昌、洪茶丘等四十人来”，¹¹并带来忽必烈诏书，这是蒙古帝国通过高丽，派往日本的第一个使团，实际上分两批：第一批，以赵良弼为国信使，赵良弼又让高丽“幸臣”康允绍偕同前往；第二批忽林赤、王国昌和洪茶丘，将兵送到海上，作为后备使臣。值得注意的是，洪茶丘原本是高丽人，因为其父投靠蒙古人，他也就成了蒙古将领。史料中特别提及，洪茶丘见到郊迎的高丽国王元宗“不拜”，¹²也就是不再向国王称臣。书中特别提及这个细节，充分显示洪茶丘的傲慢，也映衬出高丽君臣与朝鲜史官的不满。

因为日本对蒙古之通使要求不予理睬，蒙古开始用兵准备。军队未动，粮草先行。为了准备粮草，蒙古派忻都率兵前往高丽屯田，并要求高丽予以配合，准备三千头牛，并农器、种子之类备用。随之，蒙古遣殿中监郭汝弼前往蒙古上陈情表，对于蒙古所需之物，表示颇有困难，一一回绝，

承中书省牒，凤州屯田，农牛、农器、种子、军粮等事。若乃农牛，如前表奏，小邦京中鲜有畜使者，外方农民虽产之，饶者畜养亦不过一二头，贫者多以耒耨，或相赁牛而使之。今外方牛畜，悉因全罗道粮饷转输，以至饥困，损失者大半。农器，则小邦人民元来未有赡庀者，此皆虽不得如数，并当随力供办。种子，则百姓趁年耕作，以修贡赋用，其余以为粮料。……军粮，则大军之后，小邦元来蓄积，除逆贼攘夺外，悉因供亿留屯军马及追讨军马，罄竭无余。中外臣民征敛者累度，犹不连续，且又泛计种子、葛秣，接秋军粮凡几万硕，此则何从而致之耶！¹³

高丽所上陈情表，可谓百般推诿，通篇都在讲其困难。《高丽史》对于这类陈情表，以及高丽如何应付蒙古之需索，成为其重点叙说之内容。朝鲜王朝史官在编此书之时，也是寄托着对宗主国明朝有着同样的情感。尽管明朝较之元朝，对待朝鲜王朝并没有如此般索取，但是明初连年的处女与火者的需索，宦官的来使，也使得当时朝鲜王朝疲于奔命，不堪其重负。¹⁴故而在撰写《高丽史》时，对于这类史实着力叙述。既表达着作为藩国的无奈，也显示着藩国的抗争。尽管这种抗争并没有多大的成效，但是表达其并非逆来顺受，而是有自主意识。

陈情表不够，接着派断事官沈浑上表，继续请命，力图使忽必烈汗解除这种需索。

11 《高丽史》卷 27《元宗世家三》，元宗十二年正月己卯。

12 《高丽史》卷 27《元宗世家三》，元宗十二年正月己卯。

13 《高丽史》卷 27《元宗世家三》，元宗十二年三月丙寅。

14 有关此问题，参见[美]陈学霖：《明代人物与传说》，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年。

有曰：

噫！此百姓皆是皇帝之百姓，乃此农牛、农器、种子一皆收夺，使失其业，则恐百姓决定饥死，其又在此者役烦力竭，不堪困苦。而从逆贼者，靡有歉艰，则焉知愚民有所贰于彼哉！圣鉴若知如此，必曰何不揆力陈实，早达宸所，使我百姓至于此极？然则谁当任其责？¹⁵

从此表中看出，尽管表示高丽在尽力置办，想方设法满足需要，但更重要的是，为百姓申诉苦楚，以为农牛、农器、种子都被收走了，百姓无以为生，只能干坐等死，或许因此而走向叛逆，可是“此百姓皆是皇帝之百姓”，相信皇帝也不愿发生这样的事情，故而昧死陈情，让皇帝知悉高丽百姓的困境，实际上这是再次表达抗争。

元宗十三年（1272）正月，赵良弼从日本回到高丽，并带来日本使臣十二人。高丽元宗国王马上派使臣前往大都报告，上表祝贺。同年十二月，元复遣赵良弼往日本招谕，这次却不如第一次顺利，元宗十四年（1273）三月，赵良弼到日本大宰府，不得入国都，只得再次回到高丽。在蒙古派使臣前往日本之同时，蒙古大军在忻都、洪茶丘的指挥下，截止元宗十四年（1273）四月，先后攻占了三别抄所占领的朝鲜半岛东南沿海诸岛，珍岛、耽罗先后平定，扫清了障碍，为征讨日本作准备。对于征讨经过，《忠烈王世家》予以简略的叙述。

有鉴于第一次征讨日本前，高丽只是被动应对元朝的需索，在第二次征讨前，高丽国王主动出击，试图参与其决策过程，尽可能限制蒙古将领权限及其对高丽的侵扰。第二次征讨日本决策之际，高丽忠烈王正在大都，亲受谕旨。《高丽史》在叙述决策过程中，如斯写道：

王以七事请：一以我军镇戍耽罗者，补东征之师；二减丽汉军，使阁里帖木儿益发蒙军以进；三勿加洪茶丘职任，待其成功赏之，且令阁里帖木儿与臣管征东省事；四小国军官皆赐牌面；五汉地滨海之人并充梢工水手；六遣按察使廉问百姓疾苦；七臣躬至合浦阅送军马。¹⁶

可见，高丽国王对参与东征之事，非常重视，他先让大臣上奏，要入朝亲受东征之旨，不想由其他朝臣传旨，以争取主动。对于排兵布局，忠烈王提出他的七点见解，直接参与决策过程，这是高丽国王变被动为主动的一种努力。从他所提出的七点建议看，一方面希望少用汉军和高丽军，多用蒙古军队，甚至于水手都希望多用汉地之人，不要专门依靠高丽水手，以减少高丽王朝的责任；二则削弱洪茶丘的权限，别加其职位，因为洪茶丘是其死敌。与此同时，忠烈王希望由阁里帖木儿与他共同掌管征东事项。忠烈王这么做，意图十分明显，就是不希望在这过程中，受制于人，更不希望因为这次出征，让政敌再次掌权而影响高丽国政，所以他要争取主动。《高丽史》也着重对此叙述。尽管忽必烈并未采纳忠烈王之建议，但还是重

15 《高丽史》卷 27《元宗世家三》，元宗十二年三月丁巳。

16 《高丽史》卷 29《忠烈王世家二》，元宗六年八月辛卯。

视他的建议。

九月丙辰，征东元帅府镇抚也速达赉来，专为约束蒙古征东军队的：“其一……据本国见管粮储船只梢工水手，一切军须，请照验行下合属，如法准备，听候区用，勿值临时失误。其一，经行去处，窃恐不畏公法之人，放火烧草，事系利害，请照验行下合属，出榜禁约，如违，罪有所归。”¹⁷这两条约束，可以说是对忠烈王所提七条建议的回应，免得征东将领胡作非为，伤害高丽。尽管在《高丽史》中，对蒙古东征军之危害，没有详述，但从忠烈王在第二次东征之前的积极努力，可以看出，为了避免东征军的危害，忠烈王争取积极主动，终于获得回报。

可见，《高丽史》对在战争准备阶段，高丽王朝如何从被动应对，巧妙周旋，极陈困难，到第二次征讨前，高丽国王主动出击，争取主动，给予了系统书写。从中体现高丽王朝对于宗主国元朝的敷衍与抗争，从而凸显高丽王朝争取独立自主的意识。

第二，战争前后，高丽所耗费的人工、粮食、马料，给高丽带来诸多困难，《高丽史》则予以详述。

诚如前面提到，高丽对元朝各种需索，采取敷衍应对的办法，《高丽史》试图写出高丽的无奈。而对于高丽所耗费各种物资，面临的各种困难，为元征日本所造船舰，耗费人工、粮食、马料，不厌其详地加以叙述，充分显示高丽为元征日本，所付出的代价。即如：

“（元宗）十五年春正月，元遣总管察忽监造战舰三百艘，其工匠役徒一切对象，全委本国应副……兴役催督甚严……于交州道各为部夫，使征集工匠役徒三万五百余名，起赴造船所。是时，驿骑络绎，庶务烦剧，期限急迫，疾如雷电，民甚苦之。”¹⁸元宗十五年（1274）二月甲子，高丽国王就派遣别将李仁前往元朝汇报准备情况，将他们所做事情，所耗粮饷，事无巨细，一一上奏，特别表明高丽所面临的困难，百姓因之更加穷困，最后恳求“岁令供给，罔有期限，将无奈何！兹实悯焉！乞皆蠲免，以惠远人”¹⁹，只求减免，以苏民力，以解民困。

高丽常常跟元朝算经济账，对于他们所提供的粮草数目，时时向元朝禀报，一笔一笔地算清。忠烈王三年（1277），高丽遣使上书中书省，其中有言：“小邦自至元七年以来，征讨珍岛、耽罗、日本大军粮饷，悉于百姓科收，尔后见在合浦镇边军、耽罗防护军、盐白州归附军并阔端赤，一年都支人粮一万八千六百二十九石二斗，马牛料三万二千九百五十二石六斗，皆以汉斗计。亦于百姓科收，今者所遣屯田军三千二百并阔端赤等粮料，更于何处索之！”²⁰特别提及以汉斗记，可见，高丽是多么在乎这些粮草。这是在第一次东征时，高丽所筹集的粮草。《兵志》更详细叙述了为第二次东征，筹集军粮所采取的办法，真可谓费尽心机。

17 《高丽史》卷 29《忠烈王世家二》，忠烈王六年九月丙辰。

18 《高丽史》卷 27《元宗世家三》，元宗十五年正月。

19 《高丽史》卷 27《元宗世家三》，元宗十五年二月甲子。

20 《高丽史》卷 28《忠烈王世家一》，忠烈王三年二月丁卯。

忠烈王三年（1277）二月，令诸王百官以至庶民，出米有差，以充洪茶丘军粮。……八年（1282）四月，东征所支兵粮十二万三千五百六十余石。九年（1283）二月，命各道禄转未输京者悉充军粮。三月，令诸王百官及工商奴隶僧徒出军粮有差：诸王、宰枢、仆射、承旨，米二十石；致仕宰枢、显官三品十五石；致仕三品显官、文武四五品十石；文武六品、侍卫护军八石；文武七八品参上解官六石；东班九品参外副使校尉南班九品四石；正杂权务队正三石；东西散职业中僧一石；白丁抄奴所由丁吏诸司下典独女官寺奴婢十斗；贾人大户七石；中户五石；小户三石。唯年七十以上男女勿敛。²¹

这段史料记录高丽王朝为筹集军粮，不得不采取的办法。第一，从这段史料可知，第二次东征日本期间，为了筹集军粮，高丽王朝上至国王，下至贩夫走卒，都必须筹集定量的军粮，以保证前线军需。第二，充分说明，征讨日本，给高丽社会带来全方位的损害，几乎无人可逃。第一次征讨之前，蒙古军队来高丽军屯，生产粮食，可以给高丽减轻军粮的负担；第二次出征之前，并没有再行军屯之事，高丽王朝只得全民动员，人人贡献。第三，《高丽史》特别在《兵志》中，将筹集军粮的问题，予以陈述，亦可印证在《世家》部分，对于军粮等物资供应的细致叙述，充分说明对这部分史实的关注，有其必要性的。

《高丽史》卷29《忠烈王世家二》忠烈王六年（1280）十月戊戌条，特地收录一份元中书行省移牒，转录东征军事牒，主要探讨士卒逃亡事故及其处置办法，篇幅极长。较之叙述征讨日本的战事经过，长不止数倍，这一方面说明这是件大事，同时也反映朝鲜王朝修史官一种特别的心态，似乎有些幸灾乐祸。六年十一月，再上书中书省，汇报准备情况，曰：“小国已备兵船九百艘，梢工水手一万五千名，正军一万名。兵粮以汉石计者十一万，什物、机械不可缕数，庶几尽力，以报圣德。”²²详述各项准备事项，向皇帝表忠心，也是一篇极长的表文。这一卷中，将这两个极长的表文收录，表明高丽为征讨日本所作的努力和付出的代价。在朝鲜王朝修史官看来，元征高丽，如果没有高丽的准备与付出，大概也是不可行的。尽管东征日本，高丽只是附属帮衬，但对于其社会的影响则是深远而全面的。

第三，《高丽史·忠烈王世家》对两次元东征日本经过，叙述简略，且所记史实以高丽将领为中心。

至元十一年（1274）十月，元丽联军第一次征讨日本，日本称之为“文永之役”。《高丽史·忠烈王世家》，叙述此次战争，只有数行，如斯写道：

冬十月乙巳，都督使金方庆将中军，朴之亮、金忻知兵马事，任恺为副使；金侁为左军使，韦得儒知兵马事，孙世贞为副使；金文庇为右军使，罗裕、朴保知兵马事，潘阜为副使，号三翼军。与元都元帅忽敦、右副元帅洪茶丘、左副元帅刘复亨，以蒙汉军二万五千、我军八千、梢工引海水手

²¹ 《高丽史》卷 82《兵志二》。

²² 《高丽史》卷 29《忠烈王世家二》，忠烈王六年十一月己酉。

六千七百、战舰九百余艘征日本，至一歧岛，击杀千余级，分道以进，倭却走，伏尸如麻，及暮乃解。会夜大风雨，战舰触岩崖多败，金佺溺死。²³

至元十八年（1281），元朝第二次东征，日本称之为“弘安之役”。对于此次征讨日本的经过，《高丽史·忠烈王世家》也只有寥寥数行字，其曰：

七年五月戊戌，忻都、茶丘及金方庆、朴球、金周鼎等以舟师征日本。癸亥，行省总把报：是月二十六日，诸军向一歧岛，忽鲁勿塔船军一百十三人、梢手三十六人，遭风失其所之。遣郎将柳庇告于元。六月壬申，金方庆等与日本战，斩首三百余级；翼日复战，茶丘军败绩，范文虎亦战舰三千五百艘、蛮军十余万来会，值大风，蛮军皆溺死。八月己卯，别将金洪柱自合浦至行宫，告东征军败，元帅等还至合浦。是月，忻都、茶丘、范文虎等还，元官军不返者，无虑十万有几。十一月壬午，各道按廉使启：东征军九千九百六十名、梢工水手一万七千二十九名，其生还者一万九千三百九十七名。²⁴

综合这两段史料，可知几点：

第一，叙述相当简略，充分说明《高丽史·忠烈王世家》对于这次征讨日本的战争，并不重视；或者说，叙述战争经过，并非其关注的重点历史事件。

第二，在如此简单的叙述中，其内容选择值得关注，重点介绍高丽军队的将领以及建制情况。首次东征，高丽军队尽管只有八千人，但是分左、中、右三路，各有将领指挥，对于元军将领，一笔带过。尽管从人数上看，高丽军队是绝对的少数，但在《高丽史》的叙述中，却是主要关注的对象。第二次东征的叙述，依然是以高丽将领优先，既点出了随军征讨高丽将领的名字，书中所记录唯一一场胜仗，还是高丽将领金方庆所指挥的高丽军队，斩首三百级。对于元军战事情况，未提一场胜仗，只述其败仗。

第三，具体战事情况，叙述极其简略，两次战败，都提及了“大风”。首次东征，“至一歧岛，击杀千余级，分道以进，倭却走，伏尸如麻，及暮乃解。会夜大风雨，战舰触岩崖多败”。征日本，先胜后败，夜晚败于“大风雨”，也就是日本所谓的“神风”。第二次则曰“遭风失其所之”，“值大风，蛮军皆溺死”。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东征失败的直接原因。

第四，两次战争的叙述，都提及了具体的损失。首段史料中，除提及战舰败没外，特别提及左军使“金佺溺死”，这是高丽溺死的最高指挥官。而在随后的《年表》中，则曰：“十月，金方庆与元元帅忽敦、洪茶丘等征日本，至一歧战败，军不还者万三千五百余人。”²⁵。第二段史料对于元军伤亡情况，有多个数据，十分清晰地呈现出东征伤亡之惨重。在下文《年表二》中则曰：“元至元十八年，忠烈王七

23 《高丽史》卷 29《忠烈王世家二》。

24 《高丽史》卷 29《忠烈王世家二》。

25 《高丽史》卷 87《年表二》。

年五月，金方庆与忻笃（都）、茶丘征日本，至霸家台战败，军不还者十万有奇。”²⁶这与第一次征讨的叙述类似，字数不多，叙述简略，但是丝毫不掩饰其漠视的态度。

可见，从《高丽史·忠烈王世家》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当中，高丽军队是主角，蒙古军队只是配角，日本海战作为背景而已，充分显示《高丽史》的主体性意识，并非全面叙述这场战争，而是揭示高丽军队在其中的作用，是一种选择性的历史书写。

3. 《高丽史》对元东征战争中高丽将领传记之书写

纪传体史书，人物是中心；各种历史事件的叙述，也都贯彻到人物传记之中。高丽参与这场战争的将领，《高丽史》中有专传的人不多，主要有《金方庆传》，其子金忻付传、部将朴球付传；《金周鼎传》、《罗裕传》；金文庇传付《李贞传》。另外，一些相关人物如李藏用、洪福源、赵彝有传。在这些传中，比较详细讨论了这次战争的是《金方庆传》，其他人物的传，对这场战争一笔带过，甚至未曾提及。根据人物生前表现，有正面叙述的，如《金方庆传》；有反面典型的，如赵彝与洪福源都被列入《叛逆传》中。可见，《高丽史》对这些人物的选择与书写，都是有着强烈政治诉求的。

《高丽史》中《叛逆传》有六卷。序曰：“孔子作《春秋》，尤严于乱臣贼子及据地以叛者，其诛死者而不贷，所以戒生者于后也。夫人臣忠顺，则荣其身，保其宗，而美名流于后；叛逆者未有不脂润鼎镬，赤其族而覆其祀者，可不戒哉！作《叛逆传》。”²⁷《高丽史》中，对于那些投靠元朝、危害高丽之人，大多列入《叛逆传》中，东征将领中以《洪福源传》与《赵彝传》为代表。赵彝“中进士，后反，入元称秀才，能解诸国语，出入帝所”。他并未率兵前来高丽征讨，《高丽史》中所记，只是他向忽必烈进言：“高丽与日本邻好，元遣使日本，令本国乡导。”这才导致高丽派使臣宋君斐陪同元使前往。后来又有几次进“谗言”，故而《高丽史》曰：“彝常以谗毁为事，竟不得志而死。”乃是以言辞加害高丽，《高丽史》对这类人予以贬斥，“有金裕、李枢者，亦反人也。”²⁸列之于《叛逆传》，称之为“反人”。可见，朝鲜王朝史官们有多痛恨这些卖身求荣的家伙。

洪福源，乃洪茶丘之父，亦被列入《叛逆传》中。《高丽史》中无洪茶丘传，在《洪福源传》中，对洪茶丘所干事多有记述。洪福源原本为高丽西京郎将，高宗二十年（1233）起兵反宣谕使郑毅，失败后，逃到蒙古。“福源在元为东京总管，领高丽军民，凡降附四十余城民皆属焉。谗构本国，随兵往来……然自是元兵岁至，攻陷州郡，皆福源导之也。”后洪福源得罪高丽人质永宁公綽之蒙古妃子，被处死。“籍没家产，械其妻及子茶丘、君祥等以归。福源诸子憾父之死，谋陷本国，无所不至。”²⁹元宗二年（1261），忽必烈即位后，才为洪福源雪冤，并令洪茶丘袭其

26 《高丽史》卷 87《年表二》。

27 《高丽史》卷 127《叛逆传一》序。

28 《高丽史》卷 130《叛逆四·赵彝传》。

29 《高丽史》卷 130《叛逆四·洪福源传》。

父职“管领归附高丽军民总管”，此后洪茶丘一直担任元朝官职，因为他来自高丽，高丽相关事务，元朝大多委托洪茶丘办理。洪茶丘对高丽从不顾恤，处处与高丽为难，高丽君臣恨之入骨。

高丽国王忠烈王对于洪茶丘相当忌惮，他曾亲自向忽必烈进言，希望将洪茶丘召回元朝，不能留置高丽。“然茶丘在焉，臣之为国，不亦难哉！如茶丘者，只宜理会军事，至于国家之事，皆欲擅断。……上国必欲置军于小邦，宁以鞑靼汉儿军，无论多小而遣之，如茶丘之军，惟望召还。”³⁰在忠烈王看来，洪茶丘肆意干涉国政，独断专行，使得他无以为政，故亲自向皇帝进言，希望将他调回。忽必烈提醒国王有关事项，忠烈王斥之为“茶丘之妄言”，忽必烈只好说：“非惟茶丘，人多言之。”忽必烈问“忻都如何”，忠烈王曰：“忻都，鞑靼人也，可则可矣。使茶丘在，则与高丽军妄构是非，虽忻都不能不信，望令茶丘与高丽军皆还于朝，以鞑靼汉儿军代之。”³¹可见，忠烈王宁可让鞑靼人忻都取代洪茶丘，也不让他在高丽搬弄是非。高丽国王与洪茶丘是水火不容的。其时，洪茶丘镇守耽罗，于是忽必烈下令，将忻都与洪茶丘等皆召回，免生事端。高丽趁此机会，接管耽罗镇守任务，也进而将耽罗置于其控制之下。东征期间，“（先是），以茶丘为监督造船官军民总管。茶丘克期催督甚急，分遣部夫，使征集工匠，诸道骚然。帝又命茶丘提点高丽农事，又命为东征副元帅。茶丘以忠清道梢工水手不及期，杖部夫，使大将军崔沔以大府卿朴暉代之。”³²这段史料虽涉及元征高丽之事，主要是讲洪茶丘借战事而危害高丽之种种罪行。他虽是东征副帅，却祸害高丽，比之达鲁花赤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没有给洪茶丘单独立传，洪福源传中，已清楚交代了洪茶丘的所作所为。本传所述之元征高丽，只是作为说明洪茶丘所作所为的时代背景而已。尽管对于洪茶丘，已将他视作元朝人，在《叛逆传》中叙其事，将他视作叛逆。与赵彝被归入《叛逆传》一样，是朝鲜王朝史官为高丽王朝抒发着一种批判的情感，对于那些投靠元蒙帝国的高丽人，《高丽史》一律斥之为“反人”，归之入《叛逆传》。

与把洪福源、赵彝被列入《叛逆传》相对照，金方庆则是作为正面肯定的对象。金方庆官至兵部尚书翰林学士。在两次东征日本过程中，金方庆都任高丽军队最高统帅，在其传中，对两场战争给予了较多篇幅。第一次东征，《金方庆传》述曰：

（元宗）十五年，帝欲征日本，诏方庆与茶丘监造战舰。造船若依蛮样，则工费多，将不及期，一国忧之。方庆……用本国船样督造。是年元宗薨，忠烈即位，方庆与茶丘单骑来陈慰，还到合浦，与都元帅忽敦及副元帅茶丘、刘复亨阅战舰。方庆将中军，朴之亮、金忻知兵马事，任恺为副使，枢密院副使金仇为左军使，韦得儒知兵马事，孙世贞为副使；上将军金文庇为右军使，罗佑、朴保知兵马事，潘阜为副使，号三翼军，忻即绶也。以蒙古汉军二万五千、我军八千、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战舰九百余艘，留合

30 《高丽史》卷 28《忠烈王世家一》，忠烈王四年七月甲申。

31 《高丽史》卷 28《忠烈王世家一》，忠烈王四年七月甲申。

32 《高丽史》卷 130《叛逆四·洪福源传》。

浦以待女真军，女真后期。乃发船入对马岛，击杀甚众。至一歧岛，倭兵陈于岸上，之亮及方庆壻赵扑逐之，倭请降，复来战。茶丘与之亮、扑击杀千余级，舍舟三郎浦，分道而进，所杀过当。倭兵突至，冲中军，长剑交左右方庆如植，不少却，拔一啗矢，厉声大喝，倭辟易而走。之亮、忻、扑、李唐公、金天禄、申奕等力战，倭兵大败，伏尸如麻。忽敦曰：“蒙人虽习战，何以加此！”诸军与战，及暮乃解，方庆谓忽敦、茶丘曰：“兵法：千里县军，其锋不可当，我师虽少，已入敌境，人自为战，即孟明焚船淮阴背水也，请复战。”忽敦曰：“兵法小敌之坚，大敌之擒，策疲乏之兵，敌日滋之众，非完计也，不若回军。”复亨中流矢，先登舟，遂引兵还。会夜大风雨，战舰触岩崖多败，旆堕水死。到合浦，以俘获器仗献帝及王，王遣枢密副使张镒慰谕，命方庆先还，加上柱国判御史台事。³³

第二次征讨情况，《金方庆传》如斯写道：

七年三月，出师东征。方庆先到义安军阅兵仗王至合浦，大阅诸军。方庆与忻都、茶丘、朴球、金周鼎等发，至日本世界村大明浦，使通事金贮檄谕之。周鼎先与倭交锋，诸军皆下与战，郎将康彦（康师子）等死之。六月，方庆、周鼎、球、朴之亮、荆万户等与日本兵合战，斩三百余级。日本兵突进，官军溃，茶丘弃马走，王万户复横击之，斩五十余级，日本兵乃退，茶丘仅免。翼日复战，败绩。军中又大疫，死者凡三千余人。忻都、茶丘等以累战不利，且范文虎过期不至，议回军，曰：圣旨令江南军与东路军必及，是月望会一歧岛，今南军不至，我军先到数战，船腐粮尽，其将奈何？方庆默然。旬余，又议如初。方庆曰：奉圣旨，赍三月粮，今一月粮尚在，俟南军来合攻，必灭之。诸将不敢复言。既而，文虎以蛮军十余万至，船凡九千艘。八月，值大风，蛮军皆溺死，尸随潮汐入浦，浦为之塞，可践而行。遂还军。³⁴

这两段史实书写，清晰地呈现了东征战场另一个版本，有几个特点：第一，有关元东征作战史实的叙述，这是《高丽史》中最详细的版本，较之《忠烈王史家》的叙述，更为详细，增加了许多细节，也更为形象。这段历史书写，以金方庆为中心，意在凸显金方庆的战功及其英勇事迹，故金方庆是中心，叙述其言行，揭示他在这场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构成本版本的主线。诚如前面所提到的，金方庆是高丽名将，出身名门，战功赫赫。而这两次战争中，金方庆的表现，充分说明金方庆是位英勇善战的栋梁之才，值得倚重。

第二，从这段史料中看，金方庆似乎是战争的主宰，第一次战斗正酣之际，金方庆“拔一啗矢，厉声大喝，倭辟易而走……倭兵大败，伏尸如麻”，甚至蒙古主帅也称赞他“蒙人虽习战，何以加此”！在战事有利之时，他建议乘胜追击，惜

³³ 《高丽史》卷 104《金方庆传》。

³⁴ 《高丽史》卷 104《金方庆传》。

不被采纳，以至于遭遇风暴，战舰损坏败没，因而大败。第二次征伐之时，也是金方庆指挥的高丽军队，“斩三百余级”，取得一场胜仗。蒙古军队则屡打败仗，洪茶丘甚至仅以身免，最终“值大风，蛮军皆溺死，尸随潮汐入浦，浦为之塞，可践而行。”可见，战斗何等惨烈！用这样强烈的对比法，以凸显金方庆的战功。

第三，这段史料与《高丽史》其他史料一样，给人呈现的是高丽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如果只看《高丽史》，我们并不能全面掌握战事的情况，只是朝鲜王朝官方所塑造的高丽军队的表现而已，这种表现颇有夸大甚至故意塑造之嫌。事实上，抛开这些史料的片面书写，而从战事的角度来考虑，这场战争是元朝发动的，高丽被迫随从，高丽军队只能是辅助而已，不可能成为战争胜负的主宰。因此，《高丽史》某些情节不可避免的被夸大，甚至是杜撰的。即如金方庆与主帅的对话，就很难说是真实存在的。作为朝鲜王朝编纂者，固然不可能听到这些对话，即便高丽王朝留下的档案资料，也不大可能有这样的对话记录，因而可以说，这是一种合理的想象，从而增加金方庆在这场战争中的重要性，给他的表现添上一些耀眼的光环。《高丽史》中的相关叙述，这样的光环或多或少存在。

综上所述，《高丽史》以是否忠于高丽作为判定人物的标准。凡是背叛高丽，投身元朝，即便高丽是元朝的藩国，这些人物就被视作“反人”，而被打入《叛逆传》中，赵彝、洪福源就是典型代表。金方庆是东征日本时高丽的级别最高的将领，他是高丽东征的代表人物，被塑造成英雄典范。在他的传记中，以金方庆为中心，朝鲜史家展开合理的想象，通过金方庆的对话，为蒙古东征塑造了一个更为生动的版本，金方庆被塑造成为东征战事的主宰，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人物。蒙古将领则是失败的化身，对东征失败要负主要责任。

4. 结语

朝鲜王朝官修《高丽史》，对于元东征日本的历史，在《忠烈王世家》与《金方庆传》中，呈现出两个相似而又有细微差别的版本。其基本主旨是相同的：凸显高丽王朝在这场战争中的贡献，宣扬高丽将领的战功。给我们呈现的是，高丽似乎是这场战争胜负的关键，只因元朝统帅一意孤行，不听高丽将领的忠言，以至于遭大风雨而败。诚如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德·塞尔托所表述的：官方的历史书写，是由国家理性来完成的。“它要依据一些现成的材料，通过专门手法，来‘处理’某个‘环境’下的各种因素，以构建缜密的叙述。”³⁵因此这一版本是朝鲜王朝官方史家所构建出来的，它与明朝所修《元史》和日本相关史书的叙说，一定有着天壤之别。

如果将《高丽史》与《元史》两相对比，我们会发现有很大不同。即如所谓洪茶丘诬陷金方庆案，《高丽史》载：金方庆有功得赏，随之受到朝中党人排挤，被诬告欲谋反，“（洪）茶丘与本国宿憾，欲伺衅嫁祸，闻方庆事，请中书省来鞫。”³⁶洪茶丘百般迫害，试图置之于死地，金方庆受尽折磨，忽必烈过问后，才将金方庆莫须有的罪名去除。《元史·高丽传》则曰：“十四年正月，金方庆等为乱，命愷治

35 （法）米歇尔·德·塞尔托：《历史书写》，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36 《高丽史》卷104《金方庆传》。

之，仍命忻都、洪茶丘飭兵御备。”³⁷此传是将金方庆祝作叛乱，而《高丽史》中，将金方庆之事说成是洪茶丘的诬陷，有着绝然相反的看法。《高丽史》与《元史》，许多事情的记述相左，金方庆案件即是一个典型事例。金方庆在《高丽史》中，乃作为重臣而有传，《元史》则是将其视作叛乱嫌疑者。洪福源在《元史》中，被视作功臣，《高丽史》中则被收入《叛逆传》中。

如此巨大的差别，不能不引起我们警觉。对于如何处理这样一个涉及东亚三国的历史事件，如何避免这样的问题，或者说如何分析过去史书中刻意的构建，就不能只从一国立场和视角来评判历史。³⁸史料上，既要如陈寅恪所说的“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³⁹，更重要的是，立场上，更要跳出国族的窠臼，摆脱一国史的羁绊，采取东亚史的视角，方有可能趋近历史的真相。

37 《元史》卷 208《外夷一·高丽》，第 4620 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年。

38 葛兆光在《在“一国史”与“东亚史”之间：以 13—16 世纪东亚三个历史事件为例》（《中国文化研究》2016 年冬之卷）指出，“如果仅仅站在一国历史的立场、角度和视野来观看发生在东亚的历史，会出现‘死角’或‘盲点’。”因此，要舍弃一国史的视角，而从东亚史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这些历史事件。

39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参见《陈寅恪集》之《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 年，第 247 页。

指定讨论

朝鲜王朝官修《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的历史书写

[提问者 / 金甫桃、回答者 / 孙卫国]

提问 / 金甫桃：

我基本赞同孙教授的看法。高丽史的编纂过程中，从编年体到纪传体这样的史书的架构方式中包含着对朝鲜时代的认识。这里我想谈点感想作为补充。我通过韩语翻译听到您的报告的后半部分提到有些朝鲜士官有可能凭借想象撰写《高丽史》。我认为，朝鲜时代编纂的《高丽史》是基本上是根据高丽时代的原始文件来完成的。也就是说朝鲜时代的人并没有加入想象，随意加进一些文章或词语，基本上是根据高丽时代留下的文章进行整理而成。

当然，纪传体的编纂过程中，在资料的选取和构成方面可能会体现朝鲜时代人们的想法，因此在选取的记录的内容、文章当中应该含有高丽时代的人们的表达方式。我举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高丽后期有一个叫李在贤的人撰写的记录中有很多被引用到《高丽史》中。另外，作为高丽前期的趣闻，高丽给宋的外交文书当中，有的同时写下了宋的年号和辽的年号。如果是按照朝鲜时代的人的认识为基准的话，这种地方应该会进行修正，但是高丽史基本原封不动地进行了引用，这可以说是编纂高丽史的一大原则。

其次，您谈到高丽史的特点时，强调把远征日本与高丽的立场相结合。这也非常自然。我来稍微补充几点，因为这是概括《高丽史》的书，所以自然会反映高丽的立场，也包括朝鲜对待高丽的立场。远征日本是发生在13世纪的大事件，如果胜利的话，应该会大篇幅强调军事作战的部分，以及胜利之后的部分。而两次战争均以失败

而告终。所以高丽本身就不会强调战争的过程，更多强调战争前进行准备的部分，强调他们如何付出努力，或者强调遭受的灾难部分。站在朝鲜的立场上，也会承认并强调这一部分，以这种态度编纂《高丽史》。第三点与第二点有些关联，就是金方庆的列传中有很多非常详尽的记录。他死于1300年，他的墓志铭流传至今。墓志铭就是埋在墓里的石碑。墓志铭中详细记录了金方庆的官历，对他前后两次参加日本远征的内容却很简单。而强调的部分则是，第一次远征之前他与高丽王忠烈王一起面见忽必烈，忽必烈举行宴会，把金方庆安排在蒙古丞相的座位上。

我们可以看到这部分记录强调了金方庆在蒙古受到的待遇问题。1300年制作的这部分记录没有强调战争本身（因为战败了），有关战争的部分很简单，强调的是有关金方庆战前从蒙古那里得到的待遇和他的官历。

因为高丽史这部历史书是朝鲜时代编纂的，难免会出现朝鲜的认识。而朝鲜时代的人在编纂这部史书，特别是有关远征日本的内容时，编纂者持怎样的思路呢？要想正确把握朝鲜人对这场战争的记忆或认识的话，应该参考比《高丽史》稍晚的史书，比如《东国通鉴》，朝鲜后期编纂的《东史纲目》等，这些史书由其他朝鲜时代的人直接记录，或许更加有效。以上是我的问题。

基督教的，到20世纪的时候就开始mosate的考察当中都找到了这些证据。

回答 / 孙卫国：

非常感谢金教授的点评，对您提到的几点我都同意。首先第一点就是，高丽史的编写是以高丽时期的史料为基础写出来的，这一点我非常认同。但是这个史料如何去选择，选择哪些，书写哪些，哪些不写，哪些写，这是朝鲜王朝自己的选择。我提到想象是因为其中在金方庆传里提到他有一句话，甚至说有一个细节，比如在中文68页这里提到“金方庆厉声大喝”，他的言论，跟别人讲的什么事，跟别人说话的细节都被描绘出来。中国人会联想到司马迁的《史记》中很多人的对谈说话，比如鸿门宴中人物的每个眼神、每个动作一定是想象出来的。这些东西史料当中很难找到根据。所以我就觉得这些细节方面有很多想象的成分在里面。

第二点，对于高丽史哪些写哪些不写，它的根据当然是来自于高丽史料，写的过程、选择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因为历史不可能全貌反映出来。我们现在通过图像、影像去呈现的那个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也有剪辑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在当时，剪辑成为文本也就有建构的成分。另外，关于金方庆的碑篆的资料。我们知道碑篆资料非常重要，面见忽必烈的时候，把他安排在丞相的地位，对于碑篆资料需要慎重地用，如果是唯一来源（则可靠性不高）因为撰写碑文不是亲属就是朋友，这种杜撰成分会更多。明代历史学家王世贞说“国史实恣”，就是国史有很多编造的成分；“家史实腴”，家史就是包括族谱等的记录，阿谀奉承、说好话的成分特别多。如

果说有其他史料作为佐证，碑篆资料当然是可以采用。

第三点我非常同意您说的，要全面理解朝鲜王朝对高丽史的叙述。除了《高丽史》这本书之外，还要看《东国通鉴》，以及其他方面的资料，这个没错，我非常同意，因为我这个文章主要谈的是官修高丽史，这些方面还没有涉及。谢谢。

发表论文

7

围绕远征日本窥探到的高丽忠烈王的政治意图

金甫桃

嘉泉大学

原文为韩文，翻译：李金花



提 要

蒙古帝国的出现与扩张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件。蒙古曾经入侵高丽，深刻地影响着高丽。我们将蒙古影响高丽的时期大致分为战争发生时的“抗蒙”时期以及战争结束后“干涉期”。第二次进行的“东征日本”则发生在第二个时期。蒙古希望高丽能够降伏日本，要求诏谕日本，结果诏谕不成，之后蒙古军同高丽军一同讨伐日本，开疆拓土。

过去，学术界倾向于认为“东征日本”是一场由蒙古主导，高丽参与的战争。但是事实上当时的高丽国王（元宗与忠烈王）在第一次远征后，曾怀抱消极回避的态度，但之后又积极地加入作战，态度曾发生转变。本文中，我们不谈“东征日本”事件，而是着重探讨引起忠烈王态度转变的原因，分析忠烈王改变立场的意图以及政治目的。

近来，学术界不断有人讨论13世纪中后期忠烈王的政治立场。最近研究的特征之一就是对于高丽立场的改变。换句话说就是不再强调高丽倚靠蒙古而发起的这场战争，而是着眼于当时在蒙古深刻影响下的高丽以及高丽的国王是如何运用当时的时局，影响高丽-蒙古两国之间的关系。

在这一过程中，忠烈王的地位是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他是高丽的国王，又是高丽蒙古王室联姻第一人，之后又成为蒙古最高地方长官——“征东行省”的丞相。但是做蒙古的驸马，是高丽率先提出的联姻；征东行省虽是由蒙古设立行政机关，但忠烈王也在行省内部拥有自己的权力。换言之，高丽的国王，也就是忠烈王，他凭借着蒙古的力量确立自己的王权，扩大自己的权力，通过成为驸马，丞相，以期达到自己政治上的目的。

1170年之后的100年间，武臣政权，高丽的王权被不断地削弱。1270年武臣政权垮台，王权重新执掌朝政，但是鉴于当时与蒙古之间的关系，高丽改变了诸多现有的机制。忠烈王与忽必烈之女忽都鲁揭里迷失联姻，形成了高丽与蒙古之间的王室联姻，并且依照蒙古的要求，将以中书门下省等6个

部门为中心的官制，降格为由僉议府和其他4个部门组成的体制。另外像达鲁花赤这样蒙古的官员，军队也在高丽常驻。这种变化成为保证高丽王权稳定，扩张的决定性因素。

蒙古曾派遣使臣赵良弼劝降日本，外交接触失败之后，立即准备发动战争。使臣的派遣以及第二次东征日本都得到了高丽的支持。蒙古第一次远征日本，高丽曾在1274年派遣30500人，建船900艘，士兵6000名，水夫6700名。而在1281年第二次远征时，则派出战舰900艘，战士10000名，水夫17000名。所以这样庞大的人力物力支援给高丽带来沉重的负担，高丽内部产生严重的混乱，也曾多次申诉。

如果我们在政治层面上分析忠烈王，可以看出高丽在经济上的诉求与他的政治目的不存在关联。忠烈王虽然曾经申诉远征带来的严重经济负担，却并没有反对出征，反而时常表现出支持的样子。特别是他指出第一次远征失败的原因是蒙古军与高丽军指挥部出现混乱，所以第二次远征时特别强调指挥统一的重要性。他还特别任命高丽的将领为万户职，赐予他们金牌，要求按照蒙古的官制赐予他们指挥权，以保证两军的统一。蒙古准许了忠烈王的要求，并任命高丽王也就是忠烈王为征东行省丞相。从此，高丽王开始兼任行省的丞相。

忠烈王在以下3个方面倍受关注。首先，利用蒙古对东征日本的强烈意愿来强化自己王权，为此，忠烈王还特别强调沿袭蒙古的风俗习惯以及制度。他作为驸马，强调自己是蒙古统治阶级一员，提供了蒙古认证他王权的名分。由第一点延伸出第二点，忠烈王向蒙古请求指挥权，并授予高丽的将领，形成高丽军与蒙古军的一元指挥体系。最重要的是，实际上忠烈王能够将蒙古军事制度里的“万户”，自行任命给高丽将领。第三点，蒙古不仅准许忠烈王对于指挥权的要求，更是任命忠烈王为行省丞相，认可高丽王的贡献。

我们可以说，在东征日本的准备过程中，忠烈王扩大自己王权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并且从忠烈王成为丞相这一点来看，他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自己预期的目标。

随着蒙古进入高丽，蒙古帝国的登场和扩张这一世界性事件对高丽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蒙古对高丽的影响大体上可以分为“抗蒙”为主调的战争时期和战争以后的“干涉期”，始于1219年止于14世纪中后期历经将近两百年的时间。先后策划过两次的“日本远征”属于干涉期。日本远征是蒙古给日本发了要求降服的招諭碰壁后，蒙古率高丽亲自伐日的事件。

过去的主调都认为“日本远征”是由蒙古牵头，动员高丽参与的战争。发言人并不想否定远征中高丽被动员的事实本身。发言人想强调的是，可以看出忠烈王的立场从第一次远征时的消极回避，转变成第二次远征时的积极参与。因此，本文想尝试整理一下态度变化中所隐含的忠烈王的意图和政治目的是什么。

最近的研究方向已经脱离了高丽怎样被动员到伐日的视角，将更多关注点放在高丽怎样利用了该事件。其一、如李命美所主张，高丽王的目的是借助蒙古帝国的威势巩固王位，所以发生了态度变化。忠烈王兼任日本远征推进机构征东行省的丞相一职，由此巩固了国王的地位。其二、得到蒙古帝国驸马身份的高丽王，积极利用了忠烈王的立场所要履行的“助军的义务”。这两种观点虽然多少有些出入，但是都认为忠烈王期待的是蒙古帝国的丞相和驸马等要素带来的政治效果。

此文目的在于，进一步详细考察忠烈王的立场。

1. 日本远征的进行过程

刚开始高丽参与日本远征是为了给身负招谕任务的蒙古使臣带路。1266年(元宗7年)蒙古遣使黑的和弘恩赴日，并要求高丽给使臣带路。高丽派宋君斐和金贊等护送，但是走到巨济岛时由于风浪太大返回了。第二年蒙古委托高丽进行对日本的招谕，于是高丽派了潘阜携带蒙古和高丽的国书去了日本，但是日本未接受招谕无功而返。之后，前前后后有十几波的蒙古人和高丽人被派往了日本，但是都被扣押或杀害，蒙古对日本的外交招谕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

前后六次派遣的使臣都失败后，蒙古决定直接伐日。于是，又在高丽建造战船，又派使臣到黑山岛等高丽南端侦查地形。并且，以解决军粮的名义在高丽设了屯田。1271年(元宗12年)为了管理屯田，还设立了屯田经略司，并将蒙古军派驻到凤州、金州、盐州、黄州、白州、海州等十多处。高丽由于战争已经非常荒废，但是为了配合蒙古的要求不得不苦苦努力。

1274年6月，日本远征准备工作告一段落。经过几年的准备，在东征都元帅府的忻都和洪茶丘的率领下，由25,000名蒙汉军组成的第一次日本远征军起航，高丽也由金方庆任都督使，派8,000名军士、6,700名船夫、900艘战船参战。第一次远征的初期，在博多一带的战斗中蒙军和高丽的联军打了胜仗，但是战争的最终结果却是相反的。此时，金方庆率领的高丽军在博多一带占上风形势非常有利，但是天黑以后忻都主张先撤退，金方庆主张乘胜再战一场。联军最终还是按照忻都的主张先撤退，众所周知，这次错误的决策导致了联军的失败。不管怎样，因为听了蒙古将帅的命令，第一次远征以失败告终，葬身大海回不来的人也多达13,500名，可以说损失惨重。这里需要关注的一点是，高丽和蒙古指挥将帅对战势的判断和措施上发生的分歧。

第一次日本远征遇到台风还没怎么打就败了，不甘心的忽必烈再次向日本派去宣谕使，同时继续准备战争。直到1279年(忠烈王5年)完全征服南宋，也有了一定的余力后，加快了日本远征的步伐。此时，为了打退开始侵略南方沿边的倭寇，也为了加强在蒙古帝国内部的地位，高丽也积极参与了。忠烈王被任命为日本远征的推进机构-征东行中书省的丞相(1280)，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驻扎在高丽的忻都、洪茶丘等蒙古将帅的横行霸道。

但是，高丽不得不再次承担沉重的负担。为了准备远征所需的10,000名军士、15,000名船夫、900艘战船、11万担军粮以及大量的武器，高丽调用了国家的所有生产力。第二次日本远征时，位于高丽的征东行省麾下的高丽军、蒙汉军以及位于中国江南地方的伐日行省麾下的江南军都联合起来攻打日本，但是又遇到台风损

失了10多万人无功而返。

2. 高丽对日本远征的态度：日本招谕以及第一次征伐期为止

发言人在这里要关注的部分是高丽的态度。首先，看一下需要劝降日本时的初期情况。

1) [(丁卯)八年 春正月 宋君斐·金贊與蒙使,至巨濟松邊浦,畏風濤之險,遂還。王又令君斐,隨黑的如蒙古,奏曰,“詔旨所諭,道達使臣,通好日本事,謹遣陪臣宋君斐等,伴使臣以往。至巨濟縣,遙望對馬島,見大洋萬里,風濤蹴天,意謂‘危險若此,安可奉上國使臣,冒險輕進?雖至對馬島,彼俗頑獷,無禮義,設有不軌,將如之何?’是以,與俱而還。且日本素與小邦,未嘗通好,但對馬島人,時因貿易,往來金州耳。小邦自陛下卽祚以來,深蒙仁恤,三十年兵革之餘,稍得蘇息,綿綿存喘。聖恩天大,誓欲報効。如有可爲之勢,不盡心力,有如天日。”](高丽史卷26 世家26,元宗8年(1267)正月)

2) [癸丑 蒙古遣黑的·殷弘等來,詔曰,“今爾國人趙彝來告,‘日本與爾國爲近隣,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漢唐而下,亦或通使中國。’故今遣黑的等,往日本,欲與通和,卿其道達去使,以徹彼疆,開悟東方,向風慕義。茲事之責,卿宜任之,勿以風濤險阻爲辭,勿以未嘗通好爲解。恐彼不順命,有阻去使爲托。卿之忠誠,於斯可見,卿其勉之。”](高丽史 卷26 世家26,元宗7年(1266)11月 癸丑(25))

从以上的案例中可看出,高丽觉得外交上招谕日本这事相当棘手,想尽办法抽身。如果,日本答应外交上的招谕降服蒙古还好说,否则,蒙古为了让日本降服会不惜发动战争,显然高丽直接或间接被卷入战争是避不开的。况且,高丽在一定程度上也猜到日本不会同意降服。这点可以在1268年高丽送往日本的国书“奇装异服的人们突然跟我们一起过海,贵国禁不住会怀疑我们的意图。<中略>无法抗拒忽必烈的命令,只得将蒙古的使臣带到了海边,但是以风大浪高为由拖延时间后,最终返回了。这表示我国对贵国的态度。”(镰仓遗文 no.9845 高丽国牒状)中看出。

在接下来的准备第一次征伐的过程中,高丽曾多次向蒙古反映战争筹备物资已经是无法承受之重。

3. 二次征伐中忠烈王的意图

第二次征伐过程中情况出现了变化。之前都是蒙古要求高丽对日本进行招谕,现在是高丽反过来先提出要伐日。看下面:

3) [王又奏曰,“日本一島夷耳,恃險不庭,敢抗王師,臣自念,無以報德,願更造船積穀,聲罪致討,蔑不濟矣。”帝曰,“王歸與宰相熟計,遣人奏之。”](
<

高麗史>卷28,忠烈王4年(1278)7月甲申(3))

在这里忠烈王在建议忽必烈由高丽先伐日,事实上是忠烈王劝谏忽必烈伐日。当然,上述的对话发生在解决高丽-蒙古之间迫在眉睫的金方庆诬告事件的过程中,有可能高丽不得不表态积极支持蒙古的伐日。不管怎样,这些措辞的前提是高丽愿意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伐日所需的负担,跟第一次征伐时想尽办法逃避负担的态度是有很大差异的。

那么,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围绕着两次伐日高丽的态度发生变化的背景是什么。关于忠烈王对二次征伐表现出积极性的理由,大致上被理解是为改善高丽与蒙古的关系,进一步牵制洪茶丘等在高丽的蒙古势力而不得已的作为。当然,不能否定这点,发言人从宏观的角度也不认为这样的解释是错误的。不过,这可以说明当时高丽的政治背景,如果说是发生态度变化的直接理由则稍显欠缺。

相信一个国王在做决策时,不仅会考虑高丽-蒙古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还会考虑其他方面。因此,准备两次征伐的主体-两位高丽国王的差异应是导致态度变化的直接原因。元宗和忠烈王是父子关系,经过一个世纪的武臣弄权王权被削弱的情况下,两位国王都想回复王权。但是,理解和接纳蒙古的程度上有一些差异。下面的插曲很能说明问题。

4) [幸西北面,迎公主。順安公惊廣平公諱帶方公澈漢陽侯僎平章事俞千遇知樞密院事張鑑知奏事李汾禧承宣崔文本朴恒上將軍朴成大知御史臺事李汾成從行。(a)王責汾禧等不開剃,對曰,“臣等非惡開剃,唯俟衆例耳。”蒙古俗,剃頂至額,方其形,留髮其中,謂之怯仇兒。王入朝時已開剃,而國人則未也,故責之。後,宋松禮鄭子璵開剃而朝,餘皆效之。初,印公秀勸元宗,效元俗,改服色,(b)元宗曰,“吾未忍遽變祖宗之法。我死之後,卿等自爲之。”](高麗史節要 卷19 忠烈王 卽位年(1274)10月)

以上是1274年忠烈王迎接入境高丽的齐国大长公主时,根据蒙古习俗改变发型相关发生的轶事。(a)和(b)中可以看出元宗和忠烈王对改变发型的不同态度。如(b)所示,元宗表示自己无法将发型和服饰改成蒙古式,要求臣僚们要改等自己死后再改。相反,如(a)所示忠烈王先于别人改变了发型,还责备尚未改变发型的李汾禧。这可以理解为忠烈王比他的父亲元宗更努力积极接纳蒙古的影响力。

并且,建议和筹备第二次征伐的过程中,有必要仔细分析忠烈王的建议。忠烈王在准备征伐的过程中,提了七条建议。

5) [王以七事請,“一,以我軍鎮戍耽羅者,補東征之師,二,減麗漢軍,使闍里帖木兒,益發蒙軍以進,三,勿加洪茶丘職任,待其成功賞之,且令闍里帖木兒,與臣管征東省事,四,小國軍官,皆賜牌面,五,漠地濱海之人,并充梢工水手,六,遣按察使,廉問百姓疾苦,七,臣躬至合浦,閱送軍馬。”帝曰,“已領所奏。”](高麗史 卷29 世家 29,忠烈王6年(1280)8月乙未(23))

6) [小國軍民,曾於珍島·耽羅·日本三處,累有戰功,未蒙官賞,伏望追錄前功,各賜牌面,以勸來効。每一千軍,摠管千戶各一,摠把各二,花名,抄連在前。請以上將軍朴之亮,大將軍文壽·羅裕·韓希愈·趙圭·親從將軍

鄭守琪·大將軍李伸·朴保·盧挺儒·安社等十人爲摠管·大將軍趙扑·將軍安迪材·許洪材·金德至·徐靖·任愷·金臣正·李廷翼·朴益桓等十人爲千戶·中郎將柳甫·金天祿·李臣伯·辛奕·崔公節·呂文就·安興·李淳·金福大·車公胤·李唐公·郎將朴成進·高世和·中郎將宋仁允·郎將玉環·桂富·金天固·李貞·徐光純·咸益深等二十人爲摠把。」(高麗史 卷29 世家29, 忠烈王6年(1280)11月 己酉(11))

以上的两条记录中可看出, 忠烈王请求给高丽的将帅授予蒙古的官职, 也举荐了候选人。忠烈王提出了将高丽军将帅任命为万户、赐予牌面等要求。这意味着蒙古官职的授予是在高丽王的要求下发生的, 反映着强烈的忠烈王的意图。

那么忠烈王的意图又是什么呢? 首先, 他提议限制洪茶丘的晋升, 等立功了再赏, 由此看出要牵制洪茶丘的意图。同时, 表面上是授予与蒙古相同的官衔构建统一的指挥体系, 事实上是从蒙古军分离出高丽军避免指挥上的混乱, 更深的意图是本人亲自掌管高丽军指挥府的人事权。

忽必烈悉数采纳了忠烈王的这些建议, 给高丽赐予了虎符等。由此, 忠烈王可以给金方庆等高丽的将帅授予蒙古的官名和印章。

7) [帝冊王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事, 賜印信·又以金方慶爲中奉大夫管領高麗軍都元帥, 知密直司事朴球·金周鼎爲召勇大將軍左右副都統, 並賜虎頭金牌·印信·趙仁規爲宣武將軍王京斷事官兼脫脫禾孫, 賜金牌·印信, 朴之亮等十人爲武德將軍管軍千戶, 賜金牌及印, 趙扑等十人爲召信校尉管軍摠把, 賜銀牌及印, 金仲成等二十人爲忠顯校尉管軍摠把。](高麗史 卷29 世家29, 忠烈王6年(1280)12月 辛卯(23))

1281年3月壬子, 金方慶、朴球、金周鼎等率军赶到合浦, 可见此时任命蒙古官职是伐日所需的编制过程的产物。就是说, 忠烈王要求蒙古军官职位上任命高丽的将帅并获批, 于是担任蒙古官职的高丽将帅们参与了第二次伐日。由此可猜测到, 忠烈王向蒙古要求官职的意图是建立与蒙古军相同的指挥体系, 并行使自己的影响力。

这些现象可以理解为, 忠烈王利用“下赐”万户等蒙古官职或金牌等的形式, 掌握和巩固了军队的统帅权。忠烈王通过行使蒙古官职上的人事权, 不仅掌握了统帅权, 甚至还获取了他们的忠诚。万户等职位的任免或剥夺等人事权, 有效提高了国王对臣僚的掌控力。

还需要考虑的是征东行省的存在。征东行省是蒙古以伐日为目的设立的军司令部性质的军前行省, 这点是很早以前达成的共识。1280年策划第二次征伐的过程中设立的征东行省, 这次设在了高丽, 忠烈王被任命为征东行省的丞相。也就是说, 1280年6月左右, 蒙古开始商议伐日的事宜, 并于同年10月将忠烈王任命为征东行省的左丞相, 12月份又任命为右丞相。日本远征结束后的1283年6月, 忠烈王再次被任命为征东中书省的左丞相, 与阿塔海共同处理征东行省的事务。此时, 忠烈王在征东行省内已经处于最高的位置。

对于只担任高丽官职的大多数臣僚而言, 忠烈王是毫无疑问的唯一命令权

人，也是一国之主。但是，对于行省官等编入蒙古官僚体系的高丽出身的臣僚来讲，高丽王不是“唯一”的君主。事实上，蒙古皇帝的威望和影响力更大。因此，高丽王迫切需要在蒙古官僚体系内确保高位官职，甚至是能对行省的人事权发挥影响力的丞相的地位。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最终决策权人形式上是蒙古皇帝，但是在万户、总管等以军职为首的蒙古官职的任命上，形成了由高丽王推荐的高丽官僚担任的局面。于是，高丽王可以与蒙古官职上的高丽人维持君臣关系，这也是忠烈王积极推动二次伐日的政治目的所在。

结论

忠烈王既是蒙古皇帝的驸马，又是征东行省的丞相，有着高丽国王、驸马、丞相等身份。忠烈王凭借这些身份可以在高丽国内，与蒙古官僚之间的关系中确保自己的威望。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说忠烈王积极利用了蒙古的伐日，尤其是二次伐日。

可以说，忠烈王的意图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效。但是，在乃颜的叛乱中打到平壤，并向忽必烈表示有意助军，这是他为了维持自己作为蒙古王室成员的威望而不得不采取的行动。换句话说，依附蒙古确立和加强王权威望而做出的忠烈王的选择，最终限定了高丽在政治和外交上的斡旋余地。

指定讨论

东征日本中高丽忠烈王的政治意图

[提问者 / 车林多尔济、回答者 / 金甫桃]

提问 / 车林多尔济：

多谢您的报告。按照要求我向您提一个问题。您谈到第二次远征日本时，忠烈王所起的历史作用，您依据的是高丽史的记录，还是其他元史或中国的文献资料？

回答 / 金：

多谢您的提问。基本上是以《高丽史》等韩国史料为中心。中国的史料、特别是《元史》几乎都与高丽方面的描述一致。所以我在处理这段历史时，一般情况下两方面都会阅读，这篇论文基本上以《高丽史》为依据而完成。

提问 / 车林多尔济：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还应该参考其他史料。因为《高丽史》中有错误或者夸张之处。所以有必要研究其他史料。

回答 / 金：

是的。您的意见理所当然。今后我会充分研究其他史料。不过，从高丽方面来看，会有明显强调元宗或忠烈王立场的倾向，我的这篇论文的目标是调查忠烈王的意图与其父亲不同，或许《高丽史》存在过度强调、有所偏颇的问题，但是考察倾向方面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会在完成论文的过程中补充其他史料。

提问 / 车林多尔济：

在解释史料时必须足够重视。因为，部分学

者有夸张解释的倾向。比如说，忠烈王十分接近蒙古皇帝的继承权，相当于（皇帝继承权）的第7位等描述。要知道第7位之前还有很多很多有继承权的人。第7位这个说法容易产生误导，乍听起来会让人觉得很可能继承皇位，实际上忠烈王离开皇帝继承权还有极长的距离，绝对不可能继承皇帝。这些方面还需要谨慎加以研究。

发表论文 8



对蒙战争及讲和过程和高丽政权的环境变化

李命美

首尔大学

原文为韩文，翻译：李金花

提 要

同蒙古的战争、交涉以及最终讲和的过程与高丽内部掌握政权的武臣政权垮台，恢复王权这一过程是连接起来的。此次演讲将讨论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的高丽王权-政权有关的政治、外交方面的环境变化。

与高丽之前的外交对象国不同，蒙古作为游牧国家，与周边国家的建立关系方式从战争开始到讲和阶段都保持着比较强硬的态度。1230年到1240年，与蒙古的战争以及交涉的过程中，高丽方面一直没有完整地回应过蒙古方面的要求，但是一直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回应。这种交涉的结果之一便是高丽宗室的外交政治活动。这种现象与蒙古的首将间直接的会面，重视个人及家族间关系的关系形成方式有关。高丽的王族体制中，包括太子在内，宗室的政治外交活动几乎不会在表面上显露出来，但借由蒙古战争这个契机，高丽宗室的活动开始表象化，而这种活动形式也一直保持到战争结束，也给高丽-蒙古的关系以及高丽王权所处的环境带来了变化。

另一方面，高丽-蒙古之间“完全”讲和的过程与元宗由于武人政权的掌权者林衍而废位后又复位的过程是衔接起来的。这个过程也可以被看成是高丽与蒙古之间的关系导致的高丽王权所处环境变化。在当时的东亚国际秩序中，高丽国王需要受到中国皇帝的册封，但是由于时效性较差，实际高丽国王的即位和退位（或者废免）都是依据高丽的内部情况决定的。但是蒙古接受了当时世子（也就是未来的忠烈王）的请婚和请军，还随军派遣了蒙古的诏使，高丽的王权也通过“实质性的册封”以及“与皇室的通婚”，与蒙古的皇权获得了直接的联系。这使得以往国家间的“册封”变成现实，同时通过通婚这个在蒙古维持政治关系时非常重要的媒介，形成家族之间的联系，给高丽-蒙古之间的关系带来变化。这种变化牵扯着两国，更是给高丽王权所处的环境带来转机。可以说这种变化是引发未来高丽与元朝关系中诸多政治事件的结构性变化。

1. 蒙古的讲和条件、蒙式关系的形成

1231年蒙古入侵高丽，当时处在崔氏武臣专权下的高丽朝廷被迫迁都江华岛。之后长达三十年的时间是讲和和战争的反复，期间蒙古一直坚持几个讲和条件。这里包括，要求将迁到江华岛的首都迁回开京（出陆还都）；国王亲朝、纳送人质、设立邮驿、人口普查、派援军、筹集军粮、设立达鲁花赤等蒙古对属地的一般性要求，通常被称为‘六事’。（凡遠邇諸新附之國，我祖宗有已定之規則，必納質而籍民，編置郵而出師旅，轉輸糧餉，補助軍儲。今者，除已嘗納質外，餘悉未行）

这些要求是蒙古不直接统治附属国的同时，又直接掌控政治、军事和经济相关领域的主要事务所需要的。

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六事’当中的国王亲朝和纳送人质两条要求。为什么要关注这两条呢？因为这是蒙古与其他政治单元形成和维持关系的方式，换句话说，这是游牧社会形成和维持政治网络的方式。统治家族之间延续好几代的通婚也是这种方式之一，显然高丽王室也成了其对象。起初，这倒不是蒙古向高丽提出的要求，而是由高丽世子主动向蒙古提出。因高丽内部发生政变，掌权的武臣集团废黜了元宗，而在收拾这一残局的过程中，高丽世子提出了这一要求，并促成此事。相比之下，国王的亲朝、将王室子弟当做人质纳送为秃鲁花（turḡaḡ）等是蒙古从战争初期开始要求的事情。

蒙古要求纳送人质应该就是为了通过讲和结束战争的同时，将附属国首脑的子弟扣为人质。但是，战争结束这一短期事件之后，双方的关系将长期维系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秃鲁花赴蒙的所谓人质—质子通常会编入宿卫（怯薛，kešig），与蒙古的皇帝、皇室及统治阶级建立人际关系，被重新培养成新的统治阶级。这个时期以及之后送到蒙古的高丽宗室的情况也大致相同。

另外，在讲和过程中要求国王亲朝也是为了政治单元首脑之间建立直接关系，与纳送人质是一脉相承的。在游牧社会，各方势力通过战争聚集和分裂。蒙古国家体系的分立、分权都是通过分封构成，所以对蒙古而言，政治单元首脑之间的直接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蒙古跟战争中的国家或政治单元讲和时，与对方的国王或首脑建立直接的关系（个人之间、家族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就是首脑们亲自面见皇帝表示臣服的‘亲朝’。为了持续维持这样的关系，需要将对方首脑家族的子弟作为人质（秃鲁花）送进蒙古入侍，且必要时需要首脑亲朝。¹

高丽熟悉的方式是以间接方式在国家之间建立关系，例如通过使臣以册封和朝贡等，所以对首脑个人之间、家族之间建立直接的关系的方式绝对是前所未闻的。² 因此，高丽按自己的方式对这些要求进行解读并寻找折中的方式进行应对。这样的应对方式随着双方关系的进展而发生变化，展现了对蒙关系在高丽社会，尤其对政治环境产生的影响。这也是本文关注六事中的这两条的理由所在。

下面分析一下，对于蒙古的讲和条件中所包含的国王亲朝以及纳送人质问题

1 在蒙古，亲朝被理解为诸王或封王臣服于可汗的象征，拒绝亲朝被视为背叛。蒙古的亲朝、朝觐等相关的更多内容，请见李治安1989年出版的《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97-299页。

2 蒙古统治阶级的个人之间、家族之间关系的具体形态及其意义的更多内容，请见金浩东2010年出版的《蒙古帝国和世界史的诞生》，石枕出版社 96-100页。

上，高丽是怎样理解和应对的。并且，简单探讨一下这样的应对方式在两国关系稳定以后是怎样发展变化的，以及这种发展变化所反映的当时高丽-蒙古关系的特征以及政治影响。

2. 对国王亲朝要求的解读和应对宗室的外交活动：讲和条件交涉和使节团的率领者

蒙古在1231年(高丽高宗18年)第一次入侵高丽并签订了讲和条约，但是在高丽迁都到江华岛之后，以此为由马上再一次入侵，并作为撤军的条件要求国王亲自到蒙古面见皇帝，即亲朝。³

这可以分析为第一次入侵后的讲和条约是在没有国王亲朝的情况下签订的，而之后的江华迁都使蒙古察觉到了这种讲和方式的不稳定性。高丽找各种借口没有答应蒙古的要求，而之后每次蒙古的入侵都伴随着高丽国王亲朝要求，这种情形也一直持续到1258年崔氏专权的终结，高丽以太子亲朝的方式完成了两国的讲和。

高丽之所以没有答应国王亲朝的要求，应该是心理上的抗拒和武臣专权等政治状况综合起作用的结果。高丽一方面回避国王亲朝的要求，另一方面又为了谋取暗含于这一要求背后的两国稳定关系，也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讲和条件的交涉过程中宗室的活动以及讲和以后宗室们作为正使率领使节团等现象都说明了这点。

高丽的宗室担任正使率领使节团是与蒙古的关系中出现的独特的现象之一，也是呈现当时高丽-蒙古关系的一个侧面的事例。高丽宗室率领使节团访问蒙古的具体情况整理如下。

〈表〉高丽宗室率领使节团访问蒙古的案例（出自：《高丽史》，《高丽史节要》）

编号	遣使时间	人物	遣使目的
1	高宗26年(1339)12月	新安公 王佺	战争中的交涉
2	高宗32年10月壬午	新安公 王佺	战争中的交涉
3	高宗40年12月壬申	安庆公 王曄	战争中的交涉
4	高宗44年12月	安庆公 王曄	战争中的交涉
5	元宗元年(1260)4月丙寅	永安公 王僖	皇帝即位贺礼
6	元宗2年4月己酉	太子 王諲	阿里不哥平定贺礼
7	元宗6年正月乙未	广平公 王恂	元宗亲朝时盛情的谢礼
8	元宗8年11月甲午	安庆公 王曄	新年贺礼、日本初访报告
9	元宗11年8月戊辰	世子 王諲	圣节贺礼、裴仲孙谋反报告
10	元宗13年正月甲申	济安侯 王淑	定“大元”国号的贺礼
11	元宗14年正月癸亥	带方侯 王澈	许可世子婚事的谢礼
12	元宗14年润6月己未	顺安侯 王棕	皇后、皇太子册封贺礼
13	忠烈王即位年(1274)9月戊戌	济安公 王淑	公主下嫁、国王继承爵位的谢礼
14	忠烈王12年5月庚午	济安王 王淑	皇太子真金过世吊丧
15	忠烈王18年润6月丙戌	世子 王璋	圣节贺礼
16	忠宣王即位年(1298)正月	平阳侯 王暉	许可禅位的谢礼
17	忠烈王复位年(1298)9月	中原侯 王暉	复位谢礼
18	忠烈王29年11月戊寅	济安公 王淑	申请前任国王回国
19	忠肃王7年(1320)6月己巳	丹阳大君 王珣	皇帝即位贺礼

3 高宗19年(1232)11月，上奏蒙古皇帝的陈情表的内容中提到皇帝的诏书内容，并表明高丽在国王亲朝问题上的立场（《高丽史》卷23，高宗19年11月），可见之前收到的蒙古皇帝的诏书上要求国王亲朝。高宗19年11月之前，同年7月曾收到过蒙古的诏书。（《高丽史》卷23，高宗19年7月庚辰朔）

编号	遣使时间	人物	遣使目的
20	忠肃王8年3月	丹阳大君 王珣	改年号、太后册封贺礼

高丽宗室担任使臣被派到蒙古的例子当中，战争交涉中被派了四次，与蒙古达成讲和的1259年以后有16次，可以确认的次数共计20次。其中，元宗在位期间有8次，引人关注的是宗室担任正使的情况都集中在这个时期。尤其，元宗元年(1260)4月派出的使节团是高丽与蒙古讲和以及元宗即位后的首次遣使。

在宗室担任正使率团出行蒙古的情形中最引人关注的是，这些例子大多是涉及到特殊事件的例行性出访。如上所示，宗室率领使节团的出行虽然有新年、圣节贺礼等例行出访，但多数是皇帝平定叛乱的贺礼或者是王室之间通婚的谢礼等关乎特殊事件的贺礼或谢礼为目的的遣使。

在与蒙古建立关系的初期，指派宗室担任正使可能是出于高丽在具有特殊意义和重要性的事情上意欲提升使节团规格的考虑。通常，国家之间以外交为目的遣使中使臣的规格，尤其是正使的规格直接反映遣使主体国在对方国家的关系上赋予多大的意义和重要性。靠什么选定并凸显正使的规格，则取决于遣使的目的以及派遣主体和对象。从高丽前期派到宋朝的使臣人选来看，高丽当时在选拔使臣时的重要标准是家族背景、官品、学识等。⁴从这点上，作为高丽立场，指派宗室担任正使是以家族背景或官品做为选拔正使的标准，想以此尽可能地提高正使的规格，给对蒙关系赋予最大程度的意义和重要性。

可是丽蒙关系之前并没有出现过高丽宗室担任正使的情况，由此可见这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蒙古”这一关系对象的影响。我们可以从由宗室担任使节的初期情况中可以确认这一点。宗室首次担任使臣是1339年(高宗26)新安公王佺的出访。包括这次使节团出访，高宗年间共出现了4次宗室担任正使的例子，这些使节团的出访虽然没有明确记载其目的，据猜测是与当时蒙古作为结束战争的条件所提出的国王亲朝有关。

如前所述，蒙古自第二次入侵以后一直要求国王亲朝。1235年(高宗22)开始的第三次入侵接近尾声的高宗26年(1239)4月和8月，蒙古分两次遣使高丽一再要求国王到蒙古亲朝。同年12月高丽派新安公王佺和少卿宋彦琦到蒙古。⁵之后，高宗的次子，即元宗的弟弟安庆公王湑也是分别于1253年(高宗40)和1257年被派到了蒙古。这也是当时刚即位的宪宗回应蒙古军事入侵并要求国王或王子(应该是太子)亲朝而安排的出访。⁶由此可见，宗室担任使节出访是为了回避国王的亲朝要求，又为了避免受迫于蒙古而采取的随机应变之策。当来访的蒙古使臣要求高宗移驾江外亲自迎接时，高宗也没有亲自出迎，而是委派新安公王佺迎接⁷，当蒙古军队入侵并要求国王和太子亲自出来投降时，也代派了永安公王僖。⁸

但遣使宗室看来并没有高丽所期待的那样，能完全替代国王或太子的亲朝或投降。1239年(高宗26)出使蒙古的新安公王佺于第二年9月回国，传达了蒙古皇帝要求国王亲朝的意思。安庆公王湑是王子，于1257年(高宗44)按照王子入朝的要求

4 朴龙云，1995·1996《高丽和宋之间交聘的目的和使节的考察(上)·(下)》韩国学报21·22。

5 《高丽史》卷23，高宗26年4月、8月、12月。

6 《高丽史》卷24，高宗40年8月己未、庚午，10月辛未、12月壬申；44年7月壬申、12月。

7 《高丽史》卷23，高宗37年6月庚子。

8 《高丽史》卷24，高宗45年6月丙申。

入蒙，第二年蒙古再次要求太子亲朝。并且，两国之间的讲和最终还是通过太子王僖(后来的元宗)的亲朝才尘埃落定。这表明在当时，蒙古希望与国王、太子直接建立关系，并没有要求遣使宗室。但是，高丽是非常排斥国王或太子亲朝的⁹，于是站在‘高丽的立场’折中一下蒙古的要求选择了遣使宗室，且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讲和以后。

元宗亲自入朝蒙古促成讲和，并随后成为了高丽国王。元宗为了祝贺世祖忽必烈即位，在宗室永安公王僖的带领下派出了即位之后的第一支使节团。不久之后，又为了庆祝忽必烈打败了曾经一起竞争过王位的阿里不哥，派太子王湛担任正使出访蒙古。如表所示，这种遣使活动之后也有过好几次。

在高丽国王心理上抗拒亲朝，且在当时，尚未有通婚等蒙古式关系建立法介入丽蒙关系。鉴此，元宗的考虑方式应该还是停留在传统方式上，想提升使节团规格，以此来维持与蒙古的和平。从高丽提升使节团规格的方式来看，与过去的使臣人选标准相比大幅提升正使的规格，再结合当时‘高丽的理解’遣使宗室。元宗自己在太子时期有入朝的经验，也熟悉作为太子入朝的始末，所以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以高丽曾经经历过的与中国王朝之间的关系以及使节团的组建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融入蒙古建立关系的方式所含的特征，设计了折中的遣使宗室的方案。

这从侧面上表明，在蒙古式关系的基础上看待高丽问题的蒙古以及浓厚的东亚式关系的脉络上看待蒙古问题的高丽之间，还没形成一种完全达成共识的稳定的关系，也可以说反映了元宗和高丽对这种关系的态度。元宗时期的丽蒙关系中，以首脑个人或首脑家族之间形成和维持直接关系的要素没有直接发挥作用，而是通过例行的、惯例性使节团出访等形式的国与国的关系间接表现的。忠烈王时期以后随着王室之间的通婚或国王亲朝等引进更多直接关系的过程中，遣使宗室的方式逐步退出了政治舞台。如上表所示，遣使宗室的例子集中出现在元宗时期，忠烈王时期以后，尤其1298年忠烈王和忠宣王之间发生的重祚事件以后几乎看不到。因为忠烈王时期以后国王自己与蒙古皇室通婚，也非常愿意亲朝，以个人之间、家族之间关系为中心的蒙式关系要素全面凸显，所以没有必要借助遣使宗室这种折中方案。换句话说，高丽和蒙古的关系中例行的、惯例性使节出访所占的比重逐步缩减。这是使节团本身增加了务实性内容的比重和意义的结果，也是相比于稳定两国之间的关系，定期提醒和维持这种关系的主要手段只有使节团出访，尤其只有例行的、惯例性使节出访的过去，高丽国王与蒙古皇帝和皇室直接建立的关系等连接丽蒙关系的其他手段登场并开始占据重要的比重，所以也没有必要提升使节的规格来强调关系的重要性。

另外，忠烈王时期以后遣使宗室的例子显著减少的背后是，丽蒙关系中宗室所具有的意义和比重问题、丽蒙关系的性质以及高丽权力结构问题、国王威望的变化问题。通过册封和朝贡建立的东亚传统国家之间的关系要素，以及通过通婚建立的蒙古式(游牧社会的)个人之间、家族之间关系要素相互有机结合的就是丽蒙关系。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的蒙古附属期，复杂的权力结构下发生的高丽国王的威望变化分为三种。第一、高丽国王作为蒙古皇帝的诸侯，其威望不仅在外交上，也在高丽

9 讲和以后高丽仍然对国王亲朝持负面的态度，这在元宗5年蒙古提出的亲朝要求的回应中可知一二。(《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5年5月)

内部具有了实质性意义。第二、蒙古皇帝作为实质的最高权力存在，皇帝赋予权力的结构下，高丽国王需要与蒙古皇帝/皇室建立类似关系的其他权利主体竞争。

第三、通过上述过程，王朝体制下高丽王室原本拥有的血缘正统性的权威比重多少有些缩小。这些变化是过去在册封-朝贡关系中形式上存在的高丽作为诸侯国、国王作为诸侯的威望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再加上高丽王权很大程度上依赖驸马的地位（通婚这层关系）形成‘非常特殊的，变动性大，又可以多元形成的关系’，还通过行省丞相这一职位，将一定部分的官僚属性移入到高丽国王威望的结果。国王的威望变化可以说是‘相对化’的过程，因为之前在高丽的政治单元内按照自己的逻辑存在的最高权力机构-王权，在进入蒙古附属期后，不得不与其他权力主体之间竞争。基于丽蒙关系的权力结构是1269年元宗复位后形成的，但是高丽国王和臣僚认识并利用与蒙古的关系及其权力结构全貌的过程是分阶段完成的。高丽国王和臣僚们在1298年忠烈王和忠宣王之间上演的重祚事件中，清晰地认识到蒙古附属期权力结构的特征。高丽国王和臣僚们都通过重祚事件认识到，高丽国王与皇帝建立的关系出现问题时，国王有可能被废。忠肃王时期发生的拥立藩王的运动告诉人们，即使不是王室直系，只要与皇帝和皇室建立的关系比国王和皇帝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和坚固时，可以挑战国王的王位。¹⁰因此，让宗室担任出访蒙古的使节，不得不说是有些冒着政治风险的行为。忠烈王时期后遣使宗室的例子明显减少，故此猜想蒙古附属期对权力结构的认识是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3. 人质（秃鲁花, turɣaɣ）的派遣和宗室参与宿卫

担任使节出访的宗室活动在元宗时期以后，尤其是忠烈王时期的重祚事件以后几乎看不到，高丽宗室的政治、外交活动通过另一种渠道继续。其中，值得关注的是蒙古的宿卫（怯薛, kešig）制度。

高宗28年(1441)4月，谎称宪宗的后嗣-永宁公王俊是国王的儿子，与10位贵族子弟一起作为人质送到蒙古。这应该是蒙古的‘6事’之一-‘纳送人质’的回应，也是为了平息上一年蒙古提出的国王亲朝要求。后来，王俊并非国王儿子的身份被暴露，但是他在蒙古朝廷中的活动得到认可，继续停留在蒙古甚至做到了辽沈地区总管的位置。起初高丽在人质纳送上有点浑水摸鱼的嫌疑，不过还是按照蒙古的要求继续纳送人质，派去的高丽宗室都加入了宿卫。宿卫是与成吉思汗保持密切的关系，最受信任的血盟(nöker)家族以及新臣服的政治单元首脑的子弟或亲族包括在内的蒙古皇室的护卫队，这是蒙古帝国的核心统治阶层。将其他政治单元首脑的子弟召唤来参与宿卫，一方面是蒙古为了担保其他政治单元的臣服，另一方面是为了将这些人培养成新的统治阶层。¹¹并且，参加宿卫的人质也有机会结识蒙古的政治势力，扩大自己的政治根基。

10 关于蒙古臣服期的权力结构，请参照李命美2016年出版的《13-14世纪高丽·蒙古关系的研究-作为征东行省丞相、驸马的高丽国王，其综合地位的探究》，慧眼出版社。

11 森平雅彦，2001，《元朝宿卫制度与高丽宗室-关于高丽和元的关系中人质的意义》，史学杂志第110编第二号。

高丽的情况也是一样的。除了年幼的时候即位的忠穆王和忠定王之外，其他国王都有即位之前的宿卫经历。忠烈王是从元宗12年(1271, 世祖至元8)开始到元宗15年(1274, 至元11)继承王位之前，经历过重祚的忠宣王是在忠烈王16年(1290)-24年(1298, 成宗大德2)正月期间，以及同年8月被废以后1308年复位(武宗至大1)之前，同年11月回到蒙古后又发配到西藏，直到忠肃王7年(1320, 英宗即位)为止当过宿卫。忠肃王是忠宣王复位后被召到蒙古当宿卫，直到忠宣王5年(1313, 仁宗黄庆2)继承王位。忠惠王是忠肃王15年(1328, 天顺帝致和1·明宗天历1)开始到17年(1330, 文宗至顺1)期间当宿卫后回来继承了王位，但是忠肃王复位后再次被召去当宿卫，后来由于个人生活不检点，忠肃王5年(1336, 顺帝至元2)被送回高丽。恭愍王也是忠惠王复位后被召到蒙古当宿卫，直到1351年继承王位。¹²

参与过蒙古宿卫的高丽宗室不局限于世子，起初非王室直系的人物常被当做人质派到蒙古。¹³从上述高丽国王的例子中也可观察到，像忠肃王和恭愍王都不是世子却被送到蒙古当过宿卫。忠宣王的次子-忠肃王在忠宣王复位后，与兄长王鉴(世子)一起被招过去当了宿卫。这是因为蒙古要求两位王子一同前行。¹⁴恭愍王也是兄长忠惠王复位后当过宿卫，但并不是因为世子身份。虽然最终没有落实，但是恭愍王即位后召唤忠惠王的庶出-释器也有很大可能是为了把他吸收到宿卫。

现在无法清楚地知道蒙古把不是世子的高丽宗室吸收到宿卫，是不是为了培养下一任国王继承人，以防高丽政局的变动。不管怎样，高丽的臣僚们都相信被蒙古召去当宿卫的宗室将是下一任王位继承人。当王祺(后来的恭愍王)被召入宿卫时，高丽的臣僚们称他为大元子。¹⁵元子原指国王的长子，并不是说元子就是世子，就是未来的王位继承人。高丽的臣僚们非要将忠惠王的弟弟-王祺称为大元子，可能是因为臣僚们觉得他虽然没有被册封为世子，但是在蒙古当过宿卫就将具备下一任继承人的威望。大家都认同宿卫制度提供王位继承人的候选人资格，营造执政的政治环境，而过去这个角色是由太子府担任的。

光宗时期引进的太子制度分为册封仪式和东宫官的运营。通常把在位国王的长子册封为太子，赋予以血缘正统性为基础的权威，而东宫官的任命和运营是为了提前打造太子即位后行使王权的政治环境。东宫官本身是为了负责太子的教育和护卫，并培养太子的国王资质，也是为了事先搭好将来治理国家所需的领导班子。通过史料可以确认，担任东宫官的人物通常是当时已经在高位官职，就算当时不是高管，在太子继位后还是会担任高位官职。¹⁶况且，太子制度可以避免追逐王位导致的政局分裂，也有助于稳定当前国王的政治根基。太子是国王册封的，东宫官的构成中也可以看出，太子的政治人脉基础实际上包括在国王的政治根基之内。

但与蒙古建立关系之后，高丽的太子制度开始有了一些变化。首先，王位继承人太子被降级为世子(诸侯国的继承人)。从高丽前期的例子中发现，太子的册封

12 入职宿卫的期间通常以年度为单位标记，暂时回国的期限没有标记。高丽国王在即位前参与宿卫的情况以及高丽宗室参与宿卫的更多内容，请见森平雅彦的上述论文。

13 与蒙古讲和之前的高宗28年(1241)作为人质送到蒙古的永宁公王綽、忠烈王时期的带方公王澄及其儿子中原公王显就是这种情况。此外，从忠宣王手中继承藩王地位的王嵩，以孙子的身份继承藩王地位的王笃瓘不花也当过宿卫。

14 《高丽史》卷124，尹硕传。

15 《高丽史》卷38，恭愍王总书忠惠王后2年5月。

16 金昌谦，2008，《高丽显宗时期东宫官的设立》韩国史学报，33页。

是分阶段完成的。通常是将当前国王的长子立为太子，为太子任命东宫官组建太子府进行培训，然后在适当的时期册封为太子。立太子到册封太子的时间是没有固定的。元宗时期到忠烈王时期世子制度的运营类似于高丽前期。忠宣王时期后世子制度名存实亡，几乎起不到稳定王权以及顺利完成权力交接的作用。

有记录显示，忠宣王的长子-王鉴和次子王熹(后来的忠肃王)分别在1310年(忠宣王后2)正月和1313年(忠宣王后5)3月以世子身份继承了王位，可见两位都是世子。两位当世子的时期而言，据推测王鉴是忠宣王复位的1308年8月以后到1310年正月以前，弟弟王熹是王鉴去世的1310年5月以后到以世子身份继承王位的1313年3月以前。但是，忠宣王的两位王子，尤其是继承王位的忠肃王不仅没有相关的册封记录，也没有发现组建世子府的记录。那以后的世子情况也都差不多。

记录显示，忠肃王的长子(世子)王禎(后来的忠惠王)是1328年(忠肃王15)以世子的身份派到蒙古当了宿卫，但是没有发现世子的册封或世子府的组建等相关内容。有可能是因为忠肃王与藩王发生纠纷被召回蒙古直到1325年才回国。但是，1328年王禎以世子的身份派到蒙古当宿卫之前有三年的时间，并且与藩王发生王位继承纠纷以后，为了稳定政局册封世子以及组建世子府等动作都是情理之中的，但是却没有相关的记录，这点与元宗时期或忠烈王时期的世子册封和相关制度的运营是有区别的。

继承王位的忠惠王的长子忠穆王也没有世子的记录。考虑到忠穆王即位时只有8岁，可能是因为太年幼忠惠王在位时还没立为世子。还有，忠宣王复位后虽然将长子立为世子，但是事实上几乎都没有打造政治根基所需的世子府的组建或确定世子地位的世子册封等。当然，这些有可能只是记录上的问题，但是考虑到太子或世子作为正式王位继承人的威望时，册封仪礼本身具有重要的意义。原来的惯例是太子册封礼之后大赦天下，或将太子的生日指定为节日进行庆祝，所以实际册封以后都不留记录的情况本身值得推敲。另外，忠定王和恭愍王都不是前任国王的儿子，这可能是他们没有成为世子的原因。

尤其是忠宣王时期以后太子/世子制度没有正常运营的背景来看，该制度底层蕴含的王位继承相关的传统观念所具有的权威和规定性，在与蒙古的关系中很大程度上被削弱。这样的变化理所当然地对围绕高丽王权的政治环境带来巨大的变化。

在过去的王朝体制下，虽然太子的权力仅次于国王，也不会威胁到王权，是因为太子的权力来自于国王，其政治根基也直接挂钩到国王的根基。相比之下，通过宿卫制度形成的世子或王位继承候选人的势力根基，与国王的势力根基发生交集的同时还有差集，这部分差集随着宿卫期间以及宗室的势力会扩张。但是，下一任王位继承人不在高丽境内，在蒙古朝廷入职宿卫的情况下，国王无法控制继承人独立培养势力的过程。

高丽国王甚至都掌握不了反复上演的继承纷争中被废国王的命运。分别在1298年和1332年被蒙古废黜的忠宣王和忠惠王都被召回蒙古，再次经过宿卫期间后，分别在父王去世后复位。1332年废黜后再次入职宿卫的忠惠王，以个人生活不检点为由送回国内例子中看出，将他们召回蒙古入职宿卫的很大的目的是回炉重塑。不管蒙古的意图是什么，对废黜国王的上述措施不仅阻止现任国王掌握前任国王的命运，还留下前任国王复位的可能性，促使高丽权力中心的二分化，制约了国王的王权。推行所谓‘反元改革’的恭愍王给忠惠王的庶子释器扣上谋逆罪试图

诛杀，后来要求送还当时在蒙古的忠宣王的孽子-德兴君塔思帖木兒的例子等，都是为了打破蒙古附属期的权力结构。

另外，宿卫制度还影响到了围绕国王的人际关系网，换句话说，国王和臣僚的关系。世子或具有王位继承机会的宗室在蒙古当宿卫时，有高丽臣僚随行，他们的作用类似于过去太子府的东宫官。王位继承人不是在高丽境内与当前的政权关系密切的臣僚建立关系打造其政治根基，而是在远离高丽的蒙古，短则几年，长则十年的期间与长期伴随左右的随行臣僚以及蒙古内势力建立关系打造其政治根据。王位继承人即位后，这些随行的人物成为国王的左膀右臂构成主要的政治根基是众所周知的事实。¹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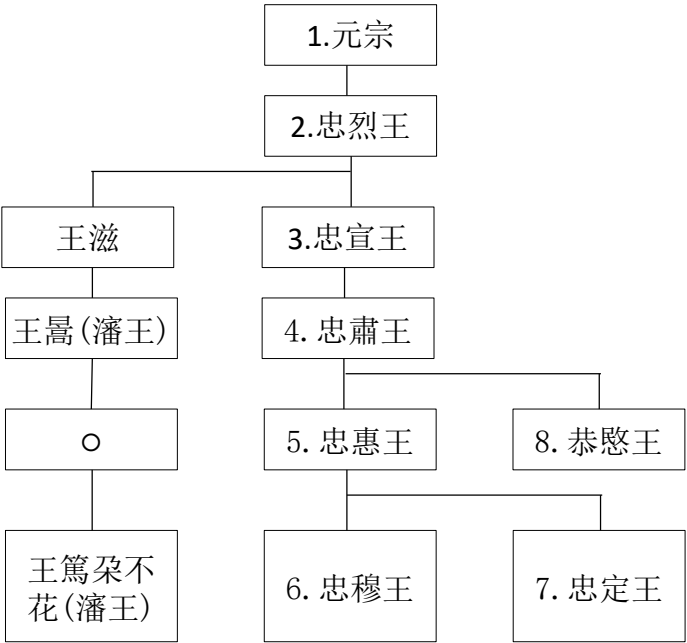
随行臣僚中的一些人自己也加入宿卫，而且世代加入宿卫。与蒙古的关系中宿卫制度原来是高丽国王在政治上建立自己的核心人际关系网的重要渠道之一，同时也打开了臣僚摆脱国王的控制，直接与皇帝的人际圈发生关系的可能性。过去以国王为制高点的人际关系网围绕皇帝重组。

4. 结束语

蒙古在丽蒙关系中除了采用东亚国际关系中常用的所谓的‘册封-朝贡’模式外，试图适用游牧部落之间的关系建立和维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首脑以及首脑家族之间建立直接关系的几种模式。长达三十年的战争过程中出现的国王亲朝以及纳送人质等讲和要求是在这样的脉络下提出的。尽管高丽没有积极响应这些要求，但是也根据自己所熟悉的国家间的惯例做了相应的解读和回应。在这个过程中，高丽宗室和太子的政治外交活动非常凸显，这在蒙古之前的关系中是几乎看不到的。

高丽-蒙古的关系初期，宗室或太子/世子的政治或外交上的活动，主要是为高丽的利益服务的。比如，战争时期被推出来担任讲和谈判的主体，担任正使率领使节团出访等，起初作为人质送走的旁系宗室或太子/世子的活动也是为了国家利益。随着两国关系的进展，蒙古皇权成为实质最高权力后，局面发生了变化。权力的大小取决于与皇权的亲疏，这层关系不仅包括1:1的君主对君主的关系，还包括1:多的个人之间、家族之间的关系。高丽国王即位后在王权的行使和维持中不仅要依赖于蒙古皇帝、皇室的亲近关系，还需要与形成类似关系的其他权力主体进行竞争。随着世子在蒙古朝廷效力于宿卫，高丽国王再也无法掌控世子的命运及其政治上的人际关系，而且频繁上演的重祚中，被废的国王也会被召到蒙古效力于宿卫，现任国王无法掌控被废的前任国王的命运。这样的权力结构下，高丽的宗室或世子在政治上没有必要一定跟高丽国王同进退共命运。朝廷擅自解读蒙古的要求遣使宗室的作法也显著减少。但是，蒙古与其他政治单元之间普遍使用，且构成帝国运营根基的宿卫制度下，宗室/世子的政治活动持续展开。通过首脑个人之间或统治家族之间直接建立关系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应用到高丽，影响了围绕高丽王权的政治环境。这样变化又是触发丽蒙之间各种政治事件的结构变化。

17 关于蒙古臣服期亲信势力的更多内容，请参照金光哲，1991，《高丽后期世族阶层的研究》，东亚大学出版社；李益州，1996，《高丽和元朝关系的构造和高丽后期的政治体制》，首尔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



< 参考资料 > 蒙古附属国时期的高丽国王位继承图

指定讨论

对蒙战争及讲和过程和高丽政权的环境变化

[提问者 / 孙卫国、回答者 / 李命美]

提问 / 孙卫国：

其实关于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王朝这一点，可能在座的学者们也未必同意，但是在西方这是一个问题。我们中国学者一般都会讨论元朝或者蒙古帝国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问题。昨天我们就提到了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的确宋和唐有很大的差别，但我们要知道宋和明之间的差别也是非常大的。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元朝的影响非常大。有些中国学者指出，元朝对中国历史影响巨大，是因为蒙古帝国把草原民族的人身依附关系带入了中央王朝的制度中。在宋朝，君臣关系是非常宽松的，而在元朝君臣关系变成主奴关系，到了明清，君臣关系就变得非常严格，君主地位非常高，朝臣地位非常低。这便是人身依附观带入到中央政权的影响。

谈这么多是因为想说李命美教授的文章，是把这种人身依附关系放入到了讨论源于高丽的宗藩关系之中，因为他特别讨论了宿卫制度，也就是怯薛制度。宿卫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私人关系，王子、或者国王、或者世子，到宫中去当侍卫，这种关系恰恰强化了两国之间的私人关系，把宗藩国与国的关系加入了个人、家族、与姻亲的关系，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给中国的宗藩关系增加了新的内容。在元和高丽形成了一种姻亲关系，或者用另一个词叫做舅甥关系，这是李命美教授的文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也让我有很大的收获。

我在这里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其实是跟

我自己的论文有关的，我们知道尽管高丽王朝是以佛教立国，但是儒教的影响也非常大。按照儒家的华夷观的思想，蒙古族建立的蒙元朝应该是算夷狄，这样的话对于高丽王朝的正统性的论述会受到影响。朝鲜王朝在臣服清朝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是反清的，甚至有北伐的思想，这种思想在高丽王朝的时候没有那么强烈，但是影响还是有的。我不知道高丽的国王和儒臣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可不可以请李命美教授给我提供一点指教。

第二个问题就是讨论宿卫制度对高丽王朝政局的影响。其实宿卫制度对于元朝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高丽的世子到了元朝宫廷，长期生活在宫廷之中，参与到元朝宫廷的政治斗争之中，所以说宿卫制度是一把双刃剑，这篇文章里面提到了宿卫制度对于高丽的影响，那么对元朝又有怎样的影响呢？谢谢。

回答 / 李命美：

感谢您提出非常好的问题。我认为您提了两个大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对受儒教影响很大的高丽来说，蒙古政权从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野蛮民族的政权。而对这个野蛮民族的政权，高丽的态度为什么跟后来的朝鲜不一样，没有表示反对？这个问题如何解释？我认为，首先高丽王室基本上通过通婚做了蒙古的驸马，态度很积极，就像您刚才提到的那样，实行了以融合为目的的中国化，特别是两国关系稳定后，我认为他们在认识上并没有把蒙古当作野蛮民族。

这是我阅读史料后得到的感觉。史料中有不少他们对战争时期蒙古使节所采取的野蛮行为表示反感的记录，但是关系稳定之后，就没有了这样的内容。所以我觉得高丽人并没有认同蒙古使节的野蛮行为。通观各种文集资料，元世祖忽必烈或许有他作为大汗的身份认同，在他以后的年代里，蒙古皇帝实现了汉化，引进并实行了很多中国式统治方法。所以高丽的文人虽然不认为他们是中国，是非汉民族王朝，但是认为蒙古在文化上实现了中国化。因此，没有出现像朝鲜时代对待清朝的反感。

其次是有关宿卫制度给高丽政权和元带来的影响。有关对高丽政权的影响，我刚才提到高丽与中国的册封朝贡关系一直持续，到了元代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讲，蒙古皇帝有意识地册封或废除国王，不过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很明显的个人关系。另外，不管蒙古方面的意图如何，把加入宿卫的宗室当作王室的继承人的认知过程中，在身分意识方面也带来了巨大变化。在高丽，母方原本身分地下的话，她生下的孩子孽子（妾所生的孩子）没有王位继承权。但是，到了这个时期，在高丽的身分制度下没有王位继承权的孽子，只要加入宿卫，或者通过与原皇室的关系，就会有这个可能，而且这样的情形逐渐增多。而高丽的宗室如果加入元的宿卫制度，受到元的影响的最典型事例应该是忠宣王。忠宣王世忠烈王的儿子，也相当于忽必烈的外孙。他虽然长期生活在元，但是在拥立元武宗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上是我的回答。

发表论文 9



浅析北元与高丽关系—以禑王时期关系为中心

其林道尔吉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原文为韩文, 翻译: 李金花]

提 要

1368年至1388年间, 元朝失守首都, 退守北方, 这段时期的元朝称为“北元”。北元时期是一个中原没有明显的统治者, 很难判断时局的过渡时期。北元与高丽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恭愍王时期关系”和“禑王时期关系”。恭愍王时期, 高丽在明与元进行角逐的时候, 实行强化自主性的政策。1369年, 恭愍王政权断绝与元朝的关系, 与明朝建立事大关系。不仅如此, 还讨伐元朝领土, 显示出敌对态度。恭愍王这样的行为被认为十分突然, 而且有些性急。但是与此同时, 事实上恭愍王又并没有完全切断与北元之间的联系, 一直维持着并行的关系。

1372年战争结束后, 北元恢复国内外局势的安全, 开始与高丽进行积极的外交活动。但是由于恭愍王坚持亲明政策, 最终对高丽的怀柔政策以失败告终。

而禑王继任恭愍王之后, 高丽与北元之间的关系又出现了变化。高丽不仅维护与明朝之间的关系, 还试图重建与曾经断交的北元之间的关系。但是遭到反对势力的阻挠, 历经曲折, 最终还是成果恢复建交。

高丽对北元重新建立外交关系, 是对恭愍王单方向外交政策的修正, 也能够牵制明朝, 符合北元与高丽的实质性需要, 是维护当时东亚势力均衡的努力成果。

在本文中, 我们将整体探讨禑王时期, 北元与高丽关系的促进过程, 以及这段关系对当时东亚的历史产生的影响和结果。

1. 高丽对北元外交路线的变化

北元和高丽之间的关系分为“恭愍王年间的关系”和“禑王年间的关系”。恭

愍王时期趁元朝和明朝展开角逐，高丽采取了加强自主性的政策。1369年恭愍王政权与元朝断交，与明朝建立了事大关系。不仅如此，还出兵征伐元朝的领土。显然，恭愍王的措施是非常突然，也是操之过急的。其实，恭愍王与明朝建立事大关系时还没有彻底断绝与北元的关系。

1372年前后，北元的内外局势趋于稳定，对高丽也频繁开展了外交活动。但是，恭愍王固守亲明政策，北元对高丽的怀柔政策未能成功。

恭愍王之后的禡王年间开始，北元和高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恭愍王遇刺后北元将瀋王脱脱不花任命为高丽王，也许当时流传的北元替换国王的传言是真事儿。固守亲明外交路线的恭愍王于1374年9月遇害后，恭愍王主导的亲明外交路线陷入了混乱。¹

恭愍王遇弑的同年11月左右，派到高丽征用贡马的明朝使臣-林密、蔡斌等在回国的路上到达开州站时，护送官金义杀掉明朝使臣蔡斌及其儿子后，劫持林密逃到了北元。²作为请谥/承袭使、告讞使被派到明朝的使臣们，听到消息后中途返回。于是，高丽和明朝的友好关系事实上结束了。之后害怕被追责的大臣们都不敢担任使臣出访明朝，高丽就没机会将恭愍王的遇害和明使臣的刺杀事件向明朝给出合理的解释。因此，难以向明朝通报禡王的王位继承事实并得到承认。

1374年11月，纳哈出派文哈刺不花送来了两头骆驼和四匹马³，这是恭愍王遇刺后从北元来的首批使臣。恐怕北元是想通过使臣了解一下恭愍王死后的高丽局势。

一个月后的12月份，李仁任政权将判密直司事金湑派到北元通报恭愍王的丧事，⁴这样恭愍王遇害的事实先于明朝通报给了北元。禡王即位后，李仁任政权将明朝和北元都视为事大关系的对象国，要求册封禡王。换句话说，恭愍王晚期的一边倒的亲明外交路线发生了变化。⁵

但是，将金湑派到北元的目的是为了通报恭愍王的丧事，跟禡王的册封无关。毕竟通告丧事和申请批准王位继承是两码事。高丽希望在通报恭愍王丧事的同时，将持续到恭愍王时期的亲善关系延续下去。但是，北元反过来利用高丽先派使臣的机会开始插手禡王的册封。之后发生的事情也证明了这点。

禡王元年(1375)正月，纳哈出遣使高丽正式插手此事。纳哈出问道：“先王没有儿子，是谁继承了王位？”纳哈出这么问是因为北元知道恭愍王没有可继承王位的儿子，已经将瀋王髡的孙子脱脱不花封为高丽王。虽然，李仁任等采取了与明/元都建交的两面外交路线，但是反对王权上听从北元的安排。

同年4月，李仁任率众臣到孝思观向太祖的魂灵发誓，“本国的无赖之徒挟瀋王之孙在北疆垂涎王位，我等同盟的臣子们将誓死保卫新君主。如有违，必遭天谴和宗庙降罪。”⁶李仁任等的意思是反对将瀋王拥立为高丽王，丝毫不能动摇自己所拥戴的禡王的地位。

1 金顺子，“韩国中世的韩中关系史”，慧眼出版社，2007，82页。

2 《高丽史》卷133、列传46、辛禡1,11月。

3 《高丽史》卷133、列传46、辛禡1,11月。

4 《高丽史》卷133、列传46、辛禡1,12月。

5 金顺子，“韩国中世的韩中关系史”，慧眼出版社（2007），83-84页。

6 《高丽史节要》卷30、辛禡元年4月。

同月，判书朴思敬从北元回来报告明德太后。

纳哈出说道，“贵国宰相派金义传话，国王驾崩却没有后嗣，愿将瀋王奉为国王。于是，皇帝将瀋王封为贵国的君子。如果先王有儿子，朝廷没有必要一定派瀋王。”⁷

听罢，恭愍王的母亲-明德太后召仁任曰：“宰相遣金義如元，予聞此言久矣。卿等獨不知乎”⁸至于这里提到的朴思敬什么时候去的北元，没有相关的记录。部分学者认为应该是派到北元的金湑的副使。⁹

刺杀明朝的使臣逃到北元的金义的部下刚好回到了高丽，李仁任和安师琦厚待他。朴尚衷上疏曰：“金義殺使之罪，在所當問，宰相待其從者甚厚。是師琦噉義殺使，其迹已見。今若不正其罪，社稷之禍，自此始矣”¹⁰

原来这份上疏一直保留着，此时太后将上疏下发到都堂，并下令把安师琦抓入大牢。安师琦听闻逃到他府拔刀自刎，众人一拥而上乱刀砍死。¹¹静观事态发展的李仁任说：“金义被派到元朝都是赞成事康舜龙、知密直赵希古、同知密直成大庸指使的。”然后，把这些人统统流放边境。¹²

接下来的同年4月，高丽将判密直李子松任命为西北面都巡问使兼平壤尹、将赞成事池邲任命为西北面都元帅、将门下评理柳渊任命为东北面都元帅，下令分别征集兵丁防范北元的入侵。不久后接到边境局势平安的报告后立即停止征集兵丁。¹³

高丽的压力不仅来自于外国，国内也有有意接应瀋王的势力。僧小英秘密派几个手下去给北方的瀋王送信，“今國家，臣弑其君，主諛臣諂，國柄專在權臣，若引兵來，大事可成。”¹⁴。还有，禡王元年(1375)9月，泥城元帅崔公哲麾下的200多人造反杀害军民过了江（鸭绿江）。¹⁵这些案例都说明禡王即位初亲元势力的活跃。

在这样的局势下，李仁任政权需要不择手段阻止瀋王被拥立为高丽国王。1375年4月李仁任欲百官联名上书北元的中书省。文中写到：

师祖皇帝成就王业时，本国的忠敬王率先入朝受皇帝的恩典，皇帝以贵朝廷的世袭王和驸马之礼对待并授予了王位。还将公主嫁给忠烈王招为驸马，后来生下了忠宣王，忠宣王又生下忠肃王，都一一世袭了王位。但是，英宗皇帝时期有过江阳君王滋的儿子完泽秃 (Oljeitu)-瀋王曷，他是我国王室的旁系，却妄想争夺王位，多亏贵朝廷慧眼而未能如愿。

还有，先王伯颜帖木儿就是作为忠肃王的亲儿子袭位，并在其24年通过遗诏传位给亲儿子-元子禡。原本派判密直金湑传先王的讙音，未曾想回来报完泽秃瀋王的孙子脱脱不花(脫脫不花)虽并非嫁到我国的公主的后孙，却痴心窥视王位。

7 《高丽史》卷126，列传39，姦臣2，李仁任：“納哈出謂臣言，爾國宰相，遣金義請云，王薨無嗣，願奉瀋王爲主故，帝封爲爾主。若前王有子，朝廷必不遣瀋王也。”

8 《高丽史节要》卷30、辛禡元年4月：“太后召仁任曰，宰相遣金義如元，予聞此言久矣。卿等獨不知乎。”

9 池内宏，《高丽末与明朝以及北元的关系》史学杂志，29-1、2、3、4/1917，满鲜史研究中世第三册，1963，282页。

10 《高丽史》卷112，列传25，朴尚衷：“尚衷上疏曰：金義殺使之罪，在所當問，宰相待其從者甚厚。是師琦噉義殺使，其迹已見。今若不正其罪，社稷之禍，自此始矣。”

11 《高丽史节要》卷30、辛禡元年4月。

12 《高丽史节要》卷30、辛禡元年4月。

13 《高丽史》卷133、列传46、辛禡元年4月。

14 《高丽史》卷133、列传46、辛禡2年7月：“今國家，臣弑其君，主諛臣諂，國柄專在權臣，若引兵來，大事可成。”

15 《高丽史》卷133、列传46、辛禡元年9月。

完全违背了世祖皇帝当初定下的规矩，望予以阻止。¹⁶

但是，左代言林朴、典校令朴尚衷、典仪副令郑道传却以‘先王用计策侍奉了南方的明国，现在再去侍奉元国不合适’为由没有签名。¹⁷

李仁任政权一方面防范北元的军事入侵，一方面又通过外交渠道要求北元废黜拥立为高丽王的脱脱不花，并以此来挽回危机局面。我们无从得知这篇文章有没有传到北元，但据猜测高丽很可能是派文天式将信送到了北元。¹⁸但是，禡王2年(1376)10月北元送到高丽的扩廓帖木儿的书信中提到‘从抄儿志处获知，伯颜帖木儿王有一儿-牟尼奴已受人拥戴处理国事。’由此推断，上述的百官联名文书好像没有传到北元。抄儿志是禡王2年2月访问过高丽的人，如果文天植将上述的文书送到北元的话，北元也不会说是通过后来访问高丽的抄儿志处了解到高丽的情况。

看来李仁任政权拒绝脱脱不花的措施是符合当时的局势的。先王遇刺，新王还未被册封的状态下，即使是止于虚名拥立脱脱不花为国王是万分危险的，所以不管用什么计谋都得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

一个月之后的1375年5月北元派了使臣来。1374年12月，金湑到北元通报恭愍王的丧事时，北元派来的使臣也是这个人。使臣带来的文书中写到，‘伯颜帖木儿王（恭愍王）背叛我国，与明相交，故赦免你弑君之罪’。此时，李仁任和池籛欲迎接元的使臣，却遭到三司左尹金九容、典理摠郎李崇仁、典仪副令郑道传、艺文应教权近的激烈反对，使臣未能进入开京。李仁任等将赞成事黄裳任命为西北面都体察使、将左副代言成石璘任命为体察使派到江界慰劳北元使臣后劝回。由此，预防了他们来高丽直接提脱脱不花的王位继承问题而动摇国家根基的混乱。¹⁹

1375年8月，泥城万户报告‘藩王母子率逆贼金义和金湑之辈已到达信州。’高丽唯恐北元入侵，立即征集各个道的军士做好了防御措施。后来发现消息不实。此时，鸭绿江以北频繁发生抢掠案件，高丽误以为金义率北元的军队攻入，后经确认并非藩王的军队，实则难民。²⁰

后来的半年多时间，北元和高丽之间再也没有使臣来往。高丽于禡王2年(1376)2月派李原实拜访纳哈出。同年5月北元的吴抄儿志来访，禡王以礼相待。²¹与明朝的关系断绝，北元将脱脱不花拥立为高丽王的问题也未得到解决，高丽开始对禡王的即位本身也感到惴惴不安。高丽朝廷试图通过纳哈出重启与北元的正式关系。之前高丽一直没有迎接北元大臣进京，北元对高丽也有不信任。但是，向纳哈出派出使臣没几天，安州副元帅王安德报告藩王已死。

高丽的官吏之间围绕与北元重启外交关系的矛盾，一直以来备受学界的关注。学界的主流做法是将当时的政治势力划分为亲明派或亲元派。部分学者批评这样的立场划分法，主张大臣之间的矛盾不是简单地源于外交上的意见分歧，而是高丽国内政治势力之间较量的结果。当时执掌政权的武将在对元外交关系上比较积极，是因为明朝对高丽采取强硬政策，国内的反明情绪很浓，尤其，杀害明朝使臣的事件

16 《高丽史》卷126，列传 39，李仁任。

17 《高丽史节要》卷30、辛禡元年4月。

18 池内宏，《高丽末与明朝以及北元的关系》史学杂志，29-1、2、3、4/1917，满鲜史研究中世第三册，294页。

19 卢启铉，《高丽外交史》，甲寅出版社，1994，635页。

20 《高丽史》卷114，列传27，杨伯渊。

21 《高丽史节要》卷30、辛禡2年5月庚午。

导致对明外交关系处于无法收拾的境地，北元又将脱脱不花册封为高丽王，从军事上对高丽形成了威胁。²²重启与北元的正式关系，很难简单地解释为防范军事冲突或禡王得到册封为目的的行为。尤其，当时北元并没有军事上给高丽施压，北元的军队来攻打高丽领土的报告也其实是误报。重启与北元的关系，应该有对内和对外两层目标。对内，当时执掌政权的李仁任等为了持续巩固自己的地位需要稳定的对外局势，于是一边给明朝派使臣，一边又与北元重启关系，在两国的威胁中谋求了本国的利益。²³

重启与北元的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与明的关系。李仁任以刺杀明朝使臣的事件为由，流放了与北元关系暧昧的赞成康舜龙、知密直赵希古、同知密直成大庸等，在亲明势力中树立了自己的名分。²⁴并且，大规模肃清了曾经上疏要求处死（与明断绝关系，与元重启关系为由）李仁任、池籛等人的反对势力，为自己推动外交政策扫清了障碍。

一方面，可以说重启与北元的关系在对外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虽然无法完全否认先学们指出的禡王册封等，但是我想这里有更重要的目的。其实，禡王即位的时候国际局势有了不小的变化。尤其，对北元来说，与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从大都逃难到北方的混乱期相比，局势有了很大的改观。

1372年北元击破大规模征伐军，政局也稳定了。另外，辽东的纳哈出也在1372年攻打牛家庄，给辽东的明军造成了重大的打击。留在云南的北元残余部队也在继续抵抗明朝。1374年前后，北元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有了喘息的机会。恭愍王以为元朝不日内走向灭亡，才跟明朝建立事大关系的可能性比较高，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北元不是那么容易被打败的，当时的高丽也看出了这点。

弱小国自保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在强大国之间维持势力均衡。但是，恭愍王晚期的对外政策并未在强大势力之间保持均衡，非常极端的排斥北元，偏向于明朝。不仅排斥了北元，还多次征伐了北元的领土。这并没有改善明朝对高丽的看法，明朝鼓励高丽征伐辽东，就是借刀杀人的计谋，其实有不可告人的私心。

辽东的北元势力一旦瓦解，下一步要收拾的就是高丽。明朝自1371年接管辽东开始透露出这样的心机，高丽的掌权者们看出了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引导高丽重启对元关系的李仁任、池籛、崔莹等武将逐渐与北元来往，尝试利用北元来牵制对高丽越来越强硬的明朝。他们甚至考虑过，遭遇明朝攻打过来的紧急情况下，请求北元的军事援助进行抗争。

高丽与北元重启关系是从北元和高丽都想牵制明朝的必要性出发的，可以说是当时在东亚维持势力均衡的努力。因为有了这样的大背景，李仁任等高丽的掌权势力不顾反对派的强烈反对，坚决推行了重启北元关系的政策。高丽希望携手北元牵制明朝，至少以此来给明朝施加压力逼迫其作出让步。

22 金塘泽，《高丽禡王元年(1375)围绕重启对元外交关系的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震檀学报83，1997。

23 高惠玲，《对李仁任政权的考察》，历史学报，第91辑，1981，24-25页。

24 Ibid. 20页。

2. 事大关系重启的过程及其结局

记录显示，1376年7月一年半前派到北元的判密直司事金湑从纳哈出的营门逃回，由此可以推测北元可能把他作为人质扣下了。北元朝廷通过高丽派去的吴抄儿志掌握了高丽局势的详细信息，了解了李仁任等掌权势力的本意。1376年10月北元派兵部尚书孛哥帖木儿送来的扩廓帖木儿的书信中可以确认这点。²⁵

书信反映了北元对当时的高丽实施的政策、两国之间发生的事情、北元和明朝之间的关系、明朝的狼子野心等重要的信息。扩廓帖木儿提到曾经跟“禡王的父亲-恭愍王关系亲密”，还说高丽和北元的关系从“丈人和女婿的关系转变为亲家的关系”，听说“恭愍王去世后没有后嗣，所以希望拥立禡王家族的人来继承大统”。接下来解释，“曾经派过携带相关诏书的使臣，但是到高丽遇阻。一直在等待高丽承认错误，通过高丽派去的抄儿志才得知高丽并没有背叛元，也得知了伯颜帖木儿王有儿子牟尼奴负责处理国事。”

并且，还分析道：‘即使国人愿听命于王子（禡王），还没正式受到元朝的册封，人心的动向也应该是支持和反对各占一半。’可以说，这句话触碰了高丽最重要和敏感的神经，还提醒道应该尽快解决禡王的册封问题，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北元。

信上劝道：“小国侍奉大国时必定要获得信任，才得以保住社稷”，“如果高丽不再回到元，一定要侍奉朱元璋，必定会被朱元璋吞并，即使高丽如履薄冰地小心伺候，明朝也会掠夺高丽的财物、抢走人口、改变社稷，根本无法预测会沦落到什么地步。”，“元正在策划恢复国土的大计，高丽应听命于皇帝，训练军士、喂养军马，与我们合作前后夹击敌人，为元的中兴事业做贡献才是正道！”，“收信后尽快派使臣，必有北元的好消息”。北元采用了恩威并施的办法。从后来明朝和高丽之间发生的事情来看，北元早已对明朝的野心看得一清二楚。

信中提到两国关系是“亲家的关系”，北元主动放弃忽必烈时期建立的蒙古优先的驸马关系，承认高丽是奇皇后的母国，重新定义两国是平等的亲家关系。²⁶这是北元拉拢高丽的计策。

1376年10月，纳哈出也派了右丞九住，把高丽派去的文天式也放回来。文天式是恭愍王17年(1368)10月为了恭贺皇太子的生辰派到元的使臣，在元朝被扣八年后也回来了。收到右丞相的书信后，高丽朝廷于禡王2年(1376)10月将密直副使孙彦派到北元，将禡王的王位继承相关问题的百官联名书送到北元的中书省，信中解释禡王是根据恭愍王的遗诏继位，正等待北元皇帝的册封诏书。同年10月，高丽派开城尹黄淑卿访问纳哈出，回礼了纳哈出的使臣九住的来访。12月纳哈出派使臣送来银和羊²⁷，禡王3年(1377)正月纳哈出又派使臣送来羊和马。2月北元派翰林承旨孛刺的送来了国王册封令、美酒和海东青。²⁸

对于北元册封禡王的事件，有些人解释说：‘摇摇欲坠的北元已经没有能力支

25 《高丽史》卷133、列传46、辛禡2年10月。

26 尹恩淑，《爱猷识理答腊的活动和丽蒙关系的变化》，东北亚历史财团以及蒙古科学院共同主办“韩-蒙关系的昨天和今天”2010 韩蒙国际学术会议发表论文集(2010)，乌兰巴托，237页。

27 《高丽史》卷133、列传46、辛禡2年10月。

28 《高丽史》卷133、列传46、辛禡3年2月。

持脱脱不花担任高丽王，还不如按高丽权臣的要求顺水推舟送个人情。’²⁹不过，这时候脱脱不花已经去世，北元也没有可推举为高丽国王的人物。于是，北元在禡王3年(1377)2月册封禡王，重启了恭愍王18年以后中断的册封-朝贡关系。³⁰北元册封禡王时，还给尹桓等六位下赐了平章事官职。接下来，纳哈出派部下谋求亲善，北元也派豆尔达祭奠了恭愍王的神位。在北元多方努力伸出橄榄枝的情况下，高丽才开始使用北元的年号宣光。³¹同时下令‘中外决狱一遵至正條格!’。³²

1377年3月，高丽派三司左使李子松到北元呈上册封答谢函³³，还给北元皇帝和其他大臣一一送礼。

还有，礼仪判书文天式担任答谢使给纳哈出送厚礼，巩固了亲善关系。派到纳哈出的文天式六月份从北元回来后，派到北元的谢恩使李子松也回来了。据说，“元朝廷的大臣们看到李子松穿朝服行礼的场景都泪流满面，感叹道：‘我们朝廷迁到北方连年苦苦征战时，还以为再也看不到这样的场面’”，厚待李子松自不必多说。³⁴

册封国王的北元认为已经讨得了高丽权臣的欢心，7月派宣徽院使徹里帖木兒到高丽要求协助攻打定辽卫。³⁵对于北元这是中兴的绝好机会，但是高丽正在开展两条腿走路的外交政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高丽试图好言说服北元，希望采取拖延或不了了之的策略。³⁶禡王给北元的使臣赐了带金腰带和马鞍的骏马，但是由于高丽没有答应北元的要求使臣没有收礼物。同年八月，高丽派啓稟使晋川君姜仁裕到北元³⁷，姜仁裕9月份从北元差人过来通报了情况。信差带来的信息显示，平章文典成和大参政张海马与纳哈出一同操练军队，喂肥战马，计划待高丽军赶到一同攻打定辽卫。³⁸

高丽急忙派军簿判书文天式推脱说，寒冷的天气不宜动员军队。高丽不敢直接拒绝派军，采取了拖延战略。11月派黄淑卿祝贺冬至节³⁹，12月又派王昇送去了新年问候⁴⁰。同月，纳哈出派使臣送来了160头羊和3头牦牛。⁴¹

其实，不只北元想征伐定辽卫，当倭寇入侵全州时，都堂商量过元帅的人选问题。当时执政大臣之一的池籛主张“倭寇只是扰乱边境，不用太担忧。但是，明朝的大军一旦在定辽卫设下根据地，必定很难攻下，掉转军队攻辽才是上策。”⁴²倭寇入侵全州指的是1376年9月倭寇攻陷全州的事件。这是北元提议攻打定辽卫一年前的事情，池籛的这句话中可看出高丽的掌权势力重启北元的关系时，希望借助北元牵制明朝进驻辽东。

29 卢启铉，《高丽外交史》(1994)，638页。

30 金顺子，《韩国中世韩中关系史》(2007)，85页。

31 《高丽史》卷133、列传46、辛禡3年2月。

32 《高丽史》卷84、志38、刑法1、职制、辛禡3年：“中外决狱一遵至正條格。”

33 《高丽史》卷133、列传46、辛禡3年3月。

34 《高丽史》卷133、列传46、辛禡3年6月。

35 《高丽史》卷133、列传46、辛禡3年7月。

36 卢启铉，《高丽外交史》(1994)，639页。

37 《高丽史》卷133、列传46、辛禡3年8月。

38 《高丽史》卷133、列传46、辛禡3年9月。

39 《高丽史》卷133、列传46、辛禡3年11月。

40 《高丽史》卷133、列传46、辛禡3年12月。

41 Ibid.

42 《高丽史》卷125、列传38、姦臣1，池籛：《高丽史节要》卷30、辛禡2年10月。

自禡王即位初，高丽一方面努力重启与北元的关系，另一方面又为缓和1374年底使臣杀害事件以后更加恶化的对明关系，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得到禡王册封而做了不懈的努力。但是，明朝一直不冷不热，外交上依然对高丽采取强硬政策。

1376年8月传来了“定辽卫将在秋天攻打高丽”的消息。高丽得到信息后派人到各个道清点军队，以防万一。⁴³现在无法考证定辽卫攻打高丽的信息是否属实，可以肯定的是这条信息促进了高丽和北元的关系发展。其实，当时明朝忙着处理国内的问题，顾不上攻打高丽。况且，2个月前送到高丽的文书上所提的要求，还没得到高丽的回应，这种情况下急着攻打高丽是不合常理的。很有可能这只是谣传，我们很难排除谨慎观察明朝和高丽关系发展的北元，看到明朝和高丽关系改善的兆头，传出谣言的可能性。1376年8月以后，高丽和北元的友好关系加快发展，想必这件事情在从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看到高丽与北元建立事大关系，明朝也开始对高丽采取安抚主义。1377年12月，明朝释放了一直扣押着的丁彦等358人。高丽也礼尚往来，1378年正月派判缮工寺事柳藩到明朝，谢皇帝的恩典，又派礼仪判书周谊上奏了请求恭愍王的谥号和王位继承册命的表文。⁴⁴同年6月，高丽使臣（行人）崔源、全甫、李之富等也获释回国。

1378年（禡王4年）7月，北元的使臣来高丽通告豆叱仇帖木儿的即位，禡王称病不出去迎接，但是在北元使臣的迫使下国王不得不去行省迎接。⁴⁵

同年8月，周谊和柳藩从明朝回来，带来了明朝礼部尚书朱梦炎记录皇帝的谕旨给高丽人看的文章。其主要内容是不干涉高丽的内政，也不会扣留使臣，但是语气上带有很强的“走着瞧，就看你的表现”的意思。⁴⁶

不久后的同年9月，高丽恢复了明朝的年号洪武。一方面是北元的皇帝驾崩，新皇即位没办法继续沿用原来的年号，另一方面跟明朝对高丽的安抚政策有关。但是，明朝看到高丽恢复洪武年号露出亲明的倾向，又恢复了强硬政策。

1378年10月，派沈德符到明朝恭祝新年，同时也派版图判书金宝生答谢释放崔源，可惜明朝对高丽的态度却越来越强硬。1379年正月，辽东道指挥司派镇抚任诚要求，释放洪武三年11月高丽军俘虏的辽阳地方的男女官民一千余人以及逃到高丽的明朝士兵。⁴⁷理由是，高丽答应派兵帮助北元。由此可见，明朝还没有打消对高丽的戒心。

大概过了一年之后的1379年6月，北元派金院甫非通报郊祭已毕，年号改为天元。纳哈出也派了门下的部下。禡王说：“丞相和已故的家父以兄弟相称”，并在纳哈出的部下返回时送了苧麻和麻布各150匹以示友好。⁴⁸同年7月，高丽派永宁君王彬到北元，恭贺了郊祭和改年号。12月，纳哈出送来了鹰和羊。

如上所述，高丽恢复明朝的洪武年号以后继续与北元来往。在与明朝的关系还没有正常化，持续紧张的局势下，高丽完全没有理由着急与北元断交。另一方面，

43 《高丽史》卷133、列传46、辛禡2年8月。

44 《高丽史》卷133、列传46、辛禡4年3月。

45 《高丽史》卷133、列传46、辛禡4年7月。

46 卢启铉，《高丽外交史》（1994），643页。

47 《高丽史》卷134、列传47、辛禡5年正月。

48 《高丽史》卷134、列传47、辛禡5年6月。

也无法排除高丽采用的是恢复与明朝的事大关系后，继续跟北元来往的两条腿走路的策略。

禡王6年(1380)，永宁君王彬带着北元的诏书回国。同年2月，北元派礼部尚书时刺问、直省舍人大都罕将禡王册封为太尉，国王携文武百官走到郊外迎接。3月，高丽派密直副使文天式到北元，祝贺节日，并答谢了册封。7月，北元派使臣颁布大赦，纳哈出也派了使臣。

再之后，北元和高丽之间的使臣来往极少。纳哈出的使臣最后来到高丽是禡王9年(1383)一月，使臣建议友好关系永不变。北元朝廷最后向高丽派的使臣于1384年10月到了和宁府。高丽派护军任彦忠安抚使臣并劝回，使臣遇到交通封锁逗留半年后回国。后来，北元和高丽之间没有了使臣往来。因为1385年开始明朝掌管了辽东，明朝在攻打纳哈出之前的1384年，攻打了位于纳哈出和高丽中间地段的女真部落，切断了纳哈出和高丽的连接。北元中央政府的使臣出访高丽也必须经由纳哈出直辖的领土，于是双方的来往不得不中断。不过，并不是彻底断绝，而是必要时随时可以重启的暂时性断绝。

代结论

恭愍王后即位的禡王年间开始，高丽和北元的关系有了很大的变化。高丽不仅与明朝维持事大关系，还尝试重新启动与北元的外交关系。

1369年，高丽派出最后一批使臣后过了五年，1374年北元派来了告讞使。可见，重新启动外交关系的第一步是由高丽先迈出的。北元也早有此意，也趁此机会积极响应。

北元和高丽都需要牵制明朝，也需要在东亚维持势力均衡，高丽和北元重新启动外交关系是基于现实的考量。在这样的形势下，李仁任等掌权者顶住了对抗势力的极力反对，坚决推行重启对元关系的政策。禡王3年(1377)2月北元册封禡王，借由此事恭愍王18年以后断绝的册封-朝贡关系重新成立。北元如此讨好高丽，高丽也恢复了北元的年号宣光。

高丽始终回避北元的主要目的——共同对抗明朝的要求。夹在北元和明朝两大国之间，高丽在外交政策上没有倾斜，同时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维持势力均衡得到了实惠。甚至还利用与北元建立的事大关系给明朝施压，迫使明朝在1378年册封禡王。

明朝和北元都成了高丽的事大关系国。其中，高丽把明朝视为事大关系的主要对象。禡王4年恢复对明外交关系后，高丽虽说仍然维持对元关系，侧重点还是在明朝。直到禡王6年，高丽一直与北元有使臣往来，这倒不是因为视北元为事大的对象。同时跟两个国家建立事大关系是解决当时所面临的外交问题的最佳渠道。有些观点认为，高丽与北元关系的目的在于牵制明朝提出过分的贡品要求，解决新王禡王的册封问题。⁴⁹其实，高丽的更重要的目的是维持东亚的势力均衡，携手北元牵制越发强盛的明朝进一步扩大势力。

高丽和北元的友好关系不只对高丽有利，被赶到北方外交上处境艰难的北元，

49 金顺子，《韩国中世韩中关系史》(2007)，87页。

也急需恢复几乎断绝的高丽的关系。一旦改善与高丽的关系，不仅可以联合夹攻明朝，在原来的附属国都置之不理的情况下，至少是一个可以恢复国际上的名誉和权威的好机会，所以说北元的目的在于军事和外交两个层面。北元年间，两国使臣的来往次数中五分之一是北元派到高丽的，可见对于北元来说，与高丽的友好关系有多么重要。

禡王年间，北元和高丽关系的最大特征是高丽首次与北元建立了典型的册封-朝贡关系。禡王3年开始持续两年的这种关系，其性质与过去元朝干涉期完全不同，可以说是160多年前蒙古和高丽的关系刚成立时高丽所希望的模式。

参考文献

I. 史料

郑麟趾等，《高丽史》，朝鲜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翻译，大地媒体。

《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97。

《元史》(A Mongolian translation from Chinese by Ch. Dandaa), Volume I-XXII, Foreword and textological study by Ts.Tserendorj,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Mongolia., Ulaanbaatar, 2003-2004.

II. 著作 1) 韩语 金顺子,《韩国中世韩中关系史》，慧眼 2007. 卢启铉,《高丽外交史》，甲寅出版社，1994

尹恩淑,《蒙古帝国的满洲统治史》，松树，2010.

2) 蒙语 Ч.Далай, Монголын түүх (1260-1388), УБ., Эрдэм, 1992.

III. 论文

1) 韩语

高惠玲,《对李仁任政权的考察》，历史学报第 91 辑 (1981).

金塘泽,《高丽禡王元年 (1375) 围绕着重启对元外交关系展开的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震檀学报 83 (1997)

尹恩淑,《爱猷识理答腊的活动和丽蒙关系的变化》，东北亚历史财团以及蒙古科学院共同主办“韩-蒙关系的昨天和今天”，韩蒙国际学术会议发表论文集，乌兰巴托 (2010)

车林多尔济,《十四世纪后期东亚国际形势以及高丽和北元的关系》，韩国学中央研究院，韩国学大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2010)

许兴植,《高丽末年李成桂的势力基础》，历史和人的对应：高柄翊博士花甲纪念史学论丛，宇宙出版社 (1984)

2) 其他

池内宏,《高丽末年与明朝和北元的关系》史学杂志, 1917,29-1、2、3、4

Ts.Tserendorj,《A royal rescript of Emperor Ayushridar of Mongolia to the Koryo king and some issu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rthern Yuan and Koryo》, Acta Historica, No10, Mongolian State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Ulaanbaatar, 2009.

指定讨论

浅析北元与高丽关系 - 以禡王时期关系为中心

[提问者 / 张佳、回答者 / 其林道尔吉]

提问 / 张佳：

元明之际的历史当中，高丽的地位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明朝还是蒙古，高丽都有很多拉拢的举动，当然也留下了很多难以解开历史谜团。刚才其林道尔吉老师对于禡王年间的北元和高丽关系的演变做了一个很详细的梳理，在这里我依然有两个问题要向其林道尔吉老师讨教。这也是我在读这段历史的时候一直没有得到解答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高丽末期的恭愍王，从他在元末的所作多来看，他选择倾向明朝，而跟元朝断绝关系，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我个人感觉并不是一个突然的事情。我认为恭愍王是高丽末期一位非常有战略眼光的国君。他在位期间，曾经派军队跟元朝一起参与到平定张士诚叛乱的高邮之战，结果各位都知道高邮之战功亏一篑。也可能通过这次战斗，恭愍王发现元朝的实力实际上不那么强大。于是就有了后面一系列的针对元朝的敌对行动，比如说进攻元朝在高丽半岛的领土，今天，各位都知道所谓的朝鲜的咸镜地区基本上都是那个时代恭愍王开疆拓土的结果。另外还有一点导致恭愍王和元朝关系从根本上说无法得到和解的原因是，恭愍王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曾经把奇皇后的家族一网打尽，这一点就变成了高丽和北元关系里的一个隐痛，时时会发作，所以他在明朝势力崛起以后选择了明朝，断绝了和元的关系，在我个人看来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举动。让我非常不理解的反而是，为何禡王继位后马上抛弃了恭愍王时代的亲明政策而转向元朝。

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到底是在哪里。我个人在读高丽史的时候没有找到答案。

第二个问题是，很多学者认为，在高丽末期，高丽国内存在着以文臣、儒臣为主导的亲明派，以及以武臣为主导的亲元派，对于这样的划分，我不知道其林道尔吉老师是否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这个观点也是与以往我们的很多人是相矛盾的，我们一般认为高丽国王选择与蒙古联姻，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借助它的“老丈人”，也就是蒙古人的势力来压制国内的武人，摆脱高丽时代武人专政的状况，那么为什么武人后来又会偏向蒙古。这是我的两个小问题，谢谢。

回答 / 其林道尔吉：

或许有我没听懂的地方，您的第一个问题是恭愍王的态度是否自然，为什么禡王对他予以排斥，采取了亲明政策？

我们在解释历史的时候，因为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所以会出现一种错误认识，有时会认为起初就是这样。但是当时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因为元惠宗离开大都，回到蒙古故乡之后的大约20年里，明朝国内有些混乱，国际上也经历了相当混乱的时期。这个时期，朝鲜时代有人批评政府，尽管蒙古放弃了大都，但是不应该立即与元断交，而与明建交。并不是我在反对，朝鲜时代也有持批评态度的人。他们认为政府太操之过急，因为时局的发展尚未确定，并不知道会倒向那个方面。

所以这个时候马上放弃蒙古，投奔明朝本身就是错误的。也有学者认为不能算作错误，而只是太着急了。现代人了解的事实是元灭亡、明变得强大，所以有可能得出以上的结论。但是当时的时局并不明朗，双方势力僵持不下，本应当再静观局势的发展，恭愍王的决定过于仓促。不过尽管如此，恭愍王并没有完全与元断绝关系。还往元派遣使节，也接受了元的使节。所以可以说恭愍王与双方保持着关系。但是我想知道禡王实施这种政策的原因。我刚才算错了时间，没把蒙古之前的部分算进去。而且报告只涉及了论文的一半左右，所以没能讲完整。可能有些部分给大家带来了误解。禡王即位时的情况与恭愍王初期大不相同。恭愍王预测“元即将灭亡”，但是几年后有的高丽执政者认为绝不会灭亡。而且，虽然与明建立了关系，但是明并没有对高丽采取让步的措施。反而是因为怀疑高丽与元勾结，于是采取了更强硬的政策。

在元尚存之时，明采取了上述强硬政策，高丽执政者不知道元灭亡之后会面临怎样的遭遇，所以利用北元给明施压，谋求在两个大国之间的势力平衡，这就是弱小国的禡王所采取的措施。

第二个问题用亲元派、亲明派等对当时的情形进行了很多的说明。我认为难以断定有过这些分类。高丽始终重视本国利益、实际利益，所以当两个大国同时存在的时候，不管是哪一方，他们都会去利用，达到生存下去的目的。但是，后来历史学家发现，存在亲元派和亲明派。我想强调的是，朝鲜半岛上先有高丽王朝，然后变成

了朝鲜王朝。北元在促使这种变化中发挥了重要外交作用。大家都知道有关这方面有很多看法。国内政治势力的争夺，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的斗争，很多背景当中，我觉得最大的原因还是外交。随后与元联手，所以明开始怀疑，结果，李成桂成功推翻了旧的政权。因为驱逐了追随元的那些势力，所以才夺取了政权。这正是我想强调的部分。

虽然元代已经灭亡，当时蒙古的政治影响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对高丽）并没有完全消亡。可以说禡王起初对明有所姑息，未果之后才改为推行亲元政策的。



高丽时期蒙古帝国饮食文化的传入与演变

赵阮

汉阳大学

翻译：朴贤

提 要

自13世纪蒙古帝国建国后，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此后各地域间文化交流持续。文化面的接触、刺激和变化，反映在蒙古帝国的物质文化领域中，尤其是饮食文化方面最为明显。13世纪蒙古征服欧亚大陆后，各地向蒙古帝国进贡食物，用盛宴款待皇帝，因此14世纪帝国中心出现饮食文化的多样化和融合。饮食文化的变化逐渐从帝国中心传到周边地域。1260年蒙古与高丽缔结友好关系以后，曾因佛教而被禁止的肉食文化也传入高丽。蒙古帝国的饮食文化传入高丽后，变得与高丽饮食习惯相吻合。肉类的处理方式和各种烹饪方法传入朝鲜半岛，但蒙古的羊肉被乳牛和猪肉所替代，而且元朝的部分饮酒文化也传到朝鲜半岛。

在朝鲜时代，随着佛教的衰退，作为茶的替代品饮料开始风行。在14世纪的《饮膳正要》介绍了清凉饮用水舍尔别的制作方法等相关知识，在17~18世纪朝鲜后期的日用生活书《山林经济》与农书《林园经济志》中被介绍成枯水。本文讨论蒙古帝国饮食文化的多样性及其传入高丽地区的过程，通过探寻蒙古饮食文化传入朝鲜半岛的踪迹，来判断13世纪在蒙古帝国扩张过程中出现的蒙古帝国作为世界级现象的特征及其意义。

1. 序

13世纪自蒙古帝国建立以来，世界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各地区之间也随之有了频繁的文化交流。蒙古帝国时期，不同文化之间发生了接触、刺激与变化，这一现象尤其凸显于物质文化领域当中的饮食文化。12-13世纪，蒙古的疆域逐渐扩大到农耕定居区域，原来在蒙古草原以肉类和乳制品为主食的饮食习惯也随之发生改变，游牧民族的谷物摄取量逐渐增多。特别是蒙古征服了中国以后，中国各地生产的新鲜蔬菜和水果也搬上了蒙古统治者的餐桌。而在进一步征服了欧洲大

陆之后，帝国的各个地区向蒙古大汗进贡美食，14世纪蒙古大汗的宫廷里也就出现了饮食文化的多样化与相互融合的现象。另一方面，饮食的变化不仅局限于帝国的核心区域，也逐渐波及到帝国的周边地区。

蒙古的统治不但给蒙古人的饮食生活带来了诸多变化，对汉人饮食文化也产生了不少影响。这个时期，西域人的搬迁使得蒙古、回回的饮食文化传入中原。汉人开始饮用马奶酒等蒙古酒种，而且受穆斯林饮食习惯的影响，一日三餐的文化也在这一时期得到普及¹。此类现象非但发生在中国境内，同样出现于韩半岛地区的饮食文化上。高丽晚期，在蒙古的影响之下，韩半岛的肉类摄入量开始大幅增加²。

民俗学家最早关注到这一层关系，并对蒙古和韩国饮食文化的相似性进行了研究。例如，蒙式肉汤“Sulen”与韩国的喝汤文化的比较、汤里泡饭煮面的烹饪方法、肉脯等肉干的制作方法、蒙古肉肠和韩国米肠的比较等等³。蒙古曾经将耽罗（济州岛）当做军事基地，前后驻军长达一百多年，所以济州的语言、风俗及饮食文化上至今留存着不少蒙古的痕迹，因此其中也不乏对济州饮食中的蒙古文化余迹的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受蒙古驻军长达130年的影响，蒙式米肠、肉脯、烧酒、汤等饮食文化传入了耽罗，济州当地美食“马尾藻汤”（Mom-Guk）是融合了蒙古饮食文化与济州当地环境的典型代表。这种汤是在煮完猪肉的肉汤中加入马尾藻做成，被认为是蒙式肉汤受济州风土环境影响演变而成的菜肴⁴。

蒙古帝国在历史上扮演了将特定地区的文化传播到其他地区的文化媒介角色，这种情形同样出现在饮食文化上。我们发现，在蒙古统治时期及之后的历史上，蒙古本土的饮食文化乃至蒙古占领地区的饮食文化出现在其疆域内的不同地区。蒸馏法就是在高丽晚期通过蒙古势力进入韩半岛的。蒙古人学习和利用了所征服地区的蒸馏技术，将马奶进行了蒸馏酒化，并称其为“亚刺吉”。蒙古骑兵在所到之处广泛传播了这种蒸馏文化，而传入高丽之后，蒸馏酒被叫做“烧酒”⁵。

另一方面，在蒙古统治下的中国，跨地区的文化交流促生了百科词典式著作的诞生。这些“类书”中出现的饮食相关项目和饮食类专业书籍，让我们可以了解到大元帝国的饮食情况，反映多元化的饮食文化。其中的代表作品有《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和《事林广记》，这些书籍介绍了当时在民间食用的饮食菜品，据此可以掌握当时饮食文化的实际情况。此外，《饮膳正要》里记载着当时蒙古统治阶层所食用的菜品和料理，是力证大元帝国丰富多样的饮食文化的珍贵资料。有趣的是，出现于这类书的烹饪方法同样收录在了17-18世纪朝鲜的日常生活用书《山林经济》和农书《林园经济志》中，这为了解蒙古帝国饮食烹饪知识的传播路径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笔者将在本文中确认《山林经济》和农书《林园经济志》所记载的肉类烹饪方法以及饮料相关的内容，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讨蒙古帝国的饮食文化传入高丽地区的现象及其演变情况，最终要考察13世纪蒙古帝国的征服和膨胀给东亚地区所带

1 史卫民《元代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05-106页。

2 金尚宝《韩国的饮食生活文化史》（坡州，广文阁，1997）331-332页。最近，韩国国内也在对蒙古饮食文化传入韩半岛的过程及其影响进行着多项研究。

3 Kim Cheonho《韩蒙间的饮食文化比较》，载《蒙古学》4，1996。

4 Lee Jongsu《13世纪耽罗与元帝国的饮食文化变动研究》，载《亚细亚研究》59-1，2016，143-179页。

5 Park Hyeonhui《烧酒的兴起：从蒙古时期（1206-1368）“中国”到韩半岛的蒸馏技术的传播》，载《中央亚细亚研究》21-1，2016，69-93页。

来的文化影响及其意义。

2. 蒙古饮食文化传入韩半岛的历史背景：以高丽和蒙古之间的人员流动为中心

高丽与蒙古于1260年和亲，之后双方的人员交流和经济交流愈发活跃，大元帝国的饮食文化也随之传入韩半岛⁶。在这一过程中，人员流动起到了媒介作用，因而笔者接下来会以此为中心进行考察。高丽与蒙古的交往始于1218年，蒙古的哈真和札剌为了抵御契丹人，率军万余众进入高丽境内。从此一直到1368年元朝灭亡，各种人员和势力访问过高丽或者长期居住在高丽，其中包括从军队到高丽统治阶层的多种群体，向高丽传播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当然，他们当中不仅有蒙古人，还有色目人官员、伊斯兰商人和汉人群体。

我们若简略梳理高丽与蒙古之间的人员交流情况，首先可以想到的是，下嫁于高丽的王后们和她们的陪嫁侍从“怯怜口”。自1274年忠烈王与忽必烈之女忽都鲁揭里迷失成婚开始，两国通婚成为一种惯例，一直延续到恭愍王一代，历时80多年，前后共有7名公主下嫁高丽国王。她们往往直接介入高丽王朝的政治，行使了巨大的影响力，从而其侍从怯怜口也随之荣升为高丽的新兴统治阶层⁷。这些怯怜口原来是属于蒙古名门望族的奴隶，跟随蒙古公主来到高丽，其具体人数规模目前难以掌握。除了他们，王族女性出嫁时陪同的家臣，即“媵臣”们也一同来到了高丽。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被称为“印侯”的蒙古人忽刺歹、回回人三哥、党项人式笃儿，另有高丽人车信也辅佐了忽都鲁揭里迷失。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到，蒙古公主下嫁高丽时通常有6-7人规模的随行队伍，主要是由蒙古、色目、汉、高丽等出身的陪臣和奴仆所构成。因此，元朝的饮食文化很可能是通过以蒙古王后为首的蒙古统治阶层传入了高丽。

其次，还有蒙古派到高丽的蒙古人达鲁花赤群体。达鲁花赤制度始于蒙古帝国初期，是帝国为了治理占领地区而向其派遣的监督官。蒙古曾于1232年第一次向高丽的开京和西京及北界派出72名达鲁花赤，而他们却被高丽人处死。之后于1260年，高丽与蒙古进行和解并联盟，束里大和康和尚被任命为达鲁花赤，其主要任务是监督高丽王室的出陵，并统帅蒙古驻军。任务完成之后，他们就回国了。此后在高丽元宗十年（1269），高丽权臣林衍造反废黜了元宗，蒙古伺机再次派出达鲁花赤，并于1270年二月任命脱朵儿为高丽的达鲁花赤。此后一直到1278年，蒙古向高丽共派出了7名达鲁花赤，其中脱朵儿和黑的是蒙古人出身，另有汉人焦天翼、李益、张国纲和契丹人石抹天衢等。这些官员当中偶有与高丽统治阶层通婚者。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1270年高丽大臣金莲家族，应脱朵儿的要求与其联姻⁸；

6 朝鲜晚期的农书及日用书籍《山林经济》和《林园经济志》里面引用了大元帝国时期书籍《居家必用》里面介绍的烹饪方法。目前尚不清楚《居家必用》在什么时候传入高丽或者朝鲜，但这依然可以看做大元帝国的饮食文化相关知识传入韩半岛并被接受的例子。相关研究可以参考Ju Yeongha编《东亚书籍的文化史与朝鲜时代饮食知识体系：以〈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为中心》（预定于2017年出版）。

7 Ko Myeongsu《忠烈王时代怯怜口（怯怜口）出身官员》，载《史学研究》118，2015，235-236页。

8 《高丽史》卷二六〈元宗世家〉

1289年赴任于耽罗的达鲁花赤塔刺赤娶了内侍郑孚之女为妻⁹；1289年蒙古使臣阿古大与高丽功臣洪奎长女成婚等事件¹⁰。通过以上事例，我们可以推测蒙古习俗与文化是经由统治阶层之间的通婚交流传入了高丽社会。

此外，高丽曾奉元朝之命开设了众多鹰坊，以便饲养猎鹰。据目前统计，元朝开设的鹰坊规模为250户。这些鹰坊的负责人是尹秀和朴义等高丽人，但实际去管理和饲养猎鹰的是由蒙古大汗派遣的猎鹰达人鹰坊子郎哥歹群体，他们由大汗亲自派到高丽庆尚道荣州等地¹¹。由此可见，实际运营鹰坊的是蒙古人。

1266年以来，元朝为了应对同日本交涉、攻打南宋，让高丽打造军舰并负担军费。1269年，高丽林衍叛乱，蒙古军队伺机入驻高丽。目前我们不清楚元朝具体的派兵规模，但有记载说，大臣蒙哥都为平定林衍之乱率领两千兵马驻扎西京¹²。于此同时，头辇哥国王所率领的大规模军队也曾赴西京担任护送元宗的任务。1270年十二月，元朝朝廷向高丽增派两千兵马实行屯田，随即又派忻都和史枢领兵五千屯田，再让洪茶丘率领两千名高丽领民实行屯田¹³。屯田的目的在于筹备出征日本，因此除了上述军队，还在王京、东宁府、黄州、凤州等十一处实行屯田并设置经略使¹⁴。在此之后，于1275年又将由南宋军组成的蛮子军一千四百人分派驻扎于海州、盐州和白州。据记载，元朝曾在1276年发放币帛给杨中信，使其给此蛮子军中的五百人娶妻¹⁵。1278年，元朝撤回了达鲁花赤，这些屯兵也依忽必烈之命废止，但仍有部分人员留在了高丽¹⁶。在高丽进行屯田的这些人员当中有蒙古人、汉人、南宋人、高丽人等，其构成比较复杂，且如前所述，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在驻扎在高丽期间与高丽人通婚生活。依据这些情形，蒙古帝国的饮食文化通过这些来自元朝的屯田势力传入高丽的可能性也是较高的。有人已经提出过，烧酒的蒸馏技术正是通过征发来到高丽地区屯田的这些蒙古人传入的概率非常高¹⁷。

1273年，丽蒙联合军成立，以镇压将据点迁至耽罗的“三别抄”势力。从此耽罗就沦落为元朝的直辖地，直到蒙古帝国的晚期。这一时期赴任耽罗的蒙古达鲁花赤、驻军以及牧人们在他们居住期间给耽罗地区留下了众多蒙古文化的痕迹¹⁸。耽罗达鲁花赤曾命令屯田兵力和本地居民开设牧场来饲养牛马，当地的肉食文化与肉汤、酒等饮食文化至今带有着浓厚的蒙古色彩。

除了访问过高丽的蒙古人群体，高丽也有直接访问过大元帝国的人群，而这些人也很可能将蒙古饮食文化介绍到了高丽。高丽文人闵思平曾跟随忠定王亲身访问过大元帝国，在他的文集《及庵诗集》里就曾提及“饮膳经”即“饮膳正要”¹⁹。而此书是元文宗图帖睦尔时期的太医院饮膳太医忽思慧于1330年为大汗所写的药膳

9 《高丽史》卷二九〈忠烈王世家〉

10 《高丽史》卷一〇六〈洪奎传〉

11 《高丽史》卷一二四〈璧幸传〉

12 《高丽史》卷二六〈元宗世家〉

13 《元高丽纪事》

14 Lee Kaeseok《高丽对元关系研究》，知识产业社，2013，178页。

15 《高丽史》卷二九〈忠烈王世家〉

16 《高丽史》卷二九〈忠烈王世家〉

17 李盛雨《韩国食品社会史》，教文社，1984，216页。

18 关于蒙古的耽罗统治和在但多居住的蒙古人的研究，请参考Bae Sukhui《元朝的耽罗统治与移住以及其痕迹》，载《中国史研究》76，2012。

19 “丹殼吹香風淡淡，皺皮弄色雨冥冥，心知此物真仙味，故入皇元飲膳經”（闵思平，Yu Hojin译，《及庵诗集》，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2013）

书，书中介绍了大量的元朝菜品。因其在闵思平的诗文中出现，所以我们可以推测《饮膳正要》和书中所介绍的元朝菜肴已于高丽晚期传入了高丽地区。

3. 韩半岛饮食文化中的蒙古帝国因素²⁰

自高丽初期，朝廷一直鼓励畜牧业，但在当时马多用于战场和搬运，而牛则主要用于农耕，因此牛马的食用比例非常低。同时高丽时期佛教香火兴旺，官方也曾数次颁布屠杀禁止令²¹，甚至到了成宗时期，敕令禁止肉食²²。受其影响，高丽的肉食文化变得更加萎靡。《高丽图镜》风俗篇里记载了高丽人的宴会场景，对餐桌上饮食的描述极为简朴²³。“今麗人，於榻上復加小俎，器皿用銅，鱸腊魚菜，雖雜然前進，而不豐腆。”对于高丽的肉食文化，徐兢又在《杂俗·屠宰》中记道：

夷政甚仁，好佛戒殺。故非國王相臣，不食羊豕，亦不善屠宰。唯使者至，則前期蓄之，及期將用。縛手足，投烈火中，候其命絕毛落。以水灌之，若復活，則以杖擊死。然後剖腹，腸胃盡斷，糞穢流注。雖作羹羹，而臭惡不絕。其拙，有如此者。²⁴

通过这一纪录，我们可以得知，当时在高丽除了王室成员，其他人很难食用肉类，且高丽的肉食貌似只是为了宴会或待客而准备的特殊菜肴。在肉食尚未普及的情况下，高丽人的屠宰技术也相对落后。当然，当时的高丽也有机会接触狩猎民族的饮食文化，其北部边疆就与契丹和女真接壤，并频繁交往。但相对来说，高丽内地的肉食文化并未普及开来。

但是自从1260年蒙古与高丽和亲之后，高丽地区的肉食文化开始出现扩散的趋势。据编纂《高丽史》的史家记载，忠烈王的后妃齐国大长公主在听闻母亲的讣告后很悲痛，其间却仍然维持了肉食。看来在史家眼中，丧事期间不禁肉食的蒙古后妃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蒙古公主嫁入高丽王室后，日常饮食仍然以肉食为主。我们推测，是蒙古人让高丽人产生了肉类也可以当作日常食品的观念。

蒙古与高丽和亲之后，蒙古大汗曾赐羊给高丽国王当做礼物。1263年，忽必烈下诏于高丽文宗，并赐羊五百只，文宗将此分与诸王及五品以上官员²⁵。1297年，大元帝国的太后为忠烈王祝寿，赐羊五十只、天鹅十只及蒙古大汗御酒²⁶。至忠烈王时期，记录中开始出现，在高丽王室主持的宴会上已经是以美酒与羊肉来设宴²⁷

20 第三部分是根据笔者之前的论文的部分内容进行整理和补充而成。（详情参考，赵阮《〈饮膳正要〉和大元帝国饮食文化的东亚传播》，载《历史学报》233，2017）

21 “禁屠杀，肉膳亦买市廛以进”（《高丽史》卷二光宗十九年）；“自今年限三年，禁中外屠杀”（《高丽史》卷八文宗二十年一月）

22 “禁屠杀，断肉膳”（《高丽史》卷三成宗八年十二月）

23 徐兢《高丽图镜》卷二二《杂俗·乡饮》

24 徐兢《高丽图镜》卷二三《杂俗·屠宰》

25 《高丽史》卷二五《元宗世家》

26 忽必烈收到了高丽方面的报告，表明高丽将接受蒙古之命实行“置邮、籍民、出师、输粮”，即于1263年八月回诏命高丽“力行其令”，并一齐赐羊为礼。《高丽史》卷三一《忠烈王世家》

27 《高丽史》卷三一《忠烈王世家》

。据此推测，蒙古和高丽和亲之后，原来作为蒙古人主食和中国北方佳肴的羊肉，登上了以高丽王室为中心的统治阶级的餐桌。只是高丽的风土气候不适于发展畜牧业，所以牧羊产业一直没能高丽发展起来。综上得知，到了高丽晚期，羊肉和猪肉已经在上流阶层的祭祀和宴会场合广为使用，而平民百姓则食用了便于饲养的鸡肉和狗肉²⁸。

此外，随着高丽晚期肉食的普及，原为用于农耕的牛肉也开始被当做食材。在与蒙古和亲之前，牛肉相比于羊肉和猪肉很少被食用，只有零星记载表明，少数上流阶层曾有过食用牛肉的情况。而在和亲之后，蒙古朝廷下令高丽要进贡牛和天鹅。在1271年元宗时期，蒙古要求高丽进贡六千头农牛，同时对于来到高丽屯田的士兵来说，牛肉的肉用价值丝毫不低于农用价值。迫于蒙古的农牛进贡要求，高丽开始饲养牛群，这不仅让牛群个体数量增加起来，还对食肉观念在高丽社会扎根的过程起到了重要作用。²⁹

在《居家必用》庚集中介绍了元朝的民间烹饪文化，而其中相当多的烹饪方法同样记载于17世纪的朝鲜实学书籍《山林经济》。根据金尚宝的研究，元末类书《居家必用》里出现的菜品当中有60%以上原封不动地收录在了17世纪朝鲜《山林经济》的“治膳”篇，从而证明肉类烹饪方法是在高丽晚期由元朝传入高丽的。只不过元朝主要以羊肉为材料做肉类菜品，到了高丽和朝鲜就以牛肉和猪肉替代了羊肉³⁰。

关于从《居家必用》引用到《山林经济》的肉类烹饪方法，可以举下面例子。从《居家必用》“烧肉品”部分引用了烧肉、羊膊、羊肋、羊耳舌、野鸡、鹌鹑、羊胛肪、野鸭；从“煮肉品”的“煮诸般肉法”引用了羊肉、败肉、煮驴马、煮肥肉、牛肉、马肉、獐肉、鹿肉、熊掌。烧肉指“烤肉摆设之法，除了直接在火炉烤的羊肉之外，其余所有的肉类均用钎子串起来，蘸以油、盐、酱、细料、酒、醋等，涂一层薄面皮，反复翻烤于炭火之上，肉熟后去掉面皮摆上”，介绍了羊膊、羊肋、羊耳舌等的烧烤方法；煮诸般肉法则介绍了牛、羊、驴、马、鹿、獐、雁、熊掌等硬肉、肥肉、败肉的各种煮法³¹。韩半岛从高丽晚期开始普及肉食，但肉类烹调方法并不发达，只有风干、腌制等。由此可见，《居家必用》向半岛提供了丰富而有用的肉类烹调知识和信息，因其包含了从北宋到元朝大量的烹饪方法。

自蒙古帝国形成以来，大量的蒙古及蒙古占领地区的外来文化流入了东亚各国。综观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确认，蒙古与高丽和亲之后，肉食文化通过王后、官员、商人、军队等人群为媒介传入高丽，使得高丽社会出现了肉食变得更为普遍、肉食范围逐步扩散的倾向。而在此之前，肉食仅限于高丽的少数上流阶层，而基层则受佛教文化影响，肉类消费量非常有限。

与肉食相伴而来的，还有酪和酥等乳制品，尤其是高丽屈服于蒙古之后，其生产量有大幅提高。朝鲜时代亦有记载，朝鲜王室“以酪粥为常膳”³²。酪粥又名驼酪粥，有趣的是“驼酪”在蒙古语是指将牛奶发酵而成的酸奶。这表明，在朝鲜时代

28 李盛雨《高丽之前的韩国食生活史研究》，乡文社，1978，362-362页。

29 李盛雨，同上本，364页。

30 金尚宝，同上本，331-332页。

31 Kim Hyesuk《〈居家必用史类全集〉的饮食烹饪法内容和朝鲜的引用》，载《东亚书籍的文化史与朝鲜时代饮食知识体系：以〈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为中心》，77-80页。

32 《朝鲜王朝实录》三四〈仁祖实录〉仁祖十四年（国编影印本）

酸奶不仅作为御贡品在王族当中消费，也被当做朝鲜上流阶层的日用食品和接待外国使臣的食品。朝鲜时代设有“司仆寺”、“内医院”等机构专门负责畜牧，并由这些机构负责向王室进奉乳制品。另外，朝鲜初期还存在专门制作驼酪粥等乳制品的集团，叫做“酥油赤”。他们是居住在平安道的蒙古人，原来主要从事于屠宰行业，在朝鲜初期负责向司膳房进献酥油，而后者是朝鲜王室御膳房的采购机构。可是到了朝鲜世宗三年（1421），朝廷下令废止向其采购³³。这些酥油赤很可能是从高丽晚期开始就已经在韩半岛北部地区定居的蒙古人，这表明朝鲜初期在半岛境内的蒙古人已经专门从事于乳制品制作行业。从中可以看出，朝鲜王室存留了以乳制品为主食的蒙古饮食文化。那么，韩半岛的乳制品食用历史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据《高丽史》记载，高丽明宗年间，翰林学士李纯佑上奏四机所有奶牛全被调用制作炼乳以备八关会之事，并指出此举恐有伤奶牛和幼牛³⁴。这表明高丽时期上流阶层已开始制作乳制品并将其用于国家大型活动。到了高丽晚期，开始出现乳制品生产专业化的倾向。在禡王时期专门设有“乳牛所”来制作御用乳制品，负责制作牛酪进献给王³⁵，王时而也将这些牛酪赐给近臣作补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推测高丽晚期已设有专门机构向王室进奉乳制品，而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朝鲜王朝。而高丽王室常食乳制品的习俗则源于主食乳制品的蒙古习俗，且这些蒙古饮食习惯是通过蒙古王后和官员们传入高丽的。

除了肉类和乳制品之外，本文还注意到，蒙古帝国的饮料“舍尔别”的传播路径。进入朝鲜时代，佛教逐渐衰亡，替代茶的饮料也随之得到了发展。在此过程中，蒙古帝国的饮料也被介绍到了韩半岛。朝鲜晚期的日用生活书籍《山林经济》收录了“渴水”即清凉饮料，介绍了“木瓜渴水”和“五味渴水”³⁶；而《林园经济志》则介绍了御方渴水、林檎渴水、木瓜渴水、葡萄渴水、香糖渴水³⁷。这些饮料的制作方法是照搬了《居家必用》“渴水番名摄里白”项下的内容，相同内容在《饮膳正要》里被介绍为蒙古大汗所饮用的“舍尔别”。

“渴水番名摄里白”是指番名及波斯语叫做“摄里白”，其种类有用桂皮、丁香、桂花等制作的“御方渴水”，当年度林檎果汁制作的“林檎渴水”，杨梅果汁制作的“杨梅渴水”，木瓜制作的“木瓜渴水”，五味子汁和蜂蜜熬制的“五味渴水”，葡萄汁加蜂蜜制作的“葡萄渴水”，松糖、藿香叶、生姜等熬制的“香糖渴水”，葛粉、郁金、山梔、甘草等制作的“造清凉饮法”等。其中用五味子汁和蜂蜜熬制而成的“五味渴水”的制作方法跟《饮膳正要》里介绍的“五味子舍尔别”非常相近。

33 《朝鲜王朝实录》二〈世宗实录〉世宗三年

34 《高丽史》卷五九〈李纯佑传〉

35 《高丽史》卷一三五，禡王十一年

36 洪万《山林经济》（坡州，景仁文化社，1973）

37 徐有渠《林园经济志》（首尔，保景文化社，1983）

文献名	原文
『飲膳正要』	五味子舍兒別：新北五味十斤，去子，水浸，取汁；白沙糖八斤，煉淨。右件一同熬成煎。
『居家必用』	五味湯水：北五味子肉一兩爲率，滾湯浸一宿，取汁同煎，下濃豆汁對當的顏色恰好。同煉熟蜜對入，酸甜得中。慢火同熬一時許，涼熱任用。
『事林廣記』	五味湯水：北五味子肉一兩爲率，滾湯浸一宿，取汁同煮。下濃黑豆汁對當的顏色恰好。同煉熟蜜對入，酸甜得所。慢火同熬一時許。涼熱任意用之。
『山林經濟』	五味子滾湯浸一宿，取汁同煮。下濃豆汁對當的顏色恰好。同煉熟蜜對入，酸甜得中。慢火同熬一時許，涼熱任意用之。 ³⁸

《飲膳正要》、《居家必用》、《事林廣記》、《山林經濟》等文獻里出現的五味湯水的制作方法都是在五味子汁里加入糖分熬煮而制，其方法基本相近。另外，朝鮮晚期的《山林經濟》里是直接引用了《居家必用》里面五味湯水的制作方法，可見它是參考了《居家必用》這本書籍。但是仔細閱讀之後，我們可以在細節上發現，各書籍在選材上存在一些不同之處。《飲膳正要》使用的是白沙糖，而《居家必用》、《事林廣記》《山林經濟》里面都是採用了在五味子里加入豆汁熬煮的，最後再添加蜂蜜放涼的方法；且與《居家必用》、《山林經濟》里記載為加入豆汁不同，《事林廣記》里特別記載為“黑豆汁”。關於五味湯水制作方法的這種差異，可能是源於各地區的风土和自然環境的不同。

在《飲膳正要》里，砂糖和白沙密（即白沙糖）作為甜味調料經常用於多種菜肴。在當時，中國生產砂糖的專門機構砂糖局是位於杭州³⁹，而泉州的永春地區則是白沙糖的主要產地，因為在這些地區居住著掌握制糖技術的穆斯林和猶太人。這些技術是通過從阿拉伯半島遷到泉州並定居的技術人員傳入的，並且此地區生產的白沙糖是直接進獻到大都的蒙古宮廷⁴⁰。蒙元宮廷里飲用的五味子湯水，在加上了通過西域傳入的白沙糖技術的點睛之筆後，作為珍貴飲料進獻到王室。與此相對應的是日用書籍里出現的五味子加豆汁的湯水，因其食材比較低廉，成為了老百姓的飲料。而在韓國，其傳統是同五味子一起加入綠豆來制作五味湯水，這是因為綠豆作為韓半島的主要生產豆類產品，比較容易買到，且更合朝鮮人的口味。

4. 結論

蒙古在13世紀建立了龐大帝國，從此蒙古帝國的影響遍及了東亞的政治、社會、制度等各個領域。本文主要從文化方面考察了“蒙古襲來”東亞各國的影響。

歐亞大陸在蒙古帝國時期迎來大規模的交流與融合。這一充滿活力的過程給帝國的中心和占領地區的文化帶來了變化，有時甚至完全改變一些地區的原有文化面貌。大元帝國的:center是各地區文化互相碰撞和交流的場所。當時蒙古的政策十分開

38 韓國傳統知識門戶網 <http://www.koreantk.com/ktkp2014/kfood/kfood-view.view?foodCd=109513>（搜索日期：2016年8月20日）
39 “杭州砂糖局宦皆主体，回回富商也”《山居新话》（《四库笔记小说从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40 尚衍斌，同上本，66-69页。

放，大批录用了蒙古、畏兀儿、西藏、波斯、汉、高丽等民族当官员。又在忽必烈执政时期，打通和建立了海运体系，打下了运送物资和商品流通的坚实基础，各个占领地区的物资开始大批集中到大都，使得帝国的中心在人员和经济层面出现了多种文化和谐共存的局面。最直观地表明这一时期的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大融合的现象即是饮食。从西亚、中亚一直到东南沿海和高丽，蒙古大汗可以尝遍从世界各地进献而来的山珍海味。

在1260年蒙古与高丽和亲之后，双方的人员交流开始重新活跃起来，帝国的饮食文化也自然而然的传入韩半岛地区。下嫁高丽的蒙古王后和她们的陪嫁家臣和侍从、达鲁花赤等蒙古外派官员、蒙古驻军和屯田人群以及访问过大元帝国的高丽人，都在这一时期充当了传播帝国饮食文化的媒介人，给高丽原有的饮食文化带来新要素和新观念。饮食文化是需要通过长时间的接触和交流才能缓慢变化的领域。高丽和朝鲜接受了部分大元帝国的饮食文化，这本身就反映了蒙古与高丽在历史上有过长期而广泛的接触与交流。

众所周知，在蒙古帝国瓦解之后，在其欧亚大陆征服地区诞生了众多民族主义性质的政权。明朝和李氏朝鲜确立了以程朱理学（性理学）为基础的王朝正统性，并努力从政治层面上抹去蒙古所遗留下来的痕迹。但是蒙古的文化因素早已融入社会生活中，其影响无法轻易被消除。元帝国这一政治实体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上，但其在13-14世纪所进行的广泛交流在东亚地区留下了众多的遗产与痕迹。有趣的是，我们可以从17-18世纪朝鲜的实学者们的文集当中发现这些痕迹的留存。这表明，“蒙古冲击”并未随着蒙古势力的衰退而一同消失，而是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作为一股强大的余波在东亚地区维持了其影响力。

指定讨论

高丽时期蒙古帝国饮食文化的传入与演变

[提问者 / 桥本雄、回答者 / 赵阮]

提问 / 桥本雄：

感谢您的报告，非常有意思。正好在日本《居家必要事类》开始出名。至今，一般观点认为日本人从17世纪，也就是江户时代开始吃拉面、面食，实际上15世纪的室町时代就已经开始吃面的事实刚刚得到证明。室町时代的僧侣写的《阴凉轩日录》中就提到招待客人食用《居家必要事类》中出现的“经带面”。这是一种碱水面，从分类上看属于拉面的一种。因此，日本人最早食用拉面应该是在15世纪。也就是说，在日本使用小麦粉制作面食的文化，大概是跟《居家必要事类》进入日本的同时开始的。我认为，此前日本有大麦、薏米等各种麦类，而从这时期开始，小麦在日本得到普及，所以才有了拉面。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韩国的面食文化是何时，以何种形式开始的？面粉也好大麦也好，您要是知道的话，向您请教。

第二个问题是，我觉得高丽的宫廷内信仰佛教的气氛非常浓厚，而他们面对肉食文化，是否有过抵抗、冲突或者迷惘呢？这一点大概跟《事林广记》等版本的种类，比如说是因公还是因私，到底由谁带进高丽，等版本的流传路径也有关系。我对高丽的佛教信仰一点都不了解，他们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吃肉的呢？都说日本人不会讲宏大的话题，还请赐教。

最后是个小问题，忽必烈给元宗赠送五百只羊的同时，还送了“卷宗”，请问这是什么样的东西？

回答 / 赵阮：

我今天的报告内容是在高丽食文化中考察蒙古食品对东亚的影响。其实我对高丽以外的地区也很感兴趣。比如在日本和越南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因为没有资料。您提到拉面，而且有据可循，这一点让我学到不少。

首先回答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佛教信仰非常浓厚的高丽宫廷对食肉文化的反应如何，有什么根据的问题。《高丽史》中有一份记录，有一个嫁到高丽的蒙古王妃，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在为母亲服丧时，每天都吃肉。把这一点特意写进了《高丽史》，当时读到的时候印象很深。我觉得之所以有这段内容，是因为王妃的行为在高丽人心目中比较少见，非日常所见。因此，蒙古这一元素凸显了高丽的佛教信仰与高丽的非普遍性文化的不同，人们感受到了这些蒙古因素的不同性质。但是，通过不断的通婚和密切接触，这些不同性质的文化很自然地被吸收进来，高丽人接受了帝国文化。通过被当作人质（质子）抓到元大都的高丽王们，以及在元大都长大的人质出身的高丽王，人们逐渐习惯这种文化，成为高丽人的日常的一部分。我推测是上层社会首先消除了对蒙古文化的抵触。

接下来回答您的第三个问题，高丽史中出现“下赐养只五百头”，这是《高丽史》中正式留下的记录，是由国家编纂的史料。除此之外，还有献牛，征工等记录。

最后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我也不能准确回答面食文化何时进入高丽，有一点已经得到考证，那就是从三国时代开始，制作材料并不是小麦粉，而使用了其他材料。所以说，虽然他们已经开始吃面食，但是材料并不是小麦粉。当时在韩国已经有面食文化，材料是否使用小麦粉看来还需要进行考证。

提问 / 桥本雄：

有关第三个问题中的“卷宗”，如果不是史料，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文件呢？

回答 / 赵阮：

我只看了《高丽史》中的记录，只有“送来了卷宗”的叙述。到底交换的是什么样的卷宗，我也不清楚。应该是当时的外交文书中出现的记录吧。



“深簷胡帽”考： 一种女真帽式在蒙元时代的 盛衰史

张佳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原文为中文、日语翻译：宋刚（北京外国语大学）]

提 要

明朝洪武元年发布的更易“胡服”诏令，曾经专门提到元代流行的“深簷胡帽”。综合考察蒙元时代的各类资料可知，这种具有深刻时代特征的帽式，即是“幔笠”（或名“方笠”、“四角笠子”）。幔笠本是金代女真服饰，后被蒙古人接受，并在蒙古征服的裹挟下遍及中国、高丽、中亚乃至波斯地区；使用人群亦遍及君主、臣僚、文人、庶民各个社会阶层。元明鼎革之后，它被汉族士大夫视作中国在元代“胡化”的重要象征，从而迅速淡出历史舞台；丽鲜易代之际，幔笠也在朝鲜半岛上演了类似的历史。

幔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迄今为止的蒙元服饰研究，却对其缺乏正确认识，以致与明代帽式混同。有关幔笠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厘清许多重要图像资料的时代，而且幔笠在东亚流行与消亡，也从侧面见证了烜赫一时的“蒙古风”的兴衰、以及东亚儒家知识分子“胡汉华夷”意识消涨的历史。

1. 引言：从一则史料的校勘说起

洪武元年二月壬子（1368年2月29日），即位仅仅三十八天的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颁布了著名的革除“胡服”¹令，号召臣民“复衣冠如唐制”，也即恢

¹ 本文中所使用的“胡服”、“胡化”、“华夷”、“夷夏”等词汇，均系为了便于表达而沿用历史惯称，并不包含价值倾向。

复唐代的衣冠样式，以此显示新王朝在文化上对“中国正统”的继承。《明太祖实录》概述和节录了这一诏令的内容，云：

诏复衣冠如唐制。初，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椎髻，**深檐胡俗**，衣服则为袴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字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上久厌之。至是，悉命复衣冠如唐制。……不得服两截胡服，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²

在中国近世文化史上，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献，屡屡为研究蒙元史和明史的学者所引用。不过，这份诏令所言及的服饰名物，笔者尚未见有专门的探讨。今天通行的史语所校印本《明实录》，系据多种明清抄本整合而成，虽经校勘，讹误依然众多。本条诏令中文字扞格之处，亦未见有很好的校勘与疏通。

例如，“深檐胡俗”一句，“檐”依据《洪武正韵》等字书的解释，即古代服饰配件中的“蔽膝”³，于此文意难通。《太祖实录校勘记》此处云“旧校改‘俗’作‘帽’”⁴，但“深檐胡帽”一语，文意依旧晦涩。幸运的是，嘉靖以降，随着明代诸朝《实录》的传抄出宫，抄撮《实录》纂修各体史书，在明后期史家当中蔚为风气。周藩宗正朱睦㮮（1517-1588），在分类纂录洪武朝政事的《圣典》一书中，引用《实录》此条，作“深簷胡帽”⁵。嘉靖《宣府镇志》和顾炎武《日知录》引及此一诏令，也均作“深簷胡帽”⁶。此外，从诏令上下文语境推断，“辫发椎髻”描绘元代发式、“袴褶窄袖”描绘衣式，“深簷胡帽”描述元代帽式，文意允切。因此，综合考虑以上因素，通行本《明太祖实录》革易“胡服”诏令，“深檐胡俗”一词，应当校正为“深簷胡帽”；“檐”是“簷（异体作‘檐’）”之形讹，“俗”则系涉上文“胡俗”而误。

然而，“深簷胡帽”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帽式？其在元代流行程度如何？元明易代之后，是否又真的随着“胡服”禁令而从民众日常生活当中消失？这些更为深入的追问，远非文本校勘所能解决，而应从元明史料、尤其是能够反映社会生活实态的图像资料当中，寻求答案。

2. 正名：元代“瓦楞帽”考误

顾名思义，“深簷胡帽”是以“深簷”作为特征的。考察元代图像材料不难发现，这类造型颇为奇特的帽式，在元代甚为常见；而且在较早的时候，已经被研究中国服饰史的学者注意到。沈从文先生（1902-1988）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81年初版于香港），在考订元至顺（1330-1332）刻本《事林广记》所载打双陆图（参看图1）时，首次将图中“官员”所戴的这种深簷、四角、方形的帽式，命

2 《明太祖实录》卷30，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第525页。

3 宋濂等纂：《洪武正韵》卷6。

4 《明太祖实录校勘记》，第103页。按，《校勘记》此处以“胡俗衣服”四字为句，并不妥当。

5 朱睦㮮：《圣典》卷9《易俗》，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5册，第342页。

6 嘉靖《宣府镇志》，收入《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察哈尔省》，台北成文出版公司，1970年，卷20，第216页。陈垣：《日知录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卷28，第1624页。

名为“四方瓦楞帽”⁷。沈氏这部著作，是中国服饰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影响极巨。



图1

“瓦楞帽”的命名，一直被后来的服饰史著作所沿用。不过，这种帽式虽然以“四楞”（或曰“四角”）为常见，但也偶见六楞者，因此研究者又创造出“四楞瓦楞帽”、“六楞瓦楞帽”等等名目⁸。

中国古代名物研究的难点在于，图像资料中的、或者出土的物品，本身往往没有自名，因此很多物品如何定名，便成为难题。在无法与确凿的文献材料进行比对的情况下，研究者根据物品的形制来命名，便成为一个权宜的办法。实际上“瓦楞帽”一名，并未见于任何蒙元时期的文献；沈从文先生如此定名，也仅是一种权宜之举。幸运的是，在日本覆明洪武四年刊本《魁本对相四言杂字》（现存最早的看图识字课本）当中，这种帽式清楚地自名为“幔笠”（参看图2）⁹。在元代文献当中，又写作“幔笠”；因其形状为方形、迥异于其他的笠帽样式，又被称作“方笠”。而且这种笠子独特的“深簷”样式，成为不少元人吟咏的对象。例如，王和卿描绘秃发者以幔笠遮盖的滑稽小令《天净沙·咏秃》，即云：

笠儿深掩过双肩，头巾牢抹到眉边。款款的把笠簷儿试掀，连慌道一句：“君子人不见头面”。¹⁰

曲中所谓“笠儿深掩过双肩”，无疑是对幔笠“深簷”特征的夸张描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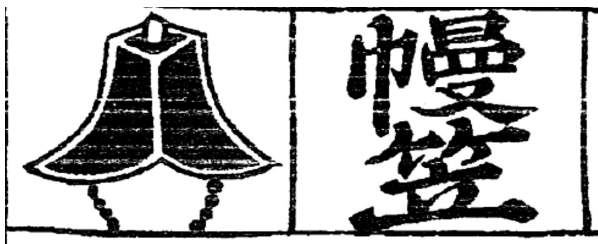


图2

如果仅仅是恢复“幔笠”（或“方笠”）这一历史本名，似乎完全无需如此大费笔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沈从文将幔笠权宜地定名为“（四方）瓦楞帽”，却意外地误导了明代服饰史、乃至元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原因在于，“瓦楞帽”一名虽然迄今未见于任何蒙元文献，却大量出现在明代后期的史料当中。明代的瓦楞

7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四六《元代玩双陆图中官僚和仆从》，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535页。

8 参看赵刚等著：《中国服装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7页。

9 《魁本对相四言杂字》，收入《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第15册，凤凰出版社，2012年，第344页。

10 杨朝英纂：《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卷3，中华书局，1958年，第110页。

帽，因其帽顶折叠、形状似瓦而得名，在晚明人物画像当中极为常见（参看图3，曾鲸[1568-1650]绘张卿子像）。在沈氏《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引发巨大影响之前，名物词典中有关“瓦楞帽”的解释不误，如华夫等主编《中国古代名物大典》（济南出版社，1993年）云：

瓦楞帽，省称“瓦楞”，一种顶部折叠如瓦楞的帽子，明代平民所戴。¹¹



图3

然而，沈氏之后的服饰史著作以及新近出版的名物词典，多将明代的瓦楞帽，附会为元代的幔笠。例如，《中国文物大辞典》（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编，2008年）“瓦楞帽”条即云：“金元时已有，明代专用于士庶”，不加考辨地将“瓦楞帽”之旧释、与沈氏的研究强行捏合在一起（以笔者之固陋，尚未在金元文献中发现明代样式瓦楞帽）。《中国设计全集·服饰类编》（张秋平等编，2012年）“元代瓦楞帽”条，更混糅多种研究，谓：“北方游牧民族流行的帽式，明代沿用……瓦楞帽在明代为平民所戴”，并引证多种文献，证明瓦楞帽在明朝的流行¹²。此类认知淆乱，限于篇幅，无法在此一一列举。

“瓦楞帽”的命名错误，还误导了元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出于对蒙元历史地位的焦虑，蒙元对明朝的影响，成为一个颇受关注的主题。在不少研究当中，明代后期流行瓦楞帽，成为明朝在文化上延续蒙元影响、“胡风”流行的典型例证¹³。通过上面的讨论不难发现，这实在是一个因将元代幔笠和明代瓦楞帽混为一谈，而造成的误会。

3. 源与流：幔笠的起源及其在亚洲的传布

洪武元年的禁令，将“深簷胡帽”贴上了蒙古标签，但从源头上来说，幔笠虽然盛行于元代，却并非起源于蒙古服饰。检索考古资料不难发现，这类帽式金代就已经出现在中原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确凿的幔笠图像资料，是山西高平县李门村金正隆二年（1157）石刻女真人乐舞图（参看图四）。这组图像资料带有浓郁的

11 华夫等编：《中国古代名物大典》，济南出版社，1993年，第529页。

12 张秋平等编：《中国设计全集·服饰类编》，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55页。又如，黄能馥等编：《中国服装史》，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年，第297页。董进（颀芳主人）所著《大明衣冠图志》是迄今所见最好的明代服饰史研究专著，但依然遗憾地沿袭了这个错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16页）。

13 参看罗玮：《汉世胡风：明代社会中的蒙元服饰遗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24-2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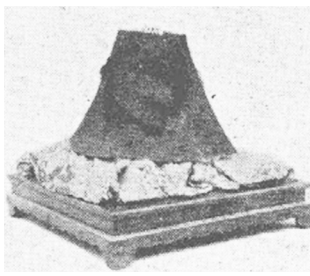
女真风格，其中人物髡首辫发、着尖靴、佩蹀躞带，乐舞唯用笛、鼓，皆与两宋文献所描述的女真习俗相符¹⁴。与元代的习见样式稍有不同的是，此处的幔笠为尖顶。元代常见的方顶幔笠，见于金大安二年（1210）山西侯马董玘墓砖雕（参看图五，顶部有帽饰）。



图四



图五



图六



图七

从目前所见材料推断，这种源于女真的帽式，大约从金代晚期开始，在中原地区的汉族民众当中流行。蒙元早期的北方墓葬当中，出现了较多的此类图像与实物材料。如山西大同冯道真墓（1265年）出土藤制幔笠一件，稍后的王青墓（1297年）则出土藤、草幔笠各一件（图六）¹⁵。陕西蒲城洞耳村壁画墓（1269年），则充分反映了蒙古国时期北方汉、女真和蒙古三种文化的交融（参看图七）。从姓氏和籍贯来看，该墓男女主人应该皆为汉人，但却有蒙古名；壁画中的人物，均穿着带有女真（左衽、幔笠）和蒙古（腰线袄、罽罽冠）混合风格的服饰。以上这些都显示，早在蒙元前期，幔笠已经成为北方民众的重要日常用品。

不过，中国南方的情形并非如此。在长期宋金对峙的巨大军事压力下，儒学理论当中的“华夷之辨”，成为南宋朝廷凝聚民心、一致对外的有力精神武器。这不仅体现在南宋的思想文化上（例如，被南宋士人作为教材的胡安国[1074-1138]《春秋传》，便以高标“攘夷”为特色¹⁶），也反映在日常生活当中。南宋朝廷和士大夫，对异族风俗习尚的渗透，抱有极度的警惕。绍兴年间时局刚刚稳定，宋高宗“念境土地未复，将用夏变夷”，下令禁止市井百姓“效胡乐、胡舞，长跪献酒”等女真式的娱乐活动¹⁷。对于由金朝投奔来的“归正人”，南宋政府在给予安置的同时，也一再要求他们不得继续“胡服”¹⁸。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有人对临安民

14 有关该图的介绍，参看景李虎：《金代乐舞杂剧石刻的新发现》，载《文物》1991年第12期，第34-37页。该报告亦受沈从文的影响，将图中的幔笠称作“瓦楞帽”。女真人在大规模接受汉文化之前，乐器较为简单，《三朝北盟汇编》谓：“其乐则唯鼓、笛，其歌则鹧鸪之曲”。

15 大同市文物陈列馆：《山西省大同市元代冯道真、王青墓清理简报》，《文物》1962年第10期。

16 参看牟润孙：《两宋春秋学之主流》，收入《注史斋丛稿》，中华书局2009年，第69-87页。

17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10，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436页。

18 李之亮点校：《宋史全文》卷24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下册，第1640页。

众效习“胡俗”发出警告，这是反映南宋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夷夏之辨”的有趣文献：

臣僚言：“临安府风俗，自十数年，服饰乱常、习为胡装，声音乱雅、好为胡乐。如插棹篦、不问男女，如吹鹧鸪，如拨胡琴，如作胡舞，所在而然。此皆小人喜新，初则效学以供戏笑，久习之为非，甚则上之人亦将乐之、与之俱化矣。臣窃伤悼，中原士民沦于左衽，延首企踵，欲自致于衣冠之化者，三四十年来不可得，而东南礼义之民，乃反堕于胡虏之习而不自知，甚可痛也。……伏望戒敕守臣，检坐绍兴三十一年指挥，严行禁止，犯者断罪，令众自然知惧矣。”诏从之。¹⁹

从史料来看，金国服饰对南宋似乎确实产生了某些影响，但这种影响不应太过夸大，甚至认为南宋服饰“几乎已完全与北方民族‘混一’了”²⁰。中国南北服饰真正接近“混一”的状态，要到元代统一江南、从地理乃至心理上逐渐消泯夷夏界限之后。至少从南宋使臣留下的大量文献来看，衣冠服饰的巨大差异，依然是宋金民众最为直观的区别。例如，乾道六年（1170）范成大使金途经开封，便发现：

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男子髡顶，月辄三四髡，不然亦间养余发，作椎髻于顶上，包以罗巾，号曰“蹋鸱”，可支数月或几年。村落间多不复巾，蓬辩如鬼，反以为便。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已北皆然，而京师尤甚。惟妇女之服不甚改，而戴冠者绝少，多绾髻。²¹

淳熙丙申（1176）年使北的周焯，进入金国统治的睢阳，亦云：

入境，男子衣皆小窄，妇女衣衫皆极宽大……无贵贱，皆著尖头靴，所顶之巾，谓之蹋鸱。²²

此时南北分隔仅半个世纪，而北方民众的服式、发式，已与南方产生巨大差别。这些明显不是范成大、周焯等使臣在南宋所习见者。政区的边界、以及更为重要的“夷夏之防”心理界限，显然是阻遏北方民族服饰向南传播的两大障碍；而这一状况真正改变，要到元代。

就幔笠而言，虽然南宋晚期已经流行于金蒙占据的淮北地区，但对南宋本土并未产生太多影响。南宋灭亡之初，德祐二年（1276）二月，左相吴坚等人担任祈请使赴蒙，渡河进入金朝故地邳州，发现“自此，人皆戴笠，衣冠别矣”²³。随着蒙古对南宋的征服，原本带有异域、异族色彩的幔笠，很快在南方得到传播，并且成为时尚。宋濂在给南宋遗民、抚州士人李士华（1266-1351）所作墓志中提到：

会宋亡为元，更易方笠、窄袖衫，处士独深衣幅巾，翱翔自如，人竞以迂。处士笑曰：“我故国之人也，义当然尔”。²⁴

坚持不易故国衣冠，只是李士华这类少数遗民的行为。为求得出仕机会，不少士人把戴笠、穿着北族服饰，作为向蒙古征服者表示顺服的标志。江南平定之初，文士胡长孺（1249—1323）被征入都，据说便是戴笠而往。《农田余话》记载了一

19 《咸淳临安志》卷47，《宋元方志丛刊》第四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3775—3776页。

20 刘复生：《宋代“衣服变古”及其时代特征——兼论“服妖”现象的社会意义》，《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88-89页。对于宋代服饰所受的北族影响，本文论述最为详细。

21 范成大：《揽辔录》，收入孔凡礼点校：《范成大笔记六种》，中华书局，2002年，第12页。

22 周焯《北辕录》，顾宏义点校：《宋代日记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第1134页。

23 严光大：《祈请使行程记》，王瑞来：《钱塘遗事校笺考原》，中华书局2016年，第331页。

24 宋濂：《北麓处士李府君墓碣》，黄灵庚点校：《宋濂全集》卷69，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647页。

个有趣的故事：

赵文敏孟頫、胡石塘长孺，至元中有以名闻于上，被召入。见问文敏：“会甚么？”奏曰：“做得文章，晓得琴棋书画。”次问石塘，奏曰：“臣晓得那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本事。”时胡所戴笠相偏欹，上曰：“头上一个笠儿尚不端正，何以治国平天下！”竟不录用。²⁵

野史里的故事未必属实，但戴笠在元代江南的确是一时尚尚。至顺年间刊行的日用类书《事林广记》，谓：“笠子，古者虽出于外国，今世俗皆顶之。”²⁶从图像资料来看，戴幔笠者并没有族属或者社会阶层的限制。元代文学家虞集（1272-1348）的传世画像（参看图8），即头戴黑笠；而元末讽刺张士诚幕府文人的小令所谓“皂罗辫儿紧扎梢，头戴方檐帽”²⁷，描绘得大概也是类似的一个髡首辫发、头顶幔笠的文士形象。而福建将乐杨氏家族壁画墓中的舆夫仆役，所戴也是同种类型的笠子（参看图9）。



图8



图9



图10

幔笠的流行，一直到元末不衰，甚至连皇帝亦不能免俗。现存元代帝王肖像，除去钹笠，亦有戴幔笠者。明人摹元周朗《天马图》中的元顺帝，即头戴尖顶幔笠（参看图10）。幔笠流行的区域，也不仅限于中国，而是随着蒙古大军的征服，传播到亚洲各地。

十世纪以降，高丽在领土上与先后与辽、金两国接壤，虽然迫于武力，不得不向着这两个北方民族政权纳贡称臣，但在文化政策上高丽奉行的却是一种类似于后世朝鲜的“小中华主义”态度，也即主动接受中原文明、尽量避免草原习俗的渗透。高丽太祖王建（877-943），曾经留下了著名的“训要十条”，其一日：

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尊其制……契丹是禽兽之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衣冠制度，慎勿效焉。²⁸

虽然学者对《高丽史》这段记载的真伪有所争议，但其中依然透露出高丽文化阶层的“慕华”意识。丽末文臣赵浚（1346-1405）总结高丽衣冠的演变，云“祖宗衣冠礼乐，悉遵唐制；迨至元朝，压于时王之制，变华从戎”²⁹。《高丽史》所载的舆服制度，相当程度上是唐宋制度的杂糅。北宋末使臣徐兢记述在高丽之所见，云：

25 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卷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39册，第333-334页。

26 《事林广记》后集卷10，《续修四库全书》第1218册，第373页。

27 瞿佑：《归田诗话》卷下，乔光辉：《瞿佑全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73页。

28 《高丽史》卷2《太祖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12年，第一册，第26页。

29 赵浚：《松堂集》卷3，《韩国文集丛刊》第6册，第425页。

（高丽）唐初稍服五采……逮我中朝，岁同信使，屡赐裘衣，则渐渍华风，被服宠休，翕然丕变，一遵我宋之制度焉，非徒解辫削衽而已也。³⁰

然而，高丽这种受儒家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夷夏”意识、以及衣冠上的“慕华”政策，在蒙元时代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在九次残酷的抗蒙战争（1231-1273）失败之后，高丽被卷入蒙元世界体系。虽然忽必烈允许高丽不改冠服，身为蒙元驸马的高丽忠烈王（1274-1308在位）为了表示彻底降顺，不仅自身“辫发胡服”，而且于1278年下令全国臣民衣装蒙古化：

令境内皆服上国衣冠，开剃。蒙古俗，剃顶至额，方其形，留发其中，谓之开剃。³¹

政令一出，“自宰相至下僚，无不开剃”，即便儒生，亦不能免。高丽衣装蒙古化之彻底，甚至连忽必烈都觉诧异：

（世祖）因问（高丽人）康守衡曰：“高丽服色何如？”对曰：“服鞮鞢衣帽。至迎诏贺节等时，以高丽服将事。”帝曰：“人谓朕禁高丽服，岂其然乎！汝国之礼，何遽废哉！”³²

忠烈王十六年（1289），高丽儒臣郑可臣辫发顶笠面见元世祖，这种充溢着马上之风的装束，与儒生的身份不协调，世祖遂“命脱笠”，并告谕“秀才不须编发，宜著巾”³³。不过，这似乎并未影响笠子在高丽的流行，丽末恭愍王、禑王时期，幔笠（方笠）甚至成为官员（“代言班主以上，皆戴黑草方笠”）和各司胥吏（着白方笠）的公服³⁴。



图11



图12

不仅在东亚，蒙古征服者还将幔笠带到了中亚和西亚地区。高昌故城出土的回鹘文刻本佛本生故事插图，原本的印度人物，却均被冠以幔笠（参看图11）。而在十四世纪初伊利汗国史家拉施特编纂的历史巨著《史集》当中，也出现了头戴幔笠的蒙古君王形象（参看图12）。原本属于女真服饰的幔笠，在被蒙古人接受之后，随着蒙古马蹄到达了亚洲的各个地方；在某种程度上，它可被视作蒙古征服冲决政权、族群与文化藩篱的一个象征。

30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七《冠服》。

31 《高丽史》卷72《舆服》，第二册，第476页。

32 《高丽史》卷28《忠烈王一》。

33 《高丽史》卷105《郑可臣传》。

34 《高丽史》卷72《舆服一》。

4. 重树藩篱：幔笠的淡出与东亚“夷夏”意识的消涨

十四世纪后期元帝国的衰亡，结束了不同族群文化自由交融的短暂历史。在蒙元帝国的废墟上，不仅政权之间的地理疆界，族群之间的文化与心理界限，也重新明晰起来。新建立的明帝国，同时面对着北元的军事压力和内部的合法性危机；其解决策略之一，便是重新标举儒家“华夷之辨”的旗帜，宣布在文化上“用夏变夷”、“复我中国先王之旧”，以去“蒙古化”运动，来塑造政权的正统性³⁵。这一政治和文化的剧变，迅即在东亚世界产生影响。

正如洪武元年胡服禁令所说，明朝新建立的服饰制度，其目标是要恢复唐制度。改易衣冠，是因“陋胡人旄头之制、草场简便之风”，而“特慕唐朝尊重之俗”；政府也希望借此引领风俗，“共成复古之盛”³⁶。作为“胡元”马上之习、“豪侈粗戾”之风的一部分，幔笠和其他金元北族服饰、发式一道，或被禁止、或被限制在特殊场合使用。禁革之后，幔笠已基本不见于明代图像资料——需要指出的是，某些研究所引用的少数“明代”幔笠形象，要么是误判材料年代（如《宝宁寺明代水陆画》，参看图13），要么是使用的是明代重刊的元代资料（如万历重刊李孝美《墨谱》，参看图14），这些图像并不能反映明代社会生活的实态，却容易让研究者坠入“以图证史的陷阱”³⁷



图13



图14

下面的故事说明，在禁革胡服百年之后，明朝人对幔笠已经相当陌生。弘治元年（1488），朝鲜官员崔溥因风飘至浙江，因在丧中，崔氏头戴“深笠”（即幔笠，在朝鲜演变为丧服之一，详下），这种奇特的造型很快引起了中国人的注意：

（桃渚所千户陈华）与一官人来看臣，指臣笠曰：“此何帽子？”臣曰：“此丧笠也。国俗皆庐墓三年，不幸如我漂流，或不得已有远行者，则不敢仰见天日，以坚泣血之心，所以有此深笠也”。³⁸

35 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参看拙著《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

36 刘夏：《刘尚宾文续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326册，页155。

37 关于历史研究中图像使用需要注意的问题，参看缪哲：《以图证史的陷阱》，载《读书》2005年第2期。

38 崔溥：《漂海录》，葛振家点校本，线装书局2002年，第62页。

这种深簷遮掩、不见天日的笠子，明人看来颇为奇异，崔溥不得不多费唇舌加以解释。然而，一百余年之前，它还流行在江南地区，上自学士大夫、下至舆夫仆役，靡不风从。这个例子说明，随着元明易代，幔笠已经退出了明人日常生活。

蒙元帝国崩溃后，幔笠在朝鲜半岛的遭遇，也与中国类似。部分源于丽末的国家独立意识、部分受到明朝影响，丽末鲜初的朝鲜半岛，也发生了一场革除“胡服”运动。明朝以复古为号召的服饰改革，迅速被丽末儒臣视为“华夏”文明复兴的表征。在明丽宗藩关系建立过程中，高丽屡次遣使请求袭用“大明衣冠”，以此向明朝展示“慕华向化”之心；而革除蒙元服饰、接受明朝衣冠，在高丽内部还被赋予了“追复（高丽）祖宗之盛”的特殊意义³⁹。

在高丽恭愍王时期，幔笠一度成为“代言班主”以上高官的公服。而在仿明制建立起来的李朝服饰体系里，幔笠被规定为“乡吏”阶层的常服⁴⁰。李朝初年规定，乡吏不得以闲良人员充任；在官吏群体当中，乡吏保留胜国服饰、不与新朝之制，无疑有贱辱之意。这与明初命宦官剃蒙古式“一搭头”、命皂隶戴插羽小帽，异曲同工。因此，朝鲜成宗三年（1472），礼曹要求平安道乡吏与他处一样，遵照《经国大典》穿戴“黑竹方笠”，便遭到激烈抵制：

平安道江西县吏康翰等上言启：“本道诸邑乡吏，率以良民假属，故并着草笠，其来已久，不可依他道例著方笠，请仍旧”。从之。⁴¹

连“良民”出身的乡吏，都不愿意佩戴显示其微贱地位的幔笠，士大夫更无人乐意。因此，正如前文崔溥所言，只有在居丧外出时因穿著丧服不便，才头顶深簷幔笠，以示“不敢仰见天日，以坚泣血之心”。幔笠在朝鲜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外出临时穿著的丧服。孝宗时，许积和国君讨论冠服制度，即称“前朝（高丽）士大夫着四角笠，即今丧人所着方笠也”⁴²。

由高官服饰沦为权便的丧服，幔笠地位一落千丈。然而，随着朝鲜士人“小中华”意识的不断强化，幔笠的丧服资格，也几乎不保。丁卯、丙子胡乱之后，学者开始质疑幔笠的源起、讨论居丧穿着是否合适。例如，郑经世（1563-1633）在回答学者是否应以“平凉笠”取代原为“胡金之制”的方笠时，认为居丧外出，也应穿著丧服、不可苟简⁴³。李光庭（1674—1756）意见比较暧昧，认为“方笠虽曰胡金之制，先儒居丧，亦多以深衣方笠出入者”，是“衰经不可以行道”的不得已之举⁴⁴。李德懋（1741-1793）的态度，则甚为决然：

方笠是金人之服，丽末宰相戴之，我朝中叶胥吏戴之，今则为丧人所著。其制尤为怪骇。东国丧服粗具礼制，而头著虏笠，不可不改正者也。⁴⁵

源于“胡金”的幔笠不仅淡出了民众日常生活，而且在强烈的夷夏情节之下，连作为权宜丧服也受到质疑和抵制。这与蒙元时代上自帝王、下至民庶靡然风从的盛况相比，无疑有天壤之别。幔笠在中国和朝鲜半岛的盛衰，竟然一定程度上成为

39 高丽接受明朝衣冠、改革“胡服”的过程，参看拙作：《衣冠与认同：明初朝鲜半岛袭用“大明衣冠”历程初探》，载《史林》2017年第1期。

40 朝鲜总督府中枢院印行：《经国大典》卷3《礼典·仪章》，1934年，第231页。

41 《成宗大王实录》卷21，成宗三年八月丁丑，（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影印：《朝鲜王朝实录》，1968年，第8册，第680页；卷26，成宗四年正月壬寅，《朝鲜王朝实录》第9册，第2页。

42 《孝宗大王实录》卷18，孝宗八年正月壬辰，《朝鲜王朝实录》第36册，第74页。

43 郑经世：《愚伏集》卷11《答金伯品问目（戊午）》，《韩国文集丛刊》第68册，第209页。

44 李光庭：《讷隐集》卷5《答辛与则（师锡）问目》，《韩国文集丛刊》第187册，第223页。

45 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61《论诸笠》，《韩国文集丛刊》第259册，第94页。

知识阶层夷夏意识消涨的指针。

5. 小物件与大历史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知道，长期以来被误名为“瓦楞帽”、并被视作典型蒙古服饰的幔笠，其实是一种起源于女真的帽式。虽然只是一顶小小的笠子，它的流行盛衰史，却如同标志物一般，直观地反映了十二至十四世纪东亚族群与政治格局的变迁、以及东亚儒家文化圈内华夷胡汉观念的消涨。

带有浓郁北方民族风格的幔笠，金代后期已在中原民众当中流行。宋室南渡之后，中原故土化作南方士人眼中的文化异域，衣冠、风俗上的“华夷之辨”，阻遏了幔笠向南传播。高丽虽与辽金壤地相接，但文化上的“慕华”心态，使他们对游牧民族服饰心存芥蒂。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征服运动，不仅冲决了东亚大陆各政权间的地理疆界，而且荡涤了各族群间的文化藩篱。幔笠也在此时伴着蒙古人的马蹄，传播到亚洲各地。随着夷夏意识的淡化，在潮流裹挟与利益诱惑下，北人衣冠成为江南的一时风尚。高丽则以自上而下激进“胡化”的方式，接纳了“鞬鞞衣帽”。正是在这种政治和思想背景中，幔笠在东亚风靡一时。蒙元帝国的崩溃，标志着各族群文化自由融合时代的结束。在蒙元旧基上崛起的新兴王朝，开始重新划定政权与文化的边界。在日益激烈的夷夏情节影响下，幔笠淡出民众的日常生活，化作了历史陈迹，以至今日可以作为图像文献断代的标尺（参看图15、16）。小小的幔笠，成为了蒙元帝国前后政治与文化变迁的缩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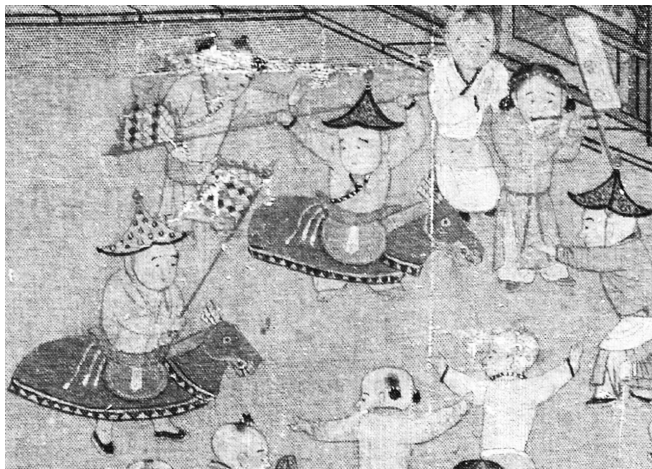


图15



图16

图片说明

图1：《打双陆》，元至顺刊《事林广记》续集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218册。

图2：日本覆明洪武四年刊本《魁本对相四言杂字》，《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第15册。

图3：曾鲸绘《张卿子像》

图4：《女真乐舞图》，《金代乐舞杂剧石刻的新发现》，《文物》1991年第12期。

图5：大安二年侯马董玘墓砖雕，取自《平阳金墓砖雕》。

图6：《醉归乐舞图》，陕西蒲城洞耳村元墓壁画（至元六年），《中国出土壁画全集》第7册。

图7：王青墓出土藤幔笠，《山西省大同市元代冯道真、王青墓清理简报》，《文物》1962年第10期。

图8：虞集像，元佚名《名贤四像》，《元画全集》第四卷第五册。

图9：《人物轿輿图》（局部），福建将乐元代墓室壁画，《中国出土壁画全集》第十册。

图10：明人摹周朗《天马图》，《故宫藏品大系·绘画编》第五册。

图11：蒙元回鹘文刻本佛本生故事插图残片。

图12：《史集》插图中的蒙古君主。

图13：《误死针医横遭毒药严寒众》（局部），出《宝宁寺明代水陆画》。

图14：《和制》，出万历重刊本李孝美《墨谱》插图。

图15：旧题《宋佚名百子图》，《宋画全集》第六卷第二册。

图16：旧题《道子墨宝·地狱变相图》（局部），《宋画全集》第六卷第二册。

指定讨论

“深簷胡帽”考：一种女真帽式在蒙元时代的盛衰史

[提问者 / 向正树、回答者 / 张佳]

提问 / 向正树：

您的报告非常让人愉悦。而且水平也很高，让人受益匪浅。特别是在研究物件方面，有时是看得见的实物，有时往往又难得一见。有时需要进行图像资料的研究，还必须与文献进行比对。张佳老师的报告纠正了以往的误解，包含许多新内容，给我们带来新的认识，对于应该如何进行这种研究，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我准备了几问题，比如说“接受了服饰”究竟是什么含义？能接受或者没能接受，有过抵抗或者没有抵抗，您谈的是中国北方吸收蒙古帽子的过程。那么，我们思考为什么被中国北方人接受的原因时，其中一点就是因为蒙古人是当权者，老百姓要奉承当权者，投其所好。要么就是，如果当权的话，在文化上也有权力，那么服饰方面当然也可能被接受。请问在这一层面上您是如何思考的。

在中国所看到的蒙古时代的服饰，当然帽子也是服饰的一部分了，女子的服饰会有点收腰。我想大概是因为要骑马。所以袖口和腰部要收一些，便于活动。那么女性服饰和男性服饰在接受时是否有变化？您的论文写到壁画上可以了解到元代汉族女性也接受了蒙古女帽。或许我的理解有些简单，如果接受男性服饰的背后，有相当大的原因与政治相关，而女性服饰跟权力就没什么关系了。这一点我很感兴趣。

回答 / 张佳：

谢谢向教授的意见。我可能有些意思没有完全的理解，所以我就按照我的理解来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蔓笠这么容易在北方流行？这个原因比较简单，我个人认为有两个，第一个是当时女真人在占领华北的时候推行了和清代一样的所谓剃发易服的政策，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方面有明确的规定：金代前期规定，征服的汉地人必须留女真人的发式，穿女真人的衣服，否则要杀头的。这是所谓的强制的文化政策，自上而下的。第二点还有柔性的民族融合，尤其到了金代后期，大量的女真人到中原定居，这种民族融合的结果自然是各种风俗的混合。所以我们再看元代的服饰遗存的时候会发现非常有趣，中原地区的元代服饰文化里面有汉族传统的，有女真的，有蒙古的，甚至还有一些更加异域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那么您提到的这些北方民族的服饰在元代流行的原因，当然还有一点，出于时尚的追随，变成了一种 fashion，大家都要追随这种时尚；还有一点我刚才没有详细展开讲，征服早期很多人把它作为一种政治投机的资本，就是比如说南方地区，江南的一些汉人以穿着蒙古民族的衣服作为向蒙古示好的方式，表示我服从你的统治。在蒙古征服的早期，根据现有材料来看，也曾经强制推行过留蒙古人的发式、穿蒙古人的衣服这样的政策，但是这个政策在后期就被废除了。我们今天来看蒙古在征服南宋的时候，并没有规定南宋统治的老百姓必须要跟蒙古人一样，没有这

样的政令。

也就是说，他们接受蒙古服饰主要是早期很多人政治投机的需要，到了后期就变成了一种时尚潮流的服从。

另外关于女性，目前我所见到的材料，没有女性带蔓笠形象的材料出现，但是元代汉族女性的装束也受到某些蒙古因素的影响，比如我们会看到一些元代汉族妇女的形象，她们的头上也会戴一个造型很奇特的姑姑冠，在座也有蒙古族的老师，现在很多蒙古女性依然戴这种帽子。这个在传统的汉族人来看还是比较奇怪的，可能这也是一种时尚，或者跟她丈夫的地位是有某些关联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您的问题，谢谢。

综合讨论

主持／总结：刘杰（早稻田大学）

论点整理／赵珖（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

总结／三谷博（跡見学園女子大学）



刘杰

我是早稻田大学的刘杰，担任今天的主持。昨天共有11位学者进行了学术报告。下面首先请赵珖教授对这些报告进行论点梳理，然后进入全体讨论。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国史之间的对话”，请各位从以上视角展开讨论。



1. 论点梳理—四场报告

赵珖

我是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的赵珖。本次会议的正式名称是“第2届日本·中国·韩国国史之间对话的可能性”，是在“国史与国史之间的对话”这一宏大的主题下举办的论坛。“蒙古袭来与13世纪蒙古帝国的全球化”正是我们这两天集中讨论的主题内容。“蒙古袭来”和“全球化”是本次论坛的关键词。回顾人类的历史，蒙古帝国大概是最早成功实现全球化的世界帝国。本论坛的主题正是建立在这种观点之上考察中国、韩国、蒙古，以及日本的发展经历，正确理解实现全球化的整个过程。

全球化，其实并不是简单的世界化。过去有段时间还流行过把全球化与本土化放在一起，称作全球本土化。这种全球本土化的形成，是因为存在局部刺激本土化从而加速了全球化的因素。世界会通过全球化而变得整齐划一，因此丧失自身的特点。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才会有强调本土化的现象。不过我们讨论全球本土化，其实就是讨论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利害关系。



我们一直谈论全球化，但是我认为在某些方面关注的却是全球本土化。这次论坛共有11位报告人分成了四个部分进行展开。

第一部分的主题是蒙古冲击的历史意义。各位报告人或是站在本国的立场，或是定位在世界史的观点，围绕究竟如何定义蒙古冲击展开了分析。

第二部分关注蒙古冲击本身。报告人并不是简单地停留在政治和军事侵略方面，而是试图阐明随后带来的文化和技术方面的具体影响。

第三部分的报告，我认为是阐明在长期的抵抗和统治的反复交替过程中，蒙古在各个区域开展统治的具体状况。

第四部分的报告与饮食及服饰文化相关。外来文化在acculturation、也就是“本土化”的过程中，必定会与老百姓的生活文化息息相关。蒙古冲击逐渐转变为蒙古和平的过程中，生活文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两位报告人分别介绍了汉人如何接受蒙古人的帽子，高丽人如何接受蒙古饮食文化的情况。

以上是每个部分的大体概括，下面就每位学者的报告分别进行简单介绍。

首先是四日市教授的报告。四日市教授强调了蒙古冲击的影响，介绍了在蒙古冲击之下蒙古和平的发展情况。教授的论文比较宏观地分析了蒙古文化经济影响和政治冲击等长期发展且持续发展的特点。教授通过对东南亚地区的实地调查所展开的分析让我印象深刻。

第二位朝克图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异密阿儿浑及其在呼罗珊等地进行的两次户口调查”。朝克图教授分析了总管阿尔浑在西亚地区进行蒙古式管理，并发挥了一定影响的情况，以及作为最基本的统治政策的人口调查的情况。个人认为，这篇论文中有关征收租税及落实统治政策的过程，或许会对其他地区的比较研究带来某些启发。

第一部分最后一位报告人桥本教授的题目是“解读《蒙古袭来绘词》——以两部奥书的研究为中心”。运用绘画作为史料的历史学研究尚不多见，尽管不是传统的研究方法，但至少在20世纪中期以后，受年鉴学派的影响，史料的范围有了极大的扩展，绘画也成了历史分析的重要史料。桥本教授对蒙古袭来绘词的地理、文字以及画风等进行了分析，以完整的史料批判为根据，阐明了这幅绘画在经历13、14世纪直到19世纪之后最终形成的曲折经过，并且为我们进行正确的历史认识提供了可能。这篇论文的史料分析以及对绘画的科学分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次是第二部分。额尔敦巴特尔教授的报告是关于蒙古帝国时代蒙古人的命名习惯的考察。对韩国、日本、中国等的普通历史学研究者来说蒙古语相对陌生。额尔敦巴特尔教授的母语是蒙古语，他给我们详细展示了蒙古人取名的具体方法，并

通过考证分析了蒙古人与其他民族融合的过程。

第五个报告是向正树教授的“蒙古帝国与火药兵器”。报告将最近流行的研究方法运用在蒙古史研究上，告诉大家如何通过大众文化及文物来把握蒙古。这篇论文将蒙古的侵略者形象进行了客观化处理，以开放的视野探讨作为外民族形象的蒙古与周边的文化交流的可能性。论文在分析上运用了有关媒体与形象的较为独特的新方法，令人颇有兴趣。

下一个是孙卫国教授的“朝鲜王朝官修《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的历史书写”。孙教授的报告首先涉及了东亚理解的方向性问题，认为必须兼顾本国史和他国史的理解，以一国史的观点来考察本国历史会增加谬误的可能性，而研究本国历史时必须关怀东亚历史的全貌。我认为这篇论文的质量非常高。

第三部分的第一个报告是金甫桃教授的“东征日本中高丽忠烈王的政治意图”。金教授着眼忠烈王的政治意图，阐明了忠烈王如何积极运用蒙古人第二次东征的侵略意图，确保强化自身王权的经过，揭示战争、外交等所有的国际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单方运作，而是通过相互之间的商议或协调来进行。

第八篇论文是李命美教授的“对蒙战争及讲和过程和高丽政权的环境变化”。李命美教授进一步挖掘了蒙古讲和条件中对待国王的亲朝及人质的情况，厘清了人质之间的人际关系在蒙古社会的形成过程，以及该人际网络如何反作用于高丽政权的情况。

下一个报告是其林道尔吉教授的“北元和高丽关系的考察”。以禡王时代的多边关系，尤其是北元20多年的国际形势为背景，广泛而深入地剖析了高丽与中国的关系，以及朝鲜王国的发展历史，是一篇高质量的论文。国际关系的分析手法就应该是多层次的、有立体感。我认为其林道尔吉教授就是采用了这样的研究方法。

最后是第四部分。韩国赵阮教授的报告以“高丽时期蒙古帝国饮食文化的传入与演变”为主题，分析了佛教国家高丽的食肉文化的发生和演变经过，以及饮食文化如何受到蒙古的影响，考证了到朝鲜时代为止，甚至是传承至今的韩国人饮食习惯的形成过程。各位到韩国都会喝到“先农汤”。“先农汤”的由来众说纷纭，大部分都认为起源于“先农坛”之说，远古的国王做了这种汤分给老百姓。但是这显然是游牧民族的食物，我个人认为先农汤的起源是蒙古食品“肉骨头汤（shulu）”。因为，韩国料理一般使用酱油来调味，只有先农汤用的是盐。这显然是游牧民的习惯。我觉得“先农”和“肉骨头汤”很接近。因此，考虑韩国饮食中至今仍保留着这样的蒙古食品的痕迹，我认为赵阮教授的论文告诉我们，某个特定文化的影响不会在短时间就结束，而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

张佳教授在“‘深簷胡帽’考：一种女真帽式在蒙元时代的盛衰史”中，以帽子幔笠为例，揭示了蒙古文化在元代扎根并流传后世的过程。幔笠似乎与朝鲜时代屈巾祭服的样式有关，最后一直影响到朝鲜的服饰文化。

以上四个部分从多方面分析了在“蒙古冲击”和“蒙古和平”这两个维度下的政治统治的状况以及相互间的文化交流。本次会议上，各位学者在讨论了各自的国史的同时，又都能站在全球化的立场上，以东亚作为切入点，而不是仅限于某一个国史，展现了更为丰富的剖析方案。

在此，我要对位这次论坛带来精彩报告的研究者，讨论的参与人以及主办方表示深深的感谢。

2. 三个问题的缘起

刘杰

多谢赵教授。感谢您对各位研究者的报告进行了精彩总结。那么，现在进入全体讨论。作为主持人，我有点纠结，究竟应该如何展开讨论。昨天晚上的晚餐会上，赵教授向我提到了一个特别好的说法，那就是“求同存异”。当时是通过翻译听到的这个词，我现在不能确定这是赵教授的原话，还是译员加上的。译员说教授称赞这场历史对话秉持“求同存异”的精神而展开。“求同存异”是指“大家一起寻求共同之处，同时保留各自不同意见”。我认为这种说法非常好。

今天是全体讨论，我想在“求同存异”这个说法上换一个字，改成“求同hua异”。“hua”这个音可以写成两个字。一个是这次论坛的主题“国史之间的对话”中的“话”字，就是“求同话异”。另一个“hua”就是融化的“化”字，让我们通过对话融化掉不同之处。让我们就在“求同话异”和“求同化异”中展开上午的讨论吧。

我认为，让不同的意见一直保留、搁置起来的做法，或许会在短时期内促进相互理解上发挥作用，但是这种做法会造成某种隔阂一直残存，这绝不是件好事。适时进行对话非常重要，我想这正是所谓的历史，“国史之间的对话”最为重要的关键点。

刚才赵珙教授谈到，这次讨论是如何看待蒙古帝国的冲击，大家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侧面进行了探讨。我们现在能够相互冷静地、站在各自的国史立场上讨论蒙古帝国的冲击，真正地用历史学来思考遥远的蒙古时代所发生的故事，到底仅仅是因为岁月的流逝带来了可能？还是说岁月的流逝本身才是最大的理由？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探讨的因素。反过来说，对于这次没有讨论的近现代历史中发生的各种事情，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冷静地进行对话？这些问题都有必要进行思考。

历史学家的对话，国史之间的对话，应该以超越时代，涵盖近现代历史的姿态来开展。这是我们历史学家的责任。我坚信这样的讨论在不远的将来一定能实现。

那么，现在我们就在昨天论坛的基础上开始讨论吧。昨天主要是针对报告人的发言进行提问，今天希望其他参会者也能发表意见，自由讨论。不过，我们的话题很多，如果太自由的话，可能会比较松散，所以还请各位在几个较大的主题之下展开。

第一个主题是“如何评价蒙古帝国的影响、冲击”。就好比“中国化”或者“蒙古化”等问题。谈到蒙古帝国的影响、冲击，有人认为即便是蒙古帝国之后，历史上也形成了贸易网络，而且随后对以东亚为首的这个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种看法会成为中国化的一个重要部分继续存在下去吗？我认为这与所谓的朝贡体系、册封体制问题相关，那么如何看待唐宋以后的中国的影响？如何看待元以后的影响？到底是在唐宋影响之上增加了元的影响？还是元的影响完全取代了唐宋？所有这些因素都包含在内，如何看待元以后对唐宋后贸易网络所形成的影响？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

其次，昨天没有展开讨论，就是如何看待册封体制或者朝贡的问题。可以说，明代重新回到了册封体制，这种体制与元代有怎样的关联呢？这一点希望能深入讨论。

还有个问题有些棘手，那就是如何把握蒙古帝国统治的历史，是当作“统治中

国的蒙古史”，还是“蒙古统治的中国史”？相关研究都是站在本国国史的立场上进行的。站在蒙古立场上的蒙古帝国与站在中国立场上的蒙古帝国应该如何展开对话？从昨天到讨论中我还没有看到好的方法，今天也请各位继续讨论。以上是从大的方面看所谓的蒙古冲击的问题。

第二点是“朝鲜半岛处于怎样的位置”？也就是高丽、朝鲜的立场。近代以后，包括现在，从外部看朝鲜半岛时，始终存在“两个大国之间的小国”的观点。在蒙古时代，朝鲜半岛被看作是“元与明之间的朝鲜”，到了近代，又被当成“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朝鲜”。人们议论朝鲜半岛的时候总是强调其被动地位的因素。这种定位是否恰当？如果站在韩半岛的立场上，会出现怎样的反论或者议论呢？我想听听大家的看法。

第三点就是“资料的问题”。有几个报告谈到了资料方面的话题。比如桥本教授使用的画卷。应该如何判别资料的可信度？资料的解读方法以及对可信度的充分的把握，与正确使用资料的历史学者的想象力之间，我们应该注意到怎样的平衡？基于高丽史的历史叙述的方法当中，是否依据画卷就能展开讨论？昨天的讨论中都提到了这些内容。

特别是孙教授谈到有效利用他国资料的意义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把对资料的谦恭姿态正确运动到历史研究中？站在各自的国史立场上，如何处理对方国家的资料？比方说，蒙古袭来的时代，会出现什么样的史料？什么才是史料的正确使用方法？有关这一点也请大家进行讨论。

以上就是听了大家的报告和提问后，我总结的自己所关心的几点问题。希望大家能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当然大家的话题可以不局限在这几个问题上，请各位学者畅所欲言。

谁先提问呢？昨天就朝贡·册封体制有过一些议论，现在就从这个话题开始吧。

3. 如何把握朝贡·册封体制

山内

我是神户女子大学的山内晋次。我否认册封体制，我认为不能将其当作某种范式。30多年前，著名的西岛定生教授提出东亚史以及支撑东亚史的册封体制这一观点，我认为这或许是个错误，不知道是否有必要以这种观点为前提继续讨论下去。我的论文当中，除了批判这个观点的部分之外，绝对不使用册封体制这个词。

为什么说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呢？如果阅读我的论文，或者其他反对西岛观点的学者的论文，就会发现，册封只是中国王朝对周边地区而言，并不是针对所有地区。这是西岛给学界带来的误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册封只是中国王朝对周边民族、国家的各种名目繁多的政策之一，只相当于光谱中的某一种颜色。我就是这样理解的。光靠册封体制绝对不能解释整个东亚，也不能解释我所研究的亚欧大陆东部的国际状况。其实能够证明西岛定生先生提出的东亚世界论或者作为其根基的册封体制论的正确性的，只局限于南北朝极短的时期、倭国、朝鲜半岛诸国与中国王朝之间的正史，特别是基于中国正史的理解范围之内。但是特别是在日本史学者当

中，却有人误解成能够适用于整个两千年的中国，持这种误解的甚至还包括一部分东洋史专家。历代王朝虽然确实都存在册封的事实，但不能当作一个完整的系统来看待。或许我推翻前人的观点比较鲁莽，不过这是我的立场。当然也有人反对我，我也受到了国内学界的批判，现在我仍旧维持自己的观点。

■ 四日市 我是昭和女子大学的四日市康博。正如山内教授指出的那样，册封体制不能解释所有的问题，会产生误读。但是，我认为在局部还是存在这种观念的。这不是一个僵硬的制度，而体现在更简单化了的君主与臣下的关系上。君臣关系是册封体制的核心所在，这种观念原本适用于国内君臣统治的体制，后来延伸到国外，并产生效应。我和山内先生的研究主要从贸易和国际关系的角度来思考世界，如果以册封体制为依据的话往往会误读。而外交场合讲究的是原则，在外交上，无视君臣关系这一原则，就不能建立实质性的关系。历史上有过先讲原则，然后再建立实质性关系的现象，所以我认为不能否认在外交上存在册封的观念。

但是每个朝代各不相同，同一个朝代中君主之间也不一样。像明朝的光武帝那样，即便是同一个君主也存在前后态度不一的现象，我们不能把它理解为一成不变的模式。不过，作为一种观念，这种关系在形式上得到了运用，我认为这一层面上不能加以否认。当然，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将它普遍适用于整个世界。蒙古袭来时，首先也采取了外交手段，并不是突然发动进攻的。在外交的过程中，有的国家表示接受，有的国家则与之决裂，以至发生战争。这种场合下，不能用册封来解释所有的事情，只依据某一事实就断定册封与朝贡的关系是错误的。只是，至今为止，日本的东洋史学界或者日本史学界过于强调了册封的部分，存在把册封当作一种走样了的范式来看待的情况。

■ 山内 那样的话，就没有必要使用册封这个说法了。中国正史中，明代左右才开始正式出现“册封”这一词语。隋唐时代没有出现“册封”二字，还没有成为一个固定概念。就像刚才四日市先生说的那样，如何用恰当的词语表达当时的时代、王朝主体，以及由之形成的君臣关系等。比如，比较隋唐和明代用词的差异的话，就不一定要用册封两个字。我觉得可以找出一个新的用语。

■ 四日市 我对册封的了解并不深刻，这个词由“册”和“封”组成，两个字都是历史概念，容易理解。我非常理解您的观点，不能用册封来说明所有情况，但是某些共通的理念只能用特定的词语来表达，我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使用册封这个词语，而在于不能过于偏激。确实到目前为止，日本学界存在过于拘泥在册封上的一面，但也不必全盘否定。我们还是听一听其他学者的看法吧。

■ 刘 以上是两位日本研究者之间的国史对话。这些对话固然重要，但我也想听听中国学者的意见。这方面葛教授最有发言权，请您谈谈。

■ 葛 我是复旦大学的葛兆光。关于朝贡体制或者册封体制呢，首先它是确实存在的，包含了三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呢，就是说，各个中国周边国家的政权的合法性，要由中国的皇帝通过授印、册封这样的方式来实现；第二呢，它用中国的立

法，用中国的皇帝的年号；第三呢，它遵守几年一贡这样的制度。但是我们得同意一点，就是说册封体制或者朝贡体制在历史上是有变化的，并不是所有的我们认为放在朝贡体系里面的所有国家，都是属于朝贡体系的。事实上有一些国家，也许它接受册封，但是呢，它并不是真正真心拥戴或者说遵从中华的制度。而且在不同的朝代，册封的国家的数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到了清代，实际上真正接受册封或者朝贡制度的国家只有六个。这里面从古代以来，一直到清代，都不包括日本，日本只有在足利义满时代曾经有过非常短暂的一次。

所以我们应该看到，朝贡和册封体制，一方面是存在过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是变化的。第三呢，也不像中国所想象的那样，有那么庞大和包容那么多的它想象中的国家，这大概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尊重历史事实的话，大概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孙 我是南开大学的孙卫国。我非常同意刚才葛先生的一番话。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美国的费正清在中国的《天下之行》这部论文集里面这样评价中国古代的册封制度，他认为天下秩序，或者说天下体制，也就是属于中国的天下体制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他用的是“Sinic Zone”，应该说是“华化地区”，主要是以朝鲜半岛、琉球、安南为主，日本的话，就是说个别的时期，可能属于这第一个圈；第二个圈叫做“内亚地区”，这些国家和中国应该会有军事方面的往来，比如北边的游牧民族也好、还有东北的少数民族，文化方面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在名义上也会遵从这个体制；另外一个就是“外圈地区”，包括东南亚、欧洲，它们无论是名义还是事实上都不与中国有册封的关系。所以一般我们现在说册封，是以第一圈为主，也就是葛先生说的，可能就是几个非常典型的国家会出现这种情况。就这些。

四日市 孙教授刚才说的应该是明代以后的册封体制吧。我想大概是山内先生认为历时性考察某个朝代之内的册封体制不合适，存在弊端。

孙 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国的册封体制也好，或者是天下秩序也好，就像您说的是“内外合一”的。（这个体制）首先是发源于西周，西周有分封体制，分封体制先是内藩分封，然后再划到外藩。所以中国应该是从西周到明清都会出现。如果是从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关系为例，这里我借用一下陈寅恪先生的观点，其实我们都知道，中国和朝鲜半岛之间，在唐朝之前中国一直都希望把朝鲜半岛郡县化，所以从公元前108年、107年，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立四郡以后就一直有战争，包括到隋朝、唐朝都几乎是要征讨朝鲜半岛，希望把它郡县化。但是唐朝以后，新罗出现以后，当时朝鲜半岛和中国之间就建立了一种册封体制，从那之后，即便我们看到蒙古把朝鲜半岛征服了，清朝把朝鲜半岛征服了，都再也没有希望设立郡县，而是一直保持它藩国的地位。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册封体制在朝鲜半岛上算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刘 请山内教授回答。

山内 我个人认为册封体制的理论，从历史上来看只适用于朝鲜半岛与中国之间。或

许在座的学者会持不同意见。因此，要解释朝鲜半岛诸国与中国王朝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行得通的。但是我不同意这种理论也适用于其他地区的说法。当然册封和朝贡的事实确实存在，不能忽视。我只是觉得不能把它当成一个体系，推广到所有的天下秩序当中。

■ 四日市 我觉得山内先生可能有些误解，这种误解的根源就是因为他认为册封非常固定，是一成不变的。册封其实就是赐予领土、函书、王号和印绶。我正在伊朗的博物馆调查蒙古统治时期的伊朗、伊尔汗国的古文献，其中有一些印有汉字朱印的文献。中国的元朝对伊尔汗国授予了王印和官印。元朝依据册封体制授予他们方形朱印及官印（特别是与宰相相关的印），当然也授予王号。因此，从形式上来看，伊朗也得到了册封。但是实际情况完全不同，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这是出于某种理念，形式上是实行册封的。山内先生或许认为除了朝鲜半岛之外，其他地区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册封关系。而与那些被统治或者缔结关系的国家之间，在礼节等形式方面应该是严格执行了册封制度。

■ 刘 这个问题请徐静波教授发言。

■ 徐 我是复旦大学的徐静波。我不太了解册封和朝贡体制，但是我非常赞同葛教授的观点。这里我还想稍作补充。刚才葛教授谈到日本只有在室町时代的某一时期曾经有过“日本国王”的称号，而其他时期基本并没有进入朝贡或册封体制。不过事实大概并非如此。在日本列岛大致统一之前，也就是大和政权建立之前，日本已经有一部分向中国王朝进行朝贡。比如，中国的《后汉书》中就有记载。当然这时候国名还没有叫日本，中国的后汉时代，公元57年光武帝时，倭国向中国派遣使节，采取了某种形式的朝贡或行动，所以被授予了金印。“汉倭奴国王”，也就是授予了在“汉”的范围之内的“倭国王”金印。1784年在福冈附近的志贺岛上发掘了这个金印。另外，在南北朝时代，南朝的宋代，日本文献中也有“某某征夷大将军”的册封。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了5世纪左右。607年圣德太子向隋朝派遣叫做遣隋使的使节，从此建立了对等关系，脱离了册封、朝贡体制。

■ 刘 非常感谢徐静波教授。下面请三谷教授发言。

■ 三谷 我是迹见学园女子大学的三谷博。我们的话题的历史地点和时代有点拓宽了，我想回到高丽上，我觉得孙教授针对李命美教授的报告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华夷观，这一点与现在的讨论关系很密切。

总的说来，朝鲜王朝的人看待清朝皇帝时，也带着一种“夷”的视角。我指的是华夷的夷。而高丽时代怎样呢？高丽人是把中国的王朝视为“华”还是“夷”呢？我想孙教授的问题在这点上。有关这一点，我想特别请高丽史的专家为我们谈一谈。

■ 刘 好的，到现在为止，主要是站在日本的立场，或者由中国专家参与了讨论。以下请韩国的专家针对三谷教授的提问谈谈看法。首先有请张教授。

张 我是复旦大学的张佳。我发表一点个人粗浅的见解。我感觉高丽前期在文化政策上、理想上，是希望向中原王朝学习的。我曾经在论文中引用到太祖王建的所谓“训要十条”，当然有学者认为这个“训要十条”有可能不是太祖留下来的，但不管怎么说它记录在高丽史里，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当时高丽上层的文化态度、他们的理想。也就是说高丽时代也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文化上有所谓的“华夷之辩”的观点出现。

但是这种观念的解体是因为受到了蒙古人的冲击，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蒙古人所安排的等级秩序里面，高丽人被安排在“汉人”这个等级，它跟中国北方的汉族民众，包括其他的移民等等都属于汉人。但是有一个非常好玩的故事，大概在元代后期吧，具体的时代我没有考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献，因为当时实行元和高丽的联姻，所以高丽就有大臣向元朝皇帝上书说，要不要改变我们高丽的地位，把我们高丽的地位从第三等的“汉人”提升为色目人的等级。这个例子十分显著地告诉我们，当时的高丽人不会因为被归为“汉人”这一等而很自豪，没有的，我们要上升到“色目人”的等级。

高丽的华夷观念的再度兴起，要到明之后。一个文化保守主义的明朝出现了，明朝以所谓“用夏变夷”为旗号去除了很多蒙古文化的因素，这个时期高丽后期由于政局的变化，他们也开始仿效明朝。李朝建立以后，由于要维持李朝本身的合法性，它就接续了明朝的口号。我们可以看到在李朝的初期，社会文化领域发生了很多和明朝非常类似的非常好玩的事情。这是我的一个粗浅的观点，请各位朝鲜史、高丽史的专家来批评。谢谢。

刘 这个问题请李命美教授回答。

李 我是首尔大学的李命美。下面回答两位的提问及相关问题。首先回答高丽人与中国的汉人等级相同，抑或介于汉人与色目人之间，他们要求更高地位的问题。

在元朝控制干涉时期，蒙古帝国把老百姓分成四等，也就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种人等级不同，这就是所谓的“四等级论”。但是，近年的观点认为，这种区分其实并不是等级差别，而只是反映了各自的文化差异。当然作为统治阶级，蒙古人确实得到了优厚待遇，这种区分，并不是为了种族歧视而设计的“排序”，目的是区分法律和习惯不同的族群，根据各自固有的法规习惯而设置的规定。因此，思考蒙古国内的高丽人所受到的待遇问题时，有必要从文化差异这个角度来理解。

这样的话，高丽人与汉人和色目人的等级相当的说法就有点模糊，出于文化相似以及地理位置相近这一点，有时会与汉人分在一起。而从高丽是当时的流放地这一特点来看，因为是受到刑罚，原则上要被流放到远离家乡的地区，所以有时又被当作色目人。

元朝控制干涉的后半期，著名的奇皇后提出把高丽人当作“色目人”来看待的要求。有人从以往的“四等级制”的观点出发，认为这是要求提升蒙古国内“高丽人”的地位。但是，如果站在近来因文化法制不同来区分四个种族的立场上来看，这并不是要求提升地位，而应该看作是针对某个特定的案例（至于是什么案

例，现在很难加以确认），要求对待“高丽”应该等同于不受“汉法”制约的色目人。

第二个问题，是韩半岛上的国家与中国王朝之间缔结的与册封、朝贡相关的内容，或者是有关高丽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如何自我定位的问题。我认为这种关系在与蒙古发生关系后，有了巨大的变化。在外交空间上，高丽在蒙古时代之前就属于“夷”的地位。但尽管如此，高丽的国家制度在格调上有很多与“夷”不相吻合的地方。高丽时代历史研究家把蒙古时代之前的高丽制度称之为“皇帝国制度”。元引入了中国的制度，他们在吸收唐宋的“皇帝国制度”的过程中，似乎并没有认为高丽人既然是“夷”，就应当改为“夷”的制度。

也就是说，高丽前期的“皇帝国制度”是高丽人在没有把自己当作“夷”的时期中吸收中国制度而形成的。但是，这种状况在蒙古时代之后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与蒙古的关系，高丽制度的确变成了“诸侯国制度”，高丽人也开始明确认识到自己处于“夷”的地位。这种中国式华裔观念极度强化的背后有着极强的蒙古因素。换句话说，以中国式观念为起点的册封与朝贡在韩半岛以最典型的方式形成的原因，反而跟蒙古式关系的建立有着很大的关系。

为什么这么说呢？不仅仅是高丽，在蒙古帝国之前的中国王朝只是在表面上进行册封，接受朝贡，并没有太多介入这些国家的内政。虽然有“势力薄弱”介入不了的一面，其中也有“不了解”所以不介入，或者“不愿意了解”的部分。

而到了蒙古帝国，高丽与蒙古的关系与之前大不相同。双方的关系变得很个体很直接，王室之间的长期联姻，赵阮教授所研究的派遣达鲁花赤都属于这个范畴，国家层面和个人层面的人员交流非常频繁。因此，蒙古官僚和个人长期驻扎高丽（或者反过来，高丽人长期驻扎蒙古）的过程中，客观上营造了元深度了解高丽内部情况的环境。另一方面，忽必烈之后，蒙古引入汉法，修改了制度。因此，元开始要求高丽把“皇帝国制度”修改为“诸侯制度”。

这只是我的粗浅想法。对已有的汉文化和中国制度习以为常的人们对制度进行调整，与完全不熟悉的蒙古人来实施，这两种情形一定会带来不一样的结果。因为，习惯中国制度的人进行导入时，在某种程度上会沿袭传统的习惯，而完全不熟悉中国制度的蒙古人难免生搬硬套，试图将册封朝贡等中国制度以最完美的原始形态强加到对象国身上。因此，高丽和蒙古的关系的变化就在于，来自中国的华夷意识与册封朝贡体制变得比从前产生更为实质性的效应，而且联姻等人员的交流以及蒙古式的关系也强化了这种效应。我认为不能简单地从册封朝贡关系来思考。

三谷

请允许我再提一个问题。我想请教的是有关蒙古帝国之前的高丽。也就是说，当中国大陆同时出现两个政权时，高丽是朝贡哪一个？高丽把哪一个看作“华”，哪一个看作了“夷”呢？

洪

我是早稻田大学的洪性珉。我的专业是10世纪至12世纪的国际关系，我想在我所了解的范围内回答三谷教授的提问。三谷教授的问题是，高丽的儒家学者们为什么没有像朝鲜抵抗清朝那样，对华夷思想没有进行抵制？最重要的原因是朝鲜时代性理学般的名分论非常强势。虽然高丽接受了儒学，但并不是朱子学的儒学，所以我觉得应该加以区分。而高丽时代的天下观可以分层三种，一种以中国为中心，另

一种是海东天下观，还有一种是形势论天下观。

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认为唐和宋是中心，高丽位于周边。海东天下观则是以中国之外的大海东侧高丽为中心。第三种天下观受形势左右，不管是中国，还是北方民族，谁强大就跟谁，是一种形势论天下观。

高丽前期的官僚中，不少人立场相互不同，造成在政治外交的悬案上采取的处理方法也多种多样，这是历史事实。

葛

关于朝贡体制，我想我们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一定要承认多重的、变化的朝贡体制和朝贡观念。比如说刚才我们讨论高丽，其实高丽建国以后，实际上很长时间他有向契丹辽朝贡，承认契丹辽为宗主。但是又有一段时间，在公元1100年的前后，又同时向契丹辽，向北宋两边朝贡。所以朝贡体制是有复杂的多重性的。比如说像琉球，琉球曾经向日本朝贡，也像中国朝贡。你不能够简单地归结为一种，它是有多重又有变化的，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

第二个要注意的是，朝贡本身是有虚有实的。有的是因为经济利益，有的是因为某种战略考虑。比如说，越南现在南边的占城，占城向中国朝贡是跟它对安南的战略有关系的，它希望中国在正面对安南进行威胁，然后帮助占城。又比如说日本的足利义满时代，之所以想法设法加入中国的朝贡圈，实际上是和经济需要有关系的，想要开展贸易。

所以我们在研究朝贡体系的时候，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归结为一种，其实它一方面是有多重性、多重体制的，另外一方面是有虚有实的，有的是经济利益、有的是战略考虑、甚至其他。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爪哇和苏禄（菲律宾当时称苏禄国），当时的朝贡完全不是说我要加入你，要你来封我当国王，而是说我在跟你的贸易里面我可以得到利益。所以这个朝贡体系我们单纯地把它理解为“政治的”，或者是像滨下武志理解为“贸易的”，都是不对的，太单一化了。

赵阮

我是汉阳大学的赵阮。我也想谈谈与朝贡、册封相关的问题。正如四日市教授先生所提到的那样，史料中确实存在蒙古使用过这些用语的记载。因此可能带来了一些混乱，但是我认为这与蒙古帝国是否实施过朝贡、册封体制不是同一个问题。而且蒙古的大汗或者统治者如何认识朝贡和册封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尽管蒙古帝国的确使用过中国式的用语，但是这里面包含怎样的意义？我觉得就像刚才葛教授指出的那样，值得进行解释。

比如，忽必烈的宰相制度中，使用过诸如宰相或者中书省等用语，不过实际上这里的宰相只不过是相当于必阁赤（Bitsechi）而已。必阁赤与中国王朝的宰相有相当大的不同。在不重视文臣的认识、待遇，不重视文件行政的背景之下，他只不过是处理实际业务的官僚，从这点来看，虽然使用了“朝贡”“册封”等用语，但是需要重新思考他们是否确实将其作为某种体系在运作。昨天听了四日市教授的报告，发现他们确实有随意使用朝贡、册封的现象。所以我认为与其说他们把它作为一种体系来执行，倒不如说只是为达成贸易目的的一种必要的手段。

刘

非常感谢。现在请孙教授发言。

孙 刚才葛教授说的话我非常同意，也借由葛先生的一个观点：讨论历史问题的时候要有三个层面，也就是历史、政治、文化，但是最后归结为认同。谈到朝贡体系的时候也是同样，我们讨论朝鲜王朝，它对于明代和对于清代在政治外交上是完全一样的，费正清等人的研究里面也都把它看做成一种典型的朝贡关系。但是如果说到认同问题，就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朝鲜半岛对于明朝，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都是认同的，但是对于清朝完全就是否认的，不但不把朝贡看成一种光荣反而看成一种耻辱。因为在韩国的宗庙里面，国王去世以后一定会有中国皇帝赐他的赐号，在明朝时宗庙中国王的碑上一定会写有赐号，但是清朝就完全没有，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涉及到刚才三谷博先生所说的华夷观问题，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另外一点，提到高丽的认同和华夷观的问题，我也有一个想法。刚才李命美教授和张佳教授也提到了高丽人想提升到二等“色目人”这个问题。这可能是一个政治认同的问题，但是文化认同，其实整个高丽王朝，它是认同宋朝的，只认同宋朝。刚才葛教授也提到，在同时给辽朝金朝甚至给宋朝进行朝贡，但是文化方面始终是认同北宋、认同宋朝。有位高丽皇帝说他做了一个梦，梦里他去了汴京，他希望他能成为宋朝人，都有这样的思想出现。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檀君神话的出现，在《三国遗事》中，它最主要的意义就在于独立自主的意识。因为正处在作为元朝藩国的时期，所以它在文化方面有很大的分离性而没有认同。

刘 我们刚才谈到了很多册封体制和朝贡体制方面的话题，希望能听到站在蒙古立场上的发言。如果有补充的话，请简单谈一谈。

4. “蒙古帝国”与“元朝”

其 我是蒙古国科学院的其 林道尔吉。我不谈朝贡册封制度。我想回应刚才主持人的要求，从蒙古学者的立场做个介绍。或许会引起一些混乱，我认为应该了解蒙古学者的所见所思。事实上，元的历史非常复杂，非常有难度。可谓难中之难。蒙古帝国和元到底是蒙古史，还是中国史，这也非常难。但是，蒙古历史学会的立场如下。

元这一王朝，国家是蒙古的，属于蒙古的历史。当然元是世界帝国，与其他国家的历史有重叠之处。但是，其他国家不能因为有重叠之处，就把元当成是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祖先建立的国家。比如，站在中国历史的立场上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元？事实上在元朝，中国在蒙古统治之下，受蒙古支配。因此，理应说成是蒙古的统治时期。当然，元的国家制度中有不少中国要素。但是，正如当时那个传统时代，邻国间相互交流，互相吸收对方的要素那样，元只是引进了部分国家制度，这种看法才合乎逻辑。因此，刚才有人把元代说成中国的、汉族的，我觉得把这个时代看作蒙古统治期才符合历史事实。这就是蒙古学会针对元史的立场，也是我的立场。我只是简单介绍一下有这种观点，也想听听其他学者的意见。

刘 谢谢您的发言。这也是我刚才在讨论开始之前提到的“蒙古帝国的历史，是作为蒙古史的一部分的中国进行统治的历史”？“还是作为受蒙古统治的中国史的

一部分”？或许来自中国的学者们会有不同的意见。在中国学者发言之前，我想请日本学者从第三方的角度谈谈见解。

向

我是同志社大学的向正树。从会议开始我就一直思考这个问题。我现在思考的是“如何称呼元”这个问题。以往在日本习惯的说法是称作元朝，就是把中国的王朝称作某某朝的传统叫法。但是这种叫法其实只是整个蒙古帝国当中，由忽必烈及其子孙统治的，以中国和中亚部分地区为中心的区域。最近杉山正明教授开始使用“大元兀鲁思”的说法，并且已经流传开来。但是大元反映的是忽必烈的意图，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他把整个蒙古帝国的叫做大元，以中国为中心的大元，并不指代忽必烈所统治的整个领土。这里存在一些误解。

所以，我自己在使用“元朝”的时候，多数是强调它作为中国王朝的一部分的场合。我更关注的是蒙古统治者如何思考、实行了怎样的政策？所以使用“元朝”的意义不太一样。那到底应该怎么称呼呢？这是我这次会上一直思考的问题。昨天会上听到元朝实际上就是大汗兀鲁思的提法，个人认为非常有趣。

另外，赵阮教授的论文中使用的是大元帝国，我想请教一下，在韩国这种叫法是否不常见，使用的不太多？

赵阮

正如向教授提到的那样，韩国的学者都在关注这个问题。忽必烈使用大元兀鲁思，也就是大元大蒙古国的名称来表达蒙古帝国的意思，韩国学者还发表了相关内容的论文。目前来看，元朝也好大元也好，叫法还比较混乱。但是这篇论文发表之后，学者们尽量避免使用元朝，比如把忽必烈统治的中原地区叫做大汗兀鲁思，即便有学者使用“大元”，他也会事先进行解释，不是传统的提法，而指代中国地区，即大汗兀鲁思。目前学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叫法，但是大家都在共同思考这个问题，也就是以蒙古人的视线来思考统治集团如何认识帝国。最近以此作为切入点开展的研究越来越多。

额尔敦巴特尔

我是内蒙古大学的额尔敦巴特尔。这个问题很大。我以前也注意到朝贡体系方面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比如说我学的专业，蒙古帝国的历史，成吉思汗建立国家以后，成吉思汗的子孙们、继承者们，进行了五十年的征服战争。他们的一条敕令规定他们应该去征服一切土地。成吉思汗说，不与任何没有归附自己的民族缔结和约，只要他们自己（这些民族）被彻底消灭，无论时间多久都要坚持下去，这是他们的外交政策。比如说对高丽，成吉思汗时期开始对高丽进行了三十年的征服战争，三十年呐。然后停战条件是什么呢，有六个条件：第一个就是高丽的皇帝必须得来，必须皇帝或者皇帝的儿子亲自去拜见蒙古的皇帝。高丽面对这样一个蒙古帝国，《元史》中说成吉思汗灭了四十多个国家，当时眼看着金朝、西夏、南宋、大理、西藏都被蒙古征服，这个时候朝贡与否对高丽这个国家的生存问题有很大影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选择。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国际关系。忍了三十多年进入了朝贡体系以后，高丽名义上是一个驸马国，独立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实际上，通过蒙古它的地位提高了，跟世界的各个国家进行交流。可以说，蒙元时期对高丽后期百年的文学，艺术，尤其是汉文学、哲学的发达程度起到很大影响。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在元朝结束中原统治之后的16世纪，成吉思汗的后裔俺答汗控制了现在的内蒙的西部地区，和明朝建立了朝贡关系。从明朝方面来说，政治理念上满足了，蒙古人边疆人和平了。但是俺答汗是什么人呢，他是忽必烈的化身，他都不把别的蒙古皇帝放在眼里，当时他征服了西藏、咱们现在的青海、新疆，对这些地方都进行了征伐的战争，进行了控制。明朝方面就认为俺答汗是归属于我们的一个国王；而蒙古方面，则一直处于几千年的战争当中，俺答汗也包括在里面。并不是说北方的民族都是好战的，不是这个问题，主要是经济还有气候问题。蒙古人南下南京，当然也有西进的部分但大部分都是南下，是一个规律性的原因，对于这一点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对于蒙古人、对于北方民族来说，经济利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希望进行经济交流。还有朝鲜这样的国家，在这个体系当中可以保证自身的和平，又能进行经济交流。

朝贡体系是一个国际体系，而并非一个胜者或者败者、英雄或者弱者的问题。

张

我想阐述两个观点。第一个，可能有点直接，我个人认为讨论元朝的历史是不是中国的历史本身是一个没有太多意义的话题。因为讨论这个话题之前，你首先要做一个界定：什么是中国，只有汉族是中国的吗？什么是中国的历史，如果统治者不是一个汉族人，它就不是中国的历史吗？那很简单，清朝是不是就不是中国的历史，就朝鲜半岛来说，这个近世以来五十年的日本统治的这个历史，是不是就不是韩国的历史，这个恐怕都是要考虑的。我觉得不管是中国学者也好，还是蒙古学者也好，我们不妨把蒙元历史时期看作是，当然现在中国和蒙古是两个不同的国家，看作是两个国家共同的一段历史，没有必要非要争这个是你的这个是我的。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我觉得这个问题讨论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学术意义。

第二个，当然中国的学者也都赞同这个史实，目前的中国的领土在蒙元时代是整个蒙古、大蒙古兀鲁思、也克蒙古兀鲁思的一部分，这是毫无问题的，但是我们如果用大蒙古兀鲁思，也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词汇的有效性，它所适应的时代范围是在什么时候。在蒙古的前四汗时期，在忽必烈汗之前，所谓的大蒙古兀鲁思的概念是成立的，毫无疑问，从亚洲到西亚，甚至到更远的地区都可以涵括在这个词汇之下，这是蒙古时代，大家所公认的政治实体是他们所控制的。但是问题是从忽必烈汗以后，恐怕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非常明显的史实是，中亚的诸王，像察合台汗的后裔、窝阔台汗的后裔，他们不断地有纷争，他们不仅内部有纷争，而且他们起来反对忽必烈，在座做蒙古史的老师大家可能都知道。所以到忽必烈汗之后，大蒙古兀鲁思是否还是一个政治实体，还是仅仅是一个概念上的象征，这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而且我们在讲元朝的时候，在讲元朝的一大贡献是，打通了欧亚大陆的交通。但是我们有没有考虑过忽必烈汗之后的这段历史，欧亚大陆交通真的像我们想象的这样畅通吗？我们只是概念上说似乎是畅通的，但我们似乎举不出太多的史实来论证。我们知道有多少中国和欧亚大陆的活动是通过陆上活动来进行的，在元代的后期，似乎举不出太多史实上的证据。对于这个表述，包括对“蒙古和平”这个概念，我自己本人也是有很多的困惑，我觉得里面实际上遮盖了很多历史的曲折、遮盖了很多矛盾之处。谢谢。

刘

今天为什么请各位学者探讨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国史之间的对话”。何为国史？举一个例子，每个国家都有教科书。教科书是国史教育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大概中国的教科书、日本的教科书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不同，呈现的内容也不一样。在思考如何编写教科书之前，从学术的角度开展这场叫做国史之间对话的讨论，不是没有意义。各国教科书中的表述其实反映的是该国主要历史学家们的立场和观点。所以请大家探讨这个话题，帮助大家相互理解，还是很有意义的。

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我认为我们可以探讨到底应该如何评价元的影响，蒙古帝国的影响，以及相关的周边问题。比如元统治中国之前，唐宋对亚洲乃至世界有过怎样的影响？元对随后的明朝又有怎样的影响？在综合思考这两个方面的影响之上，如何理解元的影响的维度。在历史的语境中进行探讨真的很有意义。接下来我想请各位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额尔敦巴特尔

张佳博士刚才说到了元朝是不是大蒙古国的问题。忽必烈这个人呢，他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他建立大元国家以后，这个国家的称号是什么呢，蒙文碑刻当中是这么写的，元朝末年这个国家叫做“大元的大蒙古国”。刚才老师也提到了伊利汗国名义上也是归属于元，听从忽必烈指挥，他们也把元朝当作大蒙古国。有关元的皇帝忽必烈，史书当中有记载。成吉思汗在的时候，忽必烈挺喜欢他，两人的长相也很相像。这可能是史实，毕竟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当然由于史书是由元朝忽必烈的家族编的史书，这也有可能是忽必烈家族自己的看法。除此之外，元朝的皇帝死了以后，都必须到现在的蒙古国的成吉思汗的陵的旁边埋葬，否则就是叛国。都得从现在的北京去到蒙古国埋葬。

另一个问题，我很同意张佳老师的这个观点，就是有些争论没有意义。比如说元朝的历史就不是中国的历史吗？清朝统治下的蒙古的历史不是蒙古的历史吗？以我们现在的观点回过头来解释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话。中国著名的文学家鲁迅有一段话，“我小的时候看我们的教科书中是这么写的，成吉思汗是我们的皇帝，长大以后看书了，看了俄罗斯人被蒙古统治的历史更长”，那么鲁迅就说，“俄罗斯人应该说成吉思汗是俄罗斯人的皇帝”，鲁迅说，“我们应该说真话的好”。现在的俄罗斯有很多蒙古国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很多蒙古族的人，现在的国家和原来已经不是一个概念，所以有些问题的讨论确实没有意义，这一点我也同意张佳老师说的。

四日市

我完全赞同张教授的意见。也部分赞成额尔敦巴特尔先生的意见。为什么这么讲呢？从观念上讲，总的说来“元朝即大元兀鲁思”可以代表一个整体，但是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等语言的资料表明，元朝建立之后出现了四个兀鲁思。蒙古帝国分成了四个国家，而且正如张教授所说，在中国，各种各样的民族拥有众多政权，不能只凭统治者就断定是某个特定民族的政权。这种柔性的思维方式很重要。另一方面，元朝由叫做汗的皇帝来统治国家，其他三个国家都是相当于汗、王的人统治，所以形式上元朝是宗主国。不过，这终究只是概念上的、表面上的说法，实际上我认为还是四个国家。

如果就刚才刘杰教授提到的问题来思考的话，虽然我使用了蒙古冲击这种说

法，但是并不意味着只是来自蒙古单方面的冲击，而是以蒙古帝国的霸权为契机，产生了多方面的冲击。虽然有一定的被叫做蒙古和平的稳定性，这只是一种表象，其背后有伊斯兰、中国、蒙古、土耳其等多种文化方面或者经济方面的因素通过流动带来冲击。因此，不是在中国或者蒙古中进行简单的二选一，两者的要素肯定都会存在。同时，把南宋文化和蒙古文化完全隔离开来也是很危险的。所以在刚才的议论中，把朱子学称为南宋文化是有问题的。事实上，朱子学是在元代进入高丽，禅宗也是在元代传入了日本。虽然是起源于南宋，但实际的传入是蒙古冲击或霸权，蒙古和平时期。请大家探讨一下这个方面的问题。

刘 您的提案非常好。我想请教葛教授对刚才这个提案的看法。

葛 我们这个会议是国史对话，国史对话的会议之所以要开，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超越自己国家的立场，或者超越自己所在的区域的立场；第二个目的就是要超越一些王朝、或者时代的局限性。刚才听了一些发言以后我感觉，要做到这两个超越是很不容易的。

第一，比如我们刚才说到，蒙元时代到底是中国史还是蒙古史，这里就有一个站在哪一个国家的立场说话的问题，有可能你为了捍卫自己国家的立场，你就会提出来这是中国史、或者这是蒙古史，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会议的意义就没有了。因为，你比如说，我最近收集了很多历史教科书，越南的历史教科书中就说，由于越南是越族，所以中国的长江以南，自古以来都是越南的领土；那么，韩国的历史教科书也有这样的说法呀，韩国人在历史书上写完颜阿骨打是高丽人，那么女真人占领了整个北方中国，整个北方中国自古以来也是高丽的领土。所以，为了超越国家的立场，我们必须找到一些互相都能接受的历史叙述方法。那么这个历史叙述方法是什么呢？在我看来，我们有必要接受一些超越国家界限的全球史的书，或者是比较大的区域史的书。那么在中国，有的历史学家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提出一个说法，我们是不是可以承认一个国家在历史上拥有双重历史体制，就像以前研究元史的著名历史学家萧启庆，他就既把它当作中国史，又把它当做蒙古史，这样是不是可以比较好一点。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超越时代，我发现我们有些叙述不太准确、不太合理，比如说昨天四日市先生说到“高丽的中国化”，其实在蒙元时代，高丽的中国化更多的是高丽的蒙古化。高丽的中国化是从汉唐以来儒家思想、汉字文化一直影响下来的。但是如果具体到蒙元时代、蒙古时代呢，其实它是蒙古的影响。特别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云南的中国化”这一说法是肯定不对的，不能说在13、14世纪云南就中国化了，因为13世纪以前，云南就不是中国，它是大理南诏国，它的文化是四种文化构成的：吐蕃文化、就是现在的西藏的文化；还有东南亚的暹罗文化、也就是泰族文化；还有安南文化；以及西南本身的文化。当然也存在汉文化。蒙元时代对云南影响最大的，实际上是蒙古征服了云南并把它收归到中国版图以后，给云南添上了很多蒙古化的色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必须承认，在那个时代，中国不是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么大一块地方，中国是在不断地变化的。要说那个时代的中国我们指的更多可能是汉族中国，你不能把汉族中国和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一化。所以我们要超越时代，回到那个时代的“中国是什么”、那个时代的“蒙

古是什么”的问题上，这样才能分辨什么是它的文化影响、政治影响，这样就会好一点。

所以我们这个会议最重要的就是要超越两个局限性，第一个是国家立场的局限性，第二个就是时代的局限性。我们在追溯历史时要尊重历史，不要用现在的固定观念去倒着看历史。现在在中国也有很多这样的讨论，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960万平方公里，去倒着写历史，然后高句丽就是中国少数民族，高丽就是外国，这可以接受吗？这种说法当然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会议一定不要强调本国的固定立场，也不要强调用固定的现代的观念倒推历史。我听了两天的会议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一点，我们这个会议不容易，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也不容易。上次是三个国家、这次是四个国家的学者齐聚一堂，我们希望大家找到大家的共识，这就是我的一个感想。

四日市

请允许我补充一点。我使用“中国化”这个词有两层含义，一是吸收传统的汉文化，第二层意思，既不是汉化也不是蒙古化，当然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就是刚才洪教授提到的三个天下观，是指事大主义。有的国家在服从大国的同时把自己当作中心，也就是向中国皇帝称臣的同时，在自己国家也拥有一名皇帝，我是在这个意义上用“中国化”这个词的。不仅是高丽，日本、越南、占婆等都有过这个现象。日本虽然在宋元时期没有向中国进行朝贡，但是向明朝进行了朝贡，同时在日本国内还拥有皇帝。越南国内也有皇帝，对中国则作为安南王称臣。这就是同时拥有两个天下的现象，这些国家把自己当作中心，所以我才用了“中国化”一词。情况就是这样。

5. 如何对待历史资料

刘

葛教授的一番话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的确，本次论坛的目的就是超越国境和时代，找出我们之间更多的共同之处。正好就是我开场白中提到的“求同话异”“求同化异”。可以用这两个词来概括。我们各自都有不同的叙述国史的方法，历史学家也不尽相同。我们各自的国史到底是如何叙述的？我认为首先相互了解这一点非常关键，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进行对话。

我们的时间已经很紧了，现在开始就第三个话题“资料”进行讨论。有关资料，大家谈的已经不少了。我们在处理画卷等历史资料时，特别是有关蒙古袭来时期的资料以及处理方式上，各国的情况如何？在使用他国的资料时会出现怎样的局限？现在是否正面临这种困境？等等，各位学者在研究中一定有很多感触，希望大家能进行意见交换。

三谷

对不起，请允许我插一句。这次会议在日本举行，可是目前为止，还有没谈到任何有关蒙古冲击在日本的情况。参会的日本学者都不吱声，这很让人为难。日本学者都善于进行资料研究，请一定发言。

佐藤

我是立教大学的佐藤雄基。那我就说两句。我很早就发现史料的构成非常不一样，所以一直很关心这一点。

高丽与蒙古、元的关系非常密切，随着元的衰退，高丽的政局也变得极其不稳定。昨天有个报告详细介绍了这个情况。而且就朝鲜王朝之后，如何叙述追随蒙古的高丽历史的问题时还发生了议论，这一时期的国史编纂重复了三四次，这段内容让人印象深刻。

相比之下，日本的情况怎样呢？近世或近代以后，与本国中心主义、国粹主义伴随在一起的诸如蒙古记忆、神风吹过等话题盛行一时。与高丽同时代的日本镰仓时代，刚才桥本先生也讲过，九州的神社鼓吹正是因为自己的祈祷才出现了神风。镰仓幕府肯定了这种主张，推行过度保护神社的政策，却没有犒赏当地真正奋战过的武士们。正是以这个时期的寺庙和神社的言论为基础诞生了神风的传说。日本的中心地区，镰仓幕府和京都的朝廷又是怎样看待蒙古冲击的呢？出乎意外的是，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尽管近代以后这段故事被鼓吹成为拯救国难的事迹，但不得不说这个时代留下的历史印记并不清晰。尽管镰仓幕府在末期，蒙古袭来之后制作了史书《吾妻镜》，但是只写到1266年，还没到第一次蒙古袭来（1274年文永之役）的年份。其后的镰仓幕府的历史有很大一部分尚未弄清。

到了南北朝时代，各种历史书籍问世。有名的包括所谓“军事故事”的《太平记》，其他还有一些历史故事。不过，我还没有进行准确的统计，我几乎没看过蒙古袭来对日本政治、社会带来的影响的相关叙述。近二、三十年来，日本史学界就蒙古袭来对日本社会带来冲击的讨论越来越多，但值得警惕的是同时代的史料非常偏颇。也就是说，武士的古文书当中会写“我们努力击退蒙古，请予以赏赐”，九州的神社则写到“正是因为我们的祷告，所以才刮起了神风”，而在国家的历史中似乎并未受到重视，至少我认为在随后的14世纪里，回顾南北朝时期的内容非常欠缺。倒不如说是江户时期以及近代以后，人们把这段历史与某种国粹主义相关联，进行了重新发现。

尽管都说是蒙古冲击，但是高丽与日本，以及推翻元朝建立起来的明王朝的历史形象有很大的不同。针对蒙古所拥有的意义，我们在进行国史间对话的时候，要考虑到各自国家传承下来的蒙古记忆的不同，带着这种不同记忆所留下的种种史料又是如何保留下来的，我想多听听各位的意见

孙

关于史料的问题，因为我这边提交的论文是关于高丽史对元朝东征历史的书写问题，其实本身我对元东征日本的历史并不了解，但是我史学史研究的背景，和我自己这些年一直在做的朝鲜和中国史料的比对的研究，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所有古代的史料，无论是中国、朝鲜还是日本，都有以王朝为中心所塑造的一套官修史书的系统，在东亚都有相同的背景。在塑造这个史料的时候，如何确保本王朝的正统性，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政治正确性”，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所以他们在书写的时候会对这方面的问题特别关注。我们现在去利用这些原始资料的时候，就像葛老师所说的，必须要超越王朝和时代的局限性。

我自己不懂元朝史，但我对明清两朝的史料是尤其深有感触。尤其对于万历朝鲜之役，也就是韩国所说的壬辰倭乱这个史料，在中国的话，书写是有非常大的问题。以至于现在我们中国有那么多学者研究明史，但是关于万历朝鲜之役到现在为止没有一部可以拿得出手的研究的著作。因为对于中国，从史料记载来看，从《明

实录》开始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一直到清修明史、官修明史。最后的结论就是说，因为整个清朝开始对战争采取消极否定的态度，所以造成了直到现在，如果只是用中国的史料来研究这个战争的话，一定是会越研究越没意思，导致现在为止没有一本书出来。但是我们都知，万历朝鲜之役是影响东亚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在韩国、在日本有非常丰富的史料，所以我这些年一直在用韩国的史料和中国的史料比证。

我发现必须要有这种超越王朝的眼光，用三国的史料去比较的话，如陈寅恪所说的“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谁的史实是真的、谁的史实是假的，为什么它会那么去记载，背后的目的何在。用东亚的视野、或者说是超越国家王朝的眼光就显得非常非常重要。尤其是我们身处东亚这样一个地理背景之下，有三国的共同的历史背景，更加需要用这样一个办法去做。在日本一直有一个研究范式，就是史料批判，这个方式在我们利用与三国历史相关的那些史料时一定是非常有用。就是这样。

娜荷芽

我是内蒙古大学的娜荷芽。关于刚才讲到史料这个问题，孙老师刚才说利用对比研究非常重要。孙老师用的是韩国语的和汉语的这个史料，那么关于元朝这个时期的史料呢，很多是在波斯语上的。关于波斯语的资料调查，我们朝克图老师和额尔敦巴特老师专门去做过这个波斯语的调查。我想听听我们这两位老师对史料方面的介绍。

朝克图

我认为史料在历史研究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对其他日本史、高丽史等方面不太懂，我就以自己蒙古史的研究为例说一下自己的看法吧。

有关蒙古史的史料，众所周知，主要有三种文字，一种是蒙古文字，以《蒙古秘史》为代表的；然后是汉文，《元史》；除此之外就是波斯语史料。这三种文字的史料，虽然都是有关元代历史方面的著作，但是它们的侧重点、记述方式、观点等方面都有一些区别。所以研究元代蒙古史的话，到底用哪种史料作为重点，这是我们做研究的需要注意的事情。用蒙古元代史来说，现在很多国家的学者都很重视波斯文的史料。波斯文史料现在包含很多，过去我们就知道几本，四日市先生也多次去伊朗做过调查，有好多种元代方面的史料。今后我们应该挖掘波斯文、阿拉伯文、突厥文、甚至是拉丁文，运用多语史料来研究蒙古时代。刚才听到了有关蒙古东征的问题，实际上同一时期日本也西征达到过东欧国家，东欧国家也有保存拉丁文等各种文字写的史料，这个方面的史料我们几乎是没有挖掘的。今后我们要研究蒙古帝国的时候，应该在全球范围内挖掘史料，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蒙元时期的历史。蒙元时期的历史应该从世界史开始，拉施特编著的《史集》，这个就是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研究的。世界史应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应该是从蒙古时代开始的。所以我们在研究蒙古史的时候应该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研究，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我想说的第二点是，有些后人对史料的理解和看法，或者对史料的记述方式都有一些当时的政治倾向。比如说同样的元代历史，蒙古文史料和汉文史料的记载就很不一样，所以应该从哪个史料的角度去研究，是历史学者需要注意的事情。现在在中国研究元史，很多学者都是通过汉文史料来研究，但是也有一些蒙文史料，

内蒙的学者就是两种史料都可以利用。其实内地的很多学者对于蒙文史料几乎不知道，或不利用、或采取否定的态度。所以虽然是在一个国内，但是我们研究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或者说是分歧，所以在研究方法上应该注意史料的多重性，从多种角度来研究。我同意之前老师说的这个观点，从多种视野、多种角度来研究。我想说的就这些。

刘 在座的各位，特别是年轻学者，大家的专业领域或者时代可能不一样，您可以从您的专业角度进行发言。

贵田 我是静冈大学的贵田洁。我的研究主要是区域经济和社会经济。刚才佐藤先生也讲过，日本方面的资料都不是主流的，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理所应当的。直接服从的高丽有怎样的史料，如何保留下来？这一点与中国的资料的保存方法，以及短时期受到进攻的日本的史料保存肯定不一样。

另外，最开始有人提到全球本土化。在元代，这种全球本土化的时期很长，如果从区域经济研究的角度出发，我可能比较容易加入这种讨论，比如金教授在报告中谈到忠烈王热衷军事，他是不是在经济上受到了极大的压制？如果有这方面的资料的话，请赐教。

金 我是嘉泉大学的金甫桃。首先回答贵田教授的疑问。虽然会有涉及，但是内容并不多，很难把握。这个时期，也就是高丽时代以及高丽后期的史料并不多。不过，《高丽史》中还是经常出现这方面的内容。比如写“为了准备打仗需要很多的木材和军粮，但是筹备起来很难”，“不能顺利进行征税”的现实。到了后代还提到“筹集高丽国王滞留蒙古的费用很难”，尽管有这些表述，但是我在论文中也提到过，很难用具体的数字来概括，所以研究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下面谈谈“蒙古冲击”，蒙古给高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一点不用多说了，我想谈谈高丽人所受到的冲击。我认为“重祚”事件对高丽的震撼最大。“重”表示重复，“祚”表示即位。国王即位两次的现象，从忠烈王开始，“忠烈王”、“忠宣王”、“忠肃王”、“忠惠王”，有四代高丽国王即位两次。他们都是父子关系。也就是说，当了皇帝后一度废位，然后再次即位。比如“忠烈王”即位之后，一度将王位让给儿子“忠宣王”，随后父亲重新即位，“忠烈王”去世后，“忠宣王”再次即位。这种即位两次的现象就叫做“重祚”。

造成高丽这种“重祚”现象的正是蒙古。蒙古以高丽国王的资质和政治状况为由让他们时而退位，时而即位。之前虽然有过因政变等理由国王被流放或更迭的事情，但是无论是什么政治状况，都未曾发生国王退位之后又重新登基的先例。这可以说是高丽，特别是高丽后期受到的最大的蒙古冲击。而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竟然就是中国式的“册封”，通过册封行使国王任命权。蒙古可以任命高丽国王，当然也可以废掉国王。

对于高丽，所谓的朝贡、册封，在高丽前期与宋建立关系时，或者接受契丹、金、辽的册封时，实际上就是建立了一种外交关系，因此与蒙古建立关系时，高丽人基本上把元当成了占领中原的中国，既然是中国，所以就很自然地接受了朝贡、册封。但是当蒙古人在国王的即位、存废上行使政治权力或者强权，他们受到的冲

击还是很大的。这种国王的正统性和王权会受到朝贡或册封左右的历史性经验，在高丽末期、甚至到了朝鲜时代都发挥了强大的作用，所以高丽或朝鲜初期的统治者对这一部分及其敏感。

我认为高丽末期传入的性理学思潮又从学术上或者思想上将这种现象进行正统化，发挥着影响。

贵田

从历史认识的角度思考这个时代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有很大的差别。我了解不多，比如日本的学会上，对外关系史的专家都认为，虽然有战争的年代，但是其中和平年代的交流应该就是朝贡。对日本来说，在某种意义上，货币经济渗透进来的时候，这个时代的社会就容易留下光明的印象。而对朝鲜、韩国来说，感觉却是受到了极大的压迫。所以如何谈论东亚社会，似乎日本与高丽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而昨天第二部分中谈到了肉食文化受到了蒙古的影响，所以，到底应该怎样理解这个时代的高丽？我自己还没有找到眉目。

刘

针对这个问题，在座的哪位回答？

李

贵田先生提到的内容的确是事实，我也认为有差别。金教授也谈到了“重祚”问题，所以在政治上很难把高丽社会描写的那么光明。但是，我们来看看蒙古冲击以及随后的蒙古和平吧。

我在这里想以代表性文人李穀和他的儿子李穡为例，讲一个有趣的故事，高丽时代后期的统治者跟他们差不多。父子二人都是很聪明的学者，他们参加元的各种科考，在元当官。但他们并不是我们常常加以否定的“附元势力”。他们并不是否定高丽国而跟随元，属于很正常的靠科举升官的人。特别是父亲李穀，人在元当官，给在高丽的儿子写信中，曾经写过“男子汉就该到大都来生活，体验这里的生活”的诗句。李穡后来也考科举在元当官。

我们常说恭愍王5年进行反元改革，以“诛杀奇氏一家事件”为契机，高丽摆脱了蒙古的统治。高丽人对蒙古、也就是对元的反感不断积聚，到了蒙古国力渐弱的时候乘机进行反击，摆脱了蒙古的统治。这个时期很重要，两国关系事实上已经断绝。我研究了金石文资料，发现就在刚刚断绝关系之后，李穡充当了撰写“墓志铭”的角色。高丽人死后，会在墓碑的墓志铭上留下他一生的经历，往往会请关系很近、书法漂亮、文笔好的大家撰写墓志铭。在高丽时代，特别是元干涉期，有很多这种墓志铭或者僧侣的碑文是元的著名文人的书法或者撰文。而反元改革发生后，也就是事实上两国断绝外交关系的时候，在个人层次上的人员交流依旧非常活跃。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确认，高丽人在意识上并没有觉得元只是一个单纯压迫自己的对象，而一直承认元是交流的对象，是有文化的国家。

其林道尔吉

我想简单介绍一种作为历史的蒙古史、蒙古帝国史的研究方法。大家必须认识到，蒙古帝国是一个游牧民国家。这意味着什么呢？在解释某个国家制度时，会在设定的框架里进行说明，但是总有框架里解释不了的内容。原因就是游牧民比定居民相对自由。元的历史中也有一些这样的部分。正因为不知道这一点，所以定居民国家的历史学者想把所有的内容都放进既定框架里来解释，就会犯错误，解释不

通。

比如，当时的蒙古执政者在任何事情上都很随心所欲。他们认为这些权利是上天赐予的，所以无所顾忌。但是，也有协调配合所统治的国家、地区老百姓要求的人。忽必烈之前，蒙古人占领了中原领地的一部分，但是当地的统治不太成功。忽必烈征服所有中原之后了解到了这个地区老百姓的需求。所以就不再采取从前的政策，在形式上满足他们的要求，比如使用年号等。决定在形式上选择并采取双重办法，表面上满足这些老百姓的需求，但同时又让他们彻底服从蒙古式统治。高丽的情况也一样。忽必烈之前同样不成功，因为高丽人所要求的朝贡册封关系与蒙古人实施的不一樣，完全不同没有一致的部分。而忽必烈即位后改变了政策，他们了解到，蒙古人所熟知的事情与领地内老百姓所了解的事情并不一致。也就是说，蒙古人只理解自己的想法，而高丽和中国等国家的人也不了解对方。可以说因为出现了这种双重政策，所以后来出现问题的时候，双方又会发生冲突的现象。

村

我是三井文库的村和明。我的发言跟大家的议论有些不同。我想谈的是，资料的保存问题和与历史认识相关的问题。有关这一点日本学者也涉及了一些，佐藤雄基先生谈到了日本的资料的保存问题，三谷教授谈到了日本对蒙古冲击的看法等问题。

在日本，蒙古袭来时代的资料要保留下来的话，一般来讲最多的应该是亲身经历过战争的武士们留下的记录，但是中世时期武士们留下的资料后来留下多少了呢？实际上比率很小，与元寇相关的资料也不例外。相对来说比率较高的是寺庙、神社等宗教设施。保存在佛教、神道等宗教设施的资料总体来讲比率很高，而由中央政府编纂并且保存下来的资料几乎为零。我想谈谈这个问题对后来日本的蒙古记忆带来的影响。

佐藤雄基先生刚才提到日本方面留下的记录有限，我也持同样看法。后来的日本以这些仅有的记录为基础，有意识地回顾蒙古冲击时期往往都是国际局势处于动荡的时期。其中之一就是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时代，也就是入侵朝鲜、或者葡萄牙和西班牙侵入日本的时代。第二个是近代伊始，武士时代终结的19世纪。以天皇为中心的近代国家形成的时期。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讲的内容只是我的假设，因为是宗教设施保留下来的记录，所以回顾本时期的时候，必然会带有神话色彩。与其说是有技术性的、现实性的、普通老百姓的记录，不如说经常被描写成有神仙出场的近乎神话的故事。因此，日本是神国的意识每当面临动荡时期就会复苏，有时还会稍加变形进行重新建构。

就这一点，我想再稍微展开一些，作为抽象问题来谈谈。资料帮助我们与过去坦然相见。我们见到的是制作资料的人以及资料形成的时代。另一方面，资料并没有穿越时空来到现在。是流传至今的。资料流传至今的历史过程当中，曾经被什么样的人拥有过，或者被藏匿过？能读到这份资料的人群有些什么样的变化？为此，围绕资料的记忆又是如何变化至今的？当我们像这次论坛一样，就经历相对较长的时期而形成的帝国的过程以及影响等问题进行思考时，就像葛教授指出的那样，需要我们超越国家、民族、语言的束缚进行审视的时候，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就会变得极为重要。这不是从前的记录与现在的我们的简单的面对面，而需要弄清谁读过，

谁没有读过，其间的关系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我认为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是我们这些被现代国民国家分隔开来的研究者在一起谋求解决颇为棘手的全球化帝国问题的研究中，共同分享问题意识的有效方法之一。

山内

我想谈谈最开始有关册封、朝贡的话题，刚才已经有很多学者进行了发言，谈到撰写史料的人的立场，或者是场所、年代。史料就是在这样那样不同的情况下形成的，但是更为根本的问题是，讨论东亚历史的时候，前近代以汉文史料为主。也就是说，在当时，很大程度上偏重古汉文和汉语。刚才提到的册封和朝贡也如此。使用汉语的话自然只有这种表达方式。如何区别表面上的汉语表述与实际情况的不同呢？在日本、朝鲜半岛和中国的古汉文史料中，朝贡和册封等表述都一样。我所关心的是，如何区别不同，实际情况到底怎样？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很多方法，我尤其期待的是第四部分的报告内容，二位学者谈到了衣食住的问题，这是构成所谓的社会基层的主要内容。不是掌权者之间的关联所构成的世界，而是社会基层的关联。能够解读这些方面的话，对古汉文、汉语的偏重就会得到缓解，这一点令人期待。

榎本

我是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榎本涉。我想谈谈这次论坛的总的印象。总共11个报告的内容都很充实。以下是我个人的想法。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全球化，几乎所有的报告都是考证蒙古这一空前的庞大帝国形成、扩张的过程，以及受到冲击的一方为生存如何制定各种战略。我认为基本上就是以考虑国家和统治阶层的问题为主。但是就像白宫和霞关（日本主要官厅所在地，译者注）交流密切，因此实行相近的制度一样，这种现象称得上是全球化吗？我倒是认为，只有信息、文化、流通的交流达到密切的程度，才能叫做全球化。也就是说，虽然这种结果的前提需要上层的交流，全球化的重要指标之一则是物品和信息的流通超越以往的范围，跨越国境。政治上的交涉说起来就是前提。本次论坛在前提方面的内容非常充实，而其结果则带来了怎样的全球化的世界呢？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还知之甚少。而全面涉及这个方面内容的应该是第四部分的两位教授的报告。如果今后还会组织这方面的讨论的话，我希望更加突出这一主题，主要讨论“在前提之下产生的交流”。从这一点上看，贵田先生从事的货币研究也非常重要。这些都是文化的问题。

其次，刚才谈到资料的问题。14世纪以后，日本和高丽留下的资料有趋于相近的现象。比如诗文集、语录等等，13世纪以前日本和高丽也都有，可是14世纪以后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我在思考这或许有些关联。有种可能是，在元代，蒙古出现了一种从蒙古语直译过来的古汉语文体，非常奇特，而这种直译体也进入了高丽。我觉得这种现象对后世也产生了影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韩

我是高丽大学的韩承勋。我的专业是韩国近代史。各位学者们的报告和讨论对我来说就像听外星人讲话，感到非常高深。听了报告后，我在脑海里模拟了许多场面，这场“国史之间的对话”之后，接着就是朝鲜出兵（文禄、庆长之役）、19世纪、然后进入20世纪。到我这个年代，对话会如何展开呢？与这种模拟相关，这次报告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的是，尽管有政治上的对立，和平、稳定、宽容、灵活性将人们的生活带向富饶。如果想把这个结果运用到近现代的话，又会是怎样？我

不禁浮想联翩。

然而，事实上近代史面临着很多困局。当然较大的原因是政治纠葛带来的冲击，伴随政治纠葛和对立而制作的史料比和平稳定的相关史料要多得多。我不太懂，但是估计13、14世纪的史料就是如此。这就是我的一点看法。大家的议论中提到了“冲击”这个词。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冲击”比较显而易见，而政治冲击也不能忽视。我稍微走一点题，西方冲击，也就是西欧人侵略东亚，他们理解东亚的方式之一，就是更多地集中在与东亚的纠葛和对立上，而不是东亚历史的和平与稳定。那么，为什么朝鲜和日本关系不好？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提到文禄、庆长之役。

另外，我对向教授报告的最后部分的印象也很深。就是政治纠葛的部分，我认为有真实的史料，也有在内部夸大其辞的成分。我得到了研究中如何对待这种史料的答案。这个答案也适用于近现代史研究。虽然我的专业不一样，但是收获很大，非常感谢。

洪

与史料相关，昨天榎本教授向额尔敦巴特尔教授提问的是，为什么蒙古语中高丽不叫高丽？我想边介绍契丹文字的解读研究情况，边进行说明。契丹文字中，征伐高丽的文字已经能解读，把高丽称为“šulwur”。这个词与蒙古语的“solong□o”，满语的“solho”一样，都是对朝鲜半岛王朝的称呼。“šulwur”出现在契丹碑文上。目前研究界认为“šulwur”这个单词本身可能来源于三国时代的新罗。

我觉得这个观点很有说服力。因为契丹与高丽打过仗以后，历史上有过一场“徐熙（高丽外交官）的外交谈判”。契丹将军问“高丽明明源自新罗，为什么要向北方扩张领土呢”？高丽没有正面回答，反驳道高丽本身就是从高句丽而来，“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向北方扩张”。谈判中又个叫孝逊宁的契丹人，他就理解成了高丽王朝的名称大概叫做“šulwur”。我觉得这个词后来影响了蒙古语和满语。我就补充这些，谢谢大家。

赵阮

听了各位的发言，让我想到了很多。我在研究“达鲁花赤”中看到各种不同的史料，历史上出现达鲁花赤（掌管占领地的首长）后，在高丽史上，成为与有威胁的“征服者”或“侵略者”的形象。据史料记载，一共派遣了72个达鲁花赤，他们被同时杀害。对立如此尖锐，他们往往被描写成诱发矛盾的人物。但是元的后期，查阅派往江南、中国地区的达鲁花赤的相关资料，他们都是很友好的形象。

因此他们在汉人当中成为施行善政、统治良好、体恤百姓、解决地区问题的友好形象。墓志铭就有这样的内容。哪种史料，哪个时期，是墓志铭，或是国家的正式资料等，资料不同，描写达鲁花赤的内容也不一样，整个元帝国的形象就更不一样了。

即便元代有各种各样的史料，也存在不少问题。元帝国的形象和历史事实都存在不连续的现象，有一定的局限。不过就像朝克图教授所说，有必要通过不同语言还原真实的历史。比如“元史”，只花了三年就编纂出来，这的确存在问题。而且，各种史料是在怎样的背景下编纂，编纂时期等都需要进行梳理、把握，这样的话，这些史料就有充分的利用价值。我们有必要一起综合性地开展蒙古帝国史研究。

刘 非常谢谢。大家的发言都很重要。最后我想请两位正举手的学者发言。

荒木 我是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的荒木和宪。我的专业是15-16世纪东亚交流史。我的发言只是一些感想，是关于资料方面的。我对本次论坛的主要印象就是我们似乎面临一种困境，就是只能在正史上开展研究，比如高丽史、元史等，都是正史。15-16世纪的日本没有这样的正史，所以大多使用原始文本，比如记录（抄本）等一手资料。就像朝鲜的《朝鲜王朝实录》、明的《明实录》一样，这些资料在同时代比正史更可靠。如果把两种资料组合起来，我觉得更容易展现交流史。就本次论坛所设定的时代，大家都从正史去考究，我想这是有弊端的。翻开《朝鲜王朝实录》，就会发现，在某个决策出台之前，各种意见记录得非常详细，从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当中，到底哪个成为最终决定，这个过程相对清晰。与之相反，正史中叙述的只有结果，或者只记录众多意见中最终被采纳的那一个。所以我感觉阅读正史的时候，一定要意识到每一项决策的背后都隐藏着很多可能性，最终决策只是其中之一。

还有一点，我在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工作，对我们来说，历史并不意味着仅限于文字资料，正如山内先生提到的那样，保存下来的各种文物资料也非常重要。从这些文物中能读出什么？然后与文字进行对照，才能把握真正的历史。我们是站在这种立场上进行研究的。如此说来，与文字资料相比，考古学的成果、遗迹中挖掘出来的遗物等文物虽然显得无声无息，但正是因为沉默不语，所以没有更多冗余的信息，我们就能从这些考古文物和考古学成果中读出一些名堂。如果能意识到这一点的话，我想国史研究就会从国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彭 我是大阪市立大学的彭浩。我有很多想请教的地方。因为时间所限，请允许我只提一个简单的问题。我的问题与荒木先生的资料问题有关。我在研究中经常使用近世18世纪时期的一手资料。听了大家的发言后，感觉蒙古帝国时期的一手资料非常欠缺。但是，朝克图教授的发言中提到，虽然有蒙古语资料，但是利用率不高，不太受重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我比较关心的地方。特别是这次论坛的关键词是外交交涉、政治统治等，到底有没有相关的蒙古语资料？数量有多少？如果有很多的话，为什么不利用起来？这是我的疑问。

刘 感谢二位。我们的综合讨论到此结束。最后请三谷教授进行总结发言。

三谷 我们的论坛持续了一天半，各位学者的报告和发言都很充实，衷心感谢大家。昨天的报告内容比我想象的要丰富，我原以为今天的讨论已经没有什么话题了，但是大家的发言非常踊跃，时间很快就不够了。作为本次论坛的策划者之一，我感到非常高兴。

我自己对今天的讨论内容也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应该更深层次地看待冲击和国际交流等。我非常赞同榎本教授的观点。打个比方说，蒙古的公主嫁到高丽，生了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到底是在父亲一方家长大，还是在母亲一方家长大的？我听说，一般来讲，在朝鲜半岛，孩子一直是在母方家抚养长大的。那么，对于从蒙古嫁过来的公主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冲击呢？家庭结构不大容易发生变化，所以一旦

能看出某种变化的话，应该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课题。

在这里，我最想感谢的是参加这次论坛的各位学者。大家在和悦的气氛中进行学术探讨，即便意见相左，也能够在倾听对方的前提下进行反驳。我想本次论坛最重要的目的已经达到。非常感谢大家。论坛后的学术考察也是交流的重要机会，希望每位学者能找到更多话题，为自己今后的研究创造条件。

同时我们要特别感谢同声传译的各位老师。我开过类似的研讨会，但是很少有像这次会议的翻译这么清晰易懂。为表达谢意，让我们为同传老师送上热烈的掌声。

最后，让我们衷心感谢主办方渥美财团。他们的工作非常完美。请大家热烈鼓掌（掌声）。

代后记

1

第2次 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蒙古袭来与13世纪蒙古帝国的国际化”圆桌会议报告

金罔泰 高丽大学

第57次SGRA论坛在北九州市召开，主题是“第二届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蒙古袭来与13世纪蒙古帝国的国际化”）圆桌会议”。我们不妨作个比喻，如果说去年秋天召开的第一届会议是“序曲”，旨在建设对话沟通的平台的话，那么本届会议汇集了中日韩三国的青年才俊，旨在进行一场有深度的对话。

在2017年8月7日后三天的时间里，此次于北九州国际会议场举办的会议陷入了临时取消的危机。天气预报称，观测史上第二缓慢的10号台风预计将缓速经过九州北部，所幸台风对交通设施的影响很小。然而，因部分航空公司调整了起降时刻，出现了个别韩国籍参会人（包括我在内）迟到的现象。

开会第一天举行了开幕式和基调演讲。SGRA代表今西淳子女士发表开幕式致辞之后，三谷博先生（跡见学园女子大学）宣读了会议宗旨。三谷先生表示，在过去，以东亚史为背景展开的种种历史研究之核心在于如何评价20世纪上半叶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三谷先生认为，一方面，过去的历史研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良好的进展，而在另几个方面来说，过去的相关研究可谓是失败的，最明显的教训，则是国家出面干预必然招致失败。与之相反，以个人组成的会议，参会人士之间只要有相互理解对方的心态，就能够取得成功。三谷先生进一步指出，计划召开5届的本系列会议，以贯通前近代与近代以后的所有时代为目的，安排第一至第三届的主题为前近代。最后，三谷先生强调，此次会议最核心的目的，就是准确理解各方的学术发表并提出问题。

葛兆光先生（复旦大学）在发表基调演讲“后蒙古时代？——重新审视14-15世纪的东亚史”中表示，聚焦公元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期的东亚世界，我们不难看出蒙古帝国已然衰落，王朝林立，且王朝之间的关系（并不仅限于朝贡体系）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葛兆光先生提议，分析这段时间的东亚史可以从中发现近代东亚政治格局之萌芽。我认为葛先生的一番话，对于相关史学者而言也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8月8日是论文发表环节，分为四个讨论小组，共11篇论文。第一讨论小组由四日市康博先生（昭和女子大学）、朝克图先生（内蒙古大学）、桥本雄先生（北海道大学）负责发表，主题是“蒙古袭来”的历史意义，以及如何从各国、世界史的视角定位“蒙古袭来”。第二讨论小组由额尔敦巴特先生（内蒙古大学）、向正树先生（同志社大学）、孙卫国先生（南开大学）负责发表，主题是通过各种史料考究蒙古袭来所带来的文化技术的影响。第三讨论小组由金甫枕先生（嘉泉大学）、李命美先生（首尔大学）、其林道尔吉先生（蒙古国科学院）负责发表，主题是被蒙古帝国所侵略并长期对抗的高丽为案例，多维分析蒙古帝国统治形式。第四讨论小组由赵阮先生（汉阳大学）、张佳先生（复旦大学）负责发表，以食物和帽子为切入点，分析蒙古帝国对被统治地区造成的长期和体系化的物质文化影响。每个讨论小组的发表人都在其他讨论小组环节中积极提出了问题。

8月9日上午，以昨日圆桌会议讨论为基础，会议进入综合讨论环节。本环节

虽然不同于普通的日本学术大会，但是我认为，经过了一晚上的知识沉淀后，参会人士的提问与评估能够更切合会议宗旨，效果良好。此日由赵珖先生（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整理总结论点。赵先生表示，昨日圆桌会议以“蒙古袭来”和“全球化”为关键词展开了有深度的发表和热烈的讨论。先生进一步指出，蒙古帝国是第一个实现全球化的帝国，我们聚焦这一时期中日韩三国的历史演变，就能够明确了解到何为全球化，且不能止步于这一时期的全球化，我们更需要关注全球化和全球在地化的内在联系。赵先生总结道，由四个小组构成的圆桌会议，能够涉及到政治、统治形式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在分析各国国史的同时，视野并不局限于一国的立场，从东亚世界的维度俯瞰蒙古帝国，开阔了视野，堪称跨国学术会议的典范。

综合讨论主持刘杰先生（早稻田大学）提出了五项讨论主题。第一，如何评价蒙古帝国的影响；第二，册封体制与朝贡；第三，蒙古帝国到底是蒙古史还是中国史，双方应该以何种形式进行对话；第四，从高丽到朝鲜，在韩国史上的中国是如何被定位的；第五，史料批判。随后会议进入了自由讨论环节。从上述五项当中，册封体制、蒙古史以及史料批判成为讨论环节的焦点，参会人士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会议最后，三谷博先生作了总结讲话。三谷先生表示，本次会议历时三天，非常充实。三谷先生作为实行委员，在此向参会人士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并提出本次讨论之中，有关“全球化”的分析有所欠缺。三谷先生总结称，希望今后三方人士能够继续举办国史对话，再接再厉。

9日下午SGRA组织了一场参观活动。我们参观了蒙古入侵九州北部的部分重要地点。元寇纪念馆和筥崎宫作为史料馆令人印象深刻，同时向我们抛出如何记忆并评估历史的问题。随后我们雨中探访了生松原元寇防垒筑地。面临此情此景，我不禁陷入一场想象和深思；800年前试图从此地登陆的蒙古联军，和观望蒙古联军的镰仓武士，在相互对峙时，双方兵马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会议期间，各国研究者交流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在此过程中的苦恼，讨论和建议如火如荼。当时存在的国家或王朝的领土范围并不与现代国家的概念或国界相一致。从这一点来说，蒙古国籍史学家的参会意义非凡。我认为，国际会议最大的难关是语言关。多语种口译必然花费不少时间。因此，国际会议往往出现不翻译提问、辩驳的现象。所幸的是，此次会议三天时间里，SGRA提供了同声传译团队，各国研究者能够坦率地沟通。我在此向渥美财团和同声传译者致以最崇高的感谢。

对于本次大会，每个人都应该有不同的感受。但我坚信，参与的各位都会同意本次大会取得了重大成果，并提出了众多课题的。经过此次会议中被提出来的基础性问题，我们重新获得了东亚这一空间，不同时期的朝贡关系分别具有什么样的实质，和如何跨越被固化的各国历史认识等等论点。国史对话被计划举办五届。我们不能丢掉已有的成果，不能停止甚至倒退。我们需要巩固成果，进入下一个阶段。明年夏天举办的第三届会议，主题定为在近世震撼了整个东亚的战争，以及如何转向和平的世纪。我衷心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对本系列会议感到兴趣并积极参与进来，为东亚带来拥有可持续发展的史学的时代。

（本文译自SGRA瓦版：金同泰“第二届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蒙古袭来与13世纪蒙古帝国的国际化”）圆桌会议”）

代
后
记

2

第2次 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重启东亚历史对话——北九州蒙古袭来会议”

三谷博 迹见女子大学

2017年8月7日，“国史对话”圆桌会议拉开序幕。虽然说本次会议是此系列会议的第二回，然而事实上，去年召开的第一次会议是预备会议，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本次会议就是第一次正式会议。东亚各国拥有独立的“国史”，相互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召开“国史对话”的宗旨就在于试图填平鸿沟，达成某种意义上的共识。“国史对话”由渥美财团常务理事今西淳子女士命名。

我们计划组织四次圆桌会议，以涉及东亚国际关系的历史事件为主题，邀请各国国史学家进行讨论。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元寇”（日方指代蒙古入侵日本的历史术语），以此为起点，每次会议逐次推进时代，讨论各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

本系列圆桌会议选择涉及东亚各国的历史事件作为主体，被邀请的人士自然以国际关系专家为主。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邀请了日韩国史专家。本次圆桌会议的核心目标还有下述两点：一、本国史专家平时并不关心国际关系史以及其背后隐藏的政治目的，所以我们想考察当这些史学家将如何应对本次圆桌会议；二、本国史专家是否认可本次圆桌会议的意义。因此，我们组织了中日韩三国同声传译团队。历史学术语晦涩生硬，传译的难度可想而知。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团队的表现依然可圈可点，在此向同声传译团队致以衷心的感谢。

我们选择“蒙古袭来与13世纪蒙古帝国的国际化”这一主题，就是旨在——无论对话的结果好与坏——让东亚各国国民坐到对话桌前来。在21世纪初，东亚各国一度积极组织共同历史研究，然而本次会议如果生搬硬套当年的会议形式，那么日本人只能自动坐到被告席上。如此一来，跨国学术会议便不能满足平等对话的条件。何况在如今领土纷争日趋紧张的国际形势之下，日本学者淡出东亚跨国学术会议呢。

因此，“蒙古袭来”这一主题的特点就在于时代久远，各方人士可以对此历史事件保持心理距离。那个年代的东亚三国国民，以时下流行的词汇来形容，那就是“大家都是受害者”。高丽被置于蒙古帝国的严格统治之下；中国出现了蒙古王朝；日本成功抵挡住了蒙古袭来，损耗却巨大。正是因为三国都是受害者，所以本次会议具备了进行冷静客观讨论之条件。我们虽然邀请了蒙古史学家，但他们并没有被视为侵略者之子孙后裔。日本人普遍接受蒙古相扑选手剑指横纲之位（译者注：日本相扑运动员的最高级称号），没有把蒙古人与元寇联系在一起。在此次会议召开期间，韩国史学家也不曾表现出谴责蒙古史学家的态度。

虽然如此，本次圆桌会议也不是完全处在政治“磁场效应”范围之外的。元朝究竟是也可蒙古兀鲁思（译注：蒙古帝国的蒙语名称）的一员呢，还是中国的一个朝代呢？来自蒙古人民共和国、内蒙古省的蒙古史学家，以及汉族史学家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我没能完全理解三方人士意见的方方面面。葛兆光先生指出，对于元朝的属性问题，中国国内史学家当中，也有人认为元朝是具有双重性的。在国际史学界当中，以现今国家之政治结构直接映射古代世界常常被视为是一种时代错误（anachronism），史学家予以猛烈的批评。然而在东亚，各方政府和舆论往往

掉入时代错误的陷阱之中。试问这种自掘坟墓，见笑大方的行为是否算是明智之举呢？

本次圆桌会议，以下三个场面留给我深刻的印象。首先是四日市康博先生的发表。四日市先生指出，忽必烈其实积极筹划第三次对日侵略行动，过早来临的死亡断送了他的计划；越南和爪哇（元朝居然侵略如此遥远的国家！）在打赢保卫战之后，立即向元朝朝贡。日本在打赢保卫战之后，虽然重启了贸易活动，但并没有积极修补外交关系。我不禁感叹日本对于国际关系的迟钝，以及背后隐藏的天然孤立性。

其次，蒙古统治之下的高丽也是印象深刻的。假如日本被蒙古征服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天皇家族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也有可能延续下去。就像李明美女士在发表当中所提及的那样，天皇家族的分支极有可能效仿高丽王室而选择依附元朝，迎接元朝公主下嫁。我认为，这场思想实验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天皇制度这一近代日本史的难题。

提到高丽，赵阮教授介绍的饮食文化变迁也饶有兴味。高丽王朝所信奉的佛教原本禁止荤腥，在蒙古统治之下食肉习惯蔚然成风。政治统治即使结束了，形成气候的饮食文化是不会有变化的。在俯瞰历史长流时，我认为生活文化史的重要性甚至是超过政治史的。家族结构、男女关系的变化也是社会结构的重要支柱之一，这种两因素是否在经历异族统治的过程当中出现变数呢？就李氏朝鲜而言，直到19世纪初为止，一般是母亲的家族负责养育子女。那么，蒙古公主所生的孩子，究竟是在哪里长大的？是宫廷内？还是在宫廷外？再者，按照中世纪蒙古的习俗，孩子由父母哪一方家族来负责养育的呢？一环扣一环，在我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各种疑问。

当我们站在观察整个东亚地区的历史变迁的立场时，本次圆桌会议的研究发表的意义，在于揭示了当时的国际关系，并启发了当时各国社会结构之变动。不知在场的日韩国史专家作何感想。我相信两国专家是聆听了会议发表的，但如果这些老师们能够进一步积极参与会议当中来，向发言人提出问题的话，我想讨论会更加精彩。我在综合讨论的结尾引用了某位老师“出席国际会议不提问，就得挨罚款”的名言警句，敦促诸位发言。我原本打算在会议开场引用这段话的，无奈忘记说出来，真是后悔莫及。邀请人士不鸣则已，一鸣则惊人，提出来的问题各个都有见底。我真心希望下次会议的邀请人士积极提问。

会议历时三天，由于第二天全天安排了发表，我在第三天早晨做综合讨论时，坦白而言，困顿不已。然而，负责主持的刘杰先生做出了精彩明晰的总结概述，韩方负责人赵珖先生也言简意赅地整理各个发表的论点，为综合讨论做了良好的铺垫。赵先生在百忙之中赶来参会，实属难得。我相信，下次在首尔举办的会议，必将更加有趣，有意义。

（本文译自SGRA 瓦版:Essay547:三谷博“重启东亚历史对话—北九州召开的‘蒙古袭来’会议”）

第2次 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历史家的立足点

孙军悦 东京大学

当为期三天的会议进入尾声，同行间的交流愈益融洽，专业性的讨论也越加热烈，原本应该为盛会欣喜的我却反而感到了一丝困惑。作为一个历史学的外行，之所以来旁听“国史对话”，一个重要理由是这场论坛和历史学界内部的国际学术会议有所不同，其主旨是为了在东亚各国民众之间的历史和解迟迟没有进展的状况下，思考历史家能够为此作出何种贡献。尽管学者们的发表精彩纷呈，但随着讨论的深入，话题也越来越专业，而话题越专业，气氛也就越来越热烈，几乎没有发言有意识地将论坛的内容和主旨，历史学家高度专业的研究和普通市民所面临的现实课题联系起来；历史家们的报告和讨论也几乎无法让我这个外行感受到有关700年前的历史叙述和现在之间的内在联络。这就不能不使我产生一个朴素的疑问：历史研究是否应该泯没学者自身的历史性？而感受不到学者自身历史性的历史研究是否可能？如果可能的话，这样的研究将如何与现实中民众的历史意识发生关联？在今天和未来，又将发挥怎样的现实功能？

当然，现场报告和讨论因受到各种限制未必能全面表达报告者的想法，如果仔细阅读论文，也可以从中窥见一些历史家对历史和现实之间关联性的把握。例如，有一篇论文在介绍甲午战争后所发起的建造元寇纪念碑运动的背景时写道：“在日俄战争爆发前夕，明治日本一方面要对抗欧美列强，一方面又要制定国家的生存战略。这和今天我们所处的状况不无相似。”而在提及2015年出版的以元寇为题材的漫画时指出：“漫画中象征着高科技的火药武器，同时也象征了对于时隔730年作为先进的军事大国重新在海上崛起的邻国的恐惧心理，显示了人们内心的不安”。可以说，这段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论者对现实的认识，以及把握历史与现实之间关联的角度。同样涉及明治时代和今天重提“元寇”历史的含义，为我们说明元寇史料馆由来的NPO法人志贺岛历史研究会的冈本显实先生的解说，则显示了另一种不同的视角。冈本先生明确地把建立于1904年的元寇纪念馆作为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1945年战败的日本军国主义的起点，并提醒我们注意1904年为鼓吹爱国主义建成的“元寇纪念馆”和战后为批判军国主义而保留的“元寇史料馆”的意义之不同，同时将发生于72年前的“今天”（我们参观元寇史料馆的日期正是8月9日）的长崎原子弹轰炸的牺牲者视为元寇纪念馆的牺牲者。冈本先生的历史知识显然属于常识范围，但他对于包括自己的发言在内的“历史叙述”这一行为本身的历史性与政治性却具有高度自觉。或许，和习惯于从国家的角度来把握历史，对历史事实及作为史料的展示品本身的真伪更有兴趣的专家不同，普通市民对历史执拗、持续的关心往往来源于现实中强烈的问题意识，他们更关注历史中民众与个人的命运，在叙述历史时首先会自问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地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叙述这样一段历史。

当然，历史家不能站在自己的政治立场上以现代的价值标准来衡量历史早已是学术研究公认的前提，但笔者以为，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家在叙述历史的时候必须泯却自身的个性或主体性。丸山真男在提及书写思想史的困难时这样谈到：“在写作思想史的时候，无论这种思想的立场和观点与自己如何格格不入，都不能采取超然的态度一刀两断，而需要一度进入这一思想的内部，尽可能忠实地从内部的展望来观察体会这一思想。……在此基础上重要的是，在内在地把握了各种思想的同时，还必须使自己的立足点自然而然地渗透

进思想史的叙述中，否则就会陷入这也‘理解’那也‘明白’的相对主义，无法进行真正的历史定位。”

没有“自己的立足点”或对现实强烈的课题意识也能够进行历史研究，或许是特别尊崇坚实的实证主义学风的日本近代史学的一个特质。然而，正如中世史家石母田正在战后所指出的，在史学史上留下巨大成果的历史家对具体现实的把握有时却出乎意外地贫困，在现实中也未必能发挥正面的作用，这也是近代日本史学史留给我们的教训；所以他才会批判以往的所谓“实证主义史学”只停留在史料批判技术层面的“实证”而缺乏真正的实证主义精神，是无目的、无思想、无性格的学问；并指出了成立于甲午、日俄战争期间的东洋史学所取得的卓越业绩，和其在现实中对中国的“古代文化抱以同情与尊敬，对现在和将来抱以轻蔑与绝望，试图将老大国的骨肉解剖殆尽的客观、冷峻的‘学问’态度”之间的严重矛盾。

丸山真男对“立足点”的主张，当然并不是要求先把自己的立场、观点搁置起来，通过彻底实证的研究恢复历史原貌，再根据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来进行历史定位。如果历史家的“立足点”外在于其把握历史的整个过程，即便能够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立足点”反映在历史叙述中，也不可能使其“自然而然地渗透进”历史叙述中。我以为，历史家的“立足点”应该形成于生活在现实中的历史家的内部，它不仅需要通过专业的学术训练，更需要通过在“现实”这一具体的历史场域中日夜磨练，才能作为从内部来历史性地把握所有事物现象的方法、能力和感觉，化为历史家的个性，自然而然地渗透进其主体性的历史研究和叙述的过程中。我相信，一个切切实实地在现实生活中感受着过去与现在的紧张、对未来抱有展望的历史家，不仅能够传授给我们通过辛勤劳动所获得的充满自信的历史知识，更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贯流于过去和现在、未来之间的历史脉动。

在“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成立7年后的2004年，曾经出现在所有历史教科书上的有关“慰安妇”问题的记述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中消失了。直到2016年，在批判的声浪中，被贴上“极左反日”教育的标签，再次出现于一本教科书上，整整经过了12年的岁月。2017年，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一反往年惯例，拒绝在悼念关东大地震中因谣言被惨杀的在日朝鲜人的纪念典礼上致辞，理由是有关朝鲜人的“屠杀”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不同的历史书中有不同的叙述。我明白要把对时过境迁的历史现象客观冷静的学术分析和带着现实体温的主体性的历史研究与叙述自然而然地融合在一起是一项多么困难的工作，然而在连基本的历史事实都难以得到政治家们充分承认的今天，历史家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多长时间被允许安心埋头于过去？严峻的现实让我不能不对历史家们抱有更高的期望。因为从历史家此时此地的历史叙述开始，未来的历史已经在悄然形成了。

（本文译自SGRA 瓦版:Essay548:孙军悦“历史家的立足点”（改订版））

中文版附记：作为一个历史学的外行，我没有能力对这场圆桌会议的具体内容发表评论。但既然这场会议并不是历史学界内部纯粹的学术交流，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东亚各国民众之间的历史和解，思考历史家可以为此作出何种贡献，那么就不能因为羞于暴露自己的幼稚浅陋，而怠慢了作为一个对未来负有责任的生活于现在的普通市民的义务。这样一种历史主体意识，坦率地说，不是通过在中国的历史教育形成的，而是从日本民众那里学来的。正如上文中提到的冈本显实先生一般，在日本有很多这样的普通市民，非常努力地把为维护人类和平的实践活动镶嵌在了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历史家对于自身的专业研究和现实中政府的政策导向、民众的历史意识之间的紧张关系，对历史认识、历史叙述和现实、未来的复杂关联具有多大程度的自觉，我以为至关重要。我真心希望以上过于直率的感想不过是无的放矢。

第2次 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国史学者对话的可能性

娜荷芽 内蒙古大学

近年,有关民族主义史观以及由此而来的历史教育之弊端问题引起了学界的争论。因此,学者们开始摸索如何从地域史研究这一角度重新解读历史问题。换句话说,在探讨国史问题时首先把拥有共同文化特色的地域作为一个研究范围,旨在通过对地域史的把握发现鲜为人知的史实。

东亚是地域史研究的主要范畴之一。包括蒙古、中国、位于朝鲜半岛的韩国和朝鲜、日本等国。这一地域,正如汉字文化圈这一概念所示,除蒙古之外的国家始终是由海路连接为一体的,相互之间有着数千年的文化交流,并拥有文化共同性的地域。另一方面,从13世纪至14世纪后半叶,上述大半地域也曾是由蒙古人进行政治统合的地区。这一时期东亚文化圈的文化交流异常活跃,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13世纪初,因高丽约定向蒙古进贡,蒙古使臣开始频繁往返高丽,且蒙古方面索取额外贡物之事时有发生。这便是高丽与蒙古最初的接触。例如,自1221年后每年往返于两者之间的著古与便是代表人物之一。1231年,著古与收取贡物返程时在鸭绿江畔死去。此时在蒙古,窝阔台已继承了成吉思汗汗位,成为了大蒙古国君主。窝阔台汗因著古与之死追责于高丽,曾先后6次派遣蒙军,直至1259年高丽全面降服。

不久,济州开始与蒙古接触。济州岛古代建有名为“耽罗国”的独立王国,后被高丽合并。济州位于朝鲜半岛、中国大陆与日本列岛之间,无论主动与否,在地政学上处于与周边地域可进行广泛交流之处。与此同时,也较易被周边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所左右。

至今为止,一般认为济州与蒙古的关系是以对立与纠纷为主,因此有过小评价蒙古对济州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之嫌。之所以出现上述观点,华夷论的影响不容忽视。在大蒙古帝国退回蒙古高原后,具有民族主义史观的一些学者认为汉族是中国的正统统治者,其他民族为夷狄。但最近出现了“换一个角度,即不以国家、民族的视角,而是从济州的对外关系与济州人的生活、文化这一角度进行考察时,会发现济州与蒙古最初的交流对于济州地域特性的形成影响及其深远,至今仍有案例可寻”等提案。例如,当时曾在济州养殖蒙古马,并曾经营国营牧场。现在,被韩国举国列为重点保护品种的“济州马”实为济州本土品种“果下马”与从北方输入的外来品种“胡马”的混血,在大蒙古国统治时期,又与蒙古马或西域马等多次混血的后代。

1265年,忽必烈汗从高丽人处闻知日本曾向中国派遣使臣通好一事,翌年便遣使携书2封前往高丽元宗处。1封书简记内容旨在欲与“日本国王”通好,1封书简命元宗派人护送该使臣前往日本。日本方面则无视忽必烈汗前后数次通好要求,以此为由,忽必烈汗开始着手部署远征日本,日本史称其为元寇或蒙古袭来。

2017年8月7日-9日,4国历史学家相聚北九州,就有关史学研究者如何在东亚“历史和解”问题上有所作为为中心内容召开了“第2届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学者对

话的可能性：蒙古袭来与13世纪蒙古帝国的国际化问题”会议。从东亚的角度来看，蒙古对高丽、日本的侵略在文化层次唤起了各国的自我认识，在政治方面则象征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的瓦解。本次会议，大家都热切期待可从“国史”与东亚国际关系切点处入手，进行多视界多角度的历史考察。

会议第二天，主办方组织与会学者前往“蒙古袭来”遗址，参观了元寇史料馆、箱崎宫、松原元寇堡垒遗迹等。在此，NPO法人志贺岛历史研究会的冈本顕实先生及箱崎宫宫司田村克喜先生做了极具启迪性的讲解。如在箱崎宫的楼门上揭“敌国降伏”匾额，其意一般会被理解为希望进犯而来敌国被我降伏。但据田村先生讲，该匾额上书四字意为敌国被对方之德所折服，进而自行依从，即“以德服人”之意。

为了更好地理解自国历史与他国历史之间的关系，首先应做到了解地域史，并在此基础上为拥有不同观点的学者们创造对话的机会与平台，以便不断深化人类共知的空间。

（本文译自SGRA瓦版：Essay549:那荷芽“国史间对话的可能性”）

代后记

5

第2次 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走向东亚“知识共同体”

彭浩 内蒙古大学

八月上旬，在渥美国际交流财团组织之下，围绕东亚地区“国史对话”的论坛又一次在日本北九州市召开。此次论坛主题设定为《“蒙古袭来”与十三世纪蒙古帝国的国际化》，中日韩蒙四国学者齐聚一堂，针对蒙古帝国的扩张对东亚地区的冲击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作为一名史学研究者，笔者有幸参加，并参与了之前的准备策划，自然不乏感触，借此随笔，聊叙一二。

首先，值得强调的是，此次论坛与一般的国际学术会议相比，有着更广阔的“现实关怀”。虽然以“蒙古袭来”这一历史事件为关键词，但不仅仅是讨论其来龙去脉，或时代背景，而是借此素材，探讨如何摆脱民族国家史观对历史认识的桎梏。许多历史学者已经意识到，在民族国家史观的束缚之下，各国人民的历史认识变得僵化，且易于为政治所诱导，政治诱导下的历史认识又常常会影响到国家间的关系，及国民间的感情。所以克服民族国家史观的负面影响，会有助于我们更冷静客观地认识历史，从而也有益于解决羁绊国家关系走向和解的所谓“历史问题”。

正如许多与会者所言，中日韩三国学者，或者两国学者围绕各国的历史展开的“对话”并不罕见。其中，有政府主导下的“对话”，也有民间针对具体课题、研究方法、史料利用等展开的专业性较高的学术“对话”，各自的主旨和目的也不尽相同。根据三谷博先生的观察，从会后各国“对话”者之间的关系来看，似乎民间层面的“对话”更易于开展。不过民间的史学“对话”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往往趋向高度的学术化和专业化。由于人文研究者易于沉醉于各自的研究专题，不爱过多追求研究的社会意义，这种“习性”或者说“惰性”，往往使得“对话”在如何促进大众的历史共识方面难有长足进展。且民间的学术交流受科研经费影响较大，很多“对话”项目因经费支持问题只得半途而废，难能可贵的交流成果，尚未能在学者之间达成共识，更难言改变普通民众的历史观。

而由此取得突破，正是此次论坛值得期待之处。刘杰先生起草的论坛宗旨中使用了“知的共同空间”、“知的平台”等用语。这里的“知”字意义广泛，包含了汉语中“知识”和“智慧”的双重含义。也即，通过国际论坛展开多角度的学术讨论，以便生成较为可信的历史“知识”；在各方学者确认之后，通过多种渠道进行推广，以致形成全民层面的共识；在此新的知识环境之下，也就容易生成突破国家史观束缚和解决有争议的“历史问题”的智慧。这一点在具体专业性研讨不断深入之际，也特别容易被忽视，为不忘初衷值得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

在做一简单宏观回顾之后，再回到具体史学问题的探讨上来。作为首位报告人，四日市康博先生对于蒙古帝国在欧亚大陆东部的扩张做了全面的介绍。结合其他与会者的发言，可以归纳为：在这种冲击之下，蒙古要素自然影响到中国及其他东亚地区，而另一方面，蒙古在征服中国之后又继续向周边扩张，中国要素也被随之波及周边，造成这些地区“中国化”或“中国化”程度的加深。

近年“新清史”的讨论向我们展现出清朝统治多元一体的形象，如清朝皇帝不仅是中华的“天子”，也是满族和蒙古族人的大汗，还是藏族人的“文殊菩萨”，可

谓面对不同人以不同的面孔。而不仅称号如此，对于不同民族的统治，清政府也采用了各种因地制宜的策略，形成多元复合的政治文化。而与清史相比，蒙古帝国疆域之广，不难想象其统治文化之多元性更为复杂。而做蒙元史研究之际，蒙文史料极为有限，其在东亚的活动主要依赖汉文资料得以还原。由此，在现代人特别是现代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蒙元的形象容易被作为一个汉化的中国正统王朝所认识，而蒙古人作为统治者的主体性和蒙古帝国的文化多元性却难以彰显。近年来杉山正明先生的一系列蒙元史著述，虽然在专家中不乏争议，却通过富含想象力的生动描述，让普通读者也得以领略到蒙古帝国的高度国际化和文化多元性。将这种原本应有的历史感觉，且许多专家在研究中已经获得的历史感觉，通过超越民族国家史观的历史叙述还原于普通民众，仅就于此也值得高度评价。

在论坛第二天综合讨论的环节中，刘杰先生整理出几个重要论点，其中之一就是如何在国史叙述中较为准确客观地传达出这种多元复合的状态。具体而言，与这次话题相关的历史具有鲜明的双重复合性：一是，作为中国史一个时代的元朝；二是，作为蒙古帝国一个局部的对华统治。那么，在作为“公共知”来理解时，应如何处理这一课题呢？对此，与会者提出各种意见，其中，葛兆光先生的发言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在延续现有国史叙述，即作为中国史的一个王朝——“元史”进行记述的同时，增加一些在东亚史，在欧亚史等广域层面应如何理解的叙述。民族国家这一种现存的政治形态虽然有各种弊端和局限性，但还没有在人类史上立即消失的迹象，所以完全摒弃民族国家史观也非朝夕可待之事。这种双重历史叙述有利于纠正单一性“国史”叙述的偏颇，使读者易于获取客观把握历史的宏观视野。

另外，与其后的各个时代相比，缺乏一手史料也可以理解为蒙元史研究的难点之一。对此专家们采用何种方式去克服，也是我较为关心的问题。作为听后感，可以简单归纳如下：根据编者的立场和意图对各类编撰资料进行批判性解读；多方发掘和运用图卷、雕塑、服饰等非文字资料；结合人类社会史的发展常识进行逻辑推测等等。除各位报告人之外，出席此次论坛的多是以其他时代为研究对象的学者，所以此次论坛非但可言“国史”间的“对话”，也为不同时代史学者提供了交流方法论的平台。不难想见，这种交流也同样裨益于东亚各国间“公共知”的生成。

（本文译自 SGRA 瓦版：Essay550: 彭浩“走向东亚‘知识共同体’”）

著者介绍

■ 葛兆光 / GE Zhaoguang

1950年出生于上海。1984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文献学硕士毕业。1992年起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2006-13年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教授。现为该研究院及复旦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曾任京都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台湾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教授。2009年当选为第一届普林斯顿全球学者。专业领域是中国思想史、东亚交流史。主要著作：《中国思想史》、《宅兹中国》、《中国再考》（获日本第26届亚洲太平洋大奖）等。

■ 四日市 康博 / YOKKAICHI Yasuhiro

1996年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毕业。2004年早稻田大学文学研究科博士后期课程学分修满退学。2007年获得文学博士学位。2005/4-2008/3九州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专任讲师（付任期）。2009年~驹泽大学文学部非常勤讲师。2012年~早稻田大学综合研究机构中央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所招聘研究员。2014年~昭和女子大学国际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研究领域为蒙古帝国时期的东西欧亚交流史，海域亚洲交流史。主要著作：《从器物看海域亚洲史--蒙古到宋元时代的亚洲与日本的交流》（福冈：九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版）。

■ 朝克图 / BORJIGEN Chogt

1963年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1980年9月至1984年7月就读于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学院，1984年7月起在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学院担任助教，1985年3月至1987年1月北京大学语言学院学习波斯语，1993年9月至1997年6月内蒙古大学蒙古历史研究所女真语专业硕士就读，1997年6月至1998年3月日本富山大学人文学部外国人研究院，1998年4月至2000年3月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访问学者，2000年4月至2006年7月就读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东洋史博士就读，2006年8月开始就职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2007年升任副教授，2012年聘为教授。主要著作：《成吉思汗的法》（山川出版社，2010年），从1990年代起先后发表三十余篇有关蒙古帝国、元朝历史的学术论文。

■ 桥本雄 / HASHIMOTO Yu

1972年生于日本东京。1995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2000年，东京大学博士课程满期退学，2004年获得博士（文学）学位。曾任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九州国立博物馆成立准备室、学艺部研究员，现为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中世时期的国家交流史和文化史。主要著作：《中世日本的国际关系》（吉川弘文馆，2005年）、《伪装的外交使节》（历史文化丛书，吉川弘文馆，2012年）、《“日本国王”与勘合贸易 足利将军家为何要向中国皇帝“朝贡”？》（《追溯日本史：外交篇（7）室町时代》，NHK出版，2013年）等。

■ 额尔敦巴特尔 / Eerdunbateer

1967年1月生，男，内蒙古人。1991年7月毕业于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文学学士），1995年于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取得硕士学位。同年，于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蒙古史研究所工作从事副研究员工作，并就读于韩国韩国江原国立大学史学科博士课程。2001年修了。2006年，在江源国立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获得博士学位。2013年9月~2014年9月，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元朝与高丽关系史、韩半岛的历史及文明，以及契丹、女真语言文字研究。主要著作：《简论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的比较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3，1996）、《大蒙古国与高丽》（专著，韩国慧眼出版社，2009）、《高丽王室与元晋王家族的关系》（韩国蒙古学会主办《蒙古学》35，2013）。

■ 向正树 / MUKAI Masaki

1974年出生于福冈县北九州市。1998年毕业于大阪大学文学部史学科（东洋史学专业）。2003年~2005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2007年修完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文化形态论专业）博士后期课程。2007年~2012年任大阪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特任研究员。2013年至今，同志社大学全球区域文化学部副教授。主要著作：《第二章 蒙古口海上霸权的结构与变迁》（秋田茂口桃木至朗编《全球史与帝国》大阪大学出版会2013年，pp.71-106）、《元代“朝贡”与南海信息》（《元史论丛》10中国元史研究会，2005年7月，pp.389-406）等。

■ 孙卫国 / SUN Weiguo

1966年生，男，湖南衡东人。先后就读于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获得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98）、香港科技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01）。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曾赴韩国高丽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香港城市大学和台湾大学为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韩国史、中韩关系史、中国史学史和明清史。

主要著作：《王世贞史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商务印书馆，2007年）、《明清时期中国史学对朝鲜的影响》（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

■ 金甫桃 / KIM Bokwang

2012.05.-2014.02. 高丽大学韩国史研究所研究教授，2014.03.-2016.02. 高丽大学 BK21PLUS 韩国史事业团研究教授，2017.03.至今、嘉泉(Gachon)大学 Liberal Arts College 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领域：高丽的政治制度，权力构成等。

主要著作：《高丽成宗显宗时代太祖配享功臣的选定过程及意义》（2014）、《探究高丽前期鱼袋的概念与运营方式》（2015）、《高丽蒙古关系的进展以及达鲁花赤的置废过程》（2015）、《高丽对蒙论理及“大国印象”-以1231、1232年外交文书为中心-》（2015）、《高丽前期公服制的整顿过程研究》（2016）、《高丽内部达鲁花赤的存在状态及影响-通过达鲁花赤的蒙古统治方式经验-》（2016）。

■ 李命美 / LEE Myungmi

首尔大学国史学系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曾在首尔大学历史研究所、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等地工作，现就职于人文科学研究院，担任研究员。研究国家之间的关系（东亚关系形成方式）以及个人·家族之间关系（蒙古关系形成方式）在高丽-蒙古关系中协调的模式，以及受其风波高丽末期的政治、社会的变动。

主要著作：硕士论文主题为《高丽与元朝王室通婚的开展与特征》、博士学位论文主题为《高丽-蒙古关系与高丽国王地位变化》（2016）、《探究13-14世纪高丽·蒙古关系研究-征东行省丞相驸马高丽国王的多元地位》，惠安）。

■ 其林道尔吉 / TSEG MED Tserendorj

1999年蒙古国立乌兰巴托大学毕业。2010年大韩民国韩国学

中央研究院博士课程毕业。文学博士（历史学）。专业是中世纪韩蒙关系史。

主要著作：《成吉思汗（百科全书）》（合著，乌兰巴托，2006年）、《蒙古历史与文化百科全书》（合著，乌兰巴托，2004年，2006年）、《元史注解》（译自汉语，第I-XII卷，乌兰巴托，2003年）、《三国遗事》（译自韩语、合译者J.Gantulga，乌兰巴托，2009年）、《忽必烈与他的继承者》（乌兰巴托，2015年）、《东西文化交流与阿尔泰》（《亚洲学术研究丛书7》阿尔泰学系列3，合著，亦乐2016年）等。

■ 赵阮 / CHO Won

汉阳大学史学系毕业。中国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主攻16世纪蒙古研究。后就读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课程，以“蒙元帝国期达鲁花赤制度的研究”获得博士学位。后在首尔大学历史研究所进行博士后研究，课题为“17-20世纪蒙元史研究中清朝知识分子的蒙古帝国认识”。曾任汉阳大学比较历史文化研究所HK研究教授，现在汉阳大学和世宗大学任教。专业为蒙元史。目前从事蒙古帝国时期的统治制度及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清代史书中的有关蒙古帝国认识等研究。

主要著作：“明人所看到的16世纪漠南蒙古社会的变化”（《蒙古学》2014），“17-20世纪蒙元史研究中清朝知识分子的蒙古帝国认识—以《元史类编》、《元史新编》、《新元史》为中心—”（《中国学报》2015）等。

■ 张佳 / ZHANG Jia

1981年生，山东高密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学士（2004）、清华大学历史系历史文献学硕士（2007）、复旦大学历史系专门史博士（2011），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元明社会文化史。

主要著作：《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发表论文《元济宁路景教世家考论》、《再叙彝伦：洪武时期的婚丧礼俗改革》、《别华夷与正名分：明初的日常杂礼规范》、《衣冠与认同：丽末鲜初朝鲜半岛袭用“大明衣冠”历程初探》、《明初的汉族元遗民》等十余篇。

第 2 次 国史たちの対話の可能性—蒙古襲来と 13 世紀のモンゴルのグローバル化 圓桌会议参会者名单

	姓名（字母拼写）	姓名（中文）	姓名（日文）	姓名（韩文）	所属
発表者					
1	Cho Won	赵阮	趙 阮	조원	汉阳大学
2	Chogt, Borjigen	朝克图	チョグト	초그트	内蒙古大学
3	Eerdunbateer	额尔敦巴特尔	エルデニバートル	에르디니바토르	内蒙古大学
4	Hashimoto Yu	桥本雄	橋本 雄	하시모토 유	北海道大学
5	Kim Bokwang	金甫枕	金 甫枕	김보광	嘉泉大学
6	Lee Myungmi	李命美	李 命美	이명미	首尔大学
7	Mukai Masaki	向正树	向 正樹	무카이 마사키	同志社大学
8	Sun Weiguo	孙卫国	孫 衛国	손위국	南开大学
9	Tserendorj, Tsegmed	其林道尔吉	ツェレンドルジ	체렌도르지	蒙古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0	Yokkaichi Yasuhiro	四日市康博	四日市康博	오키카이치 야스히로	昭和女子大学
11	Zhang Jia	张佳	張 佳	장가	复旦大学
発表者 / 実行委員					
12	Cho Kwang	赵琰	趙 琰	조광	韩国国史編纂委員會
13	Ge Zhaoguang	葛兆光	葛 兆光	갈조광	复旦大学
14	Liu Jie	刘杰	劉 傑	유걸	早稻田大学
15	Mitani Hiroshi	三谷博	三谷 博	미타니 히로시	跡见学園女子大学
招待研究者（討論者）					
16	Araki Kazunori	荒木和宪	荒木和憲	아라키 카즈노리	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
17	Choi Youngchang	崔永昌	崔 永昌	최영창	国立晋州博物馆
18	Enomoto Ayumu	榎本涉	榎本 涉	에노모토 와타루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
19	Han Seunghoon	韩承勋	韓 承勲	한승훈	高丽大学
20	Kida Kiyoshi	贵田洁	貴田 潔	키다 키요시	静岡大学
21	Mura Kazuaki	村和明	村 和明	무라 카즈아키	三井文库
22	Sato Yuuki	佐藤雄基	佐藤 雄基	사토 유키	立教大学
23	Yamauchi Shinji	山内晋次	山内 晋次	야마우치 신지	神戸女子大学
24	Yao Keisuke	八百启介	八百 啓介	야오 케이스케	北九州市立大学
同時通訳					
25	Ahn Younghee	安暎姬	安 ヨンヒ	안영희	首尔外国语大学院大学
26	Ding Li	丁莉	丁 莉	정리	北京大学
27	Lee Hyeri	李惠利	李 ヘリ	이혜리	韩国外国语大学
28	Lee Jinhua	李金花	李 金花	이금화	口译工作者
29	Piao Xian	朴贤	朴 賢	박현	口译工作者
30	Song Gang	宋刚	宋 剛	송강	北京外国语大学
通訳翻訳サポート					
31	Hong Sung-min	洪性珉	洪 性珉	홍성민	早稻田大学
32	Jeon Sangryul	全相律	全 相律	김상율	东京大学
33	Song Han	宋晗	宋 晗	송함	东京大学
34	Sun Junyue	孙军悦	孫 軍悦	손군열	东京大学
35	Zhu Lin	朱琳	朱 琳	주림	东北大学
実行委員					
36	Kim Bumsu	金范洙	金 範洙	김범수	东京学艺大学
37	Kim Kyongtae	金同泰	金 キョンテ（囧泰）	김경태	高丽大学
38	Li Enmin	李恩民	李 恩民	이은민	樱美林大学
39	Naheya	娜荷芽	ナヒヤ	나히야	内蒙古大学
40	Peng Hao	彭浩	彭 浩	팽호	大阪市立大学
41	Xu Jingbo	徐静波	徐 静波	서정파	复旦大学
オブザーバー					
42	Tao Weishuo	陶 韓烁	陶 韓燦	도위삭	复旦大学
レポート編集者					
43	Nagai Ayumi	长井亚弓	長井亜弓	나agai 아유미	编辑
スタッフ					
44	Imanishi Junko	今西淳子	今西淳子	이마니시 준코	渥美国际交流财团
45	Tsunoda Eiichi	角田英一	角田英一	츠노다 에이이치	渥美国际交流财团
46	Ishii Keiko	石井庆子	石井慶子	이시이 케이코	渥美国际交流财团
47	Honda Yasuko	本多康子	本多康子	혼다 야스코	渥美国际交流财团

SGRA 報告 刊号索引

- SGRA レポート 01 設立記念講演録 「21 世紀の日本とアジア」 船橋洋一 2001. 1.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02 CISV 国際シンポジウム講演録 「グローバル化への挑戦：多様性の中に調和を求めて」
今西淳子、高 偉俊、F. マキト、金 雄熙、李 來賛 2001. 1.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03 渥美奨学生の集い講演録 「技術の創造」 畑村洋太郎 2001. 3.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04 第 1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地球市民の皆さんへ」 関 啓子、L. ビッヒラー、高 熙卓 2001. 5.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05 第 2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グローバル化のなかの新しい東アジア：経済協力をどう考えるべきか」
平川 均、F. マキト、李 鋼哲 2001. 5.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06 投稿 「今日の留学」「はじめの一步」 工藤正司 今西淳子 2001. 8.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07 第 3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共生時代のエネルギーを考える：ライフスタイルからの工夫」
木村建一、D. パート、高 偉俊 2001. 10.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08 第 4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IT 教育革命：IT は教育をどう変えるか」
臼井建彦、西野篤夫、V. コストブ、F. マキト、J. スリスマンティオ、蔣 惠玲、楊 接期、
李 來賛、斎藤信男 2002. 1.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09 第 5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グローバル化と民族主義：対話と共生をキーワードに」
ペマ・ギャルポ、林 泉忠 2002. 2. 28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10 第 6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日本とイスラーム：文明間の対話のために」
S. ギュレチ、板垣雄三 2002. 6.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11 投稿 「中国はなぜ W T O に加盟したのか」 金香海 2002. 7. 8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12 第 7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地球環境診断：地球の砂漠化を考える」
建石隆太郎、B. プレンサイン 2002. 10.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13 投稿 「経済特区：フィリピンの視点から」 F. マキト 2002. 12. 12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14 第 8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グローバル化の中の新しい東アジア」＋宮澤喜一元総理大臣をお迎えして
フリーディスカッション
平川 均、李 鎮奎、ガト・アルヤ・プートゥラ、孟 健軍、B. ヴィリエガス 日本語版 2003. 1. 31 発行、
韓国語版 2003. 3. 31 発行、中国語版 2003. 5. 30 発行、英語版 2003. 3. 6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15 投稿 「中国における行政訴訟―請求と処理状況に対する考察―」 呉東鎬 2003. 1. 31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16 第 9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情報化と教育」 苑 復傑、遊間和子 2003. 5.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17 第 10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21 世紀の世界安全保障と東アジア」
白石 隆、南 基正、李 恩民、村田晃嗣 日本語版 2003. 3. 30 発行、英語版 2003. 6. 6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18 第 11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地球市民研究：国境を越える取り組み」 高橋 甫、貫戸朋子 2003. 8.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19 投稿 「海軍の誕生と近代日本―幕末期海軍建設の再検討と『海軍革命』の仮説」 朴 栄濬
2003. 12. 4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20 第 12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環境問題と国際協力：C O P 3 の目標は実現可能か」
外岡豊、李海峰、鄭成春、高偉俊 2004. 3.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21 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 「アジア共同体構築に向けての日本及び韓国の役割について」 2004. 6.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22 渥美奨学生の集い講演録 「民族紛争―どうして起こるのか どう解決するか」 明石康 2004. 4.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23 第 13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日本は外国人をどう受け入れるべきか」
宮島喬、イコ・プラムティオノ 2004. 2.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24 投稿 「1945 年のモンゴル人民共和国の中国に対する援助：その評価の歴史」 フスレ 2004. 10.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25 第 14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国境を越える E-Learning」
斎藤信男、福田収一、渡辺吉裕、F. マキト、金 雄熙 2005. 3. 31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26 第 15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この夏、東京の電気は大丈夫？」 中上英俊、高 偉俊 2005. 1. 24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27 第 16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東アジア軍事同盟の過去・現在・未来」
竹田いさみ、R. エルドリッツ、朴 栄濬、渡辺 剛、伊藤裕子 2005. 7.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28 第 17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日本は外国人をどう受け入れるべきか- 地球市民の義務教育 -」
宮島 喬、ヤマグチ・アナ・エリーザ、朴 校熙、小林宏美 2005. 7.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29 第 18 回フォーラム・第 4 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韓流・日流：東アジア地域協力における
ソフトパワー」 李 鎮奎、林 夏生、金 智龍、道上尚史、木宮正史、李 元徳、金 雄熙 2005. 5.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30 第 19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東アジア文化再考―自由と市民社会をキーワードに―」
宮崎法子、東島 誠 2005. 12.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31 第 20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東アジアの経済統合：雁はまだ飛んでいるか」
平川 均、渡辺利夫、トラン・ヴァン・トウ、範 建亭、白 寅秀、エンクバヤル・シャグダル、F. マキト
2006. 2. 20 発行

SGRA 报告 No. 0082 (中文版)

第 57 届关口全球研究会 (SGRA) 论坛

日本、中国、韩国国史直接对话的可能性 2

编辑与发行 关口全球研究会 (SGRA)

邮编 : 112-0014 东京都文京区关口 3-5-8

财团法人 渥美国际交流奖学财团内

电话 : 03-3943-7612 传真 : 03-3943-1512

SGRA 网页 : <http://www.aisf.or.jp/sgra>

电子邮件 : sgra-office@aisf.or.jp

发行日 2018 年 8 月 22 日

发行人 今西淳子